

侨夏

拥抱世界的港湾 连接天下的彩虹

| 独家 |

大江之门

江门出海走大洋，洋流星沉动霞光。

喜看侨俊代代出，一代更比一代强！

2022年4月

双月刊 | 总 225 期

国内统一刊号 CN44-1771/D
国际标准刊号 ISSN1003-7373

ISSN 1003-7373



9 771003 737224 04>

定价: ¥30 HK\$40 NT\$128 \$20

广东省侨联主管主办

广东省优秀期刊

家 园

文 李月边

想象燕子，衔来的雨云
洒落春种夏收的节气
季风吹来的天色，飘着水烟
想象一堵危墙，亟需修缮——
异国街头，有辆邮车驶入夜幕

一笔笔侨批在晨曦中抵达
堆砌成碉楼，和碉楼照护的房屋
每块砖瓦显现汗泥凝结的斑驳
与窗台前的猫对望，垄上的耕牛
——饱含泪水，记忆深处愈发清晰

烽火与枪声湮没在青山绿水中
把百年暮鼓敲响在晨钟声里
河岸的古榕，一树鸟声雀跃
像祠堂上祖宗神位的永恒心跳——
漂泊的灵魂纷纷回归

中国红·侨乡红
——南归华侨与家乡的不解情缘
南归华侨是爱国华侨，他们向祖国表达赤诚之心，为建设家乡贡献自己的力量。他们通过各种途径回国，带回资金、技术、人才等资源，促进了家乡的经济发展和繁荣。他们的爱国精神和无私奉献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和弘扬。



作品名称：《中国红·侨乡红》

作 者：李国雄 陈家文

画芯尺寸：180×116cm

材 质：宣纸

创作年代：2021年5月

江门出海走大洋

文 刘迪生（全国重大典型报告团撰稿人）

江门之五邑（“五邑”是指新会、台山、开平、恩平、鹤山），侨星璀璨，光耀世界。这一座人口400多万人的城市，却繁育出海外华侨华人、港澳台同胞500万人，文化影响辐射蔓延至北美洲、南美洲、欧洲、大洋洲和东南亚等107个国家和地区，因此有着海内海外“两个江门”之美称，“中国侨都”之美誉，可谓华夏之奇观奇迹。

近一百多年间，来自江门五邑的华侨华人，集东方文化智慧之精髓，自强不息、奋扬海外、举世瞩目，在世界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等诸多领域中大放异彩，涌现出一大批卓越建树、影响深远的行业翘楚。他们犹如点亮浩瀚夜空的熠熠星光，在恢宏辽阔的中外历史文化之轴上，不仅刻下了个人生命向度，也用一颗颗爱国之心将“中国人”三个字铿锵有力地远扬世界，鼓舞和激励着千千万中华儿女。

他们的名字不能被忘却：前有为推动新文化运动作出卓越贡献的梁启超，经营中国最早期商办铁路——新宁铁路的旅美华侨陈宜禧，中国航空之父冯如，数次筹款支持辛亥革命、成立纽约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支持抗日、被毛主席赞誉为“华侨楷模，光辉旗帜”的爱国侨领司徒美堂，百余年前东北鼠疫抗疫第一人、中华医学会创始人、“中国现代医学之父”伍连德，抗日战争时期“卖子救国”的郑潮炯。近有多次捐资建桥建校支持祖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光学仪器大王”黄克競和胞弟黄祖棠，“江门慈善家”、带头筹办五邑大学的黄球，“南粤慈善之星”的快乐义工、香港著名企业家马观适。他们热心桑梓，造福乡里，

在江门五邑修建学校、医院、敬老院、托儿所、幼儿园、影剧院、图书馆、桥梁、公路、自来水工程、侨联大厦等一大批公益事业，树立了一座座丰碑。政学两界更是人才济济：曾任巴新国第一位华人总理的陈仲民、曾任泰国副总理的陈景镇、加拿大第一位华人总督伍冰枝、澳门特区第三任行政长官崔世安。江门是院士之乡，孕育了34位院士，在全国名列前茅、广东第一，如陈垣、梁思成、梁思永、梁思礼、陈焕镛、陈新滋、朱经武等。还有文化艺术界翘楚中国油画之父李铁夫，“现代中国舞蹈之母”戴爱莲，劳动人民的“红线女”，等等。

他们，正是他们，汇聚成了辉煌灿烂的耿耿星河，谁不仰止行止？而江门人则发挥侨乡的优势，藉由一代代华侨走上了一条更为宽广的大洋海路。随着华侨新生代走入社会，或学有所成，游刃于政坛文渊；或为商界精英，为人类创造财富，成为推动居在国发展不容小觑的后发才俊。

大江之门，因侨而立，因侨而兴。如今的江门被赋予了全新的使命。此刻此时，江门在打造“侨都赋能”工程，建设华侨华人文化交流合作国家平台、华侨华人创新创业国家平台、华侨华人公共法律服务国家平台、全球侨务资讯政策研究和人才培养国家平台等“四大国家平台”，着力提升“文化交流、经贸合作、维护权益、侨务智库”四大功能，在联系服务全球6000多万华侨华人中体现“侨都”担当。

江门出海走大洋，洋流星沉动霞光。喜看侨俊代代出，一代更比一代强！

华夏

2022年4月

双月刊 总第225期

广东省侨联主管主办

华夏杂志社编辑出版

刊名题字：苏 华

《华夏》编委会

主任 颜 珂

副主任 杨春华 刘迪生

编委 柯广宁 钟敏仪

总编辑 刘迪生

副总编辑 钟敏仪

总编辑助理 赵阳欢

视觉设计 广东阅客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美术编辑 骆销冰

社址 广州市天河区体育东路140-148号
广东侨联大厦6楼

邮编 510620

电话 020-38879808

邮箱 gdqlhx@163.com

国内统一刊号 CN44-1771/D

国际标准刊号 ISSN1003-7373

广告经营许可证 440000100021

发行范围 国内外公开发行

承印单位 深圳市精彩印联合印务有限公司

定价 ¥30 HK\$40 NT\$128 \$20



■ 海潮

001 江门出海走大洋/刘迪生

■ 海韵

004 中国侨都·江门/罗开全等

■ 侨政

105 广东侨联纪事/林辅毫

■ 侨史

106 自梳女：一片冰心在玉堂/祥子

110 第二届世界广东同乡联谊大会筹备始末/林千

114 独树一帜的朝鲜华侨组织/李天成

117 一战期间“东线华工”人数探究/胡温旭

■ 撷英

125 歌舞剧《百年侨心》：此岸、彼岸，爱、精神/李宏新

128 刘南威：半世纪的南海情/赵阳欢

137 廖琪：时代的歌者/高小莉

142 又见一片星辉/程学源

146 粤曲名家黎佩仪的子喉骨子腔/莫寒

153 非遗洪拳的传承/赵阳欢

158 张尔腊的爱国情怀/张高徊

■ 拾贝

159 辉映纳西学园地的白族五朵金花/白庚胜

162 梁启超故居游记/张梅

164 一个团子里的幸福史/朱学东

166 品茗之水/刘释之

168 客家山歌在东南亚的传播与融合创新发展/陈彦 陈菊芬

175 波密雪域的嘎朗王朝/王厚基

181 德和里之心/谢锐勤

CONTENTS 目录



- 012 邑水情长 续写辉煌/子言
014 “华侨楷模，光辉旗帜”——司徒美堂/胡良光
016 陈金坚：在美洲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陈文俊 麦博恒
020 冯如：中国航空第一人/乔壹
024 民主革命先驱陈少白/陈长胜
027 李少石：毛泽东主席题词的好党员/马如爱
030 李月英：第一位华人战斗机女飞行员/麦博恒
034 陈宜禧与新宁铁路/梅逸民
039 情倾家乡教育事业的黄球/钟国权
043 伍连德：中国防疫检疫事业的奠基人/余焕权
046 张肖白：加拿大华人“白求恩”/司徒明德
049 陈焕镛：中国植物学界之先驱/马如爱
053 陈子褒：中国著名平民启蒙教育家/陈国汉
056 尤今：登上新加坡文学奖最高荣誉殿堂/麦博恒
- 059 戴爱莲：现代中国舞蹈之母/黄美卿
064 劳动人民的“红线女”/梁小恩
069 伍冰枝：加拿大第一位华人总督/麦博恒
073 唐明照：新中国第一位联合国副秘书长/北京广东五邑侨乡海外联谊会
079 朱经武：高温超导研究的先驱者/余焕权
082 叶玉如：科学界“女性诺贝尔奖”得主/余焕权
085 江门侨刊乡讯架起家乡与游子的桥梁/黎禹君 余泽权 何春图
088 陈文添：从出国“追梦”到回国“造梦”/钟敏仪
093 旧巷色彩/陈灿富
095 江门五邑：天然的华侨博物馆/黄卓才
098 “侨都赋能”工程中的侨界担当/余泽权
- 183 碧海青天夜夜心
——戴维斯·佳七年祭/春子
187 《岭南读碑记》：一个文化人的时代担当/张艳想
189 关于《风一样开阔的男人》的自说自话/章以武
192 牡丹之乡与牡丹秀士
——谈蔡建刚和他的画/胡红栓
- 湾区
196 抚今追昔珠江口/张伟棠
- 200 邓村石屋客家情/罗铭恩
202 惠州三题/徐新路
- 海风
207 哥伦比亚的中国文化和中国移民区/路易斯·康地略
220 法兰克福书展巡礼/艾云
227 东亚四季美学观念的形成及拓展/蒋述卓
234 中餐西传梦华录/王丽华

中国侨都 · 江门





①	②	③
		④

① 2019年正月十三日，开平泮村灯会上的“同心闹灯” 曾卫真/摄
 ② 开平的欢乐宴 黄志耘/摄
 ③ 2008年中国（江门）侨乡华人嘉年华 罗开全/摄





① ②

① 开平水口镇龙塘村何氏祠堂绵延数百载的“抢花炮”活动 曾卫真/摄
② 鹤山鹤城禾谷田心村的客家人在祠堂挂添丁灯 黎永红/摄





①

① 台山斗山村的浮月金秋 曾卫真/摄

②

② 世界文化遗产——开平碉楼，每年吸引大批海外游客前来游览 梁国稳/摄

③

③ 新会骑行爱好者在国庆期间低碳出行 梁国稳/摄

| 独家 |

大江之门

策划 《华夏》编辑部 文 野松（诗人）

大江苍茫，一直向东向南奔流
谁在蓬莱山和铜鼓山之间劈开一道大门
大江之门一开，那座灯塔就牧千重帆影
凌云塔下的少年中国说便成不绝的涛声
而沸腾的热土，裸露的胸襟
自有万千竞逐的骅骝卷扬起时代的风云
那些碉楼不老的容颜，风雨中挺立的腰杆
都在岁月静好中述说沧桑故事与无限思念
而银洲湖之南，崖海之浪
至今依然涌荡着赴死报国的忠魂
小鸟天堂的鹭鸟却如万千归来者
在五邑大地上筑起灵魂可栖的居所
圭峰山大雁山梁金山鳌峰山五台山
静观白沙茅龙笔抒写出天地灵气
铁夫油画中革命者独领的风骚
赤坎古镇演绎新的潮流，沿海高速穿过
大湾区，古劳水乡摇起咏春的诗意
哦，大江之门打开，侨都侨连天下
在园区再造产城融合中续写新的篇章
一个伟大梦想让她盛装鸣笛，出港远航



江陰長江大橋

邑水情长 续写辉煌

文 《华夏》记者 子言

五邑，江门之别称，珠三角最西端的城市，位于珠江流域的西江和蓬江会合处，是闻名遐迩的侨乡。

“邑”者，县也。先秦时期，江门属南越地，有新会、台山、开平、恩平和鹤山五座城邑。秦朝推行郡县制，今五邑地区的新会、台山、鹤山归南海郡管辖，开平、恩平则为桂林郡属地。西汉时，开平、恩平改属合浦郡。三国时，孙吴在今新会和恩平分别设置平夷县和思平县，此为江门建置之始。东晋时，从南海郡划分出新会郡，下辖新夷（西晋时“平夷”改名“新夷”）等县。至隋初，改新会郡为冈州，辖今江门市区、台山、开平、鹤山一带。之后，随着历史的发展，这块区域历经多次建置、撤并、划分，还曾有过“四邑”和“六邑”之说。

“四邑”这一地域概念最早流行于海外华侨圈。近代以来，闽粤沿海居民向海外谋生，其中，新会、台山、开平、恩平的移民最多，且这四县地理接壤、语言相通、民俗相近。漂泊在异国他乡的华侨，为守望相助、共谋生存与发展，或以血缘宗亲，或以地缘同乡，自发组建各种社团，因此这四县的华侨自然就“抱团”成立各种宗亲会馆。1848年新加坡成立的“四邑陈氏会馆”，是首次使用“四邑”这一概念。之后，以“四邑”命名的侨团在东南亚、美洲、澳洲和欧洲等遍

地开花。如1854年澳大利亚墨尔本创建的“四邑会馆”，1906年英国成立的“四邑总会馆”，1919年日本横滨成立的“四邑公所”。此后，“四邑”这一称谓在海外华侨中有着极高的认同度，成为四邑地区侨民心理上的文化地域概念。

“五邑”之说，是在“四邑”的四县加上鹤山。1950年，原属新会县的江门镇被置为专区直属江门镇，1951年1月改为省辖地级市，同年4月1日成立江门市人民政府，1958年4月11日又改为县级市，归佛山专区辖。1983年6月，江门县级市再次升格为地级市，实行市管县体制，管辖旧日的“新台开恩鹤”以及阳江、阳春7个县。后来，行政区域再次划分，阳江、阳春从江门市划出，至2002年新会撤市设区，从而形成今天江门三区（新会、江海和蓬江）四县级市（开平、恩平、台山和鹤山）的格局。虽然“五邑”与今日之江门所辖地域不完全重叠，但这一称谓已被定格，成为今日之江门的代名词。

而“六邑”的说法则短暂地出现在民国时期，即“新台开恩鹤”五县加赤溪县，在1953年赤溪合并回台山县后，这一说法就没有流传开来。

江门五邑人出洋史可追溯至唐代。五邑邻近穗、港、澳，南临浩瀚的南海，境内河川如织，这一地理条件十分方便五邑人开展对外交往和移民活动。从被有关学者称为“经商型的华侨”的



(②)《邑水情长》 谢维健/作

五邑古代出国华侨先驱开始，一代又一代五邑人因各种原因出洋谋生，如蒲公英一样散布世界各地。据有关统计，江门五邑旅居海外华侨华人和港澳同胞有400多万，遍布107个国家和地区。

遍布世界的五邑侨胞灿若星河，如一代大儒陈白沙、“华侨楷模，光辉旗帜”的爱国侨领司徒美堂、中国防疫事业创始人伍连德、中国航空之父冯如、中国近代建筑之父梁思成等，他们将五邑儿女的名字镌刻于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让“江门五邑”的名字名扬海外，成就“中国侨都”的美誉——

他们以勤劳、智慧、诚信的中华民族优秀品格，赢得住在国人民对中国人和中华文明的尊重；他们辛苦拼搏、勤奋学习、努力创业，并积极融入当地，为住在国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们发挥融通中外的独特优势，架起中国与各国人民民心相通的桥梁；他们

念祖爱乡，倾尽赤子之情，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感人诗篇，绵绵情意洒满华夏……

血浓于水，桑梓情深。赋能侨都，再续华章。

今日之江门，正在建设新时代侨都，面向全球展现一个侨乡的担当——深入推进“侨都赋能”工程，打造国内国际双循环重要交汇点，建设华侨华人文化交流合作国家平台、华侨华人创新创业国家平台、华侨华人公共法律服务国家平台、全球侨务资讯政策研究和人才培养国家平台等“四大国家平台”，着力提升“文化交流、经贸合作、维护权益、侨务智库”四大功能，构建联系服务全球华侨华人“高地”，携手海外侨胞共建大湾区、共圆中国梦。

高歌迈进新时代，扬帆奋进新征程。五邑大地新时代奋进的新篇章，依然需要璀璨的五邑侨星，以独特的五邑星光，续写辉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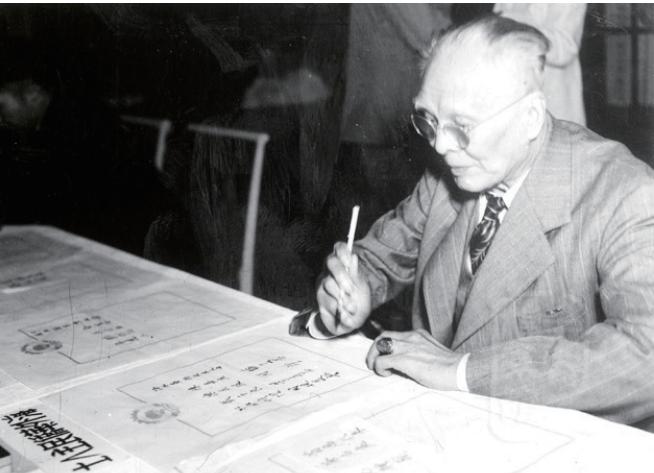
“华侨楷模，光辉旗帜”——司徒美堂

文 胡良光（《南方日报》、南方⁺客户端记者）

1949年10月1日，司徒美堂在天安门城楼上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作为从广东江门走出来的知名爱国侨领、美洲洪门致公党领袖，他曾旅居美国60多年，始终心系故土，与海外广大华侨华人一起，致力于祖国的和平统一和富强工作。毛泽东主席曾为其题词“华侨楷模，光辉旗帜”。

司徒美堂的孙女司徒月桂在北京的住所接受《南方日报》、南方⁺客户端采访时，忆起爷爷司徒美堂，她不时哽咽。这10多年来，退休后的司徒月桂一直通过参加活动、举办讲座等多种方式，宣传司徒美堂的爱国主义精神，将海外华侨华人对祖国的爱表达出来。

“没有国，哪来的家？这颗种子是爷爷种下的，永远在我心里。”司徒月桂说，她会尽己所能，把爷爷的精神传承下去，希望国家越来越好。



① 司徒美堂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签到
图片来源：国家档案局中央档案馆

“一心扑在国家上”

记者：您印象中的爷爷是怎样的？

司徒月桂：爷爷14岁就到美国谋生，当过厨师、做过小贩。他为人刚正不阿，深受侨胞的尊重。虽然身在海外，但爷爷是一心扑在国家上的人，没有为自己考虑。为支持抗日战争，他辞掉其他社会职务，发起成立美国纽约华侨筹饷总局，带动华侨捐款，总额度达1400万美元。1948年回美国时，爷爷说：“共产党救了中国。谁能救民众，我就支持谁。”他在给毛主席的信中写道：“以我82岁的高龄，什么时候召唤我，我什么时候回来。”

记者：司徒美堂先生后来出席了开国大典。

司徒月桂：是的。1949年8月，身在纽约的爷爷收到了毛主席回信，邀请他回国，爷爷马上行动。为了突破特务的阻碍，按照事先约定好的，爷爷在家吃完晚饭后，什么东西都没拿，拄着拐杖到爱国人士的家里。在他们的安排掩护下，爷爷坐上飞机顺利回到了祖国，受到了热烈欢迎。他参加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兼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

1949年10月1日下午，爷爷站在天安门城楼东侧，听到了毛主席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看到了国旗的升起，他的心情肯定是非常激动的。因为他在美国生活了60多年，一直受到不平等的对待，华侨所受的苦他都看到了。现在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腰杆子硬了，他很开心！

记者：您跟爷爷相处多吗？

司徒月桂：从1949年回国到1955年去世，爷爷一直生活在北京北池子83号筒子河边的四合院

里。我是1954年回到爷爷身边的，跟爷爷相处的时间只有一个半月。第一次见到爷爷时觉得陌生，而且爷爷坐的椅子后面墙上挂着一幅画，上面三个人的形象很凄惨，我有点害怕。但是爷爷一搂着我，我就不害怕了，所以我经常在他身边撒娇。

后来我才知道，那幅画是司徒乔先生所作的《三个老华工》，反映的是早期海外华工的苦难遭遇。爷爷心中始终牵挂着侨胞。北池子83号的电话和地址都是对外公布的，爷爷在北京也可以随时收到海外华侨华人的信息。

有一次我想去滑冰，爷爷让警卫员带我去，但在滑的过程中，我不巧被同样的初学者撞倒了，哭着回家，说是警卫员让我摔倒了。爷爷问怎么回事，警卫员小心翼翼地说了整个过程。爷爷说，“没事，你去吧”，随后把我骂了一顿，“这是你自己不小心，不能怪别人”。这一件小事告诉我怎么做人，我一直记得。

撒播爱国主义的种子

记者：能分享一下您这些年做的爱国主义宣讲工作吗？

司徒月桂：我1945年在重庆出生，日本投降时父母还抱着我上街游行了；后来我在上海住了九年，听到过解放上海的炮声；接着又随父亲到东北生活了两年，再到北京读书；高中毕业后我去宁夏农建十三师上山下乡，足足待了14年。走的时候一个人，1979年回北京时变成四个人，因为已经结婚而且有两个小孩。后来，我和爱人都在同一家公司工作，一直做到退休。我不是“啃老族”，爷爷没给我们留一分钱，种田插秧、做杂工等，我都干过。

2003年，致公党中央委员会举行纪念司徒美堂诞辰135周年的活动，我作为家族代表在会上发言，当时很多华侨都围着我，说爷爷是他们心

中的一面旗帜。这给我的教育太大了，我知道我应该做些什么。

后来我加入了致公党，我感觉自己身上有一份责任，那就是要宣传司徒美堂的爱国精神，要将海外华侨华人对祖国的爱表达出来。这成了我心里的一根支柱。因此，我在多种场合进行宣讲。这不是说我爷爷有多么伟大，我只是希望能更多地向社会各界尤其是年轻人宣扬正能量，希望国家更好。

记者：在观看新中国成立70周年活动时，您的感受是怎样的？

司徒月桂：非常震撼、骄傲！我是跟着共和国一起长大的。过去谁会想到国家变化会这么大！尤其这些年的发展，真是日新月异，太棒了！整个国家都在向着最好的方向去发展，这是我们所有中国人都愿意看到的。

爷爷见证了新中国的成立。我在1958年到1963年曾作为学生代表在天安门广场参加国庆游行。国庆60周年时，我的外孙所在的学校组织他们去参加游行，当时他不太愿意去，我说你必须去，没有几个家庭五代人里有三代人能参加这样的国庆活动。他回来后特别高兴地说，他没有白去。没有国，哪来的家？这颗种子是爷爷种下的，永远在我心里，我也是这么往下传的。

记者：我们了解到，您常回家乡，能谈谈您对家乡的印象吗？

司徒月桂：我虽然不是出生在开平，没有在开平生活过，但我的根在那里。所以，我每年总会回去好几趟，到广州、江门和开平，感受家乡的氛围，看看家乡的变化。广东发展越来越快，越来越漂亮。老家村子里的人都很友善，老婆婆也会过来看我。我还时常去江门五邑华侨华人博物馆，那里做得很好，能让历史得到传承。我想，爷爷的故居，如果有条件，可以改造为司徒氏博物馆，不只宣传爷爷一个人，司徒家族名人辈出，应该发扬所有人的光辉。●

陈金坚：在美洲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

口述 陈美娟 整理 陈文俊 麦博恒

我父亲陈金坚 1911 年 4 月出生于今台山市斗山镇中礼村委会东中村。1932 年，与邻村姑娘赵丽云结婚，育下美娟、美娥、健民三个女儿。1940 年 2 月，父亲只身前往美国谋生。1949 年 10 月 9 日，他在纽约华侨衣馆联合会（以下简称“衣联会”）会所升起美洲第一面五星红旗。2002 年 1 月，因病离世。

一介书生 英勇战士

父亲原名陈尧铿，“金坚”是他读中学时将“铿”字分拆而取的名字，意为“志比金坚”。他在中礼村读私塾，两年后入读该村培志小学，1929 年升读斗山任远中学，后入读台山县第一中学。

1930 年夏天，留日学生何干之（台山人，原名谭毓均，学名谭秀峰，解放后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回到台山，在台城举办青年暑期学术研讨班，主讲现代世界观和新文化运动。父亲和同窗好友林为梁（台山人，参加革命后改名林基路）等参加研讨班的学习。在这次学习中，父亲受到了先进思想文化的洗礼。

1931 年，“九·一八”事件爆发，日本发动侵华战争，进一步激发了父亲的爱国热情，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进步书籍，如毛泽东、朱德的文章，鲁迅、郭沫若的杂文、散文，以及《红色时论特辑》《动向》等，并写了一批抗日文章、诗歌、剧本。他与林为梁等同学组织剧社，自编自演抗战话剧，唱抗日歌曲，撰写文章在任远中学的校刊《骆驼》和台中校刊《台中半月刊》发表。父亲在一首抗日诗歌中写道：“……有热血的青年哟，起来！起来！起来与日本帝国主义决一死战……”

1935 年，父亲考入广东国民大学，专攻语文科。1936 年冬，日本侵略军南下，迫近广州，父亲停学回到中礼村，在村中“永和社”担任宣传工作，出版抗日墙报，后由同学朱郁生介绍进入台城《民气日报》任记者，专门撰写稿件评论时局、宣传抗日。1937 年，父亲回到村中培志小学任教，先后任教导主任、



② 陈金坚 陈美娟/供图

校长。他积极向学生宣传抗日爱国思想，组织学生编辑以抗日为题材的墙报、校刊，教唱抗日歌曲，自编自演抗日话剧，如《打回老家去》等。父亲还在村里办起了平民夜校，让白天不能来上课又交不起学费的村民晚上来上课学习。

投身侨团 呼吁抗日

1940 年 2 月，父亲赴美国纽约，进入祖父和二叔公开办的洗衣店里当洗衣工；7 月，由同乡陈康明介绍加入华侨抗日左派组织的纽约青年救国团（以下简

称“青救团”。“青救团”是由一班具有进取心、新思想、新文化观点的进步青年组成的团体。父亲不久后被选为教育股长，后担任书记，主持创办《纽约华侨青年救国团月刊》，宣传抗战。父亲又成立话剧团，自编剧本，演出反法西斯话剧，成为“青救团”的骨干。

同时，在父亲、陈厚父、唐明照、林棠等人的协助下，“衣联会”倡办了《美洲华侨日报》（后改名为《华侨日报》）。当时，毛泽东为《美洲华侨日报》创刊题词：

“起来，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而奋斗到底。”为该报题词的还有周恩来、邓小平、邓颖超、何香凝、司徒美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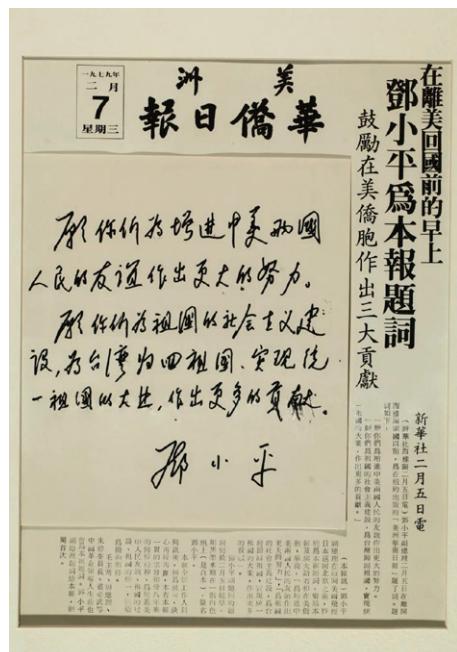
唐明照是该报首任社长，而父亲负责政治题材的编辑工作，并负责撰写评论文章，坚持客观、真实的报导和公正的评论，支持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父亲在《纽约华侨青年救国团月刊》上所发表的文章，得到《美洲华侨日报》转载，使之进一步扩大社会影响。当时在《美洲华侨日报》《衣联特刊》《衣联增刊》上发表的有关推动华侨抗日救亡，捐资助饷，实施“宪政”，揭露国民党的反动本质，支持政治协商，反对国民党利用美国的军事援助发动内战，以及对时局的意见等一系列通电、评论文章，大部分是由父亲撰写，现在我家里还存放着父亲撰写的这些文章的手稿。在抗日战争时期，父亲贯彻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关于“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原则，《美洲华侨日报》成了广大华侨华人的喉舌，表达了华侨华人的心声，深受广大侨胞的喜爱和支持。

1940年年底，南京国民党中央委派黄文山到美国组建“三民主义青年团”，计划在美国成立美西（旧金山）、美中（芝加哥）、美东（纽约）三个直属区团部。美西、美中都相继成立了团部，在美东开展组织工作时，黄文山要求时任中华公所主席赵鼎荣出面协调，意图整编“青救团”，要他们改名为“三民主义青年团美东总部”，由于父亲等核心成员早就看透了国民党的真面目，坚决拒绝整编，国民党妄图控制美东华侨青年的计划宣告失败。最后赵鼎荣只得另外找了10多人，草草成立了纽约的“三民主义青年团”，并自任团长。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太平洋

战争爆发，适龄体健的华侨青年纷纷入伍，以致当时美国华侨经济生命线——洗衣业空出了许多店铺。1942年初，一位陈姓的乡亲应征入伍，父亲把他的衣馆买下来，取名为“中国衣馆”，父亲成为“衣联会”会员。他与中国共产党人徐永英、陈厚父、唐明照、林棠等继续交往，逐渐建立起推心置腹、终生不渝的同志情谊。

“衣联会”由余宏耀等人于1933年5月创立，是一个由纽约市华侨华人洗衣业者组成的反苛律、反封建、积极抗日救国的爱国华侨团体。1938年5月，朱德为“衣联会”成立五周年题词：发扬华侨的爱国精神。父亲一方面继续参加“青救团”的活动，同时又积极参加“衣联会”的活动。1944年，父亲被选为“衣联会”秘书股主任，后来连续被选为“衣联会”委员、常委、主任委员、顾问，直至2002年，长达60年之久。



② 《美洲华侨日报》刊载邓小平题词的照相制版原稿
图片来源：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

正气凛然 国旗飘扬

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前后，随着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坚持分裂而出现的内战危机，以父亲为领导人之一的“衣联会”更加旗帜鲜明地表达了支持以中共为首的进步力量的立场。

1945年4月25日，取得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同盟国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筹备建立联合国的会议，中国与会的代表团中有董必武和章汉夫两位中共人士。在该团访问纽约时，受国民党控制的中华公所筹办的所谓全侨欢迎中国代表团的公宴，竟然不发请帖给董必武和章汉夫。父亲等“衣联会”领导人知道这个消息后，当即发动为欢迎董必武和章汉夫而举行的盛大宴会。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董必武激动地应邀作诗一首：“天与机缘到美洲，逢君忽忆念年游。中兴名论三篇策，高卧豪情百尺楼。志士不辞污马革，群儿争取烂羊头。人间何地无渣滓，次第清除始自由。”

“青救团”于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改名为“纽约华侨青年团”，父亲等领导成员继续开展各式各样的文体活动；反对蒋介石集团贪污、独裁，主张民主建政，反对内战。

1947年11月2日，冯玉祥将军在美国呼吁不要支持蒋介石打内战时，与父亲建立了战斗友谊，题写了“金坚先生老乡——我们要为全人类谋最大幸福”的辞句赠给父亲。在此前后与父亲往来的，还有文化界的陶行知、叶浅予、刘良模等。

在美国斡旋国共谈判阶段，父亲在《美洲华侨日报》上发表一系列主张和平建国、反对内战的文章。蒋介石悍然发动内战后，父亲与广大侨胞一致拥护中共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此后数年中，像抗战初期结交沈钧儒、邹韬奋等抗日“七君子”和支援廖承志、叶剑英一样，父亲等“衣联会”领导人与在香港和海外的中共成员、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有着广泛的交往，共同形成一股拥护中国共产党的力量。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美洲华侨日报》用通栏大字标题刊登“全国人民政府成立，毛泽东当选为首任主席”，向世界华侨华人报告这一特大喜讯。10月3日，该报又用通栏特大号标题报道了首都北京举行开国大典的盛况。

“衣联会”通过香港《华商报》获知五星红旗的图样，连夜赶制出一面纯羊毛五星红旗。10月9日，父亲不惧反动势力的威胁恐吓和阻挠，亲手把五星红旗悬挂在“衣联会”的大楼上，升起了美洲大地上第一面五星红旗。接着，父亲带领侨界人士一起上街游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950年至1970年，尤其是在美国推行“麦卡锡”政策期间，大批在美国的爱国华侨受到迫害。“衣联会”和《华侨日报》由于坚决认同和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坚持悬挂五星红旗，因而备受迫害，会员和报社人员有被驱逐回中国的、有坐牢的、更有失踪丧命的。

1954年，纽约地方法院企图扼杀《华侨日报》，以“莫须有”罪名判决社长梅参天有期徒刑一年。父亲挺身而出，挑起了代社长这副重担，从而使《华侨日报》这份爱国中文报纸继续正常办下去。此后，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探员便跟踪和监视父亲，认为他是一个危险分子，甚至找到洗衣馆当面指责和恐吓父亲，但父亲毫不畏惧。父



② 1949年10月1日，美国纽约华侨衣馆联合会大楼挂上“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会”条幅 陈美娣/供图

亲还出任了因谭育民无端死亡遗下的“衣联会”同仁于1947年创办的华侨洗衣偈（洗衣工厂）董事长职务，守卫“衣联会”赖以坚持屹立的经济保障，维护了“衣联会”的尊严和权益。

1956年，“衣联会”和《华侨日报》骨干陈厚父在美国受到迫害后回到台山，被选为台山县副县长。他是父亲、唐明照、林棠的亲密战友。陈厚父回到台山后，使父亲与祖国、与台山的关系更近、更密切。同年，时任中共台山县委书记赵辉曾接到中央有关部门文件通知：“时下若有陈金坚、陈科从美国受迫害回台山县，请予同志式接待。”可见中央对父亲的关心和重视。

1972年，父亲应中央人民政府邀请，率团回国参加国庆观礼，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周总理鼓励父亲等爱国侨胞要为祖国统一、维护祖国的领土完整作出更大的贡献。父亲回到美国后，做了大量的爱国、爱乡的工作。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在北京逝世。9月19日，在纽约举行的毛主席逝世的追悼大会上，父亲致悼词，沉痛悼念一代伟人毛泽东主席。

1979年中美建交后，中国纽约总领事馆于20世纪80年代初开馆，父亲带头前往祝贺。父亲对于从祖国来的国家领导人，以及各级领导、代表团都热情接待。国家主席李先念，全国政协副主席王首道，外交部部长乔冠华、吴学谦，国务院侨办主任廖晖，全国侨联主席司徒慧敏，中国驻纽约总领事柴泽民，中国驻纽约大使章文晋、韩叙，广东省省长梁灵光，广州市市长朱森林，中国乒乓球代表团，中国民族艺术团，广东省粤剧团等，都得到父亲和“衣联会”同仁的热情欢迎和亲切接待。同时，对历届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总领事的轮换，父亲等必定代表“衣联会”前往欢送与欢迎。

父亲经济上并不富裕，但他积极捐资支持祖国和家乡的经济建设和公益事业。父亲捐出资金支持祖国“修我长城”“拯救熊猫”以及赈济云南

地震、华东水灾等。1950年，他给家乡汇回47万元，支持当时台山县第一大工程“台山蛮陂头水电厂”建设。后来，他又热心捐资支持家乡兴建提领中学、培志小学新校舍，铺筑水泥村道，扩建太和医院等。为感谢他的支持，培志小学的一间课室特命名为“陈金坚堂”。

1986年，父亲由于积极参与争取少数族裔和移民福利，荣获美国纽约州马丁·路德·金纪念委员会颁发的“终身成就奖”。

1999年12月20日，在纽约华埠举行的澳门回归祖国资庆祝大会上，纽约华人社团联合总会颁赠父亲表彰牌匾，牌匾上题词：业绩铿锵，国族硕望；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2002年1月15日，父亲在美国纽约因病离世。

2007年9月12日，中国驻纽约总领事张宏喜大使为父亲在“衣联会”大楼上亲手悬挂五星红旗的英勇行为题词：陈金坚先生在纽约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他的勇气和精神使我们后人敬佩，鼓舞着我们继续努力，把祖国建设得更加繁荣强大，使中国与各国的友好关系不断发展，使世界更加和谐与美好。

2009年9月15日，“衣联会”访华团在陈锦棠团长率领下来到中国侨联，将60年前曾悬挂在“衣联会”大楼上的国旗郑重交给时任中国侨联副主席李祖沛，这面国旗成为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的珍贵馆藏品。此前，“衣联会”也曾向中国侨联捐赠《美洲华侨日报》，记录着美洲地区华侨华人60年来的生存和发展状况，是弥足珍贵的文物文史资料。

2015年9月，父亲荣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我代表父亲接受了这一崇高荣誉。●

[陈美娣，1935年出生于台山市斗山镇中礼村委会东中村，是陈金坚长女。1982年赴美，现居住纽约]

冯如：中国航空第一人

文 乔莹

广东恩平牛江镇杏圃村，有一处建于清代的青砖平房，一房一廊半厅，瓦木顶盖。1884年，冯如便是在此诞生。父母为其取名：冯九如。

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的冯如，排行第五，童年仅读过几年书，因家中生计艰难辍学回家放牛。不过天资聪颖的他，从小心灵手巧，喜欢用竹子、火柴盒、纸皮等材料制作风筝、车船等模型玩具，做得惟肖惟妙。他尤其痴迷《封神榜》中辛环和雷震子空中大战的故事，敬佩世界上第一个试图利用火箭作飞行的明朝飞天先驱万户，对飞行充满无限遐想。他还曾制作过一只大风筝，两翼吊着两个纸扎小桶，风筝乘风升空近百米，小桶变成风袋起着平衡作用。冯如的这一“飞天”尝试，传遍乡间，令人称奇。

多年后，这个“放牛娃”成为中国第一位飞机设计师、制造家和飞行家，被后人尊为“中国航空之父”，流芳百世。

“大丈夫四海为家”

冯如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转折点在他12岁那一年，遇到了舅舅吴英兰。

1895年，在美国旧金山做小生意的吴英兰回乡探亲，见到外甥一家生活艰苦，便提议带他去美国“淘金”，谋一条出路。恩平是广东著名侨乡，自清嘉庆年间就有恩平人漂洋过海去谋生。乡人在异国他乡打拼，有光鲜亮丽的，有荣归故里的，但也有无尽的辛酸，甚至与家人生离死别。冯如父母深知“淘金梦”背后的艰涩，舍不得孩子背井离乡受苦受难。但冯如渴望“走出去”，看看旅美乡亲口中的那个响彻现代工业文明隆隆机器声的花旗国（五邑人对美国的俗称），师夷长技。“大丈夫四海为家，我不愿一生守在家里种地。我愿出去学门手艺，回来孝敬父母。”冯如说服父母之后，随舅舅前往旧金山。

到了旧金山，他日工夜读，虽然生活依旧艰苦，但浩瀚的知识海洋让他的精神富足了起来。他如同一块干涸的海绵，贪婪地吸吮着知识的甘泉，增长着知识储备。在接触到美国先进的机器和技术的时候，回想家乡的贫困落后，他认为：“尝谓国家之富强，由于工艺发达，而

工艺发达必有赖于机器。今日中国贫弱极矣，非学习机器不足以助工艺之发达。”

1898年，冯如奉父母之命回乡成家。婚后的第二年，他再次赴美，前往纽约船厂打工，后来辗转到发电厂、机器制造企业等工作，接触到更多类型的机械。工作之余，他几乎将所有时间都用于钻研科技知识。

终于，历经近十载的“寒窗苦读”，冯如达到“于三十六种机器无不通晓”的水平，在机器制造方面有所建树。美国《旧金山呼声报》称他为“很有名气的机械师和发明家”。其中，他设计制造的抽水机、打桩机、



② 冯如

小型发电机、无线电收发报机等，工作效率优良，深得当地社会赞誉。

“成一绝艺以归飨祖国”

正当冯如还在潜心钻研机器制造的时候，有两件大事发生，轰动世界，也深深触动了他内心的爱国热忱。

1903年，美国莱特兄弟研制出世界上第一家载人动力飞机，并试飞成功。不久后，日俄为争夺中国东三省的权益，爆发了日俄战争，中国国土被践踏，同胞遭蹂躏。1905年9月，战争终于结束，日俄签订了《朴茨茅斯和约》，俄国将中国旅顺、大连以及从长春到旅顺口的铁路权都转让给日本。面对这样的耻辱，清政府却一声不吭。冯如听说后，痛彻心扉，发誓要用心所掌握的科学技术拯救祖国：“是（指机器制造）岂足以救国者。吾闻军用利器，莫飞机若，誓必身为之倡，成一绝艺以归飨祖国，苟无成，毋宁死。”

1906年，冯如从纽约回到旧金山，

寻求实现“航空救国”梦想的途径。因为建造飞机，不但需要工程师，还需要厂房、生产设备及零配件等。冯如虽有一腔报国热情，但仅凭一人之力，梦想遥遥不可及。

淘金胜地的旧金山，是美国西部重要的金融中心和贸易港口，工业发达，众多华侨聚居于此。于是，他一边广泛搜集制造和驾驶飞机的资料，一边筹钱和招人。当时有华侨青年慕名前来拜师，如青年工商者朱竹泉，冯如收其为学徒，后来成为冯如研制飞机的重要助手之一。冯如对朱竹泉说：

“日、俄战事大不利于祖国，当此竞争时代，飞机为军事上万不可缺之物，以其制一战舰，费数百万之金钱，何不将此款以造数百只之飞机，价廉工省。倘得千只飞机分守中国港口，内地可保无虞。”

面对巨大的资金缺口，冯如除了变卖自己所有值钱的东西，还向旧金山和奥克兰的华侨募捐，请他们集资设厂制造飞机。虽然他们对冯如“壮国体，挽利权”而研制飞机的爱国精神极为钦佩，但飞机制造尚属新鲜事物，莱特兄弟制造的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架飞机也仅成功飞行了59秒，之后就被一阵狂风掀翻而损坏严重，因此他们担心投资受损，多持观望态度。只有五邑旅美青年华侨黄杞、张南和谭耀能甘冒风险参股，予以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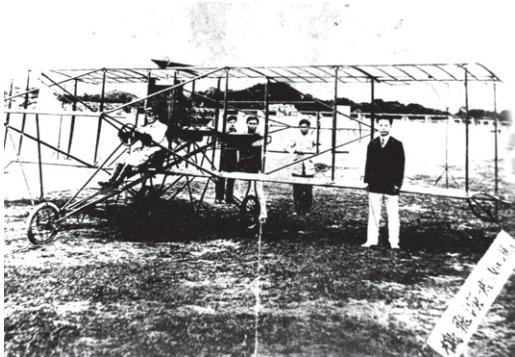
拿着募集到的1000余美元，冯如在1908年5月租下了奥克兰市东九街359号的一间面积仅7.5平方米的屋子作为厂房，定名为“广东制造机器厂”。年仅25岁的冯如和三位志同道合的助手，就在这里开创中国人前所未有的伟业——制造飞机。

冯如造飞机，是从零开始的。他在研读了大批有关制造飞机的文献资料后，选定了以莱特式飞机为设计的主要蓝本，同时参考花曼、蔻蒂斯、伯里利奥等当时著名飞行家的飞机设计，博采众长，运用自己所掌握的知识绘制出自己的飞机结构图。在按图施工过程中，他们又遇资金不足的问题，无钱购置足够的生产工具，飞机的大小零件只能靠手工制作完成。为能尽快出成效，拿到更多投资，冯如和助手日以继夜地工作。

这时，冯如收到家乡的来信。父母在信中说，其兄长不幸早逝，对其甚至思念，并催促他回家与妻子团聚，为冯家开枝散叶。飞机研制正是关键时刻，冯如只能为大义而舍小



② 《旧金山呼声报》用《他为中国龙插上翅膀》为标题对冯如第一次成功飞行进行了大篇报道



② 冯如在广州燕塘准备试飞（图中坐者为冯如，其余的是他的助手）

义，回信劝慰父母妻子，等他将飞机成功研制出来后就回家。

1909年9月，冯如成功研制出了第一架飞机，距离世界第一架飞机问世不到六年的时间，这也是中国人自己设计制造的第一架飞机。同年9月21日傍晚，冯如在助手的协助下，坐上飞机，系好安全带，在围观的记者市民的注视下，进行试飞。在滑行了一段距离后，紧张的时刻来了，冯如驾驶着飞机徐徐升空，直到攀爬至5米。由于是首次试飞，冯如只绕着小山飞行了一圈，航程约805米。正当大家沉浸于兴奋中，飞机降落时却出了点问题，螺旋桨突然停转，飞机坠落，冯如被抛离座位，幸好航行高度不高而未受重伤。

虽然首次飞行没能完美告捷，但这架被世人命名为“冯如一号”飞机的横空出世，还是在人类飞行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美国《旧金山考察家报》和《旧金山呼声报》，分别以《在航空领域，中国人把白人抛在后面》《中国人驾驶自制的飞机在空中飞行》为题赞誉这位“东方的莱特”。

“吾国大有人矣”

“冯如一号”的问世，增强了华侨支持冯如造飞机的信心。

1909年10月，广东制造机器厂改组广东制

造机器公司，冯如、黄杞、张南、谭耀能、黄梓材、刘一枝和朱竹泉成为公司的创办人和优先股东，随后向社会召集优先股东及股金。1909年11月3日至1910年2月19日，短短三个余月，优先股东发展到71人，筹得股金5875美元。1910年3月7日，广东制造机器公司召开第一次优先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相关章程，并选出黄梓材、刘一枝为正、副总经理，冯如为总机器师。由此，广东制造机器公司运营步入正轨。

公司给冯如配置了更高马力的发动机及其他飞机零部件材料，让他安心研制飞机。冯如依然以莱特式飞机为参考蓝本，先后制造了6架飞机，均未成功。屋漏偏逢连夜雨，中途，359号工场不慎失火，冯如只好在哥林打镇的麦园搭建临时工场继续工作，近半年后才迁回原址。屡败屡战，冯如带着助手去观看奥威尔·莱特的飞行表演，学习取经。事业未竟，公司的开销已经用了90%的本金，账上只余490.30美元。有的股东开始动摇了，但冯如的坚定给了很多股东信心。1910年10月3日，部分股东追究投资，筹得664美元，继续支持冯如的研究。

冯如总结前几次的失败经验，改为以花曼式飞机为参考蓝本，将飞机加以改进，终于在1911年1月制成了一架“顿异前制”飞机。同年1月18日，冯如在奥克兰艾劳赫斯特广场公开试飞。这一次试飞大获成功，飞行高度达10多米，环绕广场约1600米，飞行历时4分钟，最后平稳降落地面。现场观看的华侨、当地市民和记者欢呼声一片，向冯如表示祝贺。美国和旅美华侨的报刊对冯如试飞竞相报道，如当地《旧金山纪事报》以《中国飞行家的一次成功飞行》为题进行了大肆宣传，冯如的名字再次进入众人的视野。

之后，冯如在奥克兰进行了多次飞行表演，曾取得飞高220米、时速105公里、航程35公里的优异成绩，居世界航空记录前列。后来，冯如参照这架“顿异前制”飞机，经过改良，制造

出第二架飞机（即“冯如二号”），如起落架由后三点式改为前三点式，性能更加稳定和卓越。

1911年1月31日至2月5日，孙中山在美国筹募革命经费期间，曾与随行的同盟会人员到奥克兰观看冯如的飞行表演。在与冯如会面时，孙中山对其大加赞赏“吾国大有人矣”，游说冯如以一技之长报效祖国。

“勿因吾毙而阻其进取心”

1911年2月，广东制造机器公司更名为广东飞行器公司，以“壮国体，挽利权”为经营宗旨，准备迁回广州。

航空是当时最尖端的科技，发展前景一片光明。于是，有不少人前来找冯如“合作”，有美国人要重金聘请他一起发展航空事业，清政府两广总督张鸣岐向他发出邀请，美国政府也软硬兼施“挽留”他。而冯如始终坚定自己“成一绝艺以归飨祖国”的信念，在糖衣炮弹的诱惑下，初心不改。1911年2月22日，冯如率领广东飞行器公司的技术人员朱竹泉、司徒璧如、朱兆槐，连同飞机两架（其中一架在装配中）及制造飞机的器材设备等，乘船离开旧金山回国。同年3月22日，轮船抵达香港。张鸣岐派当时两广地区吨位最大、设备最齐全的宝璧号军舰前往迎接，搭载冯如一行回粤。张鸣岐在广州东郊燕塘，为冯如划定了飞机制造厂场地和飞机场。当时的中国，大革命风起云涌，清政府已风雨飘摇。冯如同情革命，支持孙中山，不愿为清政府效力，故婉拒了清政府的委任，只接受制造飞机使用的场所。

清政府怀疑冯如暗通革命党，派人监视冯如的行动。冯如等人只能“赋闲数月”，广东飞行器公司的业务也无法开展。直到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之后，广州的清政府官员被驱逐，广东革命军政府成立。冯如被任命为广东革命军飞机长，朱竹泉为飞机次长，司徒璧如、朱兆槐

为飞行员。广东飞行器公司也恢复了运作。冯如和助手们利用从美国带回来的、与“冯如二号”基本相同的零部件，以及在广州搜集到的帆布、槐木、铁线等材料，耗时3个多月，制造了一架性能与“冯如二号”相仿的飞机。这是在中国国内制造的第一架飞机，标志着中国航空工业史的开端。

冯如在祖国大地上的飞行“首秀”发生在1912年4月，正是中国封建帝制结束之时。为普及航空知识，唤起国人对祖国航空事业的认识与支持，冯如经广东革命军政府批准，在广东华侨最多的台山县作飞行表演，前来观看的乡民逾2000人。

第一次飞行结束后，冯如根据飞行情况，对飞机进行了改进，升降舵由单帆改为双帆。时隔半年，冯如又一次“搏击长空”。

1912年8月25日，云淡天高，碧空如洗，众多乡民闻讯赶来广州燕塘大操场，翘首以盼。起飞前，冯如向观众介绍了飞机的用途、制作情况和驾驶技术。随后，他戴上飞行帽和防风眼睛，登上驾驶座，系好安全带，启动发动机。助手推着飞机在地面滑行了一段距离后，冯如操纵着飞机凌空而起，升至约40米，向东南方飞行约8公里。目睹着翱翔于蓝天中的飞机，地面观众激动不已，掌声雷动。飞行了一段时间后，冯如想要将飞机拉高，双手把住操纵杆一抽，不料用力过猛，飞机急剧而上，头高尾低，失去平衡，致使他两足浮松，飞机随即失控坠落。冯如头部、胸部、腹部均受重伤。虽然有红十字会医生和军医的现场急救，但无奈药物太少，难以救治。在送往北较场陆军医院途中，冯如因失血过多而抢救无效，与世长辞，时年29岁。

弥留之际，冯如还在跟他的助手朱竹泉、司徒璧如等叮嘱飞机的事，勉励他们：“勿因吾毙而阻其进取心，须知此为必有之阶段。”

天空无痕，赤子有名。冯如逝世后被追授为陆军少将，葬于广州黄花岗，与黄花岗起义七十二烈士相伴而眠。

民主革命先驱陈少白

口述 潘庆超 整理 陈长胜



陈少白（1869—1934），原名闻韶，号夔石，出生于江门市郊外海镇南华里一个基督教牧师家庭。他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之一，与孙中山、尤烈、杨鹤龄同倡革命，反对帝制，被清廷称为“四大寇”。他是孙中山的亲密战友和结义兄弟，曾被尊称为中华民国的“国叔”。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他不但承担组织策划和宣传发动的重任，而且临危履险，领导和指挥武装斗争。辛亥革命胜利后，他辞去要职，回归故里主持乡政，造福乡民。陈少白爱国爱乡爱民的精神，长留青史。

少年怀大志 投身革新潮

陈少白是我外祖父，母亲在世时经常给我讲他的故事。外祖父6岁入私塾，天资聪敏，勤奋好学，是同窗中的佼佼者。适逢美国教会哈巴牧师来广东开办广州格致书院（即岭南大学前身），1888年开始招生，他第一个报考，并被录取入学。读书期间，外祖父有个三叔名叫陈麦南，经常提供多种西文译本给他阅读，他从中看到世界时局的变化，并接受了西方先进思想的启蒙。外祖父常与人说：“革命思想，多得于季父。”

1890年，外祖父赴香港前，经广州传教士区夙墀的介绍，认识了当时正在香港西医书院（雅丽氏医院）读书的孙中山，两人一见如故，谈得十分投契。后经孙中山介绍，并得到西医书院教务长康德黎批准，外祖父由广州格致书院转到香港西医书院就读。从此，他们便朝夕相处，结为知交。与此同时，他们又认识了尤烈（顺德县人）和杨鹤龄（香山县人），彼此志趣相投，抱负一致，立誓实现“驱除满人，实行大同，四人一心，复国是从，至死不渝，务求成功”的理想抱负。

1892年，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毕业，到广州开设东西药局，一面挂牌行医，一面进行革命活动。这时，外祖父急不可待，未毕业便辍学随孙中山来往广州与香港之间，协助孙中山宣传革命思想。从那时起，他改名陈少白。外祖父之所以取此名，系出于对家乡先贤陈白沙（献章）的钦仰。

忠诚革命 拼搏不已

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建立中国第一个民主革命团体“兴中会”。第二年，孙中山返香港与外祖父等人建立了兴中会总机关，在省港澳地区秘密串联鼓励革命志士为武装起义做准备工作。孙中山与外祖父曾到外海茶庵寺以民族大义说服曾是洪秀全部下的慧真和尚加入兴中会。1895年，孙中山、外祖父、黄暎康、何放等在香港卉花酒楼聚会，筹划发动广州起义事宜，后因谋事不密起义失败。外祖父随孙中山赴日本避难，他们很快又建立了兴中会日本分会。稍后，孙中山赴檀香山，外祖父则留日本，在此期间，外祖父结识了日本志士曾根俊虎及日本友人宫崎寅藏等，并取得他们的理解和支持，后来这些日本友人还到过中国，为中国的民主革命做了不少工作。此外，他还向日本华侨继续宣传革命道理。1897年，他到台湾建立了兴中分会。

孙中山在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后，总结经验教训，认为起义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革命宣传未能深入人心。因此决定在香港办报，利用报纸宣传革命道理。外祖父根据孙中山的意见，马上进行筹备。1899年秋，他从日本购进印刷机器、铅字等设备。1900年元月下旬，他用服部次郎的化名创办了中国民主革命派的第一份报纸——《中国日报》，并亲任该报社长和总编辑，杨少欧、陈春生、冯自由等先后任主笔，胡汉民、章炳麟任特约撰述。在外祖父的主持下，《中国日报》刊登了一批宣传革命的文章，其中《民主主义与中国革命之前途》等文章对唤醒人民群众起来推翻封建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这份报纸成了宣传革命道理的重要阵地，而该报社也成为组织和领导革命的机关。国民党元老邹鲁在他的《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一书中曾记述这份报纸的作用：“自己到广州一役失败后，

中山久在日本重图大举，知创设宣传机关之必要，始于己亥秋间，派陈少白至香港筹办党报，兼为一切党务军务之进行机关……香港中国日报为革命机关之元祖，自己亥以迄辛亥（1899—1911）此十三年中，兴中会及同盟会所经历之党务军务，皆藉此报为唯一之喉舌，中间遭遇无数之风潮及重大阻力，均能独立不挠，奋斗不懈，清、英二国政府，均无如之何……”该报还在排版方法上首次改变从前中文报纸的直排长行惯例，采用横排短行的版式，为以后报纸所效法。

外祖父在主持《中国日报》的同时，与程子仪等创办天演公司，开办“采南歌剧社”，招收青少年学员训练，排演《文天祥殉国》等新戏，宣传民族民主革命思想；并为香港振声天白话剧社编写《自由花》《赌世界》《鸣不平》等具有爱国主义和反封建内容的剧本。

按照孙中山的意思，为了更好地团结各种反封建的革命力量，外祖父加入广东的三合会，被封为“白扇”（即军师），后再加入哥老会，被推为“龙头”（即首领）。旋即会同三合会、哥老会两股势力与兴中会联合，于1900年春在香港召开联合大会，决定共同组织兴汉会，选孙中山为总会长、外祖父为实际主持人。该组织把带有地方派别观念和江湖习气的会党势力集结到革命旗帜下，成为民族民主革命早期的武装力量。

1905年，中国同盟会在日本成立，外祖父与冯自由等人便在香港以兴中会为基础，进行改组，大量吸收新会员，又利用香港《中国日报》社为会址，于秋冬间正式成立中国同盟会香港分会，外祖父被推选为会长。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广东宣布独立，胡汉民出任都督，外祖父受任为外交司司长。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外交权归中央。外祖父便辞

去外交司司长职，致力发展交通事业。他组织粤航公司，收回外商所租赁的广州西堤大码头，从法国商人处购买两艘轮船行驶于广州、香港之间。

淡泊名与利 归田建新乡

1921年，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外祖父被聘为总统府顾问，参与国事，年底任大本营参议。1922年他被任命为国立中华民国银行监督，1930年被任命为国民党党史编纂委员会委员，但过了不久，他便辞官归田，回故乡江门市郊外海镇。

外祖父返回故乡后，本无意再为官，但乡亲力推他出任乡事委员会主席、民国保甲局长、乡长兼新会县第四区区长等职，他只好接受了。在任职期间，他重视发展教育和交通公益事业。归乡之初，他便兼任乡立第一小学名誉校长，带头捐资建设“梦桥校舍”，后又发动挚友陈英三捐建校舍一座，还动员其他富有乡绅合捐一座，以这三座校舍作为乡立第一小学校址。他还捐资购买校舍附近土地扩大校园，开辟农场给学生作生产劳动之用。在他的带动下，外海的五禹小学、远贻小学、阿禹小学、敦陆小学等校舍相继由海内外乡亲捐资建成，为全乡青少年创造了接受教育的良好条件。

为繁荣家乡外海的经济，外祖父做了多方面的工作。在他的提议下，乡亲们拆建、扩宽了外海墟镇街道，修筑了行车公路。他们首先建起了外海市场中心大街，接着建中华路、杏林路，继而修筑外海至江门7公里长的公路。在改建外海墟镇和筑路的工程中，需要征用沿途店铺、房屋和农田土地，遭到了旧势力的阻挠，有人向县府投诉；有人受房东、劣绅蒙蔽指使，披麻戴孝跪在外祖父家门前哭丧辱骂，甚至将秽物掷入屋

内，试图阻挠筑路工程的进行。但外祖父丝毫不为所动，他耐心开导群众，联络乡中父老，解释拆建街道和修路的好处。外祖父排除困阻，使各项工程得以完成。这些工程的完成，有效地改善了外海的环境和交通运输。

外祖父主持乡政期间，在整顿乡中治安方面也做出了很大贡献。当时的外海赌风颇盛，赌场林立，盗窃案件不断发生。面对这种情况，他欲禁赌，又碍于当时开赌属合法，他便力劝戒赌。他命乡公所的丁勇阻止青少年进入赌馆，他自己则手执藤条坐在赌场门外，劝陈姓子弟不得聚赌，从此，不少赌徒浪子回头，盗窃案也随之减少，乡中风气为之改观。

外祖父在乡期间，还办了一些为后人所称颂的事，如建立乡公所，改变借用大祠堂办公旧习；清理田亩赋税，杜绝土豪劣绅凭势舞弊；提倡绿化，美化环境，指定凡公路、住宅、学校旁边和山地都要种植树木；策划重修茶庵寺；建望月台和红叶桥，修挖丹沙井等。今天，当人们享受着外海镇茶庵公园的片片绿荫时，仍然忘不了外祖父的功劳。

1934年，外祖父得了严重胃病，到北京治疗，12月23日，因医治无效逝世，终年65岁。1935年3月，他的灵柩由当时交通、铁路两个部派兵护送，用“坚如号”舰运返外海，沿途各界团体出来公祭，国民政府派代表送殡，灵柩运抵外海后，葬于茶庵寺山腰上。国民政府当局还拨专款为其修建坟墓，墓碑上刻有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题字“陈少白先生之墓”。国民党要人居正亲临主祭，并为其题挽诗：“开济艰难推此老，中山朋友独斯人。我来恭祭无穷感，愿祝英灵枯国民！”

[口述者：潘庆超，陈少白外孙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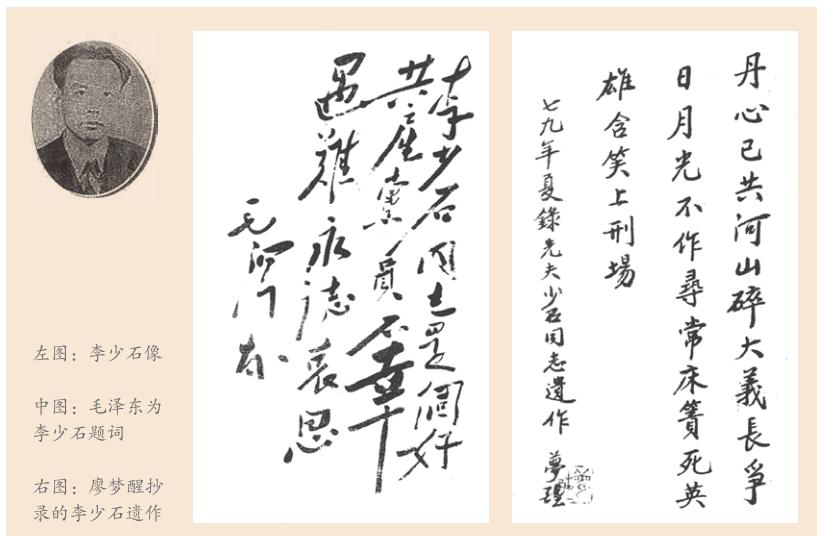
李少石：毛泽东主席题词的好党员

文 马如爱

我从小就听乡中父老讲述很多关于李少石的故事。1987年，因马以君先生（马以君，1986年任顺德县史志办主任）赠予由其作注、柳无忌写序的《少石诗注》一书，引起了我搜集李少石资料的兴趣。到了2009年，时值修地方志需整理有关潮连的历史名人录，为深入了解李少石的生平，我专程赴湖南博物馆查阅历史档案，再通过李克东教授、区惟煦教授等潮连籍乡彦与李少石之女李湄取得联系，希望她能提供其父亲的有关资料。李湄通过区惟煦托口信应允，表示支持，并把其父母的年历表、母女两人的简历、少石遗书、有关照片及短文《周恩来身边的干练秘书——李少石》一文托李克东转交给我。这使我得以见识李少石的传奇一生。

李少石，原名国俊，又名振，字默农，祖籍广东省新会县潮连乡富岗村（今属江门市蓬江区潮连富岗村）。少石是他在重庆工作时的化名。1906年6月7日，李少石出生于香港。1925年，李少石（当年用名李振）考入广州岭南大学，和国民党元老廖仲恺的长女廖梦醒成为同班同学。两人均是岭南大学学运积极分子，并在以后的岁月结成了亲密战友。是年，李少石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6月23日，省港大罢工爆发，他积极参与了声援工人斗争的“六·二三”示威游行，亲历帝国主义制造的惨绝人寰的“沙基惨案”。为了抗议帝国主义的暴行，李少石和廖梦醒在岭南大学发动学生罢课，到工厂发动工人罢工，结果被学校开除。其后，李少石到了海员工会工作。海员工会的领导人陈郁觉得李少石思想进步，1926年介绍李少石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李少石在广州河南龙光里的家便成为革命同志秘密集会的地方。

1927年广州起义后，国民党清党，广州笼罩着白色恐怖，组织将李少石调到香港工作。1929年，李少石又奉命调往上海工作。1930年，党中央派李少石回香港负责组织党的秘密交通站，负责中共中央与苏区的联络及书信、文件的传递和来往人员的接送工作。交通站选址香港青山道



16号4楼，对面是香港政府的殓房。廖梦醒从法国回来后共同负责交通站工作，在此期间李少石与廖梦醒结婚，交通站成为两人的家。

中共中央与苏区之间往来的人员在交通站接头，中央及广东省委下达各地的文件和各地向省委的报告，经交通员来往传递。有交通员来香港，李少石负责接头，廖梦醒负责抄写文件。

李少石从来俭朴，但对同志则非常慷慨。在香港交通站工作期间，有些同志从苏区经香港转上海，出发时衣着朴素，为了不引起敌人的注意，进入上海必须打扮得较为时髦阔绰，有时他们深夜抵港，翌日清晨须上船赴沪，来不及购置衣服，李少石就把自己的衣服送给他们穿。有一次，两名赶着赴沪的同志把他的衣服穿走了，恰巧李少石当天又要和另一位同志接头，没有衣服穿，廖梦醒赶紧到旧衣店给他买了一件衣服回来，以应急需。由于李少石经常把自己的衣服送给同志而使自己无衣可穿，廖梦醒没有和他商量就买了一块衣料，给他缝成衣服备用。有一天，他赶着外出工作，却发现没有合适的衣服可穿。正着急时，廖梦醒把缝好的衣服拿出来给他穿。李少石却发起脾气来，说廖梦醒乱花钱。李少石平日从不发脾气，这是绝无仅有的一次。事后，他非常后悔，写诗《寄内》向廖梦醒道歉：“布裳夜缀怜卿苦，粗粝长甘谅我贫，今宵旧事重萦梦，无限唏嘘自怆神。”

1931年初春的一天晚饭后，李少石带着廖梦醒去见中共广东省委书记蔡和森。蔡和森与廖梦醒谈了很多问题，她都对答如流。由于廖梦醒的出色表现，这次谈话后不久，党组织吸收廖梦醒入党。1932年1月16日，李少石和廖梦醒的女儿出生，取名李湄。

1933年春，中央得知有叛徒出卖了香港交通站，5月10日，李少石、廖梦醒夫妇奉令带着李湄离开香港到上海工作。李少石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分管中国工人通讯社，廖梦醒担任翻译工作。

面对白色恐怖，他们夫妻相约：“万一我们中间有谁被捕，不管面临何种考验，都要保持共产党员的革命意志，决不叛党。”李少石曾问妻子：“如果我牺牲了，你年纪轻轻就当了寡妇，不会后悔吗？”廖梦醒坚毅地摇摇头。1934年2月28日，因叛徒告密，李少石被捕入狱。在敌人严刑拷打面前，他坚贞不屈。何香凝托请柳亚子营救，经国民党四元老竭力担保，李少石得免一死。他从上海监狱被解往南京，转禁苏州反省院。在狱中，他写诗表达自己忠于革命事业的信念：“不能狮吼忍羊训，十载劳劳惯卧薪。今日岂辞缧世苦？此身原自为他人。”“丹心已共河山碎，大义长争日月光。不作寻常床箦死，英雄含笑上刑场！”李少石的脚被打坏了，不能走路，肺部被打伤了，经常吐血，但始终大义凛然，保持共产党人的英勇气节。他在狱中写下许多慷慨激昂的诗篇，如《梦回家见湄女》《九·一八感怀》《夜》《送人》《寄母》等。他写给母亲莞琴女士题为《寄母》的七绝：“赴义争能计养亲？时危难作两全身。望将今日思儿泪，留哭明朝无国人。”诗篇中既表达了李少石“生能舍己，死不还家”的决心，也流露出对祖国命运的深切忧虑。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周恩来在庐山国共两党合作抗日谈判的会议上提出质询，质问“抗日有何罪，为什么要逮捕抗日爱国人士”，并严正要求国民党当局释放政治犯。李少石于8月获释出狱。

1940年，李少石被派往国外工作，1941年1月调回香港。是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军队自粤入侵九龙，香港沦陷。中央组织地下工作人员撤退，廖梦醒因足伤，不能随大队行动，一家人暂留香港。

1942年初，因日军搜捕甚严，李少石和廖梦醒留下母亲和李湄，趁风雨之夜乘渔船离开香港，于春节前夕抵达澳门。不久，其母和女儿也平安抵达澳门暂住。5月，接周恩来重庆来电，廖梦

醒与李湄由梅文鼎护送，经肇庆、桂林、独山、贵阳，于8月3日抵重庆晤周恩来。廖梦醒任宋庆龄主持的保卫中国同盟秘书、办公厅主任。

1943年春，李少石接周恩来电，奉调重庆，在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外事组任周恩来的英文秘书。李少石来渝前，周恩来曾叮嘱廖梦醒说：

“大革命时代国民党的人都认识你，你千万不能暴露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李少石到渝后，住在曾家岩50号周公馆内，公开职业是《新华日报》记者兼编辑，实际是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秘书，是周恩来的亲密助手。

李少石与廖梦醒严格遵守周恩来的嘱咐，偶尔在路上碰到，也总是装作不认识，女儿李湄见到他也只能叫“伯伯”。李少石的工作很忙，但在忙碌之余，还帮助同志们学习，讲述革命先烈的斗争事迹。不管白天工作多累，晚上他都和大家一道守夜，以防特务袭击。当时重庆经常遭到日机轰炸，李少石总是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

是年，蒋介石《中国之命运》一书出版，李少石读后极为愤慨，写下《读完〈中国之命运〉后感》一诗：“万千逻卒猎街衢，偶语宁辞杀不辜？安内难忘伤手足，攘夷偏惜掷头颅。天之未丧斯民主，人尽能诛是独夫。二世亡秦前鉴在，祖龙何事怒坑儒？”

1944年9月，柳亚子抵重庆，寓城郊沙坪坝津南村住宅，其间，李少石经常与柳亚子诗词唱和，颇为柳老所推重。

1945年10月8日，柳亚子来访周恩来。适值周恩来参加张治中在国民党军委会礼堂举行的欢送毛泽东飞返延安的晚会，就安排李少石陪柳亚子。晚饭后，李少石送柳亚子回沙坪坝寓所，由原路回城。返回途中，在红岩嘴附近，突然遭到国民党陆军重迫击炮第一团第三营七连士兵的枪击，被狙击弹击中，子弹由李少石左肩胛穿入肺部。李少石伤势过重，抢救无效，于当晚7时45分溘然长逝，时年39岁。周恩来惊悉此讯，即告知毛泽东，并赶到医院，泪如雨下，不胜悲愤地说：“20年前廖仲恺先生遭反革命暗害，其情景犹历历在目，不料20年后，其爱婿又遭凶杀。”10月9日，宋庆龄、沈钧儒、郭沫若夫妇、茅盾夫妇等到医院吊唁。10月10日，组织给李少石穿上八路军军装入殓。10月11日，千百人聚集在重庆市立医院门前广场，为李少石烈士开追悼会。周恩来和宋庆龄扶灵至10余里外的小龙坎八路军烈士墓园，由周恩来盖上第一锹土。10月12日清晨四时，周恩来转达告知廖梦醒，毛泽东在飞回延安前题词一幅：“李少石同志是个好共产党员，不幸遇难，永志哀思！”

李少石不幸牺牲，周恩来和邓颖超十分悲痛。邓颖超将小李湄搂在怀里，深情地说：“你就当我们的女儿吧！”从此，李湄就叫邓颖超妈妈，叫周恩来爸爸。邓颖超像亲生母亲一样疼爱李湄，李湄也像亲生女儿般



② 廖梦醒（右）和女儿李湄

地孝敬干爹干妈，彼此来往非常亲密。

在李少石的遗物中有一张纸条，写着：“空袭时，穿衣，打字机，文件资料和译稿、钢笔、小刀、字典、衣箱。”从此可以看出少石经常考虑的是党的利益，以革命工作为第一生命。

李少石德才兼备，工诗文并精外语，曾以“默农”为笔名把作家卞之琳的《红裤子》等短篇小说译成英文。他的诗作有血有肉，感情充沛，生活气息浓厚，记述的革命事迹可歌可泣，充分体现了革命现实主义与爱国主义的精神。李少石遗诗36首，其中15首是在狱中写的。

李少石用自己短暂的一生践行了党的宗旨，一腔热血，一身铮骨，浩气长存。●

李月英：第一位华人战斗机女飞行员

口述 李美芳 整理 麦博恒

我的大姑婆李月英，祖籍台山市大江镇水楼村委会凤江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她满怀“国家有难，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情怀，成为第一位拥有飞行执照的华人女性、美国空军第一位华人女飞行员、世界上第一个驾机飞越大西洋的华人女性、美国驾驶战斗机的第一位华人女性。大姑婆战功卓著，最后因撞机意外而殉职。

第一个拥有飞行执照的华人女性

1912年8月24日，大姑婆出生于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市一个小康之家，父亲经商，母亲是传统的家庭主妇，生育了8个孩子。姑婆从小活泼开朗，敢作敢为，因此，游泳、排球、驾车都难不倒她。

1929年，大姑婆高中毕业后，在波特兰市中心的一家百货公司担任电梯操作员，这是当时华人女性被许可从事的少数工作之一。

1932年的一天，大姑婆的一位朋友参加航展，让她跟着坐上飞机，这是她第一次体验空中飞行，充满刺激的经历让她兴味盎然。



◎ 李月英

她随即报名进入波特兰中华航空学校学习驾驶飞机，该校是由祖籍台山市端芬镇侨领梅志新于1931年10月创办的，专门培养飞行员，曾在美国华侨航空救国史上和支持中国人民开展抗日战争中写下过光辉的一页。那时，大姑婆的父母坚决反对她学习飞行，但是飞行的吸引力确实太大了，大姑婆最终还是选择一边工作，一边学习飞行驾驶技术。她和另外一位同学每天早上4点就起床学习飞行，她心中一股“定要飞上青天”的信念，让她实现了梦想。1934年，波特兰中华航空学校包括大姑婆在内的首期32名学生毕业了，大姑婆成为第一位拥有飞行执照的华人女性。当时全美国飞行员当中，女性比例还不到1%。

回国参战 壮志未酬

1931年9月18日，日本制造了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蒋介石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仅4个多月，东北三省全部沦陷。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军又大举进攻上海。旅居海外的华侨华人兴起了抗日救国运动。大姑婆虽身处异国，但心怀乡邦。为了报效祖国，刚从波特兰中华航空学校毕业的大姑婆回到中国，前往中国政府航空委员会报到，希望能当空军飞行员，抗击日寇。尽管中国军队非常需要训练有素的飞行员，但由于当时空军拒绝女性执行战斗任务，因此没有让大姑婆上战场，她被安排在航空委员会从事文职工作，先后担任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宋美龄的英文打字员、上海虹桥机场职员、杭州的航空署图书馆管理员等职务。

后来，大姑婆因生活习惯异于常人而遭受指责，甚至有人无端攻击她是日本间谍。大姑婆愤而辞职，回到家乡台山大江水楼的小村子教书。然而乡村里严格的社会结构和对妇女活动的限制使大姑婆无所适从，加上她的汉语水平比较低，台山话也懂得不多，使得她教书时无法与学生顺利沟通。1937年年底，日军从上海一路西侵，攻占南京。大姑婆只好从台山撤到香港，在近一年的时间里，她难以发挥自己的飞行才能。不久，大姑婆离开香港回到美国，在纽约找了一份工作安身，并与华人雷炎均结婚。雷炎均是台山市大江镇人，曾与大姑婆同在航空学校学习，后返回中国参加抗日战争。1942年，他被送往美国指挥参谋学院深造，曾任盟军教官。

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正式对日宣战。大姑婆认为实现自己理想的时机来了，她立即应召加入美国空军，在空军第三大队担任运输机飞行员。

加入美国空军运送战斗机

1940年6月，德军占领西欧大陆后，制定了从海上入侵英国的“海狮”计划。8月，希特勒下达命令，要求德空军消灭英国空军，夺取战略制空权，以支援海上登陆作战。美国为支援英国抗击德国法西斯，派出飞机运送战略物资到英国。大姑婆主动承担任务，她成功驾机运送战略物资多次往返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驾机飞越大西洋的华人女性。

随着战事的不断扩大，美国急需大量飞行员。1942年夏天，美国在休斯敦成立了妇女飞行训练支队，专门负责训练女飞行员，支援前线作战。大姑婆知道后，立刻报名参加训练，因为这个机会使她既可以为美国效力，又可能有机会参与支援中国抗日的行动。1943年，美国成立了妇女空军服务飞行队，8月，妇女飞行训练支队和妇女空军服务飞行队这两个队伍合并，正式成立了美国妇女飞行队。大姑婆成为基地上最受欢迎的飞行员，她有着高度的责任感，幽默淘气，风趣活泼，总是把漆黑的头发扎在脑后或塞在帽子底下，从远处看很难判断她是男是女，她那爽朗可爱的笑声让大家难以忘怀。大姑婆能烧一手好

中国菜，经常下厨让大家解馋。有飞行员说：“她让我了解不同的文化，增长我的见闻，也扩大了我的生活领域。”

经过长达一年的艰苦飞行训练，由于表现优异，1944年9月，大姑婆被征召至德克萨斯州的驱逐战斗机飞行学院接受了多种单引擎战斗机的密集飞行训练。当地环境恶劣，经常刮大风，生活艰苦，大姑婆一心扑在飞行训练上，对于发型和妆容疏于打理，毫无讲究。但每天的第一次飞行之前，大姑婆都会认真细致地检查驾驶舱，因为响尾蛇会随时“光顾”飞机。

训练期间，大姑婆曾两次因为飞机引擎突发故障紧急迫降于当地农场，她的东方面孔被农场主人误以为她是日本飞行员，因此举着农具追杀她。大姑婆被捉住后，连忙指着有美国标志的飞机，向农夫解释，又致电军方确认她的身份，这才澄清了误会。

大姑婆勤奋好学，学习驾驶过P-47战斗机、P-51战斗机和P-63“眼镜王蛇”战斗机。半年后，大姑婆与其他同时受训的6名女飞行员以及27名男飞行员一起毕业，返回美国空军第三大队（第三大队隶属美国陆军航空队，为美国空军的前身），主要任务是驾驶新飞机由工厂飞到目的地机场。大姑婆成为第一个华裔战斗机女飞行员，也是当时美国为数不多的为美军运送战斗机的女飞行员之一。

二战期间，美军共支援苏联15000余架美国制造的战斗机，其中有一半的战斗机飞行时是循着亚特兰提斯海峡的路线，取道北非后再由苏联飞行员飞回苏联。这两条路线都相当危险，其中

北亚特兰提斯海岸的路线很有可能遭到德军战斗机的袭击；而北非的路线由于经过沙漠，酷热与风沙会降低单引擎战机的性能。后来美军改变路线，改由以阿拉斯加为终点，再送往西伯利亚，也就是大姑婆所飞行的路线。由于人手紧张，大姑婆不得不超负荷工作，每周工作六七天，两班之间只间隔8小时是经常的事。有时候，沿途空域天气不好，她不得不在一些小镇等候一周的时间，但她毫无怨言。其间，大姑婆与其他飞行员共运送5000多架战斗机至蒙大拿州的尼加拉瀑布城机场，然后再由男性飞行员将这些战机驾驶至阿拉斯加交给苏联飞行员。

大姑婆曾驾驶过70种不同类型的飞机，为抗击法西斯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被美国空军擢升为中尉。

巾帼英雄

随着二战接近尾声，盟军的胜利已成为定局，军队不再需要女飞行员。1944年10月，美国空军宣布女兵飞行队即将解散。同年11月23日早晨，大姑婆奉命执行将纽约州贝尔飞机制造厂新出厂的P-63“眼镜王蛇”战斗机运送至蒙大拿州的任务。不幸的是，这次任务成了大姑婆人生中最后的飞行。

当天下午2时左右，大姑婆驾机到达蒙大拿州空军基地，和几乎同时到达的10多架飞机一起准备下降。当她降落接近地面时，她的上方还有一架战斗机准备和她降落在同一跑道上。等到地面指挥部发现这一情况时两架飞机已经相当接

近了，调度员急忙下令要两架飞机同时回升并拉开距离。大姑婆按照指令迅速把她的机位拉高，然而对方战机通讯系统发生故障，飞行员无法听从地面指挥塔的指挥，没有按指令行动，以致两架飞机相撞，同时爆炸坠地，大姑婆身受重伤。

空军基地的医生竭尽全力抢救大姑婆的生命，军方想方设法与她的家人联系。大姑婆的个人档案中只有她丈夫雷炎均的名字，但雷炎均当时正在中国成都的空军服役，无法取得联系。大姑婆的同学知道她在波特兰的唐人街还有亲人，但大姑婆的母亲几经搬家，已无法寻找。两天后，也就是1944年11月25日，大姑婆因伤重不治，就这样孤单而平静地在基地医院里永远地合上了眼睛，年仅32岁。参加妇女空军服务飞行队的1102名女性当中，在二战期间共有38名飞行员不幸丧生，大姑婆是最后一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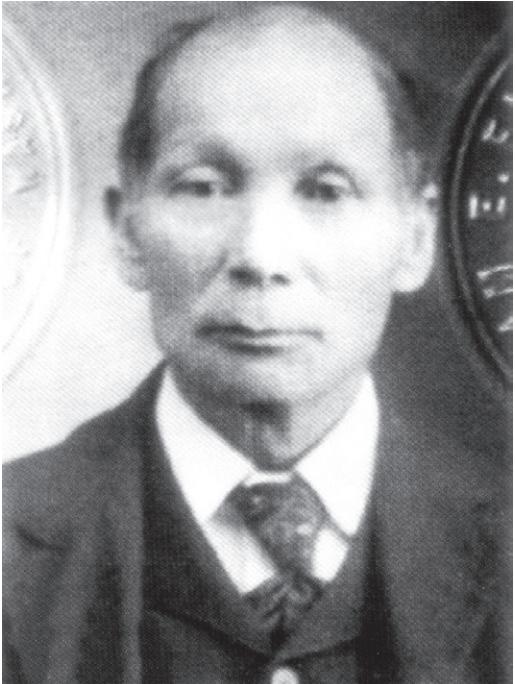
在大姑婆殉职后的第三天，她在美军坦克部队服役的哥哥也在法国战场上阵亡，李家3天之内痛失两位亲人。事后，李家打算为兄妹俩选购一处墓地，为他们举行葬礼，却遭到墓园方面的拒绝，理由是：不许亚洲人埋葬在白人的墓地里。后来李家向法院起诉墓园，最终李家胜诉，兄妹俩埋葬在墓地的斜坡上，俯瞰哥伦比亚河潺潺的流水。大姑婆的母亲说：“你们无惧风吹，也无惧水涛。”

2003年2月，美国纪录片导演Alan H.Rosenberg与华裔制片谭立人合作，通过采访大姑婆的亲友等收集素材，将大姑婆的事迹拍摄成纪录片《短暂的凌空飞翔：驾驶战斗机的女人——李月英》。该纪录片在美国公共电视台播出后，在美国各地特别是在华人社区引起强烈反响，封藏了60多年的故事，终让世人知晓。尾姑婆说：“姐姐坚持要去做这件自己梦想的事，她热爱冒险，因而她做成功了这件当时传统华人女性不可能去涉及的事！”当地台山华侨评价大姑婆说：“她是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不幸殉职的，虽死犹荣，她为炎黄子孙赢得了荣誉，为中国妇女增添了光彩。”2003年5月18日，美国中文刊物《世界周刊》发表通讯《李月英传奇》，并配发了她驾驶飞机的照片，高度赞扬她敢想敢干、迎难而上、不折不挠、勇于奉献的精神。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在《退伍军人：颂扬我们的英雄》的专题中也报导了大姑婆的传奇人生。●

[口述者：李美芳，李月英家乡后人，台山市大江镇水楼村委会原妇女主任]

陈宜禧与新宁铁路

文 梅逸民



② 陈宜禧 台山市政协文史室/供图

1986年，在我任台山县政协文史科负责人期间，组织力量，对陈宜禧和新宁铁路有关资料进行广征博采，几经努力，于1987年11月编印了《陈宜禧与新宁铁路》一书，并请新宁铁路原总经理陈挺秀为之作序。

陈宜禧，字畅庭，乳名业富、德添，1845年12月14日出生，祖籍今台山市斗山镇秀墩村委会美塘村。他的祖父陈良代育有四子：实学、哲学、兰学、资学。宜禧是实学的三子，后过继兰学为养子。因为家贫，宜禧只上过一两年私塾，便当牧牛娃、挑货郎。1860年10月，蒙乡人陈宜道赏识，资助路费，把他带往美国西雅图谋生。

立下雄心壮志

初抵西雅图，陈宜禧在一位美国铁路工程师家里当勤杂工，主人除指点他学习铁路工程技术知识之外，还送他去铁路夜校读书。1865年，陈宜禧参与修筑中央太平洋铁路，从杂工升为技工、管工，后被委以招聘华工，一干40年。后来，他与堂叔陈程学合股开办了“华昌号”商店，除与铁路公司签订开山洞、采矿石和运输等合同外，还与罐头厂签订了劳工合约。1888年，陈宜禧兴建一幢高三层的新楼，与胡观炳合股开设了“广德号”，他既积极为铁路公司招工，又参与西雅图商业区和电缆车的承建工程。

陈宜禧在致力发展自己的事业的同时，竭力维护华侨的合法权益。19世纪80年代，美国工

党经常捣乱，酿成多起排华事件。对此，陈宜禧向清廷驻三藩市总领事馆寻求庇护，又请美国著名律师柏克协助，不久，清廷根据陈宜禧等人的强烈要求，指示公使与美国政府交涉，终于赢得斗争的部分胜利。

在西雅图华侨社会，陈宜禧还以乐善好施、见义勇为著称。1896—1897年，西雅图华侨请求清廷在该市设立领事馆，陈宜禧被推荐为领事候选人，后虽未成事，被西雅图商会公举为终身名誉董事，使他成为侨领。

自鸦片战争后，铁路成为帝国主义列强掠夺中国权益的主要对象。而清廷却不断借洋债、用洋人修路，致使许多爱国主义者愤然提出“铁路修自洋人，不如修自中国”的主张，清廷乃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颁发《铁路简明章程》，允许商民集资筑路，并设立商部负责。当时身在海外的陈宜禧感到报效祖国的时机已到，便激昂

地表示：“洋人说我们笨，不懂筑铁路，我就是不服气。美国西部的铁路，哪一条不是华工筑的！待我回国筑条铁路给他们看看。”

奔走筹款立案

1904年2月，陈宜禧从美国返回家乡。6月，他邀集乡绅成立了修筑新宁铁路筹备处，被公推为总办，即起草《倡建宁城、新昌、冲蒌、斗山、三夹铁路小引》《修筑新宁铁路估工清单》和《筹办新宁铁路有限公司草定章程》，提出了组织新宁铁路公司的办法和筑路费用预算。

1904年9月，陈宜禧带着上述文件到香港，在华安会所召开3次会议，提出新宁铁路“不招洋股，不借洋债，工程由本县人自办”的主张，号召大家“以中国人之资本，筑中国人之铁路；以中国人之学历，建中国人之工程；以中国人之



② 新宁铁路车站旧址 台山市政协文史室/供图

力量，创中国铁路史之奇功”。众人听后，当场就有 50 多家商号认股。1905 年 2 月，陈宜禧又远赴美洲开展集股活动，到 1905 年年底共筹集股银 276 万元，超出原计划的四倍多。

在陈宜禧为集股而四处奔走之时，协理余灼等人将筹办新宁铁路的文件禀请新宁知县陈益转奏商部立案，而陈益却另拟“县官倡办”的《章程》上报两广总督，后未获准。1905 年 7 月，广东商务提调余乾耀也另拟章程上呈两广总督，还诬蔑陈宜禧“未能胜任总办之职”。

1905 年 8 月，陈宜禧从美国招股旋里，即为此事上省禀报，当时，陈宜禧虽然为方便筑路而“捐”了从三品“盐运使”官衔，但因有职无权，致使他上访毫无效果。为此，陈宜禧再往香港。恰遇商部右丞王清穆到港考察商务，陈宜禧便向他提出申诉。王几经调查，除致函商部请予支持外，还介绍其随行秘书吴楚三为陈宜禧助理。

1905 年 11 月，陈宜禧在新宁县学明伦堂开会，理直气壮地逐条驳斥余乾耀所拟的《章程》，与会者亦严词声讨，余乾耀只好自行告退。会议决定：（一）悉照金山各埠附股华侨来函，一致公推陈宜禧为新宁铁路公司总理兼总工程师；（二）重新修订《宁阳铁路公司章程》，并拟订《宁阳铁路公司权限章程》和《宁阳铁路公司开办善后章程》。会后即把各章程上呈两广总督岑春煊咨报商部。谁料，岑春煊竟从中阻挠，企图敲诈勒索。为此，陈宜禧马上携带有关章程上京找朝廷解决。他途经上海后，得悉王清穆正在上海，乃请求引见。同时，旅美华侨亦争得清廷出使大臣梁诚致电商部。1906 年 1 月 22 日，这个上奏获慈禧太后和光绪帝批示：

“依议，钦此。”除商部颁发铜制“商办新宁铁路公司钤记”。1906 年 4 月 25 日，商部又奏核订《新宁铁路章程》。至此，新宁铁路的立案申请，最终获得核准。

筑路大功告成

1906 年 5 月 1 日，新宁铁路在斗山坪鸣炮开工，工程分三期进行：第一期工程由斗山至公益。按原计划是由斗山经台城至新昌。谁料，遭到新昌甄姓顽固势力的阻挠，造成铁路线弯轨多出 39 处，新昌埠站也不得不取消，只好将铁路改筑至公益埠。

铁路进入施工阶段后，陈宜禧按照备案章程招工，从而减少招工方面的争执，保证了工程的进度。

1909 年 3 月 21 日，新宁铁路第一期工程竣工。从斗山经台城至公益，干支线全长 59.3 公里，沿途设车站 19 个，通车时，举行盛大庆典活动。消息传到海外，广大华侨无不欢欣鼓舞。加拿大域多利埠的华侨特制刻有“宁阳铁路伟人”字样的金牌赠给陈宜禧，以表彰其功，清廷则聘陈宜禧为四等顾问，授资政大夫，赐予“铁道转运使”官衔，官阶升至正二品。这种政治待遇是对他从事铁路建设的肯定，也有利于他开展下阶段的建设。

第二期工程由公益至江门北街。1908 年 3 月，陈宜禧再次上书邮传部、农工商部，要求准予修筑公益经新会至江门北街铁路。尽管邮传部很快批准先展筑公益到新会线的立案，但由于受到干扰，测量工作难以开展，工程被延搁至 1910 年 1 月才动工。后来，当铁路筑至会城时，一些封建顽固分子联名向县政府投诉，请求下令制止筑路。为此，陈宜禧一方面疏通土绅，另一方面作出让步：凡新会境内所设车站，均安置两名当地人供职，以及沿途所占用耕地亦高价补偿，这样才把矛盾妥善解决。

1910 年 6 月，陈宜禧又上书邮传部，申请修筑会城至江门北街线。7 月获邮传部核准，陈宜禧迅速组织力量勘测，并于 1912 年 1 月动工。8 月，当铁路筑至北街时，土豪劣绅煽动乡民殴打、

绑架施工人员并向上级投诉。后经官方调停，这场风波虽然平息了，但短短两三公里的平地铺轨工程竟整整耽误了一年时间。

第二期工程的最大问题是资金，两广总督张鸣岐决定电请邮传部令交通银行缓追欠款，如再有所需，可与该行进行洽商，这样才使资金得以落实。另一个重大难题是技术。牛湾河宽400米左右，河水很深。陈宜禧无建桥技术，便决定建造轮渡载运火车过河，并自行设计，向香港定制一艘长350英尺的渡海铁船，铺设3条轨道，每次能载运机车头1辆，客车3辆，货车1辆。火车到达江边，通过轨道开上铁船，而在潭江南北两岸码头，装有往返粗钢缆，连接在两岸的卷扬机上，卷扬机一开动，就能把铁船平稳地牵引过江。在当时，它是中国唯一的火车渡江奇观。

1913年4月26日，新宁铁路第二期工程完成，从公益经会城至江门北街，干支线全长45.1公里，共建成车站16个，同时建有机械厂1座，公益、北街等码头3座，牛湾船坞厂、宁城印刷厂、台会公司大楼3座等，从而促进了江门四邑对外贸易的发展。

第三期工程由台城至白沙。新宁铁路经几年经营，基本上清还了修筑公益至江门北街的103.5万元借款。于是，陈宜禧决定展筑台城至白沙线。1917年1月15日向交通部呈请立案获批准后，他决定重点在县内招股解决该线资金。

当时，由于铁路运输的效益已是乡民皆知，所以在修筑该线时，引发了与先前相反的纷争。白沙以黄姓和马姓居多。按原计划，铁路先经黄姓的潮境圩，再转经三合而至马姓的白沙，故导致黄姓的强烈反对，并上书交通部。1918年3月，当铁路筑至横坑、水寨时，黄姓聚众数百抗议，并冲入台城，引起械斗。陈宜禧与双方代表通宵倾谈，才将事态平息。

1920年3月20日，新宁铁路第三期工程完成，全长28.6公里，沿途设有车站11个。至此，

历时14年的新宁铁路大功告成。它共招股365万多元，购地30654亩，全长133公里，站线长121.8公里，车站46个，重要桥梁53座，涵洞437座，有机车9台，客车16辆，货车60辆，截至1931年共用去建筑费739万多元。

新宁铁路建成通车后，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一是使原来新会县一个镇的江门变成市。二是30年的运营，带动了台山和新会交通、经济、文化和市政建设的发展。当时，干支线通过的白沙、水步、大江、四九、五十、三合、冲蒌、沙坦等圩镇，店铺林立，并出现了公益、斗山两大新兴圩镇。三是带动公路、航运及建筑业的兴旺，使台山形成新的产业队伍。正如《新宁乡土地理》云：“此路既成，六都之人，交通便利。陈君此举，为吾邑增一光荣、美丽之历史矣。”

陈宜禧力排万难筑成的新宁铁路，得到了海内外乡亲的广泛赞誉。邑人将其事迹编入小学教科书。1920年3月20日，新宁铁路董事局特地为陈宜禧铸造一尊铜像，立于台城火车站，还盖了一个纪念亭。

光辉形象永存

新宁铁路全线通车后，陈宜禧已75岁。初时，公司运作正常，营业畅旺，每年客运量约为300万人次，货运量约为10多万吨，每年收入约120万元，到1921年公司动产和不动产共值180多万元。大功告成后，陈宜禧又于1917年往广州谒见孙中山，建议开辟铜鼓商埠，得到孙中山的嘉许，先后委任他为开埠筹备委员、开埠专员，并赞他“是有卓识和能干的人才”。于是，陈宜禧草拟了《开设铜鼓商埠简章》，拟将新宁铁路从斗山展筑至铜鼓，后因种种原因，致使他的宏图未能实现。

然而，1925—1926年间，公司大部分车站、

栏栅遭破坏，积欠债款达140多万元。陈宜禧虽变卖了西雅图楼房1幢和沙坦市5间店铺，把所得的6万元交给公司周转，但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导致经营困难。

在铁路经营过程中，尽管困难重重，陈宜禧都想方设法加以解决。谁知贪官污吏伺机插手，公司股东亦出现纷争，有人甚至诬告陈宜禧贪污舞弊，企图推他下台。特别是孙中山逝世之后，广东省政府“右派”乘机加紧与地方土豪劣绅勾结，妄图掠夺新宁铁路权益。为此，他们于1926年9月煽动火车司机罢工11天，致使铁路工人发生斗殴，有6名机器工人被击毙，火车运转一时陷入停顿状态。同年11月11日，广东省政府借以“工潮迭起，路务废弛”“管理不妥”为由，决定由省建设局派出3名官员，会同公司2名董事，组成“新宁铁路整理委员会”接管新宁铁路。此事立即引起股东纷纷请愿和通电强烈反对，陈宜禧更坚决拒绝交出总理权力。整理委员会即与军阀勾结，实行武力接管。1927年4月20日，



② 陈宜禧（前右二）邀请美国要人前来台山参观新宁铁路时合影 台山市政协文史室/供图

陈宜禧被迫离职返乡避居。

虽然如此，陈宜禧却一直没有停止过抗争。1927年6月，他在《台城舆论报》上连续12天刊登广告，以总办名义宣布6月15日召开股东大会，选举董事会。同年10月，他又发出《致宁路股东及各界诸君书》，呼吁股东“急举贤才”。整理委员会迫于无奈只好同意在1928年11月召开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了第六届董事会。1929年1月，整理委员会才把路政交回新董事会接管。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10月，敌机便以新宁铁路为目标，进行几十次狂轰滥炸，沿线车站、桥梁、牛湾渡海铁船和机器厂等先后被炸毁，铁路运输逐渐陷入瘫痪。1938年10月，国民党第四军驻江门办事处电令，限年底前拆毁铁路，以实行“焦土抗战”政策；1939年，再发动沿线乡民第二次包段毁坏铁路。1940年之后，日军多次侵占台山，新宁铁路奉命5天内把路基彻底破坏。至抗战胜利时，该路已拆毁殆尽。

陈宜禧抱着振兴实业、挽回利权的宗旨回国“倡筑宁路”，却经历了立案、筑路和“整顿”的激烈斗争，致令他倾家荡产，心力交瘁，精神失常。1929年6月25日，陈宜禧含恨辞世，终年84岁。他出殡之日，冒着大雨参加执绋者逾万人。

1966年8月，陈宜禧铜像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砸毁，纪念亭被拆除。1984年9月26日，台山县人民政府在台城台西路口花坛中央的纪念亭中，重立高1.8米、总重量500千克、身穿长袍马褂的陈宜禧铜像。2007年11月，台山隆重举行“百年陈宜禧、世纪新台山”庆典活动，以此缅怀陈宜禧的丰功伟绩。●

情倾家乡教育事业的黄球

口述 余思领 整理 钟国权



黄球,字耀寰,1921年出生于广东新会城郊大端里,旅港实业家,曾任广东省政协常委。他爱国爱乡,热心家乡社会公益事业,更积极发动侨胞回乡支持家乡发展,贡献巨大。为表彰其高功盛德,新会市人民政府于1992年10月15日授予他“新会市荣誉市民”称号,并向他颁发了“振兴新会贡献奖”的“金钥匙”。2017年12月30日,慈善家黄球驾鹤仙去,享年97岁。(图片来源:《新会侨报》)

独闯香江

我跟黄球相识将近30年。20世纪80年代末,因为工作调动,我从环城镇工业办调到镇侨务办公室,因而有机会接触并与黄球成为推心置腹的“忘年之交”。

黄球出身贫寒。1931年,其父只身到南洋谋生,留下一家7口挤在一间破旧的祖屋艰难度日。1939年,日本侵华,黄球怀揣8角钱远走香港。为了生活,黄球做过码头装卸工、街市小贩、长途汽车随车伙计以及车行伙计,尝遍了人间辛酸。某日,他听到有人说,香港不如上海,有钱都没地方娱乐消遣。他灵机一动,认为商机来了,就发动6个朋友集资7万元,办起了一个“让有钱人花钱娱乐的地方”——东方舞厅。

黄球的舞厅生意越做越好,不足半年就已“回本”。旗开得胜,黄球乘胜进军饮食业,至20世纪60年代后期,黄球旗下的7家“五月花”酒楼已发展成一个颇具规模的饮食集团。此后,黄球的石矿工场、兴业财务置业、兴旺证券、兴旺金号、兴旺财务相继开业,远在加拿大的“黄球投资”也正式成立……黄氏集团益发兴隆。

归雁情深报桑梓

阔别家乡40年,黄球非常怀念昔日求学的日子,在新会县侨联负责人唐珍琰的陪同下,特意到乡中的城郊小学“去走走看看”。城郊小学始办于1947年,至1979年已经32年,校舍低矮破旧,形同猪舍,黄球心中不禁五味翻滚。

当年家贫,黄球只读到小学三年级,便因无法缴纳学费而辍学,母亲东借西凑,才得以到私塾继续学业,但好景不长,三年后又因经济困难不得不辍学,到新会冈州汽车站当了杂工……黄球站在破旧的校园前,望着乡中子弟那一双双渴求知识的眼睛,想到自己的童年经历,重建学校的念头在黄球心中油然而生。

黄球的想法，得到了家人的一致认同。就这样，黄球慷慨捐出了100多万港元，专门用于重建城郊小学。为感谢黄球热心公益，大伙建议将城郊小学易名为“黄球小学”，谁料黄球一口拒绝，坚决不同意：“我捐款，只是为了改善家乡子弟的学习环境，不是为了出名。”

1990年，我陪镇领导赴港拜会黄球，他忽然向我提出“求助”。原来，黄球在1979年首次回乡参观城郊小学时，在旧校舍前照了一张全家福，其时黄夫人正怀孕。时隔十年，那张珍贵的全家福已丢失，他想寻回旧照。

1979年的时候，我还在大洞村委会当大队长呢，只听说其事但未见过黄球的全家福。但我不敢怠慢，回来后连忙找当年的负责人李荣光等人，可惜没找到，我只好跑到城郊小学去寻找。我和城郊小学的老师翻箱倒柜，将黄球十年间回乡所拍的相片全都翻出来，甚至连菲林底片也一张张查看，终于在一本旧相册里找到那张全家福。我们重新翻拍重洗好，致电告诉黄球这“喜讯”。黄球高兴地吩咐我马上赴港。

见到那张全家福，黄球珍之重之，立即叫家人将照片放大装裱，悬挂在自家大厅和办公室最当眼处。

坐下闲谈时，我向他聊起了环城中学的发展情况，还说他捐建的体育馆促进了学生“德智体”的全面发展，他很欣慰。当我说起入读环城中学的学生不断增多时，他说：“为感谢你们帮我寻回这张全家福，我捐建一栋教学大楼吧！”

黄球对乡中子弟的学前教育也十分重视。

1994年，黄球捐资400万港元重新兴建了城郊幼儿园，为乡中子弟的学前教育提供了极佳的学习环境。城郊幼儿园建成后，黄球特意诚聘了原实验幼儿园园长，请她带领幼儿园的教职工，着力打造一所“名牌”幼儿园。

20多年过去了，如今的城郊幼儿园已成为一所园舍壮观、环境优美、设施齐备、师资雄厚的

“江门市一级幼儿园”。2005年是黄球捐资重建城郊小学25周年纪念日。在庆典会上，得知城郊小学成绩显著，已经是新会区名牌小学但学位不足时，黄球向时任新会区副区长张莲友表示：“学校学位不足，我负责出钱，新建一座教学楼，一定要满足孩子求学的需要！”

洒向乡土都是爱

1979年，虽然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二个年头，但不少侨胞因种种原因尚不敢还乡，黄球却早已回乡捐资办学，其赤子之心，委实令人感动。

1979年初冬，黄球参加捐资助建的新会县侨联大厦奠基典礼后，在县侨联负责人唐珍琰的陪同下，专程到新会华侨中学参观。其时的华侨中学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洗礼”，墙上墨迹处处，课室门窗油漆斑驳，窗门破烂，课桌椅残破不堪，几十名学生挤在昏暗的教室里读书、写字……满目疮痍，衰败破败，这是新会华侨中学给黄球的第一印象。陪同参观的李流校长尴尬地告诉黄球：“新会侨中本应面向全县招生，但学校没有学生宿舍，无法录取乡下的侨眷子弟，我也很惭愧！”黄球沉吟片刻，指着山边的一块空地，对陪同的唐珍琰说：“我抛砖引玉，先出6万元兴建学生宿舍。你们也帮忙发动其他旅外乡亲，有钱出钱，让乡下的侨眷子弟也能到侨中入学。”

黄球回港后，很快汇回善款，并嘱托：务必保证质量。

远在香港的黄球时刻惦记着工程的进度。得知资金赤字，黄球亲自回乡并表示，宿舍大楼的资金由他独力承担，连宿舍内的床铺也由他出资配备。为此，黄球一共捐出善款近20万港元。

1981年，黄球出任新会华侨中学董事长。

1987年，得知新会华侨中学扩建遇上经济问题，黄球率先捐资70万港元，然后亲自游说侨胞捐

款。最终，在他的带头和发动下筹得 400 多万港元，解决了扩建新会华侨中学的燃眉之急。

1990 年深秋，受聘为新会华侨中学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的黄球回乡，参加新会华侨中学每年一届的田径运动会。这些年来，黄球不断捐资，连校长钟健民也不好意思再让他资助了，但他却毫不在意地说：“学校办得不错，我很欢喜！如有需要，不必客气。”钟健民听了，便实话实说：

“学校目前最需要的是有个语音室，但造价高，即使是国产设备也需 30 万元。”黄球听了，一口应承：“没问题，这 30 万元算我的。”

参观校园时，走进他出资捐建的宿舍大楼“勤静楼”时，黄球发现宿舍的床铺挤迫，因为学生逐年增加，宿舍床位不足。他驻足在大楼的走廊，指着对面的旧校舍问钟健民：“可以利用那地方调整一下吗？”得知旧校舍每个教室都有安排，黄球沉吟半晌，没再说话。离开时，他握着钟健民的手：“今天的事，我记住了。不过事有缓急，我们先搞语音室。”此后，他每次回校视察都主动对钟健民说：“上次的事，我一直记住呢，过些日子吧。”

1993 年，黄球又回来了。在与大家交谈间，黄球问钟健民：“如果新建一座宿舍大楼，要多少资金，多大规模才能解决床位不足的问题？”钟健民详细汇报了学生住宿情况，陪同在场的新会市教育局副局长钟长庚补充说：“按目前建筑造价概算，大约 500 万元。”黄球先生听了说：“这样吧，我负责 250 万元，余下的请政府解决，如何？”钟长庚和钟健民心里乐开了花。一年后，黄球在新会华侨中学捐建的另一栋宿舍大楼“求真楼”便屹立在校园里。为了表彰黄球爱国爱乡的功绩，新会市人民政府在校园内为他塑了半身铜像。

黄球不仅自己解囊捐资兴学，还穿针引线搭桥铺路，发动众多的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回乡捐资办学。夫人黄梁曼丽曾半笑半嗔地说：“我常跟他一起行山健身，他遇着人总问你是哪里人，

只要得知对方是新会人，就问有没有回乡啊，然后拼命‘拉拢’人家，要人家也跟他一起回乡。如今那些回乡捐资办学的，大都是他拉人家回来的……他也不害羞！”对此，黄球常笑呵呵地解释：“我个人能力有限，所以邀请大家回乡为家乡做事，集腋成裘。人多力量大嘛。”的确，新会华侨中学“三友堂”图书馆，就是黄球“拉拢”好友陈经纶、利荣康一道回乡共同捐资建成的。

创办于 1905 年的新会一中，曾培养了大量人才，如“地洼学说之父”陈国达等，但使新会一中“老校换新颜”的，众人都说这离不开黄球先生。

黄球是新会一中校园改建工程的发起人之一。1990 年，在前任新会县教育局长谭顺康的陪同下，黄球参观了新会一中。听完县领导和学校领导对新会一中办学成果的介绍，黄球感慨地指着简陋的校园说：“新会一中是新会最高学府，但这校容校貌实在不能代表新会教育的最高水平。”于是他主动提出捐资 200 万港元，新建楼高七层、建筑面积达 6300 多平方米的学生宿舍大楼“勤奋楼”。

工程在 1990 年 10 月动工，不到一年就建成了。宿舍大楼的每个单元都是独立套间，前后都有阳台。在 20 世纪 90 年代，带套间的学生成宿舍在大学也不多见，就算在今天也丝毫不显落后。

那年，被黄球“拉拢”回乡共同行善的朋友黄克競、苏澄洲纷纷捐资扩建新会一中。“勤奋楼”落成后，黄球发现新会一中没有游泳池，便主动提出捐建一座游泳池，并趁回乡的机会到学校亲自选址定点。为使工程尽快动工，他甚至对校长罗润涛说：“立个军令状吧，你们何时动工，我的 30 万元何时到位，如何？”大伙都没见过捐款也如此心急的人，全都被他的热心感动了。

宿舍楼和游泳池完工后，看到学生在舒适的宿舍里休息，又见学生在泳池畅游，黄球深感欣慰，“因为自己的钱真正地发挥了作用”。黄球意犹未尽，对罗润涛说：“还有哪些要紧的工程，

请告诉我！”得知还缺一个既可用来集会又能进行体育锻炼的多功能体育馆时，他又毫不犹豫地捐出200万港元，兴建了“健德堂”体育馆。

在捐建新会一中的过程中，黄球每次回乡，第一个落脚点必是新会一中。某日，黄球抵达新会码头时已是黄昏，大伙安排他吃饭休息，他却坚持要先到新会一中“走走，看学校还有什么地方需要帮助”。

黄球说：“树之有根，水之有源，人之有祖宗。”他把在家乡兴学育才视为造福桑梓的头等大事。为促进家乡的教育发展，他走遍了新会的每个角落。他三番四次捐建围垦学校的故事，更被传诵至今。

围垦，现名银湖湾，是1969年新会人民响应政府号召，在崖海边陲围滩造地开成的一个新洲。围垦地处新会最南端，偏僻、交通不便，当地孩子出入上学很不方便。1989年，黄球参观围垦时得知这信息，当即捐资10万港元创办围垦小学。1990年5月，黄球再访垦区，欣然为新校题写了校名：新会县围垦学校。

后来，围垦学校的生源渐多，原有的单层教学楼不能满足学校发展的需要。黄球获悉后，立即与围垦指挥部和县有关部门联系，再次主动捐资扩建围垦学校。当时有人说：“在围垦学校读书的大都是外省民工子弟，何必多管。”黄球不以为然地说：“外省民工也是中国人。只要是中国人，就是我的同胞，我都要帮助。”就这样，他在1992年12月又将20万港元划入围垦学校建校专用账户。一年后，新校建成，学生增至200余人，有实验室、音乐舞蹈室等多功能教学设施。2003年初秋，黄球得知围垦学校没有电脑教学设备，主动向围垦指挥部党委书记聂加伟提出，愿意捐资购置电脑教学设备。是年9月26日，黄球及亲友一行在新会区有关方面领导的陪同下，再次来到围垦学校，亲手将11万人民币支票交到围垦学校的负责人手中，使学校的信息技术教育踏上新台阶。

后天下之乐而乐

黄球是一个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长者。他重情重义，从不计较得失，更不在乎名与利。40多年来，他为家乡捐办的公益事业，涉及教育、医疗、交通，总值4000万港元，却从未因此向政府提出过一个私人要求，也没有从政府方面取得过一丁点好处。黄球先生不是新会乡亲中捐资最多的慈善家，但他绝对是最不在乎名利的。

黄球捐赠了巨额善款，办了上百项公益事业，如新会一中“勤奋楼”“健德堂”，新会侨中“勤静楼”“求真楼”和“育德池”，江门五邑大学、江门幼儿师范学校、江门一中、新会师范、会城实验幼儿园、冈州中学、新会人民医院、新会市急救中心、新会儿童活动中心、新会老人基金会和残疾人基金会等，从不冠以黄球之名。黄球曾捐建了一条道路，有关部门在路旁建一座凉亭，并命名为“耀寰亭”以资纪念。他得知后，立即吩咐将凉亭改作“利民亭”，认为“身后碑名空自好，做好眼前已足够”。

黄球大爱无疆。在粤北山区考察时，他看见连南县瑶寨的学校破旧简陋，儿童入学率只有一半，当即捐资20万港元扩建学校，并出任连南县教育促进会名誉会长。为此，广东省教育促进会还专门设立“黄球奖教金”。

随着年岁渐增，黄球把行善的“担子”移交给儿女，但他对家乡的公益依旧执着，并将其爱心、善心偏向于家庭贫困的乡中子弟。他说：“一个人，拥有财富的多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够助人，使别人快乐，那才是自己的最快乐。”

美丽的圭峰山下，黄球有一座名为“祥和苑”的别墅。每次经过，我的脑海总情不自禁地想起与黄球交往的点点滴滴，仿佛慈祥可亲的“球叔”就在我面前一样！●

[口述者：余思领，原新会会城镇侨联主席]

伍连德：中国防疫检疫事业的奠基人

文 余换权

中国防疫检疫事业的奠基人、有“中国现代医学之父”之称的伍连德是一代名医，更是爱国华侨，始终眷恋着自己的祖国。他亲自执笔，耗时7年完成的英文版自传《鼠疫斗士——一个现代华人医生的自传》，于1959年在英国出版。

由伍连德的女儿伍玉玲授权中国微生物学会原秘书长程光胜、马学博翻译，上述伍连德《自传》的中译本《鼠疫斗士——伍连德自述》（以下简称《自述》），分上、下册分别于2011年3月、2012年4月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

创造现代医学史上无数个“第一”

伍连德，字星联，祖籍广东新宁（今台山市），1879年3月10日出生于马来亚槟榔屿一个华侨家庭。17岁赴英国读书，1903年在英国剑桥大学意曼纽学院获得医学博士学位。他先后在英国、德国、法国等多家世界著名研究机构从事微生物学研究，曾师从诺贝尔生理学获得者梅契尼科夫和医学奖获得者霍普金斯。

伍连德1903年回到槟榔屿，在吉隆坡医学院从事热带医学研究，同时开设诊所。1907年应袁世凯之邀回中国服务，出任天津陆军医学堂副校长。1910年末，东北肺鼠疫大流行，引发严重公共卫生危机。伍连德临危受命，出任全权总医官，深入疫区领导抗疫工作，仅历时4个月就彻底消灭鼠疫。此后他还多次成功主持鼠疫、霍乱的大规模防疫。

伍连德是中国卫生防疫、检疫事业、微生物学、流行病学、医学教育和医学史等领域的先驱。他创造了现代医学史上的无数个“第一”：第一位英国剑桥大学毕业的华人医学博士；实施中国医生首次现代医学意义上的人体解剖；在世界上第一个提出了“肺鼠



◎ 伍连德

疫”的概念；主持了中国首次大规模对瘟疫死者的尸体焚烧；设计了中国第一只防疫性口罩；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通过隔离等办法应对城市发生的传染病疫情；主持召开中国政府承担的第一次国际学术会议；创建中国第一个海港检疫所；撰写了第一部英文版的中国医学史；他因“在肺鼠疫防治实践与研究上的杰出成就以及发现旱獭于其传播中的作用”，作为首位中国人在1935年被提名为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候选人。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著名学者梁启超就曾赞誉他：“科学输入垂五十年，国中能以学者资格与世界相见者，伍星联博士一人而已！”

伍连德在祖国辛勤工作整整 30 年，为中国的公共卫生事业作出了许多开创性贡献。

第一次成功的流行病防疫行动

1910 年 12 月，东北鼠疫爆发，伍连德熟谙细菌学、流行病学与公共卫生学，堪当重任。受朝廷重托，他临危受命急赴哈尔滨调查处理鼠疫。

到达疫区 3 天后，伍连德冒着生命危险进行了中国第一例人体解剖，从鼠疫病人尸体的器官和血液中发现了鼠疫杆菌，同时派人到满洲里查明肺鼠疫的疫源来自旱獭，从而确定这次流行的是肺鼠疫，通过呼吸道飞沫进行传播，因此他制定了通过隔离疑似患者防治肺鼠疫的全新策略。他采用的措施包括：将病人送往鼠疫医院，采用列车车厢隔离 3000 多例接触者，令所有人佩戴他发明的加厚口罩，调动军队封城，切断交通，以及通过焚烧 4643 具感染鼠疫的尸体来消灭污染源。依据伍连德周密而科学的防疫方案，靠着防疫团队高达 10% 的殉职率而筑起的血肉长城，整个防疫局势很快获得扭转。历时 4 个月，一场数百年不遇的鼠疫大流行，被以中国人为主的防疫队伍彻底消灭了。

伍连德坦言：“朝廷恩准对瘟疫死者进行集体火化，并且正式许可为获得知识而进行尸体解剖，这是中国近代医学发展史上的两个标志性事件。”

成功抗击鼠疫后，伍连德获颁“医科进士”功名，并被国内外誉为“防疫科学的权威”。初战告捷后，伍连德敏锐地意识到大鼠疫还会卷土重来。他婉拒担任管理全国卫生和医院事务官员的任命，回到东北担任东三省防疫总处处长，继续从事防疫事业。1920 年冬天，东北鼠疫果然又

起，伍连德打了一场漂亮的有准备之仗，与 10 年前仅中国境内便死亡 6 万多人相比，此次他把死亡人数控制在 1 万人以内。

经历了两次鼠疫抗疫，伍连德意识到，预防疫情必须未雨绸缪，需急迫建立国家卫生检疫系统。经过他 10 余年的不懈努力，1930 年海港检疫管理处成立，他被任命为该管理处处长，正式从洋人手中收回海港检疫权。

伍连德致力于建立中国卫生检疫体系，主持制定了《海港检疫章程》《交通检疫实施办法》《出国旅客卫生检疫规则》等一系列卫生检疫制度或章程；在各口岸创办防疫站和检疫医院 20 多所，形成了全国性的卫生检疫网络。在经费分文没有落实、基础极为薄弱的条件下，他凭借科学的管理很快使中国港口卫生检疫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国际学术会议

1911 年 4 月，清政府拨款 10 万两平库银，按国事之规格在奉天（今沈阳）隆重召开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型国际学术会议，这也是中国第一次举办的国际卫生防疫会议。这次为期 26 天的会议，旨在总结刚刚扑灭的中国东北大鼠疫，邀请到日本、英国、美国、俄国、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奥地利、墨西哥和中国 11 个国家的 33 名鼠疫权威和传染病专家出席。在这次举世瞩目的“万国鼠疫研究会”上，与会的多国专家一致公推抗击东北鼠疫的总指挥、以“鼠疫斗士”名扬天下的伍连德为大会主席。

在大会上，伍连德系统地介绍了中国防治鼠疫的经验，与会的各国专家交流了各自的研究成果。成功举行万国鼠疫研究会，更提升了中国在科学界之地位，并间接地增强了其政治影响。会后伍连德用英文发表了长达 500 页的《1911 年国际鼠疫会议报告》（马尼拉出版局出版），并应邀到多个国家讲学。

中国现代医学学术组织的创始人

回国伊始，针对各自为政的行医局面，伍连德呼吁成立以华人医生为主的医学会。1915年2月，伍连德、颜福庆等21人在上海集会宣告中华医学会成立，并选举颜福庆为首任会长，伍连德为书记。学会的宗旨：巩固医家友谊、尊重医德医权、普及医学卫生、联络华洋医界。从此，中国医师有了第一个属于自己的组织。

1916年2月，中华医学会第一届全国大会上，伍连德被选为会长，并连任了两届。1932年，中华医学会与中国博医会合并，会员总数超过2000人，成为当时中国医疗卫生界最有影响力和凝聚力的学术团体。1933年，伍连德还与颜福庆等发起创建了中国防痨协会。1937年，中华医学会公共卫生学分会成立，伍连德任首届会长。此后，他参与发起创建了10余个科学团体，包括中华麻风救济会、中国公共卫生学会、中国微生物学会、中国医史学会、中国科学社等。

在成立学会的同时，伍连德创办了《中华医学杂志》（用中英文同时出版），并担任首任总编辑。在创刊号中，他发表了题为《医学杂志之关系》的发刊词。杂志从创刊起就广受欢迎，他的绝大多数论文均发表在《中华医学杂志》上。会刊的广告收入颇为可观，除为每位会员每月免费提供一本会刊外，不久就在上海买下一所房屋，将其改造成现代化的办公室和藏书可观的阅览室。1949年，中华医学会从上海迁京之际，伍连德将自己在北京的一所宽敞的3层宅院连同数千册图书捐给学会，作为学会的办公场所和图书馆。

开启中国现代医学教育之门

伍连德还是著名的医学教育家，他率先引进当时国际先进的英美医学教育体系，使陆军军医学堂成为中国第一所现代化医学院，开启了中国

现代医学教育之门。

伍连德还上书民国中央政府，建议从根本上改变医科学生的培养方式，包括开设人体解剖学，在医院进行有系统的临床教学，建立中央医学统辖处以监督医学教育，倡导医学生学习英文等。他提出的许多建议均被采纳，从而促成北京协和医学院及北京协和医院的落成。

伍连德先后在各地创建了20余所医疗、检疫及医学教育机构。鉴于北京较完善的医院皆为外国人所建，伍连德倡议中国自行建设一所现代化的综合医院，并获得政府同意。除财政部拨款外，大部分经费由募集得来。北京中央医院（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于1916年奠基，1918年1月27日开院，伍连德亲自担任首任院长。在医院建设的3年中，他从征募建筑经费到审查设计规划，事必躬亲、身体力行。为了医院的早日落成，他不仅慷慨解囊捐助，而且在建院过程中不取分文报酬。随后，他还参与了北京协和医学院及北京协和医院的筹建，在1926年创办了哈尔滨医学院（今哈尔滨医科大学前身）。

伍连德医学造诣精深，学术著述颇丰，曾发表学术论文300余篇，涉及公共卫生、传染病流行病、医学教育、医药管理等多方面，其中多篇论文在《英国医学杂志》和《柳叶刀》发表；专著有《中国医学史》《论肺型鼠疫》《鼠疫概论》和《霍乱概论》等，《鼠疫概论》和《霍乱概论》至今仍为国际同行引为经典。

他一生访问过欧美和亚洲近20个国家，获得上海圣约翰大学荣誉科学博士、香港大学荣誉医学博士和苏联科学院荣誉院士等十几个荣誉称号。

1937年伍连德移居香港，1946年回到出生地。1960年1月21日，伍连德因心脏病逝世，享年81岁。●

[参考资料：伍连德著，程光胜、马学博译《鼠疫斗士——伍连德自述（上、下册）》，湖南教育出版社]

张肖白：加拿大华人“白求恩”

文 司徒明德（《江门日报》原副总编辑）



② 张肖白

张肖白祖籍广东开平马冈乡梧村，1897年8月19日出生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维多利亚市的一个华侨家庭。

张肖白出生后由父母代为洗礼，成为基督教徒。其父张灵椿原在加拿大教会任职，后曾回广州从事教会工作，结识了当时正在广州博济医院学医的庄燕娴，二人结婚后同回加拿大，张灵椿随后离开教会开洗衣馆谋生，庄燕娴则开业当助产士，夫妇勤俭持家，过着俭朴的生活。张肖白是长女，三弟及四妹早夭，童年时俭朴的生活给张肖白的一生带来深刻影响。

1904年至1913年，张肖白的母亲将她送进由加拿大女子传教协会兴办的东方之家托管和教育。1913年至1917年，张肖白在当地教会办的维多利亚公共学校和维多利亚高中学习。1917年，张肖白考入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白求恩大夫就读的多伦多大学医学院医疗系攻读医学。当时，比她大7岁的白求恩从学院毕业才一年，因此，她是白求恩大夫的校友和师妹。

张肖白在学校读书时，经常利用傍晚时间勤工俭学，带着书本去替人照顾孩子，边带孩子，边读书学习。由于她勤奋好学，因此学习成绩非常优秀，成为多伦多大学杰出学生代表，被载入多伦多大学医学院的历史档案中。1922年，25岁的张肖白大学毕业并获得医学硕士学位，成为第一位毕业于多伦多大学的华人和第一位加拿大籍华人医师。1923年她在多伦多综合医院实习。

—

本来，张肖白可以在英国及其殖民地医疗机构执业的，但她却于1923年11月回到中国。她要运用自己的医学专长，为

多灾多难的中国工作，为缺医少药的同胞服务。刚到中国初期，美国人办的广州夏葛医学院热诚地聘请她当教授，被她婉言谢绝；有朋友劝她到香港执业，她同样也谢绝了。最后，经加拿大教会推荐，张肖白到江门仁济医院任医师。

江门仁济医院创办于1912年。在这之前，外国传教士从1908年起就开始进入原新会江县江门埠活动。当时，加拿大传教士莱菲伦·麦克凯尔在西江边北街找了一间小屋作为临时的礼拜堂兼诊所，这就是后来仁济医院的雏形。1912年6月，由加拿大多伦多教会与加拿大基督教长老会妇女协会共同出资建了一座两层楼房，即后来的促景楼和康乐楼，正式取名为仁济医院。同时，为纪念蒙特利尔市圣保罗教堂退休牧师巴克莱医师的夫人玛丽安·巴克莱女士，又取名为玛丽安·巴克莱医院。

1929年9月，张肖白赴美国纽约医院进修妇儿科，至1930年6月返回江门，10月起开始担任仁济医院院长。1936年11月至1937年12月，她又先后到加拿大多伦多医院、英国伦敦热带病学院进修。在这期间，张肖白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并成为英国皇家医学会会员。

抗日战争爆发后，敌机频繁轰炸广州、江门等地，许多人被迫逃离家乡，但张肖白不忍心离开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同胞。1941年12月，江门沦陷，日本侵略军侵占了仁济医院，强迫她继续任职，她断然拒绝并离开了仁济医院，在自己家里替病人看病。后来，张肖白与王淑贤、张微笑、卢瑞珍女等医护人员一起在江门开设私人诊所，继续为广大群众治病服务。

1945年，抗战胜利，日本投降，张肖白回到仁济医院继续任院长兼医师。1947年9月至1948年5月，张肖白再度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医学院进修内科。回来后仍担任仁济医院院长至江门解放。1951年11月，人民政府正式接管仁济医院，改名为粤中行署第一人民医院（后改名为

北街人民医院），张肖白被委任为第一人民医院首任院长。

三

张肖白在担任仁济医院院长的岁月中，积极钻研医学，十分重视临床实践，热心为患者服务，积累了丰富的医疗经验。在医院里，她没有一天能按时下班，没有一天不坚持夜查房，从早到晚都可见到她的身影：斑白的头发，淡色的衬衣，微笑的面容。她在应诊和查房时，经常与其他医务人员一起抢救危重病人；她诊治每一个病人，总要亲自查问病历，亲自检查病因，细心体察病人的要求和愿望，真正做到想病人之所想、痛病人之所痛、急病人之所急。为了准确诊断病人的病因，往往废寝忘食地查阅中外医学文献，务求诊断病症准确无误，对症施治。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北街医院曾收治过一位腹大如鼓的女病人，经中西医反复检查，最初认定为肝硬化腹水。张肖白临床观察，再经多方细致的检查，结果正确诊断为卵巢囊肿，便果断进行手术，割出了一个30多斤重的囊肿物，使病人很快恢复健康；北街医院又曾收治过一位腹痛而不能大便的病人，多位医生诊断为直肠癌。张肖白凭着她丰富的临床经验，发觉直肠内的硬结物是积聚已久的块状粪便，断定不是直肠癌，她亲自给患者逐粒掏出粪块而病愈。1960年夏，医院收治了一大批失明病人，张肖白十分重视，每天都逐个查视，亲自细心护理，认真细致地指导眼科大夫进行手术，使绝大多数病人重见光明。1963年秋，一位腹痛病人发现胃部有不规则的硬块，临床诊断为胃癌，张肖白在大查房时，详细问诊及体检后，提出了不同见解：“如果一个胃癌病人腹部包块已可触及，他的身体情况会如此好吗？表浅淋巴结会没有转移吗？高明地处山区，秋季柿熟，病人吃了那么多柿子你们都忽略



②回到中国行医的张肖白（右一） 图片来源：江门市中心医院

了。他不是胃癌，可能是柿石病。”手术结果证实了她的正确诊断。这亦是广东省第一例柿石病例报告。如此及时诊断的事例，在张肖白的行医过程中数不胜数。

张肖白把救死扶伤视为自己的天职，经常率领医疗队深入农村巡回应诊。1956年夏，新会县上横乡发生姜片虫流行病，她立即带医疗队深入发病最严重的乡村，住在农民家里夜以继日诊疗，控制了疫情的蔓延，并提出了根治姜片虫病的有效方案。她还率领医疗队翻山越岭上门替农民治病，足迹遍及新会、开平、台山、鹤山、高明、德庆、斗门、中山等城乡。

1956年，张肖白亲自领导建立了广东省地区级医院第一个独立临床小儿科，为中华医学学会广东儿科学会的创立打下了基础。在科研方面，她对许多流行病、高难手术进行探索和研究，都取得了显著成绩。张肖白本人也撰写了大量的医学学术文献，为促进医疗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四

张肖白以医院为家，终生未嫁，长期过着俭朴生活，对劳苦大众却怀有深厚的感情。在1949年前，她就将自己的工资收入节省下来资助孤儿，使之受教育，成为护士或医疗技术人员。1949年后，她在宋庆龄的感召下，将自己所有的积蓄悉数捐给医院购买X光机和儿科病床，并独资捐建了北街医院护士学校；1961年，她还把多年来节约下来存放在加拿大银行的存款5000美元汇回祖国，用以购买X光机、心电图机等先进医疗设备捐赠给医院。

张肖白先后被评为全国劳模、两次出席全国文教战线群英会、受到刘少奇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曾当选为广东省政协委员、江门市政协副主席和市人大常委会委员。1966年初，张肖白不幸患上肺癌，党和政府领导非常关心她的健康，立即送她到广州中山医学院附属肿瘤医院留医。去世前5天，在她的要求下，她回到鞠躬尽瘁数十年的北街医院。她于1966年5月17日与世长辞，终年69岁。

张肖白逝世后，江门市人民政府在中山纪念堂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很多群众自发前来加入送殡行列，人数竟多达2000余人，而在马路两旁驻足默哀的群众更是不计其数，社会各界自发悼念的队列从江门中山公园蜿蜒至会城的南禺路。2008年5月17日张肖白逝世42周年的日子里，为了缅怀张肖白，江门市中心医院院长梁伯进发动全院职工募集善款，在圭峰山山麓上建立了一个墓地，将张肖白的骨灰安放其中，以告慰她在天之灵。

一代名医，德高医精、高风亮节，加拿大籍华人“白求恩”张肖白将永远活在中加两国人民的心中。●

陈焕镛：中国植物学界之先驱

文 马如爱

陈焕镛，字文农，号韶仲，1890年农历六月初六出生于香港，祖籍现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潮连巷头村。1903年，陈焕镛随父亲的朋友赴美，1913年入读哈佛大学，获林学硕士学位。其师授意其继续读博士，但他心系祖国，舍弃深造机会，于1919年毅然返国。

开创中国现代植物学科研事业

陈焕镛回国后即赴海南岛五指山区，成为登上祖国南部岛屿采集植物标本的第一人。当时海南岛山区瘴气弥漫，民不聊生，植物学家从未履足。他在岛上待了10个月，发现不少植物的新属种，采集了大量珍稀标本。在采集过程中他曾不慎从树上坠下，跌伤手腕，又患恶性疟疾，但他仍然坚持工作。自此，海南岛丰富的植物资源引起各方面的重视。之后，他还多次派遣队伍前往采集，为日后编撰《海南植物志》奠定了基础。

1922年夏，陈焕镛和钱崇澍在南京凑集了500元经费，与秦仁昌3人组织了鄂西植物调查队，由宜昌出发，经兴山西侧方万草山，至神农架山区所属之小龙潭及堇菜垭寺，再到巴东，共采得近千号标本。这是中国植物学家自己组织的第一支大规模采集的调查队。然而经采集所得的最完整的一份标本存放于上海招商局仓库，于1924年因失火被焚，甚为可惜。

1927年陈焕镛任中山大学教授期间，前往粤北、广州、香港、广西和贵州等地采集标本，与此同时还和英、美、德、法等60多个国家的学者和标本馆建立联系，交换得到3万余份外国标本。1928年，陈焕镛建立了中国南方第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标本馆。这个标本馆采用严格的科学管理，每种标本有3套卡片，标本若被发表的文章引证，即用确定标签贴在标本上。标本封套内还附上原始记载、重要专著等文献资料，这样不但使定名比较准确，标本记载有条不紊，也为研究工作提供了条件。当人们需要查阅一张标本，仅需查到采集人、编号、植物名、标本号码或采集地点等要素之一，即可迅速找到标本。这种管理法也为日后采用电子计算机管理标本打下了基础。由陈焕镛亲手创建的华南植物研究所标本馆后来发展成为拥有70多万号标本的标本馆，在研究中国植物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1928年陈焕镛向中山大学农学院提出设立植物研究室，发展植物科学。在当时时

局动荡，治安不稳，以及经费、人力、设备都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他仍竭力维持研究工作，第二年即将植物研究室扩充为研究所。研究所不仅从事广东植物分布调查和植物分类研究，还担负着促进广东农林经济事业发展 的使命，后更名为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为改善研究环境，陈焕镛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每年拨给他的经费 1000 元捐作建所经费，还把自己的薪酬全部捐献出来购买设备。在他的领导下，全所人员经过数年艰苦努力，标本和图书资料逐渐增多，科学仪器亦渐补充，采集队和科研队伍也在逐渐发展壮大。

1935 年 1 月，陈焕镛被广西大学聘请到梧州筹设广西大学植物研究所，为此，他常往返于广州、梧州两地，主持两所工作。数年内，他派出标本采集队到十万大山、龙州那坡、百色隆林、大瑶山等采集了大量标本，为编写《中国植物志》和《广西植物志》奠定了基础。

登上国际学术舞台

1930 年，陈焕镛创办植物学学术刊物《中山专刊》(SUNYATSENIA)，以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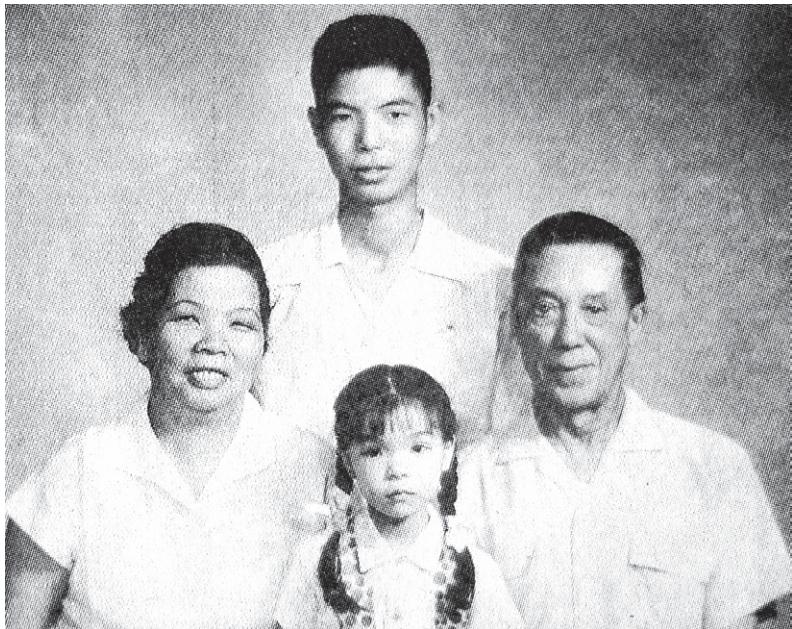
中山的名字作为刊名，纪念这位伟大的民主革命家。该刊为英文版本，专门刊载有关植物分类为主的文章，自 1930 年创刊至 1948 年共出版 7 卷 26 期，是研究中国植物的重要刊物，在国内外有一定影响。1946 年至 1948 年间，《中山专刊》在经费紧张的情况下仍如期出版。陈焕镛用《中山专刊》与国外交换得到大量植物学方面的书刊，其中有不少卷册迄今为仅有之珍贵版本。资料的积累和收藏使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逐步发展成为中国植物学科研事业的重要基地之一。

陈焕镛无论从事科研或教学，都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基础与应用兼顾，对经济植物尤以木本植物研究为重。在建立研究所的同时，设立树木园和植物园，既到野外采集植物标本，又注重采集木材、花、种子、苗木等。每当发现具有经济价值的植物，都要引种到研究所的标本园里，作进一步的观察和研究。陈焕镛一向重视培植活标本，早在南京教学期间，他就在郊外建了个小园林，培植了从美国带回的良种。1957 年，他以巨大热情兴建华南植物园和鼎湖山树木园。从园址的选定到园内的规划，均由其亲自主持，并邀请全国植物学家进行建园规划。华南植物园具有亚热带、热带植物特色，其中棕榈植物、孑遗植物、蕨类植物，以及兰花、竹、木兰、姜、中草药等植物尤为丰富，植物种类不下四千余种，在植物学知识普及和科研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陈焕镛是中国植物分类学界的先驱和权威，在国际上也享有声望。



② 1958 年，陈焕镛（左二）与著名植物学家塔赫他间院士（左一）、地植物学家拉弗连珂（右一）在研讨



② 1964年，为编撰《中国植物志》，74岁的陈焕镛（右一）带着家人到北京

1930年，他应邀参加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召开的第四届太平洋科学会议。同年8月，作为中国代表团的团长出席在英国剑桥大学召开的第五届国际植物学会议，并代表中国植物学家向大会致贺词。会上陈焕镛发表了题为《中国近十年来植物学科学发展情况》的讲话，博得与会者的莫大兴趣和重视，以致大会将中国植物研究列为重要议题之一。陈焕镛的发言，为中国在国际植物名法规审查委员会中争得两票选举权，为中国加入国际植物学会及命名法规委员会开了先河。1935年，陈焕镛应邀出席在荷兰召开的第六届世界植物学会议，被选为该会植物分类学组执行委员及植物命名法规小组副主席。

1936年，任中国植物学会会长的陈焕镛被英国爱丁堡植物园苏格兰植物学会特聘为该学会名誉会员，英国伦敦唐昌蒲学会授予其名誉会长荣誉。稍后又被聘为美国麻省园艺学会通讯员。

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陈焕镛出席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南亚栽培植物起源与分布”学术讨论会，任中国代表团团长。他发表了精辟的演讲，从中国古农学和遗传学的观点谈到水稻的起源，其见解使与会学者无不叹服。

1958年，陈焕镛代表中国科学院赴苏联列宁格勒植物研究中心作考察及学术访问。苏联《植物学杂志》以头版位置发表他与匡可任合写的《中国西南地区松科新属》，这种属于裸子植物极少数子遗种之一的银杉，被称为“活化石”。此植物在地球上其他地区早已绝灭，唯独生存于中国局部山区。

作为濒危珍稀植物，它的发现不但在植物系统分类学上又添新篇，而且对人类了解地球历史，特别是气候变化与冰川的进退及其覆盖地区都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一发表，即引起各国学者的关注，不少学者来华访问，都以一睹银杉为幸事。在访苏短暂的一个月中，他还鉴定了大批采自亚洲各地的植物标本，得到苏联同行的高度评价。

护科学财产周全

陈焕镛毕生从事植物学研究工作，十分珍惜植物资源和植物标本。为保护珍贵的标本、图书，他不顾个人安危，终使科学财产得以周全。

抗日战争爆发后，广州遭日机轰炸，农林植物研究所为避免重要的标本、图书和仪器毁于炮火，经中山大学批准，于1938年春将这些重要资料搬运到香港，在九龙马头围

道陈家寓所三层楼房设立研究所驻港办事处。而时任中山大学理学院院长兼生物系主任的陈焕镛仍留在广州，还想对石牌标本园作最后营救。10月23日广州沦陷，他只好匆忙逃至沙面英租界，后来标本园遭日军踩毁。陈焕镛匿居沙面，仍不安全，经多方营救才辗转至香港，继续主持研究所工作。

1941年年底，日军侵占香港，植物所驻港办事处遭到日军包围搜查。由于标本、图书均有中山大学标志而被视为“敌产”，办事处被日军查封。陈焕镛20余年积累得来的标本、图书面临被掠夺的厄运。1942年3月，适逢时任广东省教育厅厅长林汝珩到香港，要求将植物所迁回广州，并愿意协助运返标本、图书等，此时，陈焕镛与全所职员共商认为：“与其徒慕清高之行为而资敌以珍藏，莫若利用权宜之措施以保存实物，名城弃守，光复可期；文物云亡，难谋归赵，为山九仞，岂亏一篑之功；来日大难，当抱与物共存亡之念，赴汤蹈火，生死不辞；毁誉功罪，非所敢顾。”当时被封的标本极有可能被运往日本，经反复考虑再三，他们同意按林汝珩计划迁穗，但声明植物所乃纯粹科学机构，拒绝涉及政坛。几经波折，标本于1942年4月底运回广州，被安置在岭南大学校园内，研究所更名为广东植物研究所，陈焕镛仍任研究所所长。

抗战胜利后，陈焕镛以“如释重负”的愉快心情与员工清点公物，报请中山大学派人接收。岂料，竟有人诬告陈焕镛是“文化汉奸”，当时教育界、法律界知名人士许崇清、金曾澄、沈月飞、邓植仪等联名上书，陈述事实，并愿担保。1945年12月31日，农学院院长邓植仪给中山大学校长王星拱的报告指出：“查所称各节及经过之记载，确属实情，该员忍辱负重，历尽艰危，完成本校原许之特殊任务——保存该所全部文物，使我国植物学研究得以不坠，且成为我国植物研究机关唯一复兴基础，厥功甚伟，其心良苦，

其志堪嘉。”至1947年，当局以“不予起诉”了结此冤案。中山大学弄清情况后，恢复了陈焕镛原来的职务。

撰专著流芳百世

陈焕镛一生发表过多篇重要著作。1922年至1925年间，他先后发表和出版《中国经济树木》（英文版本）、《载栽培在我国的中国松与日本松之比较》《浙江树木二新种》和《我国樟科之初步研究》等学术论文和专著；后来又和胡先骕合作编著《中国植物图谱》（五卷），此书是早期研究中国植物分类的主要文献。他对中国樟科、壳斗科、苦苣苔科、桦木科和胡桃科等的分类有精湛的造诣，先后发表的学术论文和专著不下50余篇（册），发表的新种在百种以上，发表的新属10个，如世玮苣苔属、任豆属、银杉属及观光木属等为世界各国学者普遍承认，尤以后两新属之发现在植物分类学上具有重大意义，为中国植物学界增添异彩。

华南植物研究所在陈焕镛领导下编写出版了《广州植物志》，这是中国第一部比较完整的地方植物志；随后又编写出版了一部有450万字分为4卷的《海南植物志》，这部植物志积累了陈焕镛数十年的劳动和心血。他从1919年到海南岛采集后就下决心要摸清岛上的植物种类，“我们研究植物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发现那些尚未被启用的植物，使它们在国民经济建设中发挥应有作用”，“没有无用的植物，只有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怎样利用它”。陈焕镛将植物志生动地比喻为植物的户口册，“有了它，人们就能找到所需要的植物，把它们派上用场”。继两部地方植物志之后，陈焕镛又与钱崇澍合作主编《中国植物志》，该志是一部包含有80卷125册、具有重要学术和实用意义的巨著，是世界上最大的植物志之一。●

陈子褒：中国著名平民启蒙教育家

文 陈国汉

我是陈子褒的曾孙辈，我称他为太公。太公陈子褒，名志孚，号荣袞，又号耐庵，1862年生于新会县外海乡（今江门市江海区外海街道）。他早年追随康有为，参加戊戌变法，失败后逃亡日本，考察日本的小学教育后回国，弃政从教。他主张改革文言文，提倡白话文，是中国白话文的先驱之一。他注重妇孺教育，编写大量启蒙书籍，开启民智，办义学，兴女校，自号“妇孺之仆”，被誉为“东方的裴斯塔洛齐”（裴氏为瑞士著名儿童教育家）。他对于文化教育事业贡献之大，堪为中国文化革新之先进者，是清末民初岭南地区著名的平民启蒙教育家。

砥砺新学

太公出身于书香门第，聪颖而好学。据传，他于光绪三年（1877年）考取秀才，光绪十九年（1893年）考取广东举人第五名，膺“五经魁”，名列南海康有为之前，但他读了康有为的《书同文》试文后，自叹不如，特前往万木草堂拜谒。谈论之间，他大为折服，便效法宋代吕荣阳拜程颐为师的故事，执弟子礼，拜康有为为师，与梁启超、梁启勋、卢湘父、等人一起学习。在康有为门下，陈子褒开始接触新知识、新思想。他推崇康有为是其思想的启迪者，“然苟无康先生教导，则茫无门径，虽十分勤勉，亦无所用之”。

1893年冬，万木草堂迁到广州学宫仰高祠（今广州市工人文化宫）内。当时祠内奉祀历代名臣，神龛上设有牌位。一天，陈子褒与梁启超、梁启勋等人在祠中谈话，梁启超猛然发现神龛上有元初将领张弘范的牌位，大为吃惊。梁启勋把张弘范的牌位取下摔到地上，去厨房找来菜刀，想将其劈碎。陈子褒连忙制止，说：“不用忙，他尚未知罪，待我宣布其罪状然后行刑可也。”于是他找来纸张笔墨，一挥而就，作成一篇短文：

尔张弘范，以汉族之子孙，作胡奴之爪牙，欺赵氏之孤寡，促宋室之灭亡，尤复勒石崖门，妄夸已绩。陈白沙曾以一字之贬，严斧饿之诛。乃复窃位仰高，滥膺祀典。若非加以鞭戮，何以明正典刑。尔奸魂其飞于九万里之外，毋污中土。



⑦ 陈子褒

梁启超高声朗读了一遍，梁启勋才挥刀将张弘范的牌位劈为碎片。

当时，广州双门底有间“圣教书楼”，是一个名叫左斗山的基督教徒开设的。他热衷新学，大量购进上海广学会和中国教育会翻印、出版的外文书译本，使“圣教书楼”成为广州唯一的的新学书店。陈子褒经常来这里看书，开始接触西方文化。为了更好地了解西方文化，他还开始学习英语。

1895年，陈子褒进京参加乙未会试。时值中日战争结束，中国战

败，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在京参加应试的康有为和梁启超联络 18 省应试举人共同上书光绪皇帝，提出“拒签和约、迁都抗敌、变法图强”三项主张，史称“公车上书”。陈子褒参加了这一运动，随后加入康有为组织的“强学会”，鼓吹变法维新。

东渡日本

1898 年 3 月，陈子褒参加了康有为、梁启超在京组织的“保国会”。在“百日维新”期间，他还到梁启超主持的译书局任事。由于“维新变法”失败，康梁逃亡海外，陈子褒也经上海东渡日本。在神户，他找到在东亚报社当主任的同学韩文举，经其引荐结识了该报主编侨本海关。

侨本海关是日本著名教育家，也是诗人，各学校的校长多是他的诗友。在他的介绍下，陈子褒到各校参观，考察日本小学的教学方法。他特别欣赏日本教育家福泽谕吉创立的庆应义塾，推崇该校的教育宗旨和教学方法，决心效法，以教育救国。同年底，他返回中国，开始撰文编书办学，以实践自己的抱负。

陈子褒在日本考察小学教育四月有余，领悟到小学教育是强国之要，决心改良于中国启蒙教育。

设馆办学

1899 年，陈子褒回国后先在开平县邓氏家塾任教席，不久即到澳门设馆教学，其馆址设在荷兰园正街，初名“蒙学书塾”，后改为“灌根书塾”。他把蒙学作为教学的基本内容，改革文言文，提倡通俗的白话。这一年，他在澳门组织中山、新会、台山等地小学的 20 多名教师，成立“教育学会”（后改名“蒙学会”）。他在《教育学会缘起》一文中，开篇即言：“一国之强弱，系乎人才；人才之盛衰，系乎教育”，“中国教育既失其

本，复遗其末，非全行改革，无以激发国民之志气，浚沦国民之智慧”，“识微见远之士；至谓中国之亡，亡于学究之手，岂谬语哉”。评论深刻，入木三分，发人深省。

要开启民智，必须改革语言，普及“浅说”（即白话）。太公于 1899 年在《论报章宜改用浅说》文中指出：“今夫文言之祸亡中国，其一端矣。中国五万万人之中，试问能文言者几何？大约能文言者五万人中百人耳。”他继而指出：“大抵今日变法，以开民智为先。开民智莫如改革文言。不改文言，则四万万九千百分之人居于黑暗世界中……”他还借用“古玩店”和“卖米店”这些常见事物对文言文的观赏性和白话的实用性进行比较，“文言譬如古玩店，浅说譬如卖米店。一国之中，可以人人不买古玩，不可以一人不买米”。通俗的比喻道出了白话的实用性和重要性。

太公倡导的白话文教育运用港澳地区人们熟悉的粤语编纂教材，甚至翻译经典，推介外来文化，为广大妇孺和普遍百姓所接受。

1900 年夏，陈子褒接受澳门格致书院（即广州岭南大学前身）汉文总教习钟荣光的邀请，前往该校主持暑期国文讲习班，历时三届，先后出版了有关妇孺教材多种。这些白话读本很快就传入内地，成为乡间书塾的教科书。这些读本是中国最早的白话文教科书。

此后 7 年多，陈子褒集中精力编写启蒙课本，出版了大量教材。1904 年，他主持编辑发行了《妇孺报》和《妇孺杂志》。1909 年，“蒙学会”成立了“子褒同学会”，选卓乃宙为首任会长。同年及以后两年时间里，该会出版了《七级字课》的系列教材。1912 年至 1917 年，陈子褒先后出版了一些历史方面的教材，如《左传小识》《史记小识》等，还出版了《灌根小学杂志》。

1918 年，太公将“灌根书塾”迁到香港坚尼地道循道会旧址，继续从事小学教育。不久，学塾先后易名为“子褒学塾”和“子褒学校”，规模

日渐扩大，最高峰时学校有学生 230 余人，是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香港地区最有名的私塾，香港许多名人均出自他的门下。内地国人和海外华侨争相把子弟送来学习，一时传为佳话。

太公陈子褒在教育方法上，主张教材“通俗是贵”，遵循“浅、少、缓”原则，“趣味开智”，具有通俗性、趣味性、启蒙性、开放性、基础性的特点。其中不少教材劝人爱国，劝人向善，劝人戒赌，劝人读书，劝人戒烟（鸦片烟）。以下选自《妇孺五字书·戒烟》片段，可窥一斑：“莫食鸦片烟，一食魔鬼缠，烟瘾忽然起，眼鼻水涟涟，面如镬底黑，还耸一字肩，须戒第一口，烟床总莫眠”。

太公在教育内容上，选择了“训蒙开智”的方法，致力提高国民基本素质。据 1921 年《子褒学校年报》记载，子褒学校在课程设计上已经与现代小学非常相似，有经史、国文、诗词、图画、算术、地理、历史、唱歌、英文等科目，初步涵括了“德、智、体、美”等现代办学目标。

男女同校创先河

太公认为“中国有一大害，如女子不读书是也”，“我中国四万万人，而有二万万不读书女子，是一半无用之人矣。有一半无用之人，中国所以日弱也”，遂开办女校，大力推动妇女教育。1903 年，太公创办的“灌根学堂”开始招收女生，在中国开了男女同校的先河。他比清政府提出办女学早了 4 年，后来广东省立中学、北京高等师范附属中学于 1921 年才开始招收女生。同年，陈子褒编办《妇孺报》和《妇女杂志》，1919 年创办“联爱女校”，1921 年在香港创办“圣士提反女义学”和“子褒女校”。其中“子褒女校”聘请清代甲午进士桂玷、陈俊卿、曾壁山等 20 人为教员，培养女童的综合素质，是香港最早由华人兴办的女子学校。

太公的得意女弟子冼玉清是中国著名教育家。太公去世后，冼玉清等人把他的教育论文编辑为《陈子褒先生教育遗议》一书，该书一度为广东省教育当局所采用。近年国内一些学者对陈子褒的研究也从该书中获益匪浅。

同姓通婚

民国初年，太公在江门外海发布《通启》，倡导外海陈姓四大房互通婚姻，这是中国第一份赞成同姓结婚的倡议书。

外海陈氏于元朝至正十年（1350 年）由外地迁入，到民国初年，经 560 年的繁衍，已成为族大人多的大姓。而外海陈氏历来功名鼎盛，书香门第特别多。按照当时门当户对的婚姻观念，不少陈姓子女难以找到合适的对象，即使破格迁就，外姓人家也不敢高攀，因而不少人家特别是世家子女婚配更困难。太公认为，只有打破同姓不得结婚的限制，才能解决这个问题。他指出，在远古，由于人们刚有姓氏，故同姓者血缘相近，但外海陈姓四大房之间已历经二十几代，已非近亲血统，通婚绝无问题，对后代绝无不良影响。由于这份《通启》理据充分，外海知识分子陈仲伟、陈德芸、陈辑五在《通启》上签名支持，印发全乡。可惜当时把持乡政的人是封建顽固派，他们认为太公等人背弃礼法。他们以大逆不道为由，革去太公及签名者的胙肉（祠堂祭祖后分给各人的祭肉）以示开除族籍，从而使这一倡议在几十年内得不到推行。

太公于 1922 年 7 月 4 日在香港病逝，享年 61 岁。其继嗣子伯强、女翘学及门人冯民德等人将他的灵柩葬于香港薄扶林道中华基督教会坟场，香江学教两界赴会追悼者数千人。其老年小友同里“社会之仆”李淡愚为之撰碑文，并附联语：教泽满香江，匪我求童蒙，最难得旧学新知，深入浅语。灵魂返天国，为君留纪念，应未忘老年小友，清室逸民。

尤今：登上新加坡文学奖最高荣誉殿堂

口述 尤今 整理 麦博恒



② 尤今及其作品《聆听文字的声音》



我原名谭幼今，祖籍台山市台城白水村委会大岭厚村，1950年10月10日出生于马来亚北部的怡保镇。数十年来，我从事文学创作，辛勤笔耕，迄今为止，先后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美国、欧洲、中国出版了140多部书，包括小品文、游记、散文和小说，达千万字以上。1991年，我成为新加坡首届“新华文学奖”唯一得主，这是新加坡文学奖的最高荣誉，对我鞭策极大。

以“尤今”之名入文坛

1902年，我的祖父为了谋生，从台山漂洋过海，来到马来亚，父辈已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我是第三代。小时

候我家里非常穷，住在茅屋里，但我们有很丰富的精神生活。这精神生活像灯一样，把物质照得很亮很亮。

父亲生性爱书善文，又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与爱国精神。1941年12月，日军占领马来亚，他与马来亚军民在丛林中进行了三年艰苦卓绝的抗敌斗争。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父亲前往马来亚北部开发锡矿，后来成为一家酒店的老板。后来酒店便成了谈诗论文的场所，天天高朋满座，谈天说地，就是有顾客来了，父亲也顾不上做生意。父亲还慷慨献出美酒佳肴，让他的朋友酒醉饭足，纵论天下，有时意犹未尽，干脆将一瓶瓶好酒让朋友带走。酒店经不起这般折腾，不久就关门停业。但是，父亲仍不改初衷，又办起《迅报》，专门谈文化、谈社会、谈理想，母亲担起撰稿人的职责，在上面撰写长篇连载小说。但是，这份纯粹为理想和一时兴趣而办的报纸，经受不起时间和困难的考验，挣扎了两年，最后还是闭馆告终。

我就是在这样一种环境中成长起来，从小便徜徉在绚丽多彩的文学世界之中，父母舞文弄墨，广交朋友，我耳濡目染，随处可见的报纸、书籍给我幼小的心灵开启了一扇通往文学的窗口。我觉得离开了书就像鱼离开了水，活不下去。小学毕业时，我已经读完了大部分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如《红楼梦》《西

游记》《三国演义》《聊斋志异》等，同时，我还阅读了大量童话书籍，如《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还有各种各样的成语故事。

当时，我家附近有个书摊，很多像我这般大的孩子都在那里租连环画看。那些连环画大都是武侠、打斗题材的，没有什么文学价值。于是，我就产生了一个念头：等我长大了，一定要写有益的作品让他们看。小学五年级时，学校老师出了一道作文题《我的志愿》，我便以《我想做个小小童话家》为题，写了长大要当一名童话家的理想，作文受到老师的表扬，并作为范文在堂上宣读和评讲，老师还说我文章的结尾部分是神来之笔。我受到了极大鼓舞，把这篇文章寄往报社，后来报社将这篇文章发表了。

文章的发表对我是莫大的鼓励，我决心认真地写下去，从那时开始，一直到今天我都没有停止过。我换了几份工作，为人妻，为人母，有些嗜好因为时代的变迁而放弃了，只有阅读和写作伴随着我的一生。

1958年，我家迁往新加坡定居，父亲成了建筑工程承包商，生意应接不暇，家境日渐丰厚，能供我上大学。1972年，我考取了新加坡南洋大学中文系文学学士学位，并获第一名金牌奖。一年后，我又考取了中文系一等荣誉学位。

学生时代，我写作文是为了发表，而不是享受写作，所以那段时间我的作品都有很刻意的雕琢痕迹，而显造作。我爸爸就曾给我当头一棒。我有一篇写《渔家苦》的文章，写一个捕鱼人家怎么在生活线上挣扎，我给爸爸看，爸爸看完后很久不出声，然后说：“你对捕鱼人家懂多少？如果你不懂的话，你这些都是闭门造车的文字，闭门造车的文字怎么会有它的活力？”这话让我知道了创作是离不开现实生活的，永远不要去碰自己不熟悉的题材，因为那个是塑胶花。要让作品有鲜花的亮泽，发出鲜花的香味，就必须让植物扎根于泥土，泥土就是生活。从此，我醒悟过来，

我的笔下就找不到不属于我生活范畴里的文字。如果写我不熟悉的范畴，我会去做很多工作。

到了大学之后，我对写作的爱慢慢开始是源于内心，但文字的功力还不是很深厚，作品里有努力的痕迹。直到形成了自己的写作风格之后，写作就好像是水到渠成的东西，不再是刻意雕琢，文字像水一样很自然地流出来。但我还是会善待它，不断地给它吃补品，它也会报答我。

在这种孜孜不倦精神的驱动下，大学期间，我完成了短篇小说《飘》，投稿参加比赛前，我想给自己起个笔名。父亲给我取名幼今，幼者，不足也；“今”指的是现在。“幼今”意为“现阶段的我学问不足，必须努力进取”。我认为自己“过去努力不竭，今日尤当如此”，于是用了“尤今”这个笔名。《飘》一文获得新加坡“全国五大短篇小说创作比赛”第二名（第一名空缺）。从此以后，“尤今”这个名字便频频出现在世界文坛中。

《沙漠中的小白屋》让我一举成名

1973年，我大学毕业，想当一名记者，但是当时新加坡报馆没有空缺，只好受聘于新加坡国家图书馆，从事采编工作。三年的图书馆工作，使我进入了一个知识的海洋，我认真吸吮着书的营养，为日后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76年，我终于如愿以偿进入了新加坡的华文报馆《南洋商报》，担任外勤记者。我谨记父亲对我的教诲，不断地深入实地采访，终于在1978年出版了新闻特写集《社会鳞爪》，1979年出版了小说集《模》。这些作品忠于生活、注重真实，情感特色浓郁，出版后，佳评如潮。

后来，为了照顾孩子，我再三考虑，决定结束记者生涯，选择了教书的职业，当了一名中学华文教师。我教的是大学预修班的孩子，在我看来，每一个人都是一本书，我教他们，接触他们，聆听他们，因而我也写了一系列以新加坡青少年

为创作对象的书籍。我在教师岗位上奋力创新，改变了课堂上“命题作文”的传统方式，组织学生“走出斗室，实地采访”，取得了突出的成果，引起了新加坡社会公众的广泛重视和好评。

我的丈夫祖籍在今海南省，是新加坡高级工程师，被派遣到沙特阿拉伯工作，为期三年。1979年，我前往沙特阿拉伯与丈夫相聚，我们住在山脊的小白屋里。该地是沙漠地带，环境恶劣，昼夜温差大，且风大、沙浪大，当大风刮起来的时候，沙助风势，风助沙威，劈头盖脸地袭来，一浪接一浪打在小白屋上，小白屋摇曳作响，恰似鬼哭狼嚎，令人胆战心惊。我孤守在家，有在惊涛骇浪中痛苦挣扎的感觉，但沙特独特的风土人情却让我留下深刻印象。因尚在襁褓的孩子水土不服，一年以后，我只得回到新加坡。

沙特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令我文思泉涌，我写出了散文游记《沙漠中的小白屋》，以我在沙特生活为题材，不仅写出异国风土人情、宗教习俗鲜为人知的奇异色彩，而且反映出异邦朋友的言谈举止、思想情感。该散文游记于1986年由新加坡友联书局出版后，震撼了星岛文坛，新加坡书业发展理理会给我颁发了华文最优秀作品奖。

《沙漠中的小白屋》的发表，标志着我的创作走向成熟。我的作品分主要有四类：小品文、小说、游记、散文。其中，我写得最多的还是游记。而游记中，以“人物”作为描写重点的占百分之九十以上。旅行是丰富我生活的一种方式，间接帮助了我写作，让我开阔了视野，而且我的生活观、价值观通过旅行不断地在调整，这些都不露痕迹地流进了作品里面。迄今为止，我的足迹已遍及亚、非、欧、美、澳及北极圈的80多个国家和地区。我自认是个“恒远不累的旅人”，而秦牧先生则说我的是一个“大旅行家”。梁羽生先生曾评价我的作品说：“古入说王维的诗是‘诗中有画’，我似乎也可以说尤今的小说是‘小说中有游记’。”

“其中有游记’。”

新加坡首届“新华文学奖”的唯一得主

我的写作向善向美，特别是对生命、生活的热爱。我不想通过文章来说教，我认为，好的文学作品应该是以糖霜来包裹黄连的，应该是以好的素材、好的文笔，让对方甜滋滋地吃下去。我觉得文字是有使命的。记得有一次在南昌签书，有个少妇排到我面前之后，抓住我的手，不停地哭。她说，她随丈夫从上海来到南昌，是读着我的书度过了无数个熬不下去的日子。

由于我辛勤努力，1991年我获得了新加坡第一届“新华文学奖”。该奖项只颁发给最具代表性的一位作家，是新加坡文学奖的最高荣誉。它的评选十分严格，基本条件是：被评选者的著作必须质量皆佳；最少已出版过10部著作；评选当年最少要出版过两部著作；并善于创作各种作品；在国内外均有著作、文章发表；还要积极参加团体活动，推动文学发展。

我笔耕不辍，为中华文艺的繁荣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我的《叙利亚的卖水人》《绿毛龟》《另一种“赞美”》曾被中国大陆选为学生语文课教材。重庆师范大学甚至成立了“尤今研究中心”，这也是中国第一个以单个海外作家命名的学术研究机构。

我常自助旅行，回到故土，感受祖籍国的大好河山，曾去过海南、广东、云南、四川、江西、北京和东北三省，并写下了许多作品。

1995年3月，我回故乡台山寻根问祖，圆了我长久悬在心中的“还乡梦”。我带走故居被熏黑的瓦片，又摘下了屋边石榴树叶。我在《美丽的胎记》写下这样的字句：“台山的一草一木于我而言都具有非凡的意义，因为它们蕴藏了一份一出生便深入地埋下的感情；更明确地说，台山就是附在我身上的一个极其美丽的胎记啊！”

戴爱莲：现代中国舞蹈之母

口述 叶明月 整理 黄美卿



⑥ 香港演艺学院授予戴爱莲院士证书

我的妈妈戴爱莲，原名吴爱兰，祖籍广东省新会县杜阮镇（现属江门市蓬江区杜阮镇），1916年生于西印度群岛的特立尼达。我的曾祖父在西印度群岛经商谋生时，被同乡称为“阿大”，而在广东客家话里，“大”与“戴”音近，久而久之，吴家竟改姓“戴”了，我妈妈也由吴爱兰变成了戴爱莲。她14岁时随外婆到伦敦定居后，又将“爱兰”改成“爱莲”，沿用至今。

抗日战争爆发后，戴妈妈独身奔赴香港，投身救亡运动。在共同的斗争中她与我的父亲——当时已离异单身的画家叶浅予相识相爱，由宋庆龄主持结为夫妇。

戴妈妈与我虽不是亲生母女，但她对我的养育之恩，我铭齿难忘。我与她相濡以沫60年，她对我视同己出。

抗敌义演 以舞为战

戴妈妈5岁学舞蹈，7岁登台，10岁考入舞蹈学校学习芭蕾，14岁赴英国伦敦学习芭蕾舞和现代舞，曾先后师从著名舞蹈家安东·道林、鲁道夫·拉班等；后来又投奔现代舞大师玛丽·魏格曼和科特·尤斯学艺。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戴妈妈在伦敦多次参加为筹集抗日资金的义演，自编自演《警醒》《前进》等舞蹈，讴歌中国军民艰苦卓绝的抗战壮举，在英伦三岛激起巨大反响。

怀着一腔爱国热情，戴妈妈毅然决定回国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40年初，经过两个多月的海上颠簸，戴妈妈乘坐的英国邮轮终于驶达了香港。正在香港的



宋庆龄听闻戴妈妈到来，即派她的秘书廖梦醒前去约见戴妈妈。宋庆龄热情而亲切地拉着戴妈妈的手说：“我们有一个保卫中国同盟组织，主要工作是为抗日募捐，为前线将士采购药品，你能参加我们的活动吗？”面对宋庆龄的邀请，戴妈妈很激动，当即表示，作为中国人，抗日救亡责无旁贷。于是，她与著名男低音歌唱家斯义桂同台合演了一台晚会，她以《进行曲》《警醒》《杨贵妃》等中国题材的舞蹈表演令香港观众耳目一新，获得极大成功。之后，她又潜心创作了《游击队的故事》《卖》《空袭》《东江》和《思乡曲》等一批反映中国抗日军民战斗风貌的舞蹈，在香港举行专场义演。她将炽热的爱国激情融入精湛的舞蹈艺术之中，观众无不为之打动，捐款空前踊跃。这些作品不但鼓舞了战时的人民，同时也是中国舞蹈在现代史上开出的绚烂花朵。

民族舞魂 奠基舞坛

戴妈妈能成为中国现代民族舞蹈的奠基人，是她对于民族舞蹈孜孜不倦探索、研究、创新的结果。在重庆的时候，周恩来、邓颖超经常关心和帮助戴妈妈，鼓励她向民间学习，努力发展中国民族舞蹈事业，这对她后来的艺术实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她在重庆新华社看了延安文艺工作者演出的新秧歌剧后，创作了歌舞《朱大嫂送鸡蛋》。那时候，中国抗战如火如荼，戴妈妈一方面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一方面苦苦寻觅中华民族舞蹈之根。她研究民族学、人类学，发现中华民族舞蹈之根存在于各民族之中。于是，她和我爸爸一起踏上了舞蹈寻根之旅，先是瑶山，后来是川北、西康，甚至是大西北新疆。她回忆说：“当时去西康地区，山间的道路既狭窄又湿滑，不时有山石坍塌，而旁边就是万丈悬崖，一不留神就会跌下去摔个粉身碎骨。”然而戴妈妈没有退缩，在瑶族、彝

族、苗族、藏族、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地区，她潜心采风，学习、记录了大量少数民族的原生态舞蹈。她用拉班舞谱记录的8个藏族舞蹈，已经永久珍藏于美国纽约舞蹈中心图书馆和英国伦敦舞蹈中心图书馆。

对中国民族民间舞蹈的采集、整理、研究，激发了戴妈妈的创作热情，她将散见于民间自然传衍的舞蹈加工为舞台艺术。1946年3月，“边疆音乐舞蹈大会”在重庆公演，她带领学生们演出了她创作的瑶族舞蹈《瑶人之鼓》、根据桂剧《哑子背疯》改编的《老背少》、融入昆曲身段的《思乡曲》、彝族舞蹈《倮倮情歌》、苗族舞蹈《苗家月》、藏族舞蹈《巴安弦子》及《甘孜古舞》、维吾尔族舞蹈《马车夫之歌》等。这些过去不被重视的民族民间舞蹈登上了大雅之堂，在重庆青年宫一演就是十几场，一时风靡大后方，满城皆说戴爱莲。接着，戴妈妈又带领育才学校师生在上海连续演出4场，这股清新、健康的民族舞蹈之风一扫当时上海的靡靡之音，青年舞蹈学子纷纷效仿学习。中国民族民间舞蹈从此登上了现代艺术舞台，中国民族舞蹈的奠基之作——“边疆音乐舞蹈大会”也从此载入中国舞蹈的史册。

1946年秋天，戴妈妈和我父亲应邀访问美国，向热情的美国公众介绍中国民族民间舞蹈，加深了“二战”中美两大盟国人民之间在文化艺术上的沟通与了解。

戴妈妈常说：“芭蕾是我的工作，民族舞蹈是我的挚爱。”她多次随总理等国家领导人出访，把中国的民族舞带到了外国，也把东南亚等许多国家的舞蹈引入中国。由于成绩卓著，1981年5月，英国皇家舞蹈学院将英国著名雕塑家威利·索科普于1939年为她雕塑的头像陈列在学院贵宾大厅，以赞誉她为促进中英友谊和艺术交流做出的贡献。在揭幕式上，她深情地说：“荣誉属于我的国家。”

舞蹈之母 领军育才

戴妈妈不仅自编自演，还培育了大量的舞蹈人才，被誉为现代中国舞蹈之母。

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陷入危险之中，戴妈妈和我父亲撤离香港，来到重庆。在重庆，戴妈妈先后在国立歌剧学校、国立社会教育学院任教。1944年，著名教育家陶行知邀请戴妈妈到育才学校开办舞蹈组。戴妈妈对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十分钦佩，尽管育才学校的工作和生活条件都极为艰苦，她还是高兴地答应了。那时学校师生吃的米饭有时是发霉的，菜也只有少许黄豆、豆腐渣；没有教室，搭个露天舞台就算是舞蹈教室。戴妈妈不畏艰苦，尽心尽力培养中国未来的舞蹈人才，只要热爱舞蹈，不管身体条件好还是差的学员，她都因材施教。

抗战胜利后，戴妈妈着手开拓中国的舞蹈教育事业，她先在上海主持了私立上海乐舞学校的工作，接着在国立北平师范大学体育系和国立北平艺术学院任教。她将欧美最具代表性和最高级别的舞蹈艺术——一切凯蒂学派的芭蕾舞教学体系和拉班现代舞技巧与理论，悉心传授给她的学生。在她的引领下，一批又一批舞蹈人才源源不断地成为中国舞坛上的生力军。

新中国成立后，戴妈妈的艺术生涯进入了辉煌期，她以前所未有的精力投入到祖国的艺术和教育事业。她是国家舞蹈团第一任团长、北京舞蹈学校第一任校长、中央芭蕾舞团第一任团长、中国舞协第一届主席，是舞蹈界当仁不让的领军人物。在这一时期，戴妈妈以精湛的编舞技法对流传于陇东、陕北的民间舞“荷花灯”进行再创造，推出了力作《荷花舞》，以比兴的手法，表现了荷花出淤泥而不染的秉性，以“盛开的荷花”象征欣欣向荣的祖国。舞蹈形象鲜明、动作流畅、结构凝炼，于简洁中见功力。她还取材敦煌壁画，借鉴戏曲中的长绸舞，创作了传世之作

《飞天》。1953年，由徐杰领舞的女子群舞《荷花舞》在柏林世界青年联欢节参赛并获奖。1955年，由徐杰和资华筠表演的女子双人舞《飞天》在华沙世界青年联欢节参赛并获奖。1994年，这两个舞蹈被国家确认为“20世纪中国舞蹈经典作品”，至今仍久演不衰。年届花甲，她出任中央芭蕾舞团顾问，仍为培养芭蕾舞新秀呕心沥血。赵汝衡、张卫强、赵民华、郭培慧、冯英等在她的指导下，分别在英国皇家剧院、巴黎歌剧院、莫斯科大剧院崭露头角。身患严重职业病的青年演员王才军和汪齐凤在她的鼓励和引导下，创造了奇迹，以优美的形象、高超的技艺，战胜了巴黎歌剧院的选手，在首届巴黎国际芭蕾比赛中获特别奖。青年演员辛丽丽、杨新华在她一丝不苟的调教下，创造了独特的奥杰塔和王子形象，为祖国争得了国际比赛金牌。

1996年，香港演艺学院授予80高龄的戴妈妈“高级院士”称号。2001年，美国俄亥俄舞蹈协会将“终生成就奖”颁授给她。2002年，国家文化部授予她首届国家“造型表演艺术创作研究成就奖”。2004年夏天，“国际拉班舞谱会议”第22届年会在中国北京举行，以表彰她为推动此项工作而作出的卓越贡献（戴妈妈是国际拉班舞谱学会副主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舞蹈理事会副主席）。2004年9月10日，恰逢北京舞蹈学院建院50周年纪念日，戴妈妈的铜像揭幕仪式在主教学楼大厅隆重举行。精神矍铄的戴妈妈激动地对师生们说：“没有老师就没有舞蹈学院，我要向你们老师致敬。”

矢志不移 爱国爱党

在跟随戴妈妈生活的漫长岁月里，令我崇敬的除了戴妈妈的舞蹈艺术，还有妈妈的伟大品格。

“文化大革命”期间，她身心均遭受残酷迫害。然而，戴妈妈对祖国和人民的挚爱丝毫没有



⑦

戴爱莲舞蹈表演《思乡曲》

图片来源：中央芭蕾舞团

改变，她相信，曲折坎坷之后必将是光明的坦途。粉碎“四人帮”后，有人问她：“为什么你不去海外？”戴妈妈回答说：“这里是我的祖国，我不能离开祖国。我的根在这儿，我一定要在这儿！”

戴妈妈一生最大心愿就是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戴妈妈早在英国留学时期就信仰共产主义，加入了英国共产党。她曾在周总理接见时，天真地问周总理能否自动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当得知还得重新开始时，她没有失落，而是以不懈的努力，证明自己完全可以成为一名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到了耄耋之年，戴妈妈仍然执着入党的事情。2005年12月26日，根据她本人的申请，中国共产党接受了她入党的请求，戴妈妈多年的夙愿终于得以实现。时任文化部党组书记、部长孙家正作为入党介绍人，来到戴妈妈所在的北京协和医院高干病房区会议室，主持了一场特殊而别具意义的入党仪式。戴妈妈这时已经病重卧床不起，身上插着很多的管子，但面对党旗，她仍庄严地举起了右拳。在宣誓中，她虽然已经很难有足够的气力说出完整的话语，然而，她的神情是那么庄重，仿佛凝成一幅神圣的画卷，让我永远难以忘怀。在病榻上，她向温家宝总理去信，激动地说：“我很自豪，入党是一件无上光荣的事，我还在国外的时候，就受到党的影响。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中国的唯一希望就是中国共产党。我很幸运，看到了有着光辉前景的今天！”

2006年2月9日17时34分，我亲爱的戴妈妈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临终之际，她把我叫到身边给她立遗嘱。她深情地对我说：“我永远是国家的人，是中央芭蕾舞团的人，我回国是参加革命的，我希望把属于我私人的房子和银行存款捐献给国家，希望中央芭蕾舞团能够接受……”

戴妈妈离开了我们，离开了她无限热爱的舞

坛。作为她的女儿，我深知戴妈妈还有一个未了之愿，那就是故乡寻根之旅留下的心结。

戴妈妈在知道自己祖籍广东新会杜阮（现为蓬江区杜阮镇）后，多年来乡情缱绻，寻根之心更是迫切。1973年冬天，她趁带着正在病中的学生吴艺到从化温泉疗养之机，在时任广东省副省长林李明的帮助下，开始了自己的故乡之行。

第一次回到故乡的戴妈妈，心情非常激动，故乡的一草一木都令她深怀惊喜之情。在杜阮叱石，她俯身抓起一把泥土，深情地用纸包好。在听取了镇领导介绍杜阮未来的蓝图之后，戴妈妈急切地说：“我能为家乡做什么呢？我要捐助3000元支持家乡建设。”3000元，对20世纪70年代偏远的乡村来说，是一笔巨款。在那个敏感的年代，面对戴妈妈的拳拳赤子之心，故乡人犹豫着，最终未敢接受。这一份深爱，在特定年代的背景下竟成为一份无法传递的心意。此事成了戴妈妈30年来无法释怀的隐痛。她有时偷偷地流下泪水，仿佛一个不被母亲接纳的委屈的孩子，只能默默地凝视着从家乡捎回来的泥土。我知道，她是在思念着家乡，她是在向家乡人倾诉着游子心声。

时光荏苒，她当年的这份心结，今日终可释怀。近几年，戴妈妈的故乡江门市不断挖掘戴妈妈舞蹈的文化内涵和艺术精神，在蓬江区杜阮镇成立了戴爱莲文化艺术中心，建立了戴爱莲文化广场和戴爱莲艺术楼，并为戴妈妈塑造了铜像……

戴妈妈，一个不倦的舞者，她的舞蹈人生伴随20世纪的烽烟、苦难、抗争和追求而融入历史；她的舞蹈艺术凝结着东西方文化精髓并因传承着中华民族伟大的人文精神而成为永恒。她是五邑侨乡的杰出女儿。终其一生，她所牵挂的是祖国，是家园，是她钟爱的舞蹈事业。●

[口述者：叶明明，戴爱莲女儿]

劳动人民的“红线女”

口述 马鼎盛 整理 梁小恩

我的母亲“红线女”，原名邝健廉，是广东开平人，1925年12月出生于一个艺术之家。母亲一生致力于粤剧艺术，演过近百部粤剧，拍过90多部电影，成功地塑造了古今中外各类妇女的艺术形象，开创了独树一帜、迄今为止中国粤剧史上花旦行当中影响最大的唱腔流派——红派艺术，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赞誉。

母亲一生演绎的作品甚丰，代表作《荔枝颂》《昭君出塞》等被视为粤剧唱腔的经典。2009年10月11日母亲荣获首届“中国戏剧终身成就奖”，2010年获得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终身成就奖和广东首届文艺终身成就奖。母亲这辈子对艺术的奉献和她的爱国情怀是不可分割的，因为热爱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民族，她才能这么热爱粤剧艺术，正如母亲自己所说的那样：“我的生命属于艺术，我的艺术属于人民。”

“南国红豆”别样红

母亲自幼家道殷实，兴趣广泛，由于出身粤剧世家，加上南粤文化的

耳濡目染，打小痴迷于话剧、京剧、汉剧、粤剧等。1938年，母亲14岁，随我的外婆赴香港，师从母亲的舅母学习，一开始艺名叫“小燕红”，后来因为喜欢“红线盗盒”的侠义故事和个中精神，改艺名为“红线女”。

抗战时期香港沦陷，母亲在广州认识了粤剧大师马师曾，即我的父亲，并参加了他的剧团。1942年七八月间，母亲跟随父亲带领的剧团进入广西演出，为了配合抗日战争宣传，以及为抗战筹款劳军义演，主要是演出父亲自己编写、痛斥汉奸卖国贼的《洪承疇》等戏剧，借古讽今。观众反响强烈，每演必满座。特别是这个戏的最后一场，借戏剧中的人物，痛骂洪承疇叛国降敌，卑污无耻，连妓女也不如。有一段〔双星恨中板〕“衰汉奸，病汉奸，千刀千刀理该斩……”由独唱到全场合唱，节奏由慢而快，气氛越唱越激烈，整个剧场掌声如雷，群众高呼“打倒汉奸卖国贼”，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1944年五六月间，日本侵略者加紧沿湘桂铁



① 红线女与次子马鼎盛 红线女艺术中心/供图



⑦ 1956年，马师曾、红线女随广东粤剧团赴北京演出《搜书院》，周恩来总理冒着严寒，自掏腰包到场买票看戏。图为散场后，他站在舞台边与演员谈心 红线女艺术中心/供图

路向广西进犯，桂林危在旦夕，母亲临危不惧，与剧团其他成员积极投入“保卫大桂林”的救亡宣传中，大大激励了中国军民的抗战救国斗志。1944年，母亲嫁给了比她年长24岁的马师曾。1946年抗战胜利后，母亲定居香港。在香港的10年，她拍过近百部电影，是粤剧、电影双栖影星。新片上映时，观众祝贺她演出成功的花牌曾有3层楼那么高。然而，就在母亲在电影艺术事业的巅峰时期，她却不甘做摇钱树，用私房钱组建真善美剧团。20世纪50年代初，又组建了红星粤剧团。1952年，她在演出《一代天骄》《王昭君》，改编《蝴蝶夫人》和莎士比亚名著中，根据自己的天赋、嗓音条件，在传统旦角的基础上，融入京腔、昆腔演唱艺术和西洋美声技法，创造了使海内外观众为之倾倒的“红腔”，把粤

剧旦角唱腔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而母亲也因此成为举世闻名的粤剧表演艺术家。1955年，受周总理的亲切邀请，母亲放弃了在香港极为优厚的物质待遇和如日中天的电影事业，怀揣着一颗那个年代特有的赤子之心回到广州，自此为粤剧艺术奔走终生。当时毛泽东主席曾为她写下：

“活着，再活着，更活着，变成了劳动人民的红线女！”

母亲让粤剧“红腔”传遍大江南北，遍及东南亚和美洲。苏联和东欧的评委也被母亲的参赛节目《昭君出塞》所征服，心悦诚服地送上“莫斯科世界青年联欢节金奖”。颁奖典礼结束后，面对热情的评委和观众，母亲盛情难却，加演了《荔枝颂》，赢得了连绵不绝的掌声。金日成和胡志明更是点名要看她的表演。因为母亲主演了

一出出经典粤剧，广大观众好评如潮，敬爱的周总理把“南国红豆”的赞誉给了广东粤剧。

一代“红腔”颂人民

母亲时常说：“无论遇到多大困难，多少磨难，我都要竭尽所能，为人民服务、为人民献艺。”因“文化大革命”，母亲曾离开舞台13年3个月。母亲对那段往事记忆犹新，也刻骨铭心。母亲说，那时每次开会都要唱歌，但不许她唱，于是她就在心里唱。养鸡时没人看见，就抓紧机会练功，喂鸡时吊几声嗓，打雷时喊几大嗓。即使身居仅4平方米的陋室，也不忘练身段、摆舞姿、走台步、跑圆场。因为她始终对自己充满信心，总是告诉那些红卫兵，毛主席知道她，周总理知道她，她不是反革命。母亲坚信自己以后还会演戏，所以一直很乐观，即使面对种种辱骂和困难，也总是一笑置之。

1996年5月，红线女艺术中心在广州成立。母亲和同事们努力把中心建设成收藏、展示、传播红派艺术的殿堂。它不仅是粤剧爱好者参观、学习、娱乐的场所，也是海内外艺术交流、联谊的沙龙；不仅是红派艺术学术探讨、理论研究的园地，也是粤剧艺术探索、创新的阵地。当时母亲动情地说：“我喜欢这句古诗：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我永远记得毛泽东主席曾写信鼓励我，要成为劳动人民的红线女。我要竭尽所能，为人民服务、为人民献艺。所以，我还要进步，还要努力。”



② 1958年，红线女与国家领导人等在一起。左起：周恩来、曹禺、钱俊瑞、华加、董必武、红线女、周扬 红线女艺术中心/供图

博采众长自成一派

母亲始终认为，粤剧艺术是发展的艺术，不是封闭的，是可以与时俱进的。她上山下乡、深入生活，去体验人物的真切情感。母亲拜中国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先生为师，请教梅派唱法，请京剧艺术大师程砚秋帮助设计身段与水袖，请著名昆剧表演艺术家俞振飞指点《桂芝告状》，请中国花腔女高音歌唱家及声乐教育家周小燕为她丰富《思凡》唱腔，还有昆曲名家朱传茗、歌唱家郭兰英、王昆等，都是她恭心请教的对象。母亲把所学所识所获都化成了艺术血液，她在继承粤剧传统的基础上，吸收、借鉴京剧、昆曲、话剧、歌剧、电影以及西洋歌唱技巧，加以融合创新，大大丰富了自己的艺术素养，最终完成了红派艺术的创造。梅兰芳先生曾评价她的表演已达到了“化有形为无形”的最高境界，特别是1965年推出的作为粤剧现代戏里程碑的《山乡风云》，寄托了母亲无限的真挚的爱国情怀。为了演活角色，母亲还特意体验军旅生活，摸爬滚打，射击居然可以打到9环。1966年，她曾在上海人民大舞台连演15场《山乡风云》。周恩来总理看完演出后高兴地说，没想到一个弱女子，竟能把革命女英雄

演得这样成功。1984年，母亲在广州中山纪念堂举行粤剧戏曲独唱会，这是中国戏曲艺人的首次个人演唱会，也是母亲在“文化大革命”后首次登台。而后，她又尝试用钢琴、交响乐为粤剧伴奏。直到79岁的时候，母亲还为首部粤剧动画电影《刁蛮公主戆驸马》担任剧本改编、导演、艺术总监，并亲自为剧中的凤霞公主配音、配唱，因为她希望能够让小朋友了解粤剧。该片获得巨大成功，2004年荣获第10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美术片奖。2007年，她的弟子蒋文端带着《山乡风云》重返上海滩，让她倍感高兴，同时母亲也坦言：“抢救粤剧遗产，扩大粤剧市场，时不我待！”

2009年粤剧申遗成功后，母亲却感到了一丝担忧，因为现在的粤剧演的还是一两百年前的题材，现代元素完全缺失。所以母亲对于新编现代粤剧的创作演出极为关注，现代粤剧《青春作伴》便得到了她的大力支持。作为第23届白玉兰奖的参评作品，由广东粤剧院出品、广东粤剧青年团演出的现代粤剧《青春作伴》讲述了一位女大学毕业生文青，在遭遇家庭分崩离析、工作前途渺茫、男友移情别恋、好友横刀夺爱等一连串挫折后，选择来到农村做了一名“村官”的故事。全剧时长2小时15分，剧情悲喜结合，并融入了大量青春元素，更糅合了舞台剧、歌舞剧、话剧的特点和手法，如开场“潮爆”的街舞和现代舞及男女配角边跳边唱的“粤风恰恰”。母亲看了这个充满青春气息和活力的大型新编现代粤剧，感到兴奋，她动情地说：“这是一出好戏！经过打磨一定能成为令全国瞩目的艺术精品！”

母亲对广州粤剧院的发展充满拳拳关怀。她经常关心过问、指导广州粤剧院的工作，并且担任该粤剧院很多戏的艺术指导，亲自带队前往多地演出。1990年1月30日，为培养粤剧人才，学习、继承、弘扬粤剧艺术，根据母亲的建议，在广州市委、市政府和市文化局的关心支持下，

广州粤剧院成立了小红豆粤剧团。1994年，更名为广州红豆粤剧团。1990年至1997年，母亲亲自担任红豆粤剧团团长兼艺术总监，推出了粤剧《刑场上的婚礼》等多部精品力作。

2007年，广州红豆粤剧团排演《刑场上的婚礼》，欧凯明饰演周文雍、崔玉梅饰演陈铁军，母亲亲自担任艺术总监，并在剧中伴唱。该剧展示了革命先烈周文雍和陈铁军的爱国主义情怀，歌颂了先烈坚守和奉献的革命精神，首演以来，获得巨大成功，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在第九届中国艺术节获“文华大奖特别奖”。

为精益求精地排练好粤剧《刑场上的婚礼》，打造粤剧精品，母亲连续一个星期观看指导该剧排练。她与导演谢平安充分交换排演意见，对剧本作出了更合理的修改。2009年2月23日中午，母亲仅买了个汉堡包充饥，就直接驱车到江南大戏院观看彩排，现场对舞美、字幕、主演的唱腔等都提出了中肯的意见。排练结束，母亲已经非常疲惫，离开剧场半途，又突然想起还有几个问题没有告诉演员，随即立即折返现场。她先是在茶水间里亲自教苏大姐的扮演者出场时的一段念白，又在后台找到了阿钟的扮演者，请他注意处理演出细节，提出剧中阿钟在码头上帮陈铁军赶走两个小混混后，可一手把竹篙撑地竖起来，另一只手叉起腰，这样处理后人物性格就鲜明多了……

2009年5月至2011年7月，母亲先后超过5次亲自带队前往杭州参加第三届全国地方戏优秀剧目（南方片）展演，赴上海演出《刑场上的婚礼》，出席上海市文联组织的《刑》剧专家研讨会，赴北京梅兰芳大剧院演出《刑场上的婚礼》，等等。

为了重新唤醒逐渐被青少年淡忘的传统文化基因，母亲一直努力摸索一种积极有效的形式向青少年推广粤剧。在新世纪到来之际，她提出将粤剧改编为动画电影的构想，并亲自着手改编剧



② 2008年10月18日，红线女指导广州荔湾区少年宫粤剧班小朋友 红线女艺术中心/供图

本。经过4年的努力，终于拍摄出世界第一部粤剧动画电影《刁蛮公主戆驸马》，引起全国戏剧界轰动。

改革创新育新人

20世纪80年代以来，面对粤剧舞台演出的不景气，母亲极力奔走呼号，身体力行，为振兴粤剧不遗余力。尽管粤剧在传承和发展上面临新的挑战与考验，但母亲对粤剧的活力从未怀疑，“粤剧的传统要坚持，但粤剧也必须要改革，推陈出新，为时代服务，为观众服务。现在粤剧人才很缺乏，创新才是粤剧的生命。”母亲的入室弟子——国家一级演员、红豆粤剧团团长欧凯明，国家一级演员郭凤女、苏春梅，广东珠海粤剧团赖琼霞，国家一级演员、江门市粤剧团艺术总监余阳丽等，都是母亲亲自引荐或亲手培养的。为了把粤剧拔尖人才欧凯明引进到广东，母亲不顾年事已高，于1992年多次不辞劳苦前往广西南宁协商，傲骨铮铮的母亲甚至不惜放下身段，亲自向相关部门的领导鞠了3个躬，母亲求贤若渴的精神终于感动了相关部门的领导；余阳丽也是被母亲从湛江招来广州的，当时余阳丽只有10岁。作为特困生的余阳丽没有能力购买入读粤剧学校所需的席子、蚊帐、被子等生活用品，母亲和其他老师就张罗帮她购置。欧凯明、郭凤女、苏春梅、赖琼霞、余阳丽等也不负母亲的厚望，都成了粤剧界的台柱，成了红腔艺术的传承人，

当中不少人还荣获中国戏剧界最高奖梅花奖。其中，入室弟子欧凯明在1994年就凭借《武松大闹狮子楼》中的精彩表演，获得了广东省首届粤剧演艺大赛金奖，1995年又斩获中国戏剧界最高奖梅花奖。

除了关爱自己的学生，母亲也时刻关注年青一代对粤剧的兴趣和学习，为“南国红豆”培养新苗。其实早在40年前，为了延续粤剧的传承，母亲就走遍广东各地，招募了一群十一二岁的少年，在广州办起广东省“五七”粤剧训练班。后来，红线女艺术中心在广州成立，母亲一直在那工作，直到她逝世前一天，她依然站在讲台，为广东粤剧学校学生的表演点评，间或亲自示范唱一段，手把手培养未来的粤剧“种子”。红线女艺术中心可以说是母亲的第二个家，每天都向公众免费开放，只要是对粤曲表现出喜爱之情的孩子和年轻人，母亲都愿意倾囊以授，以至于周末假日，红线女艺术中心成为粤剧新苗的乐园。

母亲的一生，是伟大的一生，也是为粤剧艺术、为人民艺术献身的一生。她这种心向祖国、情系人民的赤子情怀，对党坚贞不移、一往情深的理想信念，时时影响着我们，使我们乐观、勇敢地度过了艰苦的知青生活和物质困乏的日子；她这种呕心沥血、甘为人梯的高尚情操，勇攀高峰、精益求精的艺术进取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和永远铭记。●

[口述者：马鼎盛，广东省政协委员，马师曾和红线女之子]

伍冰枝：加拿大第一位华人总督

口述 伍灼培 伍锦羨 整理 麦博恒



② 伍冰枝

伍冰枝，祖籍今台山市四九镇玄潭村委会水仔口村，1939年2月10日生于香港。伍冰枝的祖父伍耀培是早期移民澳大利亚的华人，父亲伍英才出生在澳大利亚。因为当时澳大利亚种族歧视极为严重，伍英才不得不于20世纪30年代到香港谋生，在加拿大政府驻香港的贸易机构工作。1941年12月，日本侵占香港，伍英才一家人撤离香港，前往加拿大渥太华生活。伍冰枝经过数十年奋斗，成为加拿大第一位华人总督。

她的丈夫约翰·拉斯腾·沙尔是著名的作家、政治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伍冰枝的哥哥伍卫权是医生，曾获加拿大勋章；伍冰枝的嫂嫂伍利德蕙于1998年9月被克雷蒂安总理委任为加拿大历史上首位华人女参议员。

扬名社会

伍冰枝说：“父亲替我起名‘冰枝’，是期望我能像大树一样开枝散叶，自强自信，出人头地。”

1944年，伍冰枝就读于渥太华肯特街区小学，后来换过两次学校。当时渥太华南部居民是英国移民后代，讲英语；北部是法国移民的后代，讲法语。于是，伍冰枝在小学阶段学习了英、法两种语言。父母还教她说广东话。1950年，伍冰枝进入渥太华兹加学院读中学。1956年，伍冰枝没有按照家人的意愿进入哥哥伍卫权所在的蒙特利尔麦吉尔大学读医科，而是选择

去多伦多大学专攻英语语言文学。大学期间，她当选为学生会副主席。两年后，伍冰枝获得了英国文学学士和硕士学位，1962年赴法国巴黎大学学习法语。

1965年，伍冰枝从法国完成学业归来，进入加拿大电视业中最具影响力的CBC电视台工作。

伍冰枝把父亲的一句话当作座右铭：“在这个世界上，如果你想要得到什么，必须要靠自己努力。”

在CBC电视台，伍冰枝孜孜不倦地工作，采访、撰稿、策划、主持，无所不能。伍冰枝令加拿大国民最难以忘怀的节目有20世纪60年代的《阿德里安娜》、70年代的《30分钟报道》等。其中，最负盛名的要数《伍冰枝直播》，这档以其英文名命名的节目，一直作为CBC的拳头节目，在每天晚上的黄金时段播出。她制作的节目《他眼中的渴望》在加拿大、美国获得过12项电视奖。1990年，她制作并任主播的*Adrienne Clarkson Presents*，是唯一一个广泛介绍加拿大音乐、影视、舞蹈、戏剧的文化专题节目。1999年，她制作的新节目*Something Special*更是大获成功。她还为加拿大多份报刊撰写文章。伍冰枝的主持风格亲切、风趣，深受观众的喜爱。

伍冰枝不仅以30年来加拿大最叫座的金牌主持赢得加拿大国民的尊敬和喜爱，还以其他各种领域的杰出才华而闻名。她擅长写小说、拍电影和文化评论影片。1968年，她出版处女作《更伤心的情人》，之后她陆续出版了小说《饥似的足迹》，散文集《真实面对》。后来，她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电影和电视片的导演和制作中。1994年，伍冰枝拍摄了电影《我和伯塔斯》，这部电影使人们看到了她在电影艺术方面日趋成熟的才华。1995年，她拍摄的电影《他眼里的诱惑》被当年戛纳艺术电影节选为在开幕式播放的电影之一。一年后，她又拍摄了文化评论《关于〈英国病人〉的制作》，对当年这部风靡世界的电影的

色彩运用艺术作了非常精辟独到的论述。

伍冰枝成为当时加拿大最有影响力的文化人士。

问鼎“总督”

“在这个世界上，要想站在别人前面，就要变成别人不可缺少的人。”伍冰枝总是这么说，“我从来没有拒绝过任何分配给我的工作，无论它是多么的细小。这就是我不断学习，努力提高自己的办法。”

1982年，伍冰枝暂时离开了CBC，她被任命为加拿大安大略省首任驻法国总代办，全权处理有关该省与法国交流、合作等各项事宜。在这个岗位上，伍冰枝一干就是6年。她不负众望，成为公认的优秀外交官。1987年，伍冰枝从法国返回加拿大，除继续主持CBC的文化节目外，还先后兼任一系列社会职务。

1987年至1988年，伍冰枝担任加拿大出版社社长。1989年到1995年，她在母校多伦多大学麦西学院担任高级研究员。之后她担任了总部设在维也纳的国际音乐、舞蹈、文化节目视听中心执行董事会主席，这一职位多年来一直由欧洲人担任，伍冰枝是打破这一惯例的第一位华人。

不久，伍冰枝担任加拿大国家文明博物馆馆长、董事会主席。她以敏锐干练的作风、严谨务实的态度以及卓越的工作成绩，向人们展现出一名政治女强人的形象。在处理建造纪念犹太人大屠杀博物馆的问题上，伍冰枝充分展示了她的领导艺术。该问题是一个涉及历史、颇具争议的敏感话题，在1995年至1996年间曾经引起人们激烈的讨论。伍冰枝出色地发挥了她的领导才能与智慧，因势利导，调解斡旋，最后灵活妥善地处理好了此事。

伍冰枝多次作为加拿大的民间代表应邀参加相关国家的庆典访问活动。1990年，她应当时刚



⑦ 位于台山的伍氏祖居，是伍冰枝父亲和几个堂兄弟合建的



当选的智利总统艾尔温的特别邀请，参加他的就职仪式。随后，她作为加拿大的代表应邀前往瑞典诺贝尔基金会访问。1998年，她又首次作为总督官方代表团成员访问印度、巴基斯坦和阿联酋等国。在各种外交场合，她优雅而又合群，灵活而又坚定。和她交往过的人都为她的优雅、智慧和少有的亲和力所折服和感染。

1999年9月8日，时任加拿大总理克雷蒂安宣布，经由他本人推荐，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任命华裔女性伍冰枝为加拿大第26任总督。

加拿大总督是英国国王在加拿大的代表，是礼节性职务，代表国家出席国内外各种重大活动，根据加拿大宪法，总督由政府总理提名，英国君主任命，任期一般为5年。1952年以前，加拿大总督均为英国人，此后则由加拿大公民担任。

10月7日，伍冰枝在加拿大参院议事厅正式宣誓就任加拿大总督，接替当时担任总督的罗米欧·勒布兰科。加拿大总理克雷蒂安、参议院领袖鲍多奥、前总督纳提逊、安大略省省督威斯顿、最高法院大法官，以及各国外交使节出席了宣誓仪式。在加拿大历史上，伍冰枝是加拿大首位华裔和第二位女性总督，也是第一位英、法裔之外的少数民族总督。

伍冰枝在担任总督职务期间，深入社区，接近民众，倾听诉求。她想方设法让国民更容易接近艺术，提高修养。她积极倡导女权，提升妇女地位。她倡导加拿大的民族主义，调解英裔与法裔族权的关系。她反对美加自由贸易协议，反对安大略省将多伦多与附近的几个市合并成一个超级城市等。她曾去科索沃看望部队，与波斯湾加拿大驱逐舰上的士兵一起过圣诞节，跟驻扎在喀布尔的军队一起迎新年。正是对军队的格外重视，让她成为备受加拿大军队尊敬的人物。在她卸任时，加拿大军队还专门举行告别仪式向她致敬。

2005年9月26日，伍冰枝卸任加拿大总督职务。加拿大时任总理马丁在欢送会上将总督旗授予伍冰枝，并高度赞扬了伍冰枝在任职期间的努力。马丁说：“她的贡献、她的风范，深深地感动了加拿大人。她不辞辛苦地巡视加拿大各地，接见加拿大各族裔人民，把他们团结在一起，共享我们的团结和多元化。”而时任参议院议长海斯更赞扬伍冰枝为加拿大历史上最出色的总督之一。

加拿大政府在伍冰枝卸任后，以1000万元基金为伍冰枝及她的夫婿、著名政治哲学家约翰·拉斯腾·沙尔设立了“加拿大公民协会”。伍冰枝为此而致力于新移民的工作。

情牵故里

伍冰枝对中国有着深厚的感情，她为自己的中国根感到自豪。她喜欢中国的字画，尤其喜欢中国饭菜，还经常亲自烹调中国菜。

1979年，伍冰枝回到祖父的出生地寻根拜祖。伍氏祖居是伍冰枝父亲和他的几个堂兄弟建的，至今已有近90年历史。祖居中悬挂着4幅画像，都是伍家的先辈。1941年香港沦陷前，伍冰枝的祖父和伯祖父伍耀传都曾居住在香港。香港沦陷后，伍冰枝一家由香港前往加拿大，而她的伯祖父一家则回到台山，画像里有伍冰枝的伯祖父伍耀传、伯伯伍少武，及他们的妻子。伍少武有一个女儿叫伍美兰，是伍冰枝的堂姐，现居住在广州。

伍冰枝在祖居参观期间，提出要写一本关于寻根的书，家乡人向伍冰枝提供了一些伍氏家族的资料。伍冰枝还到北京观光，登上万里长城。

伍冰枝当上总督后，特意把中国菜带进了总督府。她入住总督府的第一顿中餐食谱，包括卤水牛肉、水果明虾沙拉、唐兰鸡柳、四川凉面和米饭等。

唐明照：新中国第一位联合国副秘书长

文 北京广东五邑侨乡海外联谊会



◎ 唐明照

恩平出生的孩子

1910年12月10日，唐明照出生于广东省恩平县圣堂乡塘垄村，童年与母亲、二哥生活在一起。1919年夏的一天，他照例与母亲抬着马桶去村外的菜园，迎面碰到了两个陌生男人，一个50岁左右，一个20多岁。母亲指着一老一少告诉他：“这是你爹，这是你大哥。”就这样他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父亲。为了谋生，父亲和大哥早已经去美国务工，因为路途遥远，挣钱不易，父亲只能相隔多年回家一次。

父亲这次回来，主要办3件事：一是盖所房子，二是为两位哥哥成亲，三是商量全家移居美国。之所以要举家移美，是因为父亲不愿儿子们和他一样夫妻长期分居，一人孤单在外，毫无家庭温暖，一辈子只能回家几次。加之那时家乡破败，民不聊生，土匪经常打家劫舍，还专绑华侨家属的票。父亲和大哥、二哥不久匆匆返美，唐明照和母亲以及两位怀孕的嫂子则在家里等待父亲办理移居美国的手续。

1919年5月的一天，村里来了一些中学生，敲锣打鼓地叫大家去听他们演讲。唐明照没有完全听懂他们讲的是什么，但有几点深深刻入他那童年的内心，令他难忘：“日本人要抢我们的山东，列强要瓜分中国，帝国主义欺负我们。我们必须奋斗救中国！誓不做亡国奴！打倒卖国贼！”他那时还不知道这就是“五四运动”。

1920年秋，父亲来信说手续已经办好，唐明照和母亲、两位嫂子抱着出生三四个月的两位小侄子，由一位也要回美国的族兄带领动身了。他们租

了一艘小船，由村附近的集圩出发，经赤坎、三埠（开平市的新昌、长沙、荻海三个镇）抵江门，改乘拖渡去香港，前后达数日之久。在香港美国领事馆办了赴美手续，领到的纸可以用来买船票，但到了旧金山，他们这些“新客”

（第一次来美的人）要由移民局的人押领，送往“天使岛”的移民局拘留所，等候审理。经过繁琐的审查，验明身份，3个多星期后才准登陆。

上岸与家人团聚后，唐明照入读了当地小学。旧金山市议会早就通过了一项“黄白分校”的法案，不准华人子女到白人学校上学，华侨华人子弟只允许上只有中国孩子的英文学校。为让孩子学习中文，勿忘祖国，旧金山的华侨办了两所中文学校，下午5时至晚上8时上课。父亲与乡亲商量，让唐明照进了其中一所中文学校“晨钟学校”，该校名含有唤起侨胞民族意识之意。学校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设有讲演课，每周在唐人街游行后，在马路上开露天演讲会，由教员和高年级学生讲话，站在孙中山的立场议论国事。经此熏陶的唐明照在1925年“五卅”惨案后，就和几名同学一起组织在唐人街游行示威，反对帝国主义，声援祖国反帝爱国的学生和工人。

1924年，美国国会通过新的排华法案，血气方刚的唐明照义愤填膺，思考着长期居住美国出路何在。1927年，在父亲和大哥的支持下，唐明照回中国就读于南开中学。他乘坐“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于4月8日抵达上海，住进堂兄家里。不几日，北伐军进入上海。4月12日，蒋介石宣布反共清党。报纸上每天登载逮捕、杀害了多少共产党员。唐明照很觉不平，本是一道合作北伐，怎么杀起共产党人来了？

追随共产党

1927年9月，唐明照到达天津，前去拜访南开中学校长张伯苓，请求收录入学，校长欣然允

诺。他进入了高中一年级。与他同时就读的还有20余名从各国回来的华侨学生，其中一位就是后来和他结婚的张希先，她当时不满15岁，来自洛杉矶，祖籍开平。

在南开中学，他遇到了影响他一生的人——共产党员郭中鉴。郭中鉴是四川人，原是南开中学的学生，到黄埔军校学习过，国共分裂后，返回天津从事地下工作。郭中鉴是张希先哥哥的好朋友，唐明照和张希先的哥哥时常在经济上支持他。1929年11月，郭中鉴被捕，罪名是共产党杀人犯。唐明照本就十分敬佩郭中鉴，虽然郭中鉴从没有向他宣传共产主义，他也没有向郭中鉴打听过共产党的情况，但心中觉得郭中鉴人品高尚，有志气。唐明照四处奔走，设法送去衣物，赶到法院与郭中鉴相见。唐明照与张希先商量，由他们用父母供给的生活费请律师为郭中鉴辩护。郭中鉴被判无期徒刑，关押在天津监狱，每月可探监一次。唐明照和张希先每月都去探望，送去食品、衣物和书籍，并尽量多送一点，以便狱中其他共人用，直至他俩毕业离开。郭中鉴在狱中虽受过酷刑，仍谈笑自若，给唐明照留下了终生不能磨灭的印象。

1930年，唐明照考入清华大学，在朱自清、叶公超、马约翰等老师的教诲下深造。他曾经骑驴去香山、八大处游玩，还梦想带铺盖到八达岭上住一宿，但这一美梦被日本侵略者的炮火打破了。

唐明照回忆，“九·一八”事变是他一生的转折点。此前，他虽有爱国心，但并不热衷政治，一心只想圣贤读书，好好做学问。“九·一八”事变让他警醒，中华民族危难之际，他已无法安心读书，决心投身抗日斗争。他的转变，与郭中鉴的影响也有很大关系。“九·一八”事变后，他曾给狱中的郭中鉴写了一封信，表达了对日本侵略和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愤慨。郭中鉴给他回了一封长信，论述了国际国内形势，指出只有团结

全国主张抗日的力量，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对日本帝国主义进行坚决的抵抗，才能挽救中国。唐明照收到信后反复思考：出路何在，找谁去？结论是：只有找中国共产党。清华大学的共产党员同志找他谈话，他准备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这时，他与另外的同志因散发庆祝“十月革命”的传单被捕。被捕时，他身上已无传单，尚未入团，又是具有美国公民身份的华侨学生，还有美国老师出面过问，因此拘禁不到两个月，就被无罪释放了。被捕期间，唐明照更加认清了蒋介石政府的反动本质，更加坚定了跟着共产党走的决心。出狱后，唐明照没有加入共青团，而是于1931年12月直接成为一名共产党员。1932年2月至1933年3月，他先后担任中共北平西郊区委委员、北平市委组织部部长，发动学生、工人散发传单，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积极发展壮大组织。

再赴美国

1933年，唐明照因病回到美国，时值美国经济大危机，一登岸就感觉到一种人心惶惶的气氛。华侨家庭因平时勤劳俭朴，习惯积蓄，困难中守望相助，比一般美国家庭境况稍好些。唐明照家里14口人吃饭，那时父亲已退休，操持家务。父亲规定每天只能花1美元买菜，星期天可吃一只鸡或一条鱼打牙祭，平时不喝咖啡，不吃鸡蛋，不吃黄油，但有牛奶，就这样熬过了最困难的日子。

后来，唐明照考入美国加州大学历史系，研读西方近代史。刚入校时，学生中没有中国共产党或共青团的组织，只有个别党团员成立了一个社会问题协会学习和宣传马列主义。唐明照很快和他们取得联系，与他们一起先后成立了党支部和团支部，他相继担任了美共加州大学组织部部长、宣传部部长和书记。同时，他参加了旧金山进步华侨的工作，以及爱国华侨要求抗日的运动。

其间，他被选为代表出席1934年7月在克利夫兰举行的全美青年大会，列席了同年在纽约召开的美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1937年6月，他被调到纽约工作，任纽约华侨衣馆联合会（以下简称“衣联会”）英文干事。

那时纽约城总人口800万，中国人四五万，有华侨洗衣馆约4000家，遍及纽约五大区，是华侨人数最多的职业。华侨洗衣馆多为单人经营，每天工作10多个小时，每周6天，很辛苦。

唐明照到纽约不久，“七七事变”揭开了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序幕，华侨纷纷成立抗日救国会，捐款支援祖国抗战。“衣联会”会员除自己捐款外，还做了大批捐款筒子，贴上“请你捐款援助中国人民抵抗日本侵略”的英文字样，放置在各洗衣馆的柜台上。约一个月的时间，募捐的款项买了4辆轻便载重汽车，并将之改装成救护车，2辆送给国民党领导的军队，用中文在车身上写上“献给忠勇抗战将士”；2辆送给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车身写上“献给八路军忠勇抗战将士”。

“衣联会”的捐车行动，得到广大侨胞的赞扬。车改装好后，绕唐人街游行一次，召开群众大会欢送救护车回国。不久，纽约华侨的“筹饷总会”成立，统一捐款行动，“衣联会”也就将捐款筒子转交给该会处理了。

1940年7月7日，《美洲华侨日报》在纽约出版，唐明照任社长。此前，他已于1939年起担任美共中央中国局的书记，此后任职长达10年之久。《美洲华侨日报》是进步华侨办的报纸，为广大华侨群众，特别是劳动群众说话。它高举抗日的旗帜，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努力促进中美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维护华侨的正当权益，敢于主持正义，为大众说话。《美洲华侨日报》曾用逐日连载的方式，刊登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还曾全文刊登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和新四军军长叶挺于1940年11月9日

发表的关于皖南事变的著名“佳电”，以及美国女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皖南事变第二天写的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抗日的长篇译文。皖南事变后，唐明照与《纽约公报》的总编辑吕超然、旧金山《世界日报》的总编辑李大明商量，联合致公堂在美洲各国的报纸，如加拿大的《大汉公报》、古巴的《开明公报》等10家报社，对皖南事变发表了“十报宣言”，反对分裂，反对内战，要求国民党蒋介石当局悬崖勒马，不要破坏抗战，并号召全国人民团结一致，抗战到底，直到最后胜利。

1941年12月，日本袭击美国珍珠港，美国宣布对日宣战。为加强对外宣传，美国政府设立了“战时情报署”（战后更名为“美国新闻署”）。为表示支持美国参战，经美共中央中国局几位负责人商量，唐明照辞去了《美洲华侨日报》社长职务，到“战时情报署”纽约分署担任翻译工作。同时，他仍极为关心报馆，每星期都去几次，并利用业余时间为报纸写文章。其间，他被美国陆军部借调数月，为派到远东的一批美国军官学习中文对话担任教员。任务完成回到纽约的那天，唐明照的女儿出生，起名闻生，取闻父归而生之意。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经中国局的几位负责人商量，唐明照辞去了“战时情报署”的工作，重新回到《美洲华侨日报》担任总编辑。当时华侨最关心的问题是中国的前途，大家都希望能有一个独立、自主、和平、民主、富强的祖国，不希望倒退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分裂的、贫弱的旧中国。正在这个时候，董必武来到美国。对于唐明照等长期生活和工作在海外的同志来说，此时董必武的教诲极为重要和及时。

董必武是来美国出席联合国制宪会议的，并在联合国宪章上签了字。董必武是中国代表团10名代表之一，但与其他9名代表（宋子文、顾维钧、王宠惠、魏道明、胡适、吴贻芳、李璜、张

君劢、胡霖）不同，他是代表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19个解放区、1亿人民、91万正规军和220万民兵的，因此也就特别受到中外人士的重视。董必武在美国逗留大约半年，除开会时在旧金山外，其余的时间都在纽约。他在美期间，接触的人很多，无论是美国朋友、华侨同胞、中国留学生等，都喜欢聆听他对中国解放区情况的介绍，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分析，以及对共产党的政策的阐述。“衣联会”请董必武给全体会员作报告，他欣然应允，勉励华侨继续发扬爱国、勤劳和艰苦奋斗的精神，对内加强团结，对外做好美国人民的友好工作。他很关心《美洲华侨日报》的运营情况，说：“报纸要有原则性，不能随风倒，要反映广大华侨群众所关心的问题和他们的迫切要求，要为他们说话。”纽约的同志对于董必武的到来更是高兴万分，就像远离家乡的孤儿见到亲人一样。董必武请唐明照他们把住在纽约附近的同志召集在一起，给他们作了一次报告。唐明照等受教益很大，对中国未来的前途有了更清醒的认识。

唐明照很尊敬著名爱国侨领、致公堂创始人司徒美堂，与致公堂的报纸合作密切，并经中共党组织批准曾加入致公堂。司徒美堂老先生也曾经不顾高龄，徒步登上5层楼，出席纽约“衣联会”召开的向华侨宣传抗日的大会并作演讲。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中共要在北京召开政协会议，中央写信给唐明照，要他请司徒美堂回国参加政协会议。唐明照去拜访司徒美堂，没说几句话，老先生就说：“我当然去。”为防止敌人知道这个消息从中阻挠破坏，除了身边几个最亲近的人之外，一律保密。司徒美堂回国时，唐明照亲自由纽约护送他到旧金山，直看到他平安地上了飞机之后才返回纽约。

唐明照的活动范围不限于华人社会，他对美国人民，特别是报界也做了许多工作。解放战争期间，美共的《工人日报》起初对中国共产党的

革命斗争很不重视，也不了解，很少登载有关中国的报道，甚至在报道中有错误。经唐明照多次找该报国际版编辑谈话，介绍情况并提供材料后，他们才开始注意。到解放战争后期，美国报纸大量登载关于中国的报道和评论，唐明照实际上成了该报的中国问题的义务顾问。当时美国著名的自由派记者《纽约星报》主编斯通和颇具权威的军事评论家马克斯·沃纳都曾根据唐明照同他们的谈话和提供的材料发表文章，影响很大。甚至连颇负盛名的专栏作家德鲁·皮尔逊也曾根据唐明照的谈话，在他那个在全美多家报纸同时发表的《华盛顿走马灯》专栏里写过文章。唐明照还通过讲演等各种方式，向美国人民介绍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解释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促进了中美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

回到祖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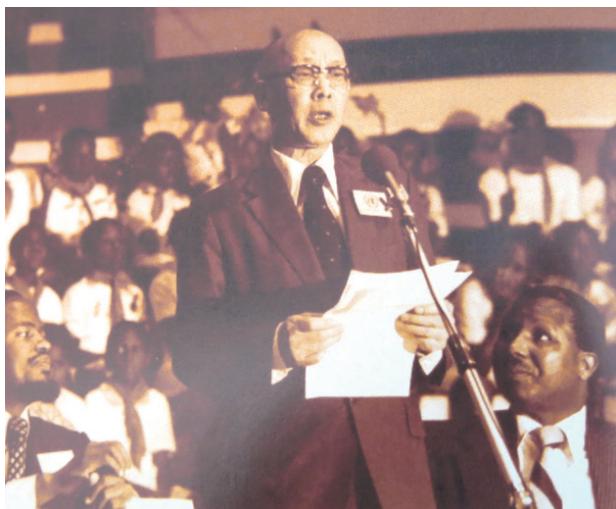
为免受美国麦卡锡法案迫害，经中共中央批准，唐明照于1950年9月辗转回国，之后一直奋斗在外交战线上。他坚定地贯彻执行党中央的对外工作方针，在人民外交、党的对外工作和政府多边外交工作中，都作出了突出成绩。

回国之初，他被分配到外交部当专员。1951年初，彭真同志安排他到成立不久的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委员会（以下简称“和大”）工作，任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和大”对外联络部的主要职责是做参加国际会议的具体筹备工作和接待外国的民间代表团和人士，参加最多的国际会议是每年都举行的世界和平理事会的会议。

1952年，中国政府在北京发起召开了一个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唐明照参与组织筹备。该会到会代表367人，来自37个国家，包括21个亚洲国家，12个拉丁美洲国家，2个北美国家，还有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另有列席代表和来宾62人。大会11项宣言和决议，全部一致通过，没有一票反对。这是新中国举行的第一个大型国际会议。

1963年，华沙举行世界和平理事会，在美国侵略越南的战火仍在熊熊燃烧的背景下，有人竟突然提议要全体起立为被刺身亡的美国总统肯尼迪默哀致敬。唐明照代表中国代表团立即起来反对，指出：“肯尼迪作为美国总统，美国海陆空军总司令，他派遣美军到越南去进行帝国主义战争，和平大会怎能向这样的人默哀致敬？越南人民在美国狂轰滥炸死伤惨重的情况下，坚强不屈，不怕牺牲，对美国的侵略进行英勇顽强的抵抗，不但在保卫越南，而且是对保卫世界和平的重大贡献。因此，中国代表团提议大会向英勇的越南人民致敬。”唐明照话落，全场先是沉默，随后从各个角落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越南南方代表立即站起来支持，朝鲜等国代表也一致响应。提议默哀的人也表示，唐明照这番讲话言之有理，无可辩驳。

此外，唐明照还多次参加亚非人民团结组织的会议。其筹备会议和第一届亚非人民团结大会于1956年在开罗



② 唐明照在联合国会场

举行，那时联合国里的非洲国家只有4个，多数都还没有独立。第二、三、四届分别在几内亚、加纳、坦桑尼亚召开，参加的很多非洲代表都是本国民族解放斗争的领导人。有的非洲代表对中国不很了解，唐明照与他们多方面交流，介绍中国的情况和政策，对增进相互了解和友谊很有好处。

“文化大革命”前，唐明照最后一次参加的国际会议是1965年10月初在印尼举行的反对外国军事基地会议。9月30日下午，他抵达雅加达参加筹备会议，当时印尼表面上很平静，但当晚就发生了“9·30事变”。印尼陆军在苏哈托率领下从万隆开进雅加达，开始进行血腥镇压，抓了许多共产党人和其他进步人士，并且把中国大使官邸包围起来，发出冲击威胁。过了几天，反对外国军事基地会议依旧照常召开，唐明照担任中国代表团团长。大会开幕前夕，印尼暴徒冲进中国驻印尼商务处进行破坏，为表明中国的态度，唐明照没有出席开幕式听苏加诺讲话，而由其他同志出席。会议结束后，他按国内指示留下参加使馆党委工作，直至一个月后签证期满回国。

“文化大革命”中，面对受到冲击的党的对外工作，唐明照坚持原则，对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

任联合国副秘书长

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恢复后，唐明照由中国政府举荐，于1972年出任负责政治事务、非殖民化、托管地工作的联合国副秘书长。在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的讲坛上，他用精湛的英语阐述了反对殖民主义、支持民族独立的鲜明立场。

唐明照广泛接触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代表和领导人，为彻底结束殖民统治而奔走呼号，赢得了很多朋友和广泛的国际赞誉。凡是非殖特委

会听取解放运动重要领导人的申诉或揭露殖民当局的演讲，他无不亲自聆听，并记下他们的正义要求。这包括津巴布韦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人穆加贝、纳米比亚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人努乔马、南非阿扎尼亚驻联大代表西贝科，还有当时鲜为人知的科摩罗、圣赫勒拿、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等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人。他还宴请他们，激励他们从事正义的斗争。解放运动领导人把他视为挚友，有问题和要求都愿找他谈。

唐明照代表联合国秘书长参加了众多的非殖民化会议，访问了非洲、南太平洋等许多国家，支持他们的民族解放斗争，足迹遍布五大洲，行程数十万公里。在他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期间，15个领地赢得了独立。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对唐明照领导非殖民化部门所取得的卓著成绩给予了很高评价。原国民党外交元老顾维钧的长女顾菊珍，在唐明照掌管的非殖民化部门工作，对他的工作能力和人品非常钦佩，说他把部门工作管理得井井有条。另一位高级官员田中先生称赞唐明照处事非常干练，使他这个来自以“工作狂”出名的日本的联合国官员也由衷地钦佩。

1979年从联合国卸任回国后，唐明照担任中联部顾问，积极参与党的对外工作战线的拨乱反正。他始终以人民公仆要求自己，把在联合国7年工作收入所得27万美元全部交给国家，自己过着简朴的生活。在事关党和国家的重大原则问题上，他头脑清醒、立场坚定。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后，他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中国虽穷，但分量很重》的谈话，很快被《人民日报》等报刊加按语转载。他在谈话中强调要坚定民族自信心和发扬实干精神，说：“我劝青年朋友们相信，我们中国虽穷，但分量很重，正因此别人才不敢小视我们。只要我们认真纠正种种失误，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自己看得起自己，上下勠力同心，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千万要自尊和自重啊！”

朱经武：高温超导研究的先驱者

文 余焕权



⑦ 朱经武（右）与英国著名物理学家霍金 余焕权/供图

2015年9月3日，朱经武作为5位侨界代表之一，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看中国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阅兵仪式。提起抗日战争，朱经武非常想念父亲朱甘亭。朱甘亭曾就读于美国波特兰耿克生航空学校，后和12位青年爱国华侨回国参加空军抗击日寇。后来他由飞行员转入地勤，当了一名机械师，在战争中幸存下来。

1941年，朱经武出生在湖南省芷江，1949年随家人移居台湾清水镇，后毕业于台湾成功大学物理系。1963年他赴美深造，先后获福特汉姆大学理科硕士学位和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物理学博士学位。他在1968年至1970年为贝尔实验室研究员，1970年至1978年任克利夫兰州立大学物理学教授，1979年起任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大学物理学教授兼磁性研究所所长，从事超导材料研究。

在高温超导研究方面取得重大突破

物理学界在1911年首次发现具有零电阻及反磁特性的超导体，但只能在极低温的4.15K (-273°C) 情况下存在。科学家一直在寻找更高温的超导体，直至1987年瑞士科学家宣布把临界温度提升至35K (-238°C)。

1987年1月，朱经武成功发现了新超导材料钇钡铜氧化合物，将它的超导温度提高到93K (-180°C)，超过了液体氮的沸点，打开



了高温超导研究及应用的大门。同年，他创办了休斯敦大学德克萨斯州超导中心（后来成为世界规模第二大超导研究中心），并担任首任主任。1988年，朱经武获得美国科学界最高荣誉的国家科学奖、美国科学院孔士德奖。1989年，朱经武当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人文科学院院士和英国皇家（艺术/产业/商业）学院院士。1990年，朱经武被《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推选为美国最优秀的研究员。

全球研究高温超导的同行在超导临界温度的探索、发现与发表上不断开展竞赛。1987年2月，中国科学院物理所获得转变温度100K (-173°C)以上的超导陶瓷材料。1988年1月，日本人用相似的方法，达到了120K (-153°C)。1993年，瑞士人做出了134K (-139 °C)。同年，朱经武团队利用高压技术，再将温度提高到164K (-109 °C)。1994年，朱经武获得超导科学卓越成就奖。此外，他还获得太空总署成就奖及国际新材料奖，工程界最崇高的约翰·弗里茨大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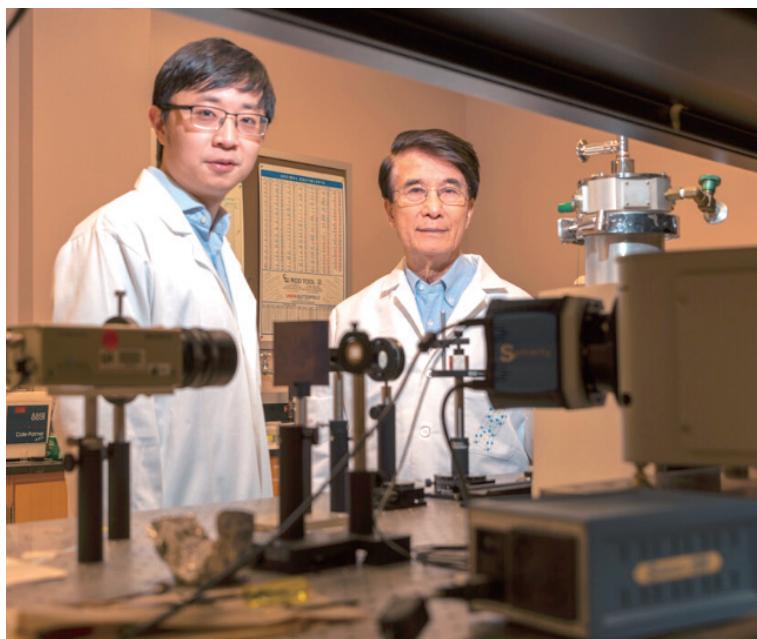
1996年，朱经武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2000年，朱经武获白宫邀请参加“二十世纪重大发明的新纪元时间锦囊”计划，又被“世纪动力”选为本世纪在气体及电力方面最具影响力的人士之一。

朱经武曾发表610多篇学术论文，合编多部专著，并为百科全书及科学年报撰写科普文章。1987年，他在美国《物理评论通讯》发表的一篇高温超导体论文，被全球物理学论文引用次数高达4348次，名列第二。

与诺贝尔物理学奖擦身而过

每个从事科研的人总是希望得到最大的承认，在物理学方面最高的荣誉就是诺贝尔奖。在超导研究历史上，1986年和1987年是两个很重要的年份。1986年，IBM的缪勒和柏诺兹二人发现了一种新型的超导材料——陶瓷体状的镧钡铜氧化合物，它在30K (-243°C)可能存在超导电性。1987年，朱经武发现了转变温度为93K的新型超导体，突破77K (-196°C)液氮温度。1987年3月，美国权威杂志《物理评论通讯》刊发朱经武发现的新型高温超导材料的组成，以及合成技术等详细资料。在这种情形下，1987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最终授予IBM的缪勒和柏诺兹，获奖理由为“发现新的超导材料”，多少有些让人意外。

有人认为，朱经武是高温超导研究的先行者，是液氮温度超导电性



⑦ 朱经武（右）与学生邓量子在实验室 图片来源：休斯敦大学

的发现者。他在高温超导领域取得了突破性的研究成果，一再打破高温超导的世界纪录，对整个超导研究和凝聚态物理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曾多次被提名为诺贝尔物理学奖候选人，却依然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

对此，朱经武认为做科学研究应该保持一颗平常心，获诺贝尔奖是可遇不可求的，一切顺其自然。

朱经武非常感谢其岳父、著名数学家陈省身。陈省身曾教导他说，从事研究不要走热门，应该开创自己的路，而且要坚持，不要一下子不行了就跳出来。朱经武在高温超导取得这样的成就，跟这种态度有关。

选择香港科技大学

朱经武是美籍华裔学者中较早与中国科技界和教育界建立友好关系的教授之一。1979年，他帮助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发展盒式高压技术和物理的研究，被聘为该所荣誉研究员；1988年、1991年又先后被中山大学、南开大学聘为名誉教授，还曾经积极协助南开大学开发新能源镍—氢电池技术。

2001年7月，朱经武在就任香港科技大学校长前，已经是休斯敦大学天普科学讲座教授、物理学系教授及休斯敦大学超导研究中心主任。朱经武之所以选择香港科技大学，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他认为要想把一所大学推上更高一层楼，没有比香港科技大学更合适的学校。因为它没有历史的包袱，政府一心一意希望它能够变成世界级的大学，而且学校的同事们也有同样的共识。二是朱经武被香港特别行政区特首董建华的诚意所感动。董建华说，香港经济在转型，特区政府希望以高科技帮助香港社会顺利通过经济转型，希望香港科技大学能够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这种机遇在一生中是并不常有的。三是他在美国住了30多年，发觉在太平洋两岸、台湾海峡两岸，人们互相之间的认识是不够的。他希望能够帮忙促进大陆与台湾两岸人民以及中国与美国人民互相增加了解。

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香港科技大学允许朱经武以非受薪形式与休斯敦大学超导研究中心保持联系，继续从事他的高温超导研究工作。

朱经武上任时定下了长远的目标，要将香港科技大学塑造成香港的“麻省理工”。如今，香港科技大学的EMBA在英国《金融时报》的排名里被列为全球第二名。英国《泰晤士报》把香港科技大学的工程学院以及IT工程列为全球第20名，学校整体排名第42名，理学院是全球第50名，人文以及社会科学是全球57名。他在香港科技大学创建了一所高等研究院，意在发展成为香港，以至世界的知识中心。

朱经武在香港科技大学担任校长8年。2009年8月28日，学校为他举行告别演讲及欢送会，3000多名师生到场送别。任期结束后，朱经武重返美国，专注于科研工作，同时也参与美国、中国及中国台湾地区一些有关科学教育政策性的工作。



叶玉如：科学界“女性诺贝尔奖”得主

口述 叶玉如 整理 余焕权

我于1955年7月出生于香港，祖籍广东台山。

我在香港上中学的时候，对科学课比较感兴趣，尤其对生物学特别感兴趣，主要是因为生物老师特别好，讲课非常清楚。她教导我说，科学是需要不断努力探索的，而其核心就是要有好奇心。

专注于神经生物学研究

1977年，我毕业于美国西蒙斯学院，获化学和生物学双学士学位。1983年，我获得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博士学位后，在哈佛大学医学院和斯隆—凯特林癌症研究所各做了一年的博士后研究，之后在纽约的两家生物科技公司从事研究工作，并担任领导职务。

1993年，我从美国返回香港。我在香港出生和长大，对香港充满感情。当时香港科技大学刚刚筹建，这所新大学能给我带来很多机会，我也希望能够影响和鼓励更多的香港年轻人走进科学领域，为香港培养更多的科学家，所以我选择放弃美国的事业。对科研来说，最重要的是人才、充裕的研究经费和配套的仪器设备。在人才方面，香港有优势。这里有许多在国外受过训练的人，他们很勤奋，做事很认真。香港的法律比较完整，在专利申请、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做得比较好。香港还有一个优势，就是与国际学术界保持有长期的接触和密切的联系。

入职香港科技大学，我先曾担任生物系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讲座教授、生物化学系主任、理学院副院长、生物技术研究所所长等职务，现任晨兴生命科学教授、理学院院长、分子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无论在什么岗位上，我一直专注于神经生物学研究，至今已有三十多个年头。

神经生物学是研究人和动物的神经系统的科学，其中包括研究脑的功能和与脑神经有关的疾病。我主要从事神经营养因子及神经信号传导等领域研究，运用现代分子与细胞生物学方法，着重探讨神经



② 叶玉如（右一）等为香港科技大学分子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挂牌

元的发育过程、神经元和靶细胞间突触的形成及功能。通俗来说，我从事的研究是脑神经系统的发育过程和功能，特别是研究神经细胞之间的信息是怎样传递的，并研发治疗神经退化性疾病的药物。

经过多年的艰苦努力，我和我的团队取得了一些突破，如发现了一些新的神经营养因子，弄清楚这些蛋白是如何作用于神经细胞上的受体。这些成果有助于理解神经营养因子如何激活表面受体、参与神经细胞的分化及维持过程，我们的研究可以应用于治疗神经退行性病变，如老年痴呆症、帕金森氏症等等，对了解由此衍生的学习及记忆的机理有很大帮助。近期的研究成果发现多个控制神经细胞之间交流信息的重要蛋白，对人的学习及记忆功能起关键作用，若这些蛋白出现异常，相关功能会衰退。这一新发现有助于研

究脑神经退化疾病的成因，为相应药物提供治疗靶点。

通过不懈努力，我和我的团队的研究获得了全球范围内同行的认同，截至 2016 年，我在《科学》《自然》《细胞》《神经元》《神经科学年度评论》《自然 — 神经科学》《神经科学杂志》等主要核心期刊上发表了 260 多篇学术论文，被引用 18000 多次，并拥有 41 项国际专利。

2001 年，我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是香港科技大学第一位获此荣誉的教授。2004 年，我获得“欧莱雅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杰出女科学家成就奖”。该奖项被称为“科学界女性诺贝尔奖”，侧重于对女科学家整个学术生涯（兼顾基础科学、应用科学、公共服务三方面的贡献）的评价。我完成的科研项目于 2003 年和 2011 年两次获得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2015 年，

我入选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2016 年又入选美国人文与科学学院外籍院士。

科研、教育、管理三管齐下

我到香港科技大学担任教学与研究工作后，组建了一支基础扎实且充满生气的神经科学与中草药现代化研究的科研队伍，并成功创建了分子神经科学中心。分子神经科学中心的宗旨是促进脑功能、神经系统疾病机理的研究和神经系统新型药物开发。随后我以此为基础成立了分子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伙伴实验室并担任主任。我还领导了跨院校的团队承担“卓越学科领域计划”和“主题研究计划”等重大科研项目，在团队的发展战略、经费申请、人才培养和学术交流等方面起核心带头作用。

在从事科学研究之余，我也积极参与推动香港生命科学发展，加入香港特区政府创新及科技咨询委员会、食物及卫生局咨询委员会、中药研究及发展委员会、香港卓越奖学金计划督导委员会、尤德爵士纪念基金理事会、香港科学博物馆咨询委员会等。我曾在多间机构担任公职，包括香港科技园公司董事局、香港特区政府创新及科技咨询委员会、香港应用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董事局、研究资助局等。

作为理学院院长，我负责统筹整个学院科研和教学事务，制定学院的目标与规划，并促进和

协调交叉学科的发展。2016 年 11 月，香港科技大学全球招聘后决定委任我为副校长（负责研发及研究生教育）。

为祖国科技发展竭尽所能

我返港工作以来，大力推动内地在神经科学与中药现代化等方面的科学研究，并取得了一些成绩。中国科学院上海脑研究所、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相继聘请我为客席研究员，南京大学、同济医科大学等聘请我为名誉教授，共同规划中国神经科学发展的蓝图。自 1995 年起，我作为香港科技大学与中国科学院共同建立的生命科学联合实验室的创始领导成员之一，在生物科技的多个领域推动香港科技大学学者与内地科学家密切协作。近年，我也积极推动中国脑计划的规划和实施。我也入选了国家科技计划专家库，为中国的科技发展和人才培养出谋划策。

自 1997 年起，我与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药物所、中国药科大学、中国科学院等科研机构积极进行多学科合作研究。我还组织了一项“访问学者计划”，邀请内地各著名科研机构及高等院校 30 余位优秀学者到香港科技大学进行深入广泛的学术交流。

2003 年 11 月，我被聘为江门市人民政府首批科技顾问，希望为家乡的发展作出贡献。●

江门侨刊乡讯架起家乡与游子的桥梁

文/图 黎禹君 余泽权 何春图

“一百多年来，侨刊乡讯宣传了江门，温暖了海外赤子的心灵，为江门发展立下汗马功劳。”在2022年初的江门“两会”上，新西兰基督城台山同乡会创会会长、台山市德华澳新厨卫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德源感慨道，海外赤子非常喜欢侨刊乡讯，称之为“集体家书”。

侨刊乡讯，总能牵动海外侨胞的心绪。从1909年《新宁杂志》创办至今，江门的侨刊乡讯已经走过113年风云岁月。这些侨刊乡讯既是记录华侨文化历史的“活化石”，更是华侨华人的“集体家书”，也是江门建设华侨华人文化交流合作重要平台的抓手之一。

江门市委十四届二次全会报告提出，以《中国侨都》杂志为龙头打造侨刊乡讯矩阵，组建海外华文媒体联盟，提升中国侨都知名度。

每个阶段的侨刊乡讯虽肩负不同使命，但“家书”底色从未改变，是一座连接家乡与游子的桥梁。当下，江门正积极发挥侨刊乡讯作用，为“侨都赋能”工程宣传造势，讲好江门侨胞爱国爱乡故事、讲好江门大湾区投资环境、讲好江门为侨服务故事、讲好江门投资优惠政策。

江门侨刊乡讯数量占广东半数以上

“《新宁杂志》出版后，侨刊乡讯在台山大量涌现，这也让台山成为目前广东省侨刊乡讯最多的地区。”《新宁杂志》社长、总编辑何志

恒介绍，在20世纪30年代最高峰时，台山共有130多本侨刊乡讯出版，形成了以《新宁杂志》为“月亮”，其他乡刊、族刊为“星星”的格局。

江门是侨刊乡讯的发源地。据了解，自清朝宣统元年（1909年）全国第一份侨刊《新宁杂志》在台山创刊以来，各地侨刊乡讯发展非常迅速，1909—1949年先后出版侨刊乡讯200多种，“文化大革命”期间侨刊乡讯全面停刊，改革开放后，侨刊乡讯得到蓬勃发展。

当前，江门大力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作为联系海内外的桥梁和纽带，侨刊乡讯深受侨胞关注，办好侨刊乡讯意义重大。据统计，目前江门有侨刊乡讯84家，数量约占广东150家的56.6%，占全国300多家的28.3%。

目前江门侨刊乡讯可分四类：一是综合性、地区性侨刊，如《中国侨都》《五邑乡情》《新会侨刊》《新宁杂志》《开平明报》《鹤山乡讯》《恩平公报》等；二是镇、村级刊物，如《冲蒌侨刊》《文楼乡音》《澄溪月刊》《小海月报》等，其中村级侨刊在五邑侨刊中数量多、分布广；三是姓氏宗族类侨刊，如《胥山月刊》（伍姓）、《居正月报》（黄姓）、《敬修月报》（李姓）等，仅台山一地现存姓氏族刊便达到20家；四是校友会侨刊，如《台中校友》《开侨校友》《冈州中学校友通讯》等。

作为“集体家书”“家乡的精神食粮”，侨刊

乡讯深受侨胞关注。加拿大侨胞冯春源就曾致函《开平明报》称：“《开平明报》是我们家乡的侨刊，我们生活在海外，很想了解家乡近况，特别需要这种精神食粮。故乡情，桑梓事，魂牵梦绕，我们多么渴望，希望出版后寄给我们。”

这些侨刊乡讯坚持记录江门市各地风土民俗、人文地理、历史掌故、邻里生活。报道范围大至经济建设，小至婚丧嫁娶，包罗万象。不少华侨远隔重洋，仍坚持订阅侨刊，就是因为喜欢看这些内容。华侨文史研究爱好者陈锦堂表示：“在侨刊里，我总能看到自己亲属或朋友的消息和报道，让我感到特别亲切。”

更有不少华侨华人形容：“看一次侨刊，就像回一次故乡。”

搭建联系海内外乡亲的桥梁

江门侨刊乡讯每年向海外发行近60万册，承担了向海外侨胞宣传家乡发展、传递家事的义务，搭建了联系海内外乡亲的桥梁。

侨刊乡讯是联系海内外乡亲的桥梁和纽带。方炳龙在2009年退休后便加入《溯源月刊》编辑工作，依托侨刊至今已为海外侨胞寻亲2000多人。方炳龙表示：“侨胞有困难可以找我们，家乡群众有困难也可以找我们。”

“绝大多数侨胞对侨刊是热爱和支持的。他们从这长篇家书中获得思乡的满足。也有侨胞从这家书中找到了自己的家乡，找到了久违的亲人。如台山水步镇芦兜村一位老华侨，就是通过《水步侨刊》的帮助找到了分开六十余年而从未谋面的亲人。”旅美侨胞叶小林认为，侨刊在海内外侨胞的心中仍有着无可替代的地位。

侨刊乡讯是讲述五邑故事的文化载体。走进中国航空之父冯如的故里恩平市牛江镇，自然风光优美，田园气息浓郁，文化底蕴浓厚，旅游资源丰富。近年来，该镇充分发挥新媒体以及《牛江侨刊》等媒介平台的宣传作用，大力宣传牛江的特色风土人情、优美景色和新农村建设新景象。

“每次回到家乡，看到侨刊里的故事，我都觉得特别感动。”冯如后人麦少芳说，“有一次，我在美国看到，一位侨胞看完《牛江侨刊》刊登冯如的故事后竖起了大拇指。”

侨刊乡讯还是侨胞参与家乡建设的精神纽带。

“在侨刊乡讯的百年历史中，曾为唤起海外侨胞爱国热情、积极支持参与祖国各项事业的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新会侨刊》杂志社社长、总编辑徐锡琨说。比如，新会梅阁阅书报社在20世纪

20年代末由美加华侨集资建成，历经沧桑、风雨侵蚀。《梅阁侨刊》发表《致我乡旅外侨胞的公开信》，获得侨胞捐赠40多万元重建报社。

又如，鹤山旅港乡亲冯业昌在改革开放初期从《鹤山乡讯》了解乡情，并与当地侨务部门联系，在沙坪镇租厂房经营印刷业务，后来生意越做越大，于1995年在家乡龙口镇龙津工业开发区内买地开设印刷公司。

与时俱进办好侨刊乡讯

当前，江门积极发挥侨刊乡讯作用，为“侨都赋能”工程宣传造势，讲好江门侨胞爱国爱乡故事、讲好江门大湾区投资环境、讲好江门为侨服务故事、讲好江门投资优惠政策。

如何办好侨刊乡讯，联结好这份乡情？



② 创办于1925年的开平《风采月刊》

组团发展是侨刊乡讯工作者探索出的一个方向。在江门市侨联指导下，江门市侨刊乡讯协会于2021年底正式成立，深入调查侨刊乡讯的现状和存在问题，为改善侨刊乡讯的生存环境向政府有关部门建言献策。“协会计划建设全市侨刊乡讯电子阅读平台，实现电子文件分享推送，同时创建全市侨刊乡讯排版中心，解决侨刊乡讯排版不专业的难题。”江门市侨刊乡讯协会常务副会长秦瑞明透露，该协会还在筹备拍摄纪录片《集体家书》。

早在2013年，为了提高台山侨刊乡讯的竞争力和生命力，台山35家侨刊乡讯就组成了侨刊乡讯联谊会，加强了各刊间的业务交流与指导。“联谊会经常组织选材、编辑、发行等方面的培训，提高采编人员的从业素质。”何志恒说。

2014年，由《新会侨刊》发起并主导



② 江门市新会区成立侨刊乡讯义工服务队

筹建，把新会区、镇、村三级的侨刊乡讯组织起来，在江门率先成立了新会区侨刊乡讯协会。2020年初，新会区侨联、义工联联合新会侨刊乡讯协会，组织成立江门市新会区侨刊乡讯志愿服务队。受这一模式的启发，新会区沙堆镇去年在沙堆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成立侨刊乡讯志愿服务队。“我们希望为讲好侨都故事、传播江门好声音、传承侨文化贡献自己的力量。”该志愿服务队成员冯子琪说。

为了适应新时期大数据时代和宣传媒体发展的多样性，江门市各个侨刊杂志社在努力抓好杂志出版质量的提升、精心组织和策划每期杂志编辑的同时，又利用先进的电子信息化设施，实行纸网互动。

“侨刊乡讯的特色特点和风格应该是别开生面的、是生动活泼的、是求同存异的、是凝聚共识广交朋友的。”江门市华侨历史学会副会长、秘书长黄柏军认为，侨刊乡讯想要得到海外侨胞的喜爱，只有一个办法：面向侨胞、争取侨心、报道侨乡、反映侨声，适应年轻读者的阅读思维习惯。

让人感到欣喜的是，江门侨刊乡讯正不断注入新活力。2021年11月，《新宁杂志》中英双语增刊 *T-magazine* 正式发行。*T-magazine* 采用鲜明的色彩设计、简洁明快的排版以及明亮清澈的配图，与《新宁杂志》的传统风格形成鲜明对比，而这也是台山侨刊乡讯在新时代的一次勇敢尝试。《新宁杂志》编辑部门负责人表示，*T-magazine* 邀请一些台山年轻华侨华人创业者参与策划、采编，瞄准海外年轻台山乡亲，风格充满朝气。“*T-magazine* 内容上侧重于介绍台山的文化、美食、美景以及华侨旅游、创业的故事，希望在文化交流、创新创业、公共法律服务、人才交流、资讯政策研究等方面有所作为，以此吸引海内外青年一代发现家乡的机会，回乡投资和创新创业。”

陈文添：从出国“追梦”到回国“造梦”

文 《华夏》记者 钟敏仪

新冠肺炎疫情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方式，祖籍江门台山的陈文添便是其中一位。2019年12月9日，陈文添从巴西飞抵广州。他这趟回来，一是应邀参加江门市“两会”，二是顺道回家乡过年。只是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打乱了他的计划，他被“滞留”在国内长达两年半之久。这是他远渡重洋以来停留在家乡时间最长的一次。他一边“远程遥控”海外的生意，一边享受难得慢下来的时光，好好欣赏家乡的风光。他才发现这片曾经养育他的故土正在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生机勃勃。

南海之滨，风劲潮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如

火如荼。位于西江之畔、南海之滨的江门五邑地区，是粤港澳大湾区重要节点城市，正迎来黄金发展机遇。陈文添与一帮同是因新冠肺炎疫情而被“滞留”在国内的侨领通过参加各种活动和考察调研，亲身感受江门经济蓬勃发展。于是他们抱团搭建交流平台，希望让更多的海外侨胞在疫情常态化的时代共享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机遇，回国“造梦”。

发动捐赠第一批口罩

2020年春节前夕，陈文添结束公务活动后回到台山，准备张罗过年事宜，却被武汉封城的消息打个措手不及。他所在的各种微信群里，不断传来国内新冠肺炎疫情日趋严重的信息。当他收到《台山市红十字会、台山市慈善会关于募集我市疫情防控工作资金和物资的倡议书》的那一刻，他再也坐不住了，放下手头所有工作，创建支援祖国抗疫微信群，动员海外乡亲出钱出力、募集防疫物资。闯荡巴西多年的陈文添，不仅事业有成，还活跃于巴西华侨社团，兼任巴西江门五邑青年联合会会长、巴西中国功夫龙狮文化总会会长等职务。他募集防疫物资的号角刚吹响，海外乡亲纷纷响应，按照防疫物资的统一规格和标准指引，或提供购买信息，或联系厂家订购，或前往巴西各大药房搜购，各尽所能。

“当时巴西圣保罗城区的药房已经买不到口罩了，有的乡亲开车去附近的县城搜购，甚至还有侨胞驾车400多公里去里约热内卢搜寻，还有



② 陈文添列席江门市人大会议

的乡亲一天跑好几趟药店，紧盯口罩上架……”陈文添回忆起当时海外乡亲为多买一个口罩支援家乡抗疫而四处奔波的点点滴滴，仍然激动不已。而身在国内的他，顾不上两地 11 个小时时差，大半夜守着手机，时刻关注微信群的信息，及时跟踪防疫物资的筹集情况。终于，第一批 1.5 万个口罩在两天内筹集完毕。

从南半球的巴西到北半球的中国，普通货运至少需要半个月甚至更久。然而疫情时期，时间就是生命。陈文添咨询了好几几种货运方式，都不够理想。后来得知巴西江门五邑青年联合会副会长谭子超有回国计划，陈文添便与谭子超商议将口罩“人肉”带回。

2020 年 1 月 30 日，谭子超化身“国际快递员”，带着口罩登机了。辗转 30 多个小时，谭子超不负所托，将口罩顺利带回台山。口罩运回后，陈文添和谭子超第一时间将口罩捐给江门市统战部安排投入到抗疫一线。这是江门市接收到的第一批海外侨胞捐赠的防疫物资，犹如及时雨，传递战胜疫情的信心和希望。

之后，陈文添继续投入到募集防疫物资工作中，“身为华侨的我们，有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怀。我们应该第一时间站出来，贡献自己的力量，共同抗



⑦ 2020 年春节前夕，陈文添组织巴西江门五邑青年联合会搜购防疫物资并迅速运回国支援家乡抗疫

击疫情”。2 月 8 日，巴西江门五邑青年联合会、巴中平原地区华人联谊会、巴西广东同乡总会、巴西巴拉那华人协会等社团筹集的第二批防疫物资，再次通过“人肉”驮回的方式送到台山。

推动巴西设立“中国移民日”

2018 年，时任巴西总统特梅尔签署法令，正式将每年 8 月 15 日设立为巴西“中国移民日”。

“我们为在巴西终于有属于华人的节日感到自豪！”1996 年移居巴西的陈文添记得，他刚到巴西的时候，总有当地人问他是不是日本人，而他总要一遍遍解释“我是中国人”。后来过了数年，当地人见他时终于问他是不是中国人。那一瞬间的民族自豪感令陈文添终生难忘。

200 多年前，这片桑巴热土上就开始活跃有黄皮肤黑眼睛的华人身影。19 世纪初，大量华人以“卖猪仔”的方式进入巴西，主要从事最艰苦的开矿、修铁路、种茶、种棉等工作。之后一代代中国移民来到这个“桑巴之国”，凭借着中华民族智慧和勤劳的优良传统，摆脱奴隶般的“猪仔”生活，走入巴西各行各业，有从商的，有从医的，还有从政的，成功融入巴西当地社会，为促进巴西当地经济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中国移民日”的设立，最早是从巴西的圣保罗州开始的，因旅巴华侨华人大部分都生活在圣保罗地区。1992 年 4 月 30 日，

圣保罗州议会通过设立“中国移民日”提案，决定每年10月7日前后，圣保罗州议会和圣保罗中国侨团在州议会举行庆祝活动。据说此日期是中国第一批移民1852年抵达巴西的日子，不过这一日期缺乏历史档案和史料的证明。虽然缺乏依据，但圣保罗州坎皮纳斯市议会在2007年也设定10月7日为该市“中国移民日”。圣保罗市议会则将每年的8月15日定为该市“中国移民日”，而8月15日正是中巴建交纪念日。

巴西是总统制的联邦共和国，各州有宪法保证的政治自主权。虽然圣保罗州市已开始陆续设立“中国移民日”，但华人希望能有一个国家层面立法的“中国移民日”。

于是，陈文添和浙江籍的几位侨领向巴西众议员、巴中议员阵线主席福斯托·皮纳托游说。“我们还邀请他到中国参观考察，”陈文添他们出钱出力，陪同福斯托·皮纳托到北京、上海和福建实地体验，“让他亲眼看看繁华的中国，

才更有说服力。”经过一年多的游说和运作，巴西众议院和圣保罗市议会分别通过相关提案将8月15日设为“中国移民日”。

2017年，福斯托·皮纳托向众议院全体大会递交提案，要求将每年8月15日定为巴西“中国移民日”，该提案次年获众议院通过，最终得到了总统签署，8月15日成为巴西全国性的“中国移民日”。

“深切感受到巴西30多万侨胞经过200多年辛勤打拼、勤劳敬业、积极融入当地社会等努力受到巴西政府的认可。”陈文添说，祖（籍）国的强大和繁荣，加上海外侨胞自身的努力，提升了海外侨胞住在国的社会地位。

以中国武术传播中华文化

在巴西各个城市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名为 Pasteiralia 的小吃店，这就是台山人开的“角仔店”。Pasteiralia 的葡语意思是包有馅料的饼，是台山人根据当地人口味特制的巴西特色食品，台山人称之为“角仔”。据说当年经营这种角仔快餐的老华侨为节约成本，将店面设在巴西人开的餐馆角落，做好的角仔就放在一个架子上售卖，因此得名为“角仔店”。不少老一辈台山华侨在巴西白手起家源于“角仔店”。

陈文添没有选择开“角仔店”这一条道路，而是跟着早年就移居巴西的妹妹做进出口生意。他从小商品贩卖做起，主要销售由中国制造的手机、相机、芯片等。最初，中国商品质量还没能得到客户的认可，不太畅销，



② 陈文添荣获巴西圣保罗市“杰出贡献奖”



⑦ 巴西中国功夫龙狮文化总会龙狮团在圣保罗华人社区举办庆祝中国春节的表演活动

后来“中国制造”质量稳步提升，中国商品随之大受欢迎。凭借着敏锐的商业头脑和诚信为本的经商理念，陈文添逐渐在巴西站稳了脚跟。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扎根巴西之后的陈文添有更多精力思考如何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促进民心相通，厚植中巴友谊。他把突破点放到中国功夫和龙狮文化上，因为这两者在巴西都有深厚的民众基础。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来自广东、香港、台湾等地的华人武师移居巴西，将中国武术传播到巴西。之后随着中国功夫片在全球掀起一阵“中国功夫热”，中国武术更是在巴西深受欢迎。随之巴西社会陆续开设了一批武馆、武校，仅在圣保罗州就有200多家，武术流派林立，如太极拳、

北少林拳、螳螂拳、洪家拳、鹰爪拳等。在巴西武术总会注册的武术爱好者也达五六万人之众，并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加。同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舞龙舞狮，在海外也是深入人心。

陈文添虽非习武者，但他为人爽直仗义，广结人缘，与不同流派的华人武师关系都不错。古尽天时地利人和，陈文添发起创建的巴西中国功夫龙狮文化总会于2014年2月24日在圣保罗成立，他任首任会长。成立仪式当天，“十二头狮子、八条龙”来贺，场面十分壮观。每逢中国传统节庆、中国移民日及其他重大节日，总会都会派人表演武术或舞狮舞龙助兴。

“总会每天下午的课程向巴西人开放，晚上七八点则是华侨子弟的训练。有免费的公共课，

也有需缴费的一对一或者小班教学。”陈文添说，各种年龄段的中巴学徒都有，其中学习舞龙舞狮的巴西当地族裔人数比华侨子弟还要多。总会还与当地军警合作，派出武师向他们传授中国功夫。陈文添以中国武术和舞龙舞狮为巴西人民打开了一扇了解中国、体验中国文化的窗口，照亮中巴两国文明共荣互鉴的前程。

回国“造梦”

这场疫情，给了陈文添回国“造梦”的契机。

《世界侨情报告（2021）》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在全世界持续蔓延，给全球经济、政治、公共健康和人文交流等方面造成了严重影响，全球经济下滑5.2%，这是二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衰退。华侨华人在海外从事餐饮、旅游、商贸等传统行业的人数众多，疫情带来的病毒威胁、隔离封控、经济下滑、就业减少、种族歧视等不利影响，给他们在海外的生存与发展带来了巨大压力。

在疫情发生之前，陈文添回国参加活动几乎都是来去匆匆的。这一次“滞留”，让他有更多时间和机会参加国内的各种活动，与更多同样是“滞留”国内的其他侨领有更多机会接触，深交，尤其是五邑地区的侨领。大家常常在江门市政府及其他部门组织的活动或会议里一次次碰面，自然形成一个圈子。除了参加活动见面之外，大家私底下也常相聚，分享各种信息。“我们当中有智利的、秘鲁的、斐济的、法国的、美国的、澳大利亚的、刚果金的、巴西的……”陈文添说，他们这帮“被困人员”是从40多个国家回来的，有的在国内有生意。聚得多了，大家就有了“想法”，总不能坐吃山空，想着在国内做点事。

于是，陈文添和几位志同道合的侨领提议“抱团”，如早期漂洋过海的侨胞为守望相助、

共谋生存发展而结社。曾被第四届世界江门青年大会授予“十大杰出青年”荣誉的陈文添有着丰富的侨团管理经验，他借助现在流行的社交方式，创建了一个微信群，将“滞留”国内的五邑地区侨领拉进群，以此为交流平台，共谋发展。

华侨华人是“侨”，也是“桥”，具有联通中外的天然优势。陈文添等人搭建起这个平台，不仅是为“滞留”国内的侨胞服务，也希望通过群里不同侨居国的侨领将家乡和大湾区的发展机遇分享出去，让更多侨胞来共享中国发展机遇。

自2021年以来，陈文添通过这个平台，组织侨领走遍江门的一山一水，考察调研，挖掘商机，在寻找个人发展机遇的同时，助力“侨都赋能、港澳融合”。他们曾成功为一些有意向在家乡发展餐饮业的侨胞推荐了合适的经营地点，并协助落地事宜；也为江门的企业“走出去”牵线搭桥，出谋划策。

陈文添等人还借助自身在侨居国侨团的影响力，为江门在海外侨团设立商务联络点。其中，鹤山市已在德国、缅甸等国家的华侨社团建立了28个海外联络点，海外乡亲可以通过联络点获得商机信息，以及在遇到困难时寻求帮助。

与此同时，陈文添和群里的侨领也在探寻将侨居国的优势产业引入中国的商机。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20世纪90年代，陈文添出洋谋生，将“中国制造”的商品销往巴西，成就了他的个人事业。而今天，中国的新发展给世界带来更多新的发展机遇。陈文添凭借着敏锐的商业嗅觉，发掘中国市场的需要。“中国的市场很大，巴西是世界农业大国，我们正在构思将巴西的优质农产品引入中国。”他说。

陈文添的回国“造梦”之旅才刚刚起步，如萤火之光，虽然不及皓月光芒，但这点滴的温暖正在努力照亮着未来。●

旧巷色彩

文 陈灿富（北美中文作家协会会员）

又一次由海外还乡，老朋友吕先生与我微信语音。他在中国、美国开公司，几天前才由国外回来，他说：“好久没去台城牛屎巷了，我们去走走吧！”

我的老家是台山，有“中国第一侨乡”之称，现有旅海外乡亲163万，遍布在110个国家和地区。

台山人一谈及故乡，都离不开牛屎巷。历经风雨洗礼的牛屎巷，不仅名字通俗好记，还是老城区最繁荣的区域之一，是这座城市的缩影与标记。

当年台城建城不久，每逢圩日，周围一带的村民总会牵牛来此交易，牛屎遍地，两侧商铺经营者却毫不介意。圩日散场，有专人负责清扫，还街道一片干净。于是，人们约定俗成称之为“牛屎巷”。

那时有个上过几年私塾的牛贩，人称“牛贩庄”。牛贩庄每次看到好牛，就会做动作、打手势，张大嗓子竭力吆喝：“你们仔细看几遍，认真看看这水牛，四蹄踏实劲力足，犁田跑得足够快，一天犁足一亩田，连续干活还有力。要想买得好水牛，起早赶来牛屎

巷。牛屎巷做买卖，从来不做欺诈事，讲良心讲道行，更加不怕踩牛屎，就怕老眼昏花买错牛。”

一个爱吟咏诗词的市民按照牛贩庄吆喝意思，顺口撰出一首打油诗《牛屎巷买卖水牛》，词语通俗易懂，流传甚广：“牛屎巷，牵牛到，牵来一条大水牛；水牛健，水牛壮，四蹄踏实劲力足；跑好快，奔得欢，一天犁足十亩田；说公平，话道义，起早买卖牛屎巷；不欺诈，讲良心，不怕巷子踩牛屎（指不用担心落入圈套上当受骗）。”

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上半叶，日本飞机经常飞到台城上空骚扰或轰炸，使牛屎巷劫难重重。某次圩日，一农村小伙牵一条牛犊走到牛屎巷，引来多人围观。小伙当众说准备卖掉牛犊买婚床。人们凑热闹，纷纷说要去喝小伙的喜酒。不料日本人飞机再一次行凶。爆炸声响，浓烟滚滚，哭声一片。护着牛犊的小伙子情急之下无法逃避。一个炸弹当头掉下来，地面凹现大坑，



⑥ 古村新韵 梁国稳/摄

小伙连同牛犊无影无踪，仅留下一根沾满血水的牛绳。

一私塾老师悲愤之下，撰写一首长长的乡间民谣《牛屎巷挨轰炸》，贴遍牛屎巷的骑楼廊柱，控诉日本人兽行：“日本仔，真疯狂，日夜轮番大轰炸；老百姓，遭苦难，惊惧头顶落炸弹；某圩日，有小伙，牵条牛犊牛屎巷；牛犊强，牛犊劲，引来多人齐围观；小伙笑，不隐瞒，卖掉牛犊买婚床；众人乐，凑热闹，熙攘怂恿饮喜酒；倭寇机，再行凶，连串灾祸满天飞；尘烟起，哭声嚎，百姓死伤躺一地；小伙子，护牛犊，内心急迫无法避；恶声响，凹大坑，小伙牛犊皆无踪；泪水飘，骂强盗，留下牛绳沾血痕；秀村姑，好命苦，未作新娘已悲恸；牛屎巷，巷不长，毋忘义愤家国仇。”

光阴似箭，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中叶，牛屎巷有过一段漫长的萧条冷清日子。直到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台山逐渐走上了经济发展的快车道，牛屎巷才得以重新焕发青春，恢复了繁华兴旺。不过，牛屎巷不再单纯用于买卖畜牧，而是成为热闹非凡的集市。整条小街有餐饮、五金、时装百货等商店。就连中间地段，也被利用开办起各有个性的“车仔档”，有配钥匙、烧烤、摆地摊等临时摊位。

有一首词句稍长的民谣《牛屎巷轶事》吟唱开来：“牛屎巷，真繁荣，街道热闹万人行；好多货，积似山，物如轮转很丰富；黄金屋，够豪气，穿金戴银正逢时；时装店，俊男女，西装彩裙共靓丽；餐饮店，客盈门，酒菜味香惹人醉；新时代，新形势，牛屎巷见新气象；邻家妹，开书店，售卖杂志又书报；读书人，喜读书，最爱走进小书店；你挑书，我拣报，阅览故乡台山料；说小巷，话趣事，牛屎巷中蕴传奇；轶闻多，讲古仔，浓缩五百长年事。”

20世纪80年代末，我在台城工作，经常去牛屎巷走走，某天走入一家既是文具店又作画

室的小店。小店利用楼梯间开店，老板是一位长者。店里有一幅中国画，长约4米，宽约1米，题名《牛屎巷》，应该是模仿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画面描绘了台城牛屎巷繁盛景象。

可惜楼梯间过于狭窄，灯火有一些灰暗，且隔着一段距离，画作署名细小难辨。我想走近前细看，恰有几个客人进店购物，老板忙于应付，我不好打扰，只好暂时放下此事。

过两天，我接受安排赴广州学习一个月，趁休息去北京路逛画店时想起旧巷小店那幅画。一回台城急急忙忙赶去牛屎巷，希望了解画作的细节，但小店已经挂牌专营钟表店。之前的老板已远赴加拿大与亲人团聚。

之后的日子，老城区需要进行全面改造，这一来，经历风雨寒暑的牛屎巷完成担当集市的使命，按文物样式修旧如旧，恢复原先面貌。过不久，又有了一首新民谣《重返台城牛屎巷》传唱开来：“当年离开牛屎巷，离乡背井闯外洋。谋生艰难谁人知，全凭意志够坚强。今日重新返台城，感受早已不一样。大街小巷还熟悉，故乡情感仍浓厚。亲人间候我开怀，欢乐场景使人醉。望望老店铺，抹净百年风雨霜。而今再看看，喜见旧巷色彩美。浏览老街区，似锦繁荣好热闹。带着祈愿与祝福，天佑祖国更富强。”

天空高远，阳光灿烂，我与吕先生开车赶往台城市区中心，在湖畔公园车场停妥小车，任由水面吹来的清风轻抚，步履轻快走向牛屎巷。老巷，一如上面民谣所唱的“抹净百年风雨霜”“旧巷色彩美”“繁荣好热闹”。恰好遇见几十个华裔子弟，由国外城市唐人街中文学校组织回来参加与相关机构合办的“故乡寻根行”活动。他们由几位年轻老师带队站在小街骑楼下，全神贯注听一位年长者娓娓讲述旧巷的前世今生。沉浸在故事之中的华裔子弟，不时传出一阵阵热烈掌声。●

江门五邑：天然的华侨博物馆

文 黄卓才（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

江门五邑，我的故乡，有“中国侨都”之美誉，到处是华侨文化瑰宝，总会冷不丁地展露在你眼前，而最让人叹为观止的莫过于中西合璧的碉楼。

开平一度拥有碉楼近3000座，大多兴建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为何要建这么多的碉楼呢？因为当年五邑地区盗贼猖獗。碉楼墙壁一般有四五十厘米厚，以黄泥拌石灰舂成，或用青砖、花岗岩石砌成，更多的是钢筋水泥结构，刀枪不入。碉楼每层四边墙上一般都开有枪眼，顶层多有瞭望台，甚至装有探照灯。门窗不大，钢铁栏杆特粗，大门都用厚厚的钢板做成，整座碉楼异常坚固，可以防范敌人。

自力村的碉楼群是开平碉楼的代表作。由于修复较早，开放旅游，申遗成功，一批批国内外游客慕名而来，专家学者也常到此考察，因而名

声大振。碉楼融欧洲古典建筑风格和中国传统建筑艺术于一体，造型霸气而秀美，正好体现侨乡的历史文化特征。

从宜居角度来看，我觉得最美的碉楼在台山斗山镇的浮月村。那里有中山阁、贤安庐、安雅庐、兰芳居、觉庐、葵华居、恒安居、仕庐、英庐、源庐、烟庐、鋈庐、晃庐、惠华居和陈国旗楼等15座别墅式碉楼。1917—1936年间，该村华侨纷纷从侨居国将设计好的图纸带回家乡，按图建造。这15座风格各异的别墅先后在田野中傲然崛起，成为“金山客”及其眷属的梦中乐园。

而台山四九镇的碉楼另具典型性。这里有全五邑最高的10层碉楼——福临碉楼，有已经修复变身为侨乡风情民宿的望岗村碉楼，有藏品丰富的私人银信博物馆和作为侨文化研究基地的儒芳村三益碉楼，还有把五邑碉楼的防御功能发挥



⑥ 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开平塘口镇自力村碉楼群 江门市侨联/供图

到极致、在抗日战争中立下奇功的上南村英雄碉楼。

1944年农历七月初五，侵华日军汹汹来犯。上南村壮丁奋力打伤日军数人。五天后，日寇出动1200多人，兵分六路进攻，以图报复。上南村壮丁组成六七十人的自卫队，据守在向贤楼、镇北楼、南营楼、竹角楼等七座碉楼，与30多位守军并肩抗击敌人。战斗对峙一天一夜，敌人久攻不下，恼羞成怒，从台城拖来十多门迫击炮、小钢炮，向碉楼发起猛烈轰击。向贤楼里的壮丁被困一天一夜，干粮吃光，子弹耗尽。突然，日本鬼子一颗炮弹在碉楼北面爆炸，墙壁被爆开一个缺口，密集的枪弹从缺口雨点般射来。几名日军冲到碉楼门口放置地雷。壮丁情急生智，在楼内找到村人存放的一匹棉布，从窗口吊放下来，然后一个个沿着布匹滑下，冲了出来。此役歼敌100多名，使日军遭受入侵五邑以来最大的失败。我方壮丁和军人阵亡25人，群众被杀10余人，付出惨重代价。

碉楼只是五邑洋楼的一种。五邑洋楼还包括了侨墟和侨村里的西式豪宅、商住楼宇以及新型校舍。台山的乡间西式豪宅最有名的是端芬镇庙边村的翁家楼。翁家楼共三座，以连体建筑立面外形似刘备、关羽、张飞而闻名；1927年始建，1931年竣工，由台山籍旅美国、香港翁氏乡亲请德国人设计图纸建造而成，分别名为玉书楼、沃文楼、相忠楼，均为当时楼主的名字。台城郊区官步村的翘庐，楼高三层，院子里树木参天。这是南洋富商百年前的心血之作，所用木材全是南洋进口的高档红木，非常名贵。

商住楼是洋楼中最有经济价值的建筑，多集中在侨墟。台山曾有96处侨墟，10000多座洋楼。洋楼大部为二至三层，统一规划，上往下商，连排成街，骑楼贯通。台城老城区的西宁墟的洋楼最具代表性，有台山县政府大楼、谭宅、东风旅

店、天桥大厦、人民电影院等，景观与广州西关上下九、恩宁路等处的老旧洋楼有异曲同工之妙。

台山的侨校建筑大多是中西合璧的新型校舍，规模宏伟，外观典雅，功能齐备。我的母校台山一中是其中的佼佼者。

五邑侨墟的前身是农村集市，侨村则是泥砖草顶的农舍。110多年前，美国华侨陈宜禧回到家乡发起兴建新宁铁路，火车如铁龙般从台山奔向新会、江门。这在交通还不发达的当时，连大文豪巴金的目光也被吸引了。他赞誉这条飞奔的长龙为“钢铁的诗”。路通财通，其后二三十年间，大量华侨资金（侨汇）涌入，台山、新会、开平等地掀起了建设侨墟、侨村的高潮。古老的墟镇集市成了以中西合璧为建筑特色，以土洋产品贸易为主业，以侨批钱庄为金融活水的侨墟。而茅房瓦舍的农村也变成了一排排整齐的青砖钢铁水泥住宅。这么一场伟大的现代化运动，从物质到精神，彻底地改变了五邑的面貌。

台城，是台山的中心城市。拥有1000多间商铺，街道纵横，四通八达，人气旺盛，有水上飞机直飞省城。最妙的是西宁墟，每逢二、七墟期，四乡侨眷和农民依时前来“等墟”（趁墟），热闹非常。还有汀江圩，又称梅家大院，以及公益埠，两个典型的华侨集资兴建的侨墟。海口埠则是广东几个古驿道起点之一，近年修整一新。台山银信博物馆早已开放迎客，馆外有个银信纪念广场，20根银信柱上用石湾陶瓷烧制的家书经常引来游客围观。

四九镇五十墟是我儿时生活过的地方。300多栋中西合璧的商住楼宇蜿蜒有致，骑楼街道风韵犹存，可以想象当年的繁荣。如今修整一新，逢五逢十的墟期一次不漏，是一个仍然活着的侨墟。五十墟离台城只有九公里，有河流从中间流过，河边修有绿道，它又靠近古兜山国家自然保护区和北峰山旅游区，可攀登，可漂流，可赏茗。

加拿大华人前总督伍冰枝、被誉为新中国音乐奠基人的著名音乐家李凌和香港美心集团董事长伍舜德等名人故居就在墟边……近年来，五十墟引起了国内外华人研究专家学者的关注，更有电视台前来拍摄取景。还有新宁铁路五十站、往昔商号、茶楼、邮局、医院、教堂遗迹等都得到保护。五十墟作为一个侨乡山水特色小镇，发展前景可期。

在五邑天然华侨博物馆里，与洋楼、侨墟齐名的，还有别具一格的侨村。

台山有4000多条侨村。这些侨村大多与侨墟同时建成，是由见多识广的华侨结合当地农耕生活设计的。它的基本格局是整齐划一、土洋结合的青砖排屋，有通风透光的天井和西式阁楼，巷子有排水、排污系统；村前宽阔的“塘基”（村场）用于村民活动、方便打禾晒谷和车辆进出。塘基前面是“以水为财”的鱼塘。排屋背后则是竹木林或果园。村头有祠堂，大榕树；村尾有水井，或有庙宇。有的侨村还有学校、书室，村口有牌楼和凉亭。整体设计亮丽、环保、舒适。近年来，台山政府投入大量资金帮助村民侨属修整村容，进行厕所革命，增建鱼塘不锈钢围栏等安全设施，面貌焕然一新。

随便走进台山的一条村子，都可以找到北美、南美的侨属。许多人喜欢加勒比，关注古巴华侨，所以我想特地推荐几条台山古巴华侨村。一条是三合镇松咀村，全村100余户人家，原有400人口，曾到古巴谋生的有90多人，还出过古巴侨领、旅古诗人等。一条是台城镇泡步村，因洪门大佬朱家兆及洪门成员众多而被称为“古巴洪门之乡”。而端芬镇的东宁里则享有“最美丽的古巴华侨村”的盛誉。它始建于1921年，由古巴华侨李晨富兄弟发起，采用股份制的集资方式主持建造。参股的都是美洲华侨和侨眷，股份簿至今保存良好。整条村子长500多米，38间青砖

房屋工整地排列着，笔直而足够宽度的巷子保证家家户户进出方便，通风透光。有些住宅的门前有“民权发达”“世界维新”等对联，体现了当年华侨的先进思想。东宁里如今虽已人烟稀少，但侨房保护得力，鱼塘碧波荡漾，曾被授予“岭南民居风貌名村”称号。五邑最大的古巴华侨村在新会沙堆镇，独联村曾有古巴华侨700人，梅阁村则为2000人。这里近海，19世纪50年代年代就有人去古巴谋生，蒋道日、蒋祖乐、蒋祖廉三位古巴侨领都是梅阁村人，他们的故居至今仍在。沙堆镇还有古巴桥、古巴楼等百年古建筑。

也许是华侨文化资源太过丰富，还有许多文物至今仍未引起文博部门和游客注意。比如供路人休憩的凉亭，都是华侨捐建的，这在台山特别多。我小时候上学，途中总爱在亭里逗留一会。可喜的是，半个世纪过去了，它们依然容颜不老，有的还得到政府维修而焕发了青春。台山凉亭最多最美的村庄是斗山镇浮石村，有树德亭、凤瑞亭、小兰亭、众乐亭、百岁亭等五座凉亭。浮石村是一条具有600年历史的赵宋皇族村，是台山飘色之乡，拥有可与浮月村比美的别墅洋楼群。该村2019年入选“全国乡村游重点村”，实至名归。

五邑侨乡文化中还有风情独特的台山话。台山方言属于粤语系的一支，但音调相当特殊，保留着大量中原古语词汇和语法，又夹杂着英语单词、短语，被称为“半唐番”。散文大师秦牧是台山女婿，他写过一篇《“小世界语”的故乡》是这样描述的：“在国外旅行的时候，你几乎到处都可以听到许多华侨讲着这种方言。由于世界上广大地区的人们，都经常听到这种声音，台山话又有‘小世界语’的美誉。在台山参观访问，我就不期然想起：这回到‘小世界语’的故乡了。”

浩浩五邑，何处无华侨，何处无华侨历史文物。

“侨都赋能”工程中的侨界担当

文 余泽权（江门市侨联副主席）

漂洋过海“闯金山”，海内海外“两江门”。

一百多年前，五邑先侨背井离乡，从“广府人出海第一站”——海口埠出发，穿越大洋、闯荡世界。如今，五邑籍华侨华人已遍布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也成就了江门“中国侨都”的美誉。

一百多年来，江门五邑海外侨胞、港澳同胞在异国他乡拼搏创业的同时，念念不忘家与国，他们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新中国建设、改革开放和新时期作出巨大贡献。江门市第十四次党代会指出，广大侨胞始终情系桑梓、鼎力支持，铭记于心、恩情难忘。放眼江门五邑，处处有侨味，处处有侨的影子。

西江长流，昼夜不止，见证江门发展之河不断向前。正如江门市第十四次党代会报告指出，当前的江门，稳的态势更加巩固、快的条件更加充分、进的潜力更加巨大，建设新时代“中国侨都”其时已至、其势已成！当前，江门在打造“侨都赋能”工程，建设华侨华人文化交流合作国家平台、华侨华人创新创业国家平台、华侨华人公共法律服务国家平台、全球侨务资讯政策研究和人才培养国家平台等“四大国家平台”，着力提升“文化交流、经贸合作、维护权益、侨务智库”四大功能，在联系服务全球6000多万华侨华人中体现侨都担当。

侨联是党和政府联系广大归侨侨眷与海外侨胞的桥梁。作为中国著名侨乡，江门市侨联是海外侨胞的“娘家”，也是侨都联系服务全球华侨



⑥ “中国寻根之旅·风韵南粤”秋令营（江门营）营员在鹤山梁赞广场合照

华人的纽带。回顾近年来的侨联工作，江门市侨联党组书记、主席林春晖感触颇深，“侨联工作见证着江门五邑侨联工作者的开拓奋进、高歌前行。我们围绕市委‘1+6+3’工作部署，特别是‘侨都赋能’工程，聚焦提升文化交流、经贸合作、维护权益、侨务智库四大功能，提升侨联组织引领力、凝聚力、服务力，创品牌、创特色，一步一步脚印书写出江门侨联工作的新篇章。”

思想领航，聚侨心

侨心向党展侨界形象。江门市侨联牢牢把握侨联是党领导下的人民团体这一政治属性，着眼画好最大同心圆，凝聚广大侨胞心，通过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史学习教育，加强党建带侨建工作。特

别是推动党史学习教育海内外传播，联系与支持海外五邑籍侨团举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座谈会，录制党史、侨史微课程视频在座谈会上播放，激发海内外侨界群众的爱国热情。策划拍摄《百年情：五邑归侨心向党》、党史学习教育视频专辑等一批专题片。参与举办“家国情怀寄尺素——江门五邑银信（侨批）”“侨心向党、同心圆梦”五邑华侨华人与中国共产党专题展，推动广大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在学习党史侨史中汇聚侨心侨力。

注重党建引领侨企发展。近年来，江门市侨联开展“党侨同心”主题党建工程，积极搭建服务载体和平台，精准对接，为侨服务务实有效。特别是党建引领侨企发展有新成效，推动李锦记集团、亚太纸业、广东嘉士利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广东可味巧克力食品有限公司、江门东骏电器有限公司等多家侨资企业、新侨企业成立党组织，尤其是鹤山雅图仕印刷有限公司成立了广东第一家新型侨资民企党校——雅图仕党委党校，为非公企业共产党员搭建新平台。

资源整合，强侨力

江门市侨联紧抓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机遇，聚焦“侨干实事”开新局，做好海外侨胞互联互通工作，开展“一站式”服务新侨、海归创业创新，积极引领侨界服务江门经济高质量发展。

建立机制，为侨界创业发展搭建桥梁。加强与有关部门、海外侨团对接合作，通过举办粤港澳青年文化创意暨人才创业创新分享会、江港科技创新合作对接会、江港携手共建粤港澳大湾区分享会、江港携手共建粤港澳大湾区推介会、华商对接RCEP经贸合作江门峰会等活动，推动多家香港和海外高科技项目落户江门。开展海外人才交流与合作，加强与 9 个“联络五邑”海外工作服务站对接，引进合作意向项目 20 个，涵盖生

物科技、环保制造、文化产业等领域。推动市留学生联谊会发展壮大，高学历、高层次留学人员为主体的会员 391 人。建设 1 个南粤侨创基地、2 个“留学归家”活动中心，搭建新侨、海归在江门创业创新的对接窗口和服务平台，先后举办各类交流活动近 70 场，推选 9 名留学归国人员申报国家级人才奖励计划。助力江门“人才倍增”工程，积极推进国家海外引才计划申报推荐工作，向市人才工作局推荐报送各类海外人才人选 15 名。

内外合力，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突显作为。2020 年国内疫情初期，海外五邑籍侨胞通过“抢货”“人肉”背货等途径纷纷捐助国内抗疫，江门共收到海外社团及广大侨胞捐赠善款、物品折合人民币 2700 多万元。同时，国外疫情蔓延后，江门启动“侨爱护航”行动，向国外寄送一次性医用防护口罩、莲花清瘟胶囊等防护物资一大批，积极支援海外 26 个国家和地区五邑籍侨胞抗击疫情。2021 年以来，江门市侨联组织“党员先锋队”支援江门大规模核酸检测工作，参加志愿服务 200 多人次，并联系多家海归、侨青企业发起“爱心接力”行动，捐赠一批抗疫物资支援前线工作人员。加强与在香港的侨联委员、五邑籍社团的联系，支援香港五邑乡亲抗击疫情，2022 年 3 月，江门统战侨务系统募捐抗疫物资和资金 3000 多万元，驰援香港五邑乡亲连花清瘟胶囊、核酸快速测试包、口罩等防疫物资及其他物资一大批。

文化引领，推动形式多样的联络交流。围绕“大力提升侨都中华文化国际传播能力”目标要求，江门市侨联着力拓展“一带一路”、欧美国家、太平洋岛国等重点地区侨胞联络工作，利用侨资源推动双边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2021 年春节期间，江门市侨联联合宣传部门录制《跨越山海的祝福——2021 年春节文化交流活动（江门—霍尼亚拉）》特别节目，与所罗门群岛华侨华人



同贺新春，在所罗门群岛华人社会和当地人社区引发热烈反响。2022年，江门市侨联继续与宣传部门、江门电视台制作侨乡特色网络晚会节目和海外侨胞春节感言、云端拜年视频，以文化慰藉乡愁暖侨心。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下，推动“工作在国内，影响在海外”，江门各级侨联举办亲情中华（冬）令营、“亲情中华·为你讲故事”夏（冬）令营、“护航计划”留学报国实践、“我们一起读江门”等20多场文化交流活动，惠及海外侨胞30多万人次，增强海外华裔青少年对“根”“魂”“梦”的认同。特别是2020年，江门创新举办首个江门“云上世青会”，发动75个国家和地区350个侨团参与，传播范围遍及全球100个国家和地区，覆盖逾1亿人次。加强文化交流基地建设，推动华侨博物馆、五邑大学、恩平牛江镇、台山大江镇、开平塘口镇等5个单位先后成功申报“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加强海外传播工程建设，设立江门市联海侨界媒体交流中心，与30多个国家（地区）70多家侨界媒体建立联系，举办“侨界媒体五邑采风行”活动，

向海外推送200多篇新闻稿件。加强侨刊乡讯工作，推动成立全省第一家地市级侨刊乡讯协会，打造以《中国侨都·江门》杂志为龙头的侨刊乡讯矩阵，积极推进侨刊乡讯优化提质，目前江门有60多家侨刊在广东省侨刊乡讯电子阅览中心和华媒“世界头条”，多家侨刊还开通了视频号和抖音号。

法律机制，护侨益

创新涉侨法律服务。走进新会检察院12309检察服务中心，抬头就可以看到“检侨联络站”的牌子，这里设有涉侨服务窗口，实行“一窗口受理”“一次性告知”“一站式协助办理”。开平翠山湖高新区也设立了检察院侨资企业服务站，检察官主动走进涉侨企业，进一步畅通检侨联系，并为企业送上汇集了涉侨法律政策指南等资料的“法治大礼包”。江门市还在鹤山中欧合作区设置了中欧合作区涉外律师团常驻涉外公共法律服务站，为涉侨涉外企业提供法律服务。江海区也积极推动公共法律服务中心、知识产权法庭和江门国际仲裁中心的涉侨法律服务综合体建设。

线下全覆盖，线上不“打烊”。近年来，江门市侨联创新为侨服务理念，“借船出海”，整合资源力量，联合法院、司法、检察部门打造“法+侨”“检+侨”工作品牌，推进涉侨多元纠纷化解工作。建立健全侨联法律顾问委员会队伍，推动全市创建涉侨纠纷多元化解工作室45个，组建特邀调解员56人，做好热心的“和事佬”，为侨界群众提供优质法律、调解服务，近三年调解纠纷852件。组建8个侨联法顾委，



② 2022年1月1日下午，在RCEP生效实施的首日，“展望区域新未来，谋求开放新发展——RCEP启航合作发展系列活动”在江门隆重举行，其中，华商对接RCEP经贸合作江门峰会由江门市侨联承办。广东省侨联党组书记颜珂（左五）出席活动



② 2022年1月27日，“中国侨都——海外华侨青少年文化交流基地”揭牌

在江海区成立全市首家侨联法律顾问委员会服务站。推动在江海、新会、开平设立3个“检侨联络站”其中，新会区检侨联络站为全省首家。拓展线上涉侨维权领域，市侨联与市司法局、江门五邑公证处打造涉侨远程公证服务系统打造江门市涉侨“一站式”服务平台，建立完善侨情资源数据库和远程跨境视频办事服务系统。同时，发挥侨团、侨领作用，在委内瑞拉、巴西、智利3个国家侨社团设立“侨爱南粤云平台暨江门市涉侨纠纷多元化解远程平台”。同时，在全省率先构建“信访超市+外送服务”网络化工作体系，在涉侨问题集中的地区设置侨务纠纷调解室，通过视频接访远程调处，让海外侨胞诉求得到妥善解决。最近，台山市群众信访诉求综合服务中心（“信访超市”）15分钟调解一起租赁合同涉侨纠纷案件，为解决群众烦心事跑出“加速度”。据不完全统计，几年来江门各级侨联共处理来信来访3357件（次），涉及侨房权益、华侨回国定居、入学教育、困难救济等问题。

发挥参政议政职责。江门各级侨联做好参与协商和推荐人大归侨代表、提名侨界政协委员人选工作，协助归侨侨眷人大代表、侨界政协委员深入了解侨情民意，为他们协商议政、建言献策做好服务。据统计，江门市现有县级以上人大侨界代表62人、政协侨界委员153人。侨界的议案、提案对我市发展产生积极的正能量作用，近年来省政协委员、市人大代表林春晖在省、市层面提交《加强引进海外人才工作 助力江门创新发展》等建议提案近20件，其中《关于强化司徒美堂历史名人效应推进江门文化强市建设的建议》受到有关部门高度关注，推动了开平司徒美堂故居成功列入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依托参政议政平台发“侨声”服务侨胞，近几年市侨联办理省、市大代表建议、政协委员提案50多件，如针对高等学校国际学生招生工作调

整的新政策，江门市侨联通过全国人大代表、归侨冯玉宝在全国“两会”期间提出建议，得到有关部门迅速反馈。引导华侨华人参政议政，助推侨胞发展事业，近年来，江门市侨联配合市人大、市政协邀请20多个国家和港澳地区华侨华人125人列席江门市人大会议和市政协会议，激发海外侨胞为江门市发展建言献策的热情。

以人为本，解侨忧

近年来，江门市各级侨联设立“归侨侨眷困难救助基金”“救助站”“侨心助学基金会”“老人食堂”等，加大对困难归侨、侨眷的帮扶，开展精准扶贫，贴心为侨界群体服务，排忧解难，促进侨界大家庭的和谐。

以侨为桥服务乡村振兴。江门市侨联系统发动捐资捐物折合人民币共5.29亿元，捐赠项目1755个。做好“送温暖·献爱心”工作，走访重点侨户、贫困侨界群众2851户，发放慰问金436.79万元。2019年以来，市侨联拨转各市、区华侨事业费和贫困归侨扶贫救助补助资金475.1万元，帮扶特困归侨逾500人。开展

“百侨扶百村”工程，服务乡村振兴，筹集 30 万元资金支持归侨文化博物馆建设，支持“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牛江镇建设恩平拉美华侨华人展馆，打造乡村旅游精品线路。支持开平市水口镇沙冈侨联打造村史博物馆，展示传统历史文化，留住乡愁，以文化传承助力乡村振兴。筹集资金帮扶多户贫困归侨改建危房，发动爱心企业帮扶广西崇左市天等县、四川甘孜州的贫困村。做好社会帮扶工作，鼓励和支持侨青会开展公益活动，每季度开展“爱的抱抱”活动，资助一批患重病的归侨及其子弟渡过难关。

真心当好侨界群众的暖心人和贴心人。依托基层侨联组织和海外侨胞国内亲人，开展“大走访、大排查”，慰问海外侨胞亲属和侨界代表 100 多户，帮助解决签证续期、驾驶证换发、侨胞子女上学、房产纠纷等一批“急难愁盼”的问题。国内疫情暴发之后，台山籍美国华人梅先生一直留在江门，在美办理的银行卡又无法在国内提取现金，加上签证过期、年事已高不熟悉网上办事流程，梅先生心急如焚，不知如何才能购买机票返回美国。经江门市侨联工作人员 30 多次沟通协调，梅老先生获得中国签证延期并购买到返美机票，让梅老先生心里既踏实又温暖。针对高等学校国际学生招生工作调整的新政策，恩平 51 名高三级外籍学生不符合参加高考的条件，很多华侨家长心急如焚。江门、恩平两级侨联急侨界群众所急，多次举办外籍学生（高三级）报读国际教育本硕双学位培训项目线上宣讲交流会，协调了外籍学生报读国内院校，让侨胞充分感受到祖国和政府及侨联的关爱。此外，江门市侨联与各市（区）侨联积极推进身在国内的近 2000 名海外侨胞疫苗接种工作，广大海外侨胞纷纷点赞党和政府对他们的关爱。江门、鹤山两级侨联协调 56 名留在鹤山的智利侨胞子女入读公办学，解决困扰侨胞家长们长达数月的难题。为深入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江门市各

级侨联还开展“侨爱心·光明行”白内障复明公益活动，帮助 700 多名困难归侨、侨眷眼疾患者免费进行手术治疗。

深化改革，强根基

组织发展，覆盖全市。近年来，江门市各级侨联以群团改革和机构改革为契机，坚持问题导向，全力推动侨联改革，夯实工作基础。据不完全统计，江门全市有侨联组织 986 个，建立市、县（区、市）、镇街（华侨农场）、行政村（居委）、村小组五级侨联工作网络。全市有党建带侨建点 437 个、侨胞之家 246 个，在海外侨胞联谊交流、便民服务、侨情收集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加强侨联基础建设，建立侨情资源数据库，打造涉侨“一站式”服务平台，推进涉侨服务“指尖办”，建立线上线下融合的服务模式。

硕果累累，誉满海外。江门各级侨联用心用情服务海内外乡亲，搭起友谊之桥，筑梦湾区侨都，赢得侨胞赞誉和社会好评。江门市侨联荣获“全国侨联系统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集体”，恩平市侨联荣获“全国侨联系统先进集体”，开平市沙冈侨联荣获全国侨联系统优秀“侨胞之家”称号，江门市留学生联谊会、台山市侨联荣获“广东省侨界贡献奖”，其中 1 名侨联干部荣获“全国侨联系统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6 名侨联干部荣获“全国侨联系统先进个人”，4 名侨联干部荣获“广东省归侨侨眷先进个人”，等等。

“侨是江门的 DNA，是这座城市最鲜明的标签，打好‘侨牌’也是江门市侨联一直以来的工作重点。我们要不忘念侨情报侨恩，立足江门、面向全国、放眼世界，最大限度凝聚侨心、侨智、侨力，推动‘中国侨都’赋能升级，把江门打造成为新时代华侨经济文化合作示范区，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贡献侨界力量。”江门市侨联党组书记、主席林春晖说。



广东侨联工作

经济 科技 品牌

侨创
南粤

汇集侨资侨才侨智，凝聚侨情侨心侨力，共享机遇，共创多赢，服务经济建设，推进社会发展。





广东侨联工作

文化交流品牌

风韵
南粤

弘扬中华文化，支持海外传承，以文化人，以韵感人，
讲好美丽中国故事，助推人类共同发展。



广东侨联纪事

3月
March

文 《华夏》记者 林辅毫

3月3日至12日, 颜珂主席赴北京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 并拜访中国侨联和全国台联。

3月7日, 谢惠蓉副主席在广州参加2022年全省外事工作会议。

3月9日, 戴文威副主席在机关会见由玖源堂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长、暨南大学全球校友副会长陈焕辉率领的港澳及海外青年侨领研习班学员一行, 并举行座谈交流。

3月12日, 谢惠蓉副主席在广州参加孙中山先生逝世97周年纪念仪式。

3月12日, 戴文威副主席在广州参加全省传

达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暨全国“两会”精神干部大会。

3月24日, 谢惠蓉副主席带队到省财政厅交流沟通工作。

3月25日, 颜珂主席、谢惠蓉副主席在机关会见非洲广东总商会副会长候建雄一行, 并举行座谈交流。

3月29日, 颜珂主席在广州参加省委农村工作会议暨全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工作推进会。

3月30日, 林克风二级巡视员在机关出席2022年“亲情中华·为你讲故事”网上夏令营全球开营仪式。

4月
April

4月1日, 中国侨商投资(广东)大会组委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召开, 审议并通过《中国侨商投资(广东)大会筹备工作方案》。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组委会主任黄宁生主持会议并讲话, 中国侨联党组成员、副主席候选人、组委会主任连小敏出席会议并讲话。颜珂主席代表组委会办公室通报大会筹备进展情况。中国侨联经济科技部、中国侨商联合会及省直有关单位、各地级以上市负责同志以线上线下形式参加会议。

4月13日, 省政府副秘书长、省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局长杨鹏飞带队到省侨联调研涉侨政务服务及信息化建设工作。颜珂主席、戴文威副主席参加调研座谈。

4月15日, 颜珂主席、戴文威副主席在机关会见省侨联兼职副主席、省商务厅副厅长陈越华一行, 就筹办好中国侨商投资(广东)大会进行座谈

交流。

4月19日, 颜珂主席、谢惠蓉副主席带队赴省科协, 就推进中国侨商投资(广东)大会筹备工作进行沟通交流。

4月25日, 庄有林二级巡视员在广州参加省政府第五次廉政工作会议。

4月26日, 颜珂主席在广州参加省委民族工作会议暨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推进会。

4月26日, 省侨联领导班子召开巡视整改专题民主生活会, 紧扣省委巡视反馈问题和整改, 结合侨联工作实际进行对照检查, 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省纪委监委第四监督检查室、省纪委监委驻省委统战部纪检监察组派员莅会指导。颜珂主席主持会议, 戴文威、谢惠蓉副主席参加会议。

4月29日, 戴文威副主席在广州出席省直机关党员代表大会。

自梳女：一片冰心在玉堂

文 祥子（广东侨界作家联合会报告文学创作委员会主任）

“相逢彼此话沧桑，一片冰心在玉堂。不负春风来入梦，但凭明月去寻香。人生有酒须同醉，世事无情莫自忙。若问今宵何处好，清茶半盏对斜阳。”这首七律描述的情景很是适合迟暮之年的自梳女，对冰玉堂的自梳女来说更是契合心境。

自梳女

“一梳福，二梳寿，三梳静心，四梳平安，五梳自在，六梳金兰姐妹相爱，七梳大吉大利，八梳无难无灾。”一头青丝挽作云鬟，从此称作“自梳女”。在某种程度上，自梳女跟尼姑类似，尼姑出家是一种“出世”的逃避，要和凡尘俗世的一切断绝关系，而自梳女逃避的只是婚姻，要走出深闺，自立于社会。

中国古代封建礼法严苛，不少女性不甘受虐待，矢志不嫁，或与女伴相互扶持以终老。过去珠三角地区的未婚女子都梳着一条长辫子挂在背后，结婚时就将其挽起成为髻，这是从少女到少妇的一个仪式象征；选择不婚的女子则自行挽起长辫以示终身不嫁，被称为姑婆、姑太。

自梳女主要分布在东莞、中山和南海、番禺、顺德一带，以顺德数量为最。《顺德县志》记载，清末顺德蚕丝业发达，大批女子进入缫丝厂，由此获得经济独立，她们情愿终身不嫁，自梳女逐渐成为普遍现象。后来受世界经济危机影响，珠三角地区丝厂倒闭，无工可做的自梳女在亲戚朋友和水客的带领下香港、澳门，甚至远渡重洋

到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地谋生，她们大多成为佣人，也被称为“妈姐”。自梳女数十年如一日照顾主人、买菜做饭、搞卫生、带小孩。叶德娴与刘德华主演的电影《桃姐》，讲的就是自梳女佣人桃姐的故事，桃姐一辈子在主人家做保姆，没有自己的家庭，一生全部奉献给主人家。

在强调贞洁的年代，自梳女终生不得与男性亲近，一旦有违誓言，轻则被同辈唾弃，重则会被乡亲同族活埋猪笼。有的自梳女选择了一种折中的方法，那就是“不落家”，名义上跟男性结婚，但不会有夫妻之实。刘嘉玲和杨采妮主演的电影《自梳》中就有这样的情节。自梳女出嫁时，会穿好不易撕开的连体衣，并随身携带剪刀，让新郎不敢造次。之后自梳女以“回门”的理由离开夫家，虽然名义上还是夫家的媳妇，死后也可葬在夫家，但几乎不再与夫家联系。此外还有一种俗称“买门口”的方式，也能让她们过上自立的生活，即是付出一笔钱，找一位已去世的男性“嫁”了，做死者名义上的妻子，这样就不会再有人逼婚了。

几十年间，散落各处的自梳女逐渐形成一股沉着而向上的力量，为中国香港、澳门地区和新加坡等地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文化交流作出不为人知却影响深远的贡献。曾有自梳女在李光耀、陈嘉庚、包玉刚等名人家中工作，此后长期保存着良好联络，令这些叱咤风云的人物与逐渐长大的后代领略到中国女性独特的坚毅勇敢、

温柔体贴。其中最有名的是先后在陈嘉庚、李光耀家当保姆的欧阳焕燕，她的护照地址就是李光耀家。

欧阳焕燕十四岁时就跟着村中族人一起来到新加坡，当时她大姐已在陈嘉庚家中打工，她也随即进入陈家。从封闭古老的乡村来到现代时髦的大都市，淳朴善良的她只顾埋头干活，并不晓得这位和善的主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华侨领袖。后来，日军战火燃烧到新加坡，在大兵压境的紧迫时分，陈嘉庚将女儿托付给这对姐妹，可见她们深受主人信任。战争结束后，陈嘉庚一家人回到新加坡，极力邀请她们再回到陈家。此时欧阳焕燕已在隔壁的李家打工，这家的大公子就是后来出任新加坡总理的李光耀。欧阳焕燕在李家的时间长达40多年，不仅见证李光耀从普通律师到新加坡总理的历程，也照看李光耀的子女长大成人，可谓见惯世面、阅尽繁华。欧阳焕燕以顺德女性独有的温煦、慈爱、宽容熏陶着李氏姐弟，

数十年从未中断的交往折射出欧阳焕燕对他们深刻的影响，成为中外华侨历史上的一段佳话。

冰玉堂

漂泊在外的自梳女大多怀念故乡，希望能落叶归根，但是按照旧俗，自梳女回到家乡一般不能在家居住，特别是不得在家辞世，于是有的自梳女委托家乡亲人另建房子以便回来后居住，还有自梳女凑钱在家乡建房子，既作居住之地，又作聚会之所，通常叫“姑婆屋”。珠三角地区有很多地方都有类似的“姑婆屋”，在东莞常平就有三处“十姊妹”屋，分别取名为“义和堂”“如意堂”“成意堂”，成为自梳女最后的家。

在顺德均安镇沙头村，我见到了当地自梳女的家——冰玉堂。这是一幢古色古香、门楣绚丽的中外风格堂屋。中部天井的三个门楼分别写着“冰玉堂”“均明建筑”与“1950”字样，使用西





② 冰玉堂坐落在顺德均安镇沙头管理区，其建筑风格保留传统广府民居特色、融合南洋建筑元素

式拱券作门，底部全部以麻石板及红色方砖铺地。后院绿树苍翠，花卉齐放，鸟语花香，一派自然闲适的风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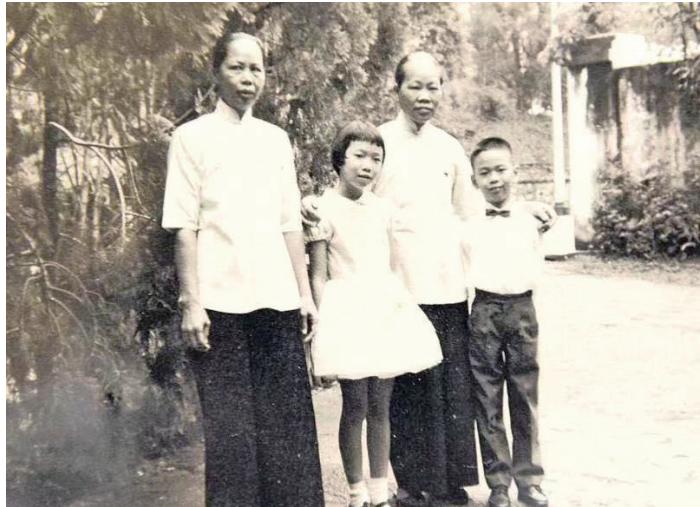
这是一栋两层高的建筑，一楼是自梳女聚会的厅堂和厨房，已故自梳女的灵位供奉在厅堂一处，二楼是自梳女的卧室，当年的床铺已经拆除，如今陈列着自梳女使用过的各式物件：昔日旧衣、手工艺品、赴南洋时用过的行李箱等，以及记录自梳女文化的相关史料，它们都是自梳女的岁月印记。冰玉堂融合南洋房舍的明丽轻快与岭南庭院的开阔舒朗，延续自梳女姐妹同居姑婆屋的古老风俗，融汇古老东方同乡会与现代西方俱乐部的建筑功能，是中西建筑文化的结合体。

1949年，新加坡均安沙头同乡会400多位自梳女和均安当地的100多位自梳女筹资8万港币，计划建一间自梳女的安老院。适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党号召各界大力“支前”，自梳女响应号召，将筹建安老院的款项借给了政府。翌年，政府归还款项，划出土地，协助建设安老院，于1951年落成，取名“冰玉堂”，乃冰清玉洁之意。因坐落在鹤岭山麓，又称“鹤岭静安舍”。冰玉堂建成以后，凡本乡旅外姐妹回到家乡，没有依托的均可入住，不收住宿费，最高峰时有三十多人同住，盛极一时。20世纪90年代末，一些自梳女辞世，一些自梳女被接回家中居住，冰玉堂便无人居住。但自梳女还是会时常在冰玉堂相聚，逢年过节她们也会聚在一起举办活动和展览自己的手工。

2012年，冰玉堂成为自梳女展览馆，是国内唯一集自梳女生活、交

流、灵位供奉、神明祭祀于一体的建筑实体，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冰玉堂展出近百年来与自梳女有关的各种用品、文献、图片，通过讲述自梳女产生的经济社会背景、自梳女的风俗、自梳女的故事等，在展示顺德自梳女起源兴盛、融入移民热潮、贡献文化交流、认识婚姻历史中起到独特而深远的作用，成为华侨历史文化展示与交流的重要场所。

冰玉堂既是均安自梳女的出发点，又是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自梳女的落脚处，是她们交流海外奇闻、回首沉浮经历、交换人生经验、追问人生价值、深化彼此情谊、寄托信仰的公共文化空间。自梳女是顺德近百年来华侨历史的重要见证者与参与者，其口述与回忆具有历史活化石的意义，更能可贵的是以冰玉堂为原点而衍生的华侨文化交流从未中断，它仍在延续与推动着中外文化交流，不断吸引着各地的研究者、参观者纷至沓来，通过文字、图片、媒体、研究，唤醒人们对那段历史的整体回忆，折射出冰玉堂独特的中西交流节点价值。



左图：自梳女使用过的藤篮

右图：自梳女欧阳焕燕姐妹在李光耀家帮佣，照顾他的儿女

冰玉堂的自梳女

七十多年过去，曾经居住在冰玉堂里的自梳女相继离去，人去楼空，姐妹金兰的欢声笑语已不复存在，只剩年纪最小的黄瑞云——她是冰玉堂的自梳女里曾经说后悔的那一个。

一个初春的午后，暖暖的阳光倾泻在冰玉堂的榕树上，留下斑驳的树影，黄瑞云悠闲地坐在树荫下，断断续续回忆起那段渐渐远去的历史。

几十年前，经水客介绍，19岁的黄瑞云从顺德前往香港。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黄瑞云奔波在香港、新加坡、顺德之间，最后回到顺德。由于长期从事搓洗衣物、擦窗抹地等繁重家务工作，她的拇指关节严重变形。如今，年逾90的黄瑞云因腿痛无法行走，只能坐在轮椅上，她用早年打工挣下的钱雇了一个保姆照顾自己。

黄瑞云小时候家里很穷，有十几张口要吃饭，当时没米饭吃，只能吃番薯。她父亲重男轻女的思想根深蒂固，特别疼爱家里的哥哥，让女儿去打工，但家产只留给儿子。在香港的六七年光景，黄瑞云给人当保姆，负责带“事头”（雇主）的四个

孩子。当年还没有正式“梳起”，只是“不想结婚”，到30岁才正式梳起不嫁。对于婚姻和感情，黄瑞云说，那个时候见到的男人不喜欢，整天想着做工，想着赚多点钱回家，后来慢慢老了就算了。

黄瑞云的姑妈也是自梳女，在新加坡做梳佣（专门给人梳头的佣人）。黄瑞云受姑妈的邀请去了新加坡，不识字的她只能做保姆。黄瑞云不忘家人，毫无保留地寄钱养家，因为父亲的偏见就赌气不给父亲，只给母亲。黄瑞云直到70岁才回乡养老，如今只身一人，靠早年积蓄和政府补贴生活。

黄瑞云谈到自己人生经历的时候，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平静和安宁，更是自信和骄傲。自梳女是封建社会环境夹缝中生长出的一片绿意盎然的新叶，是一种生存的信仰。

自梳女是一个时代的“符号”，在十年或者二十年之后，这个世界将不会再有自梳女的现实留存，她们会如同一股缥缈的炊烟，在茫茫的世界轻轻飘过，直到散去，再也不见一丝踪影，能留住她们的也就只有冰玉堂这样的姑婆屋了，这是她们灵魂的最终归宿，但愿冰玉堂永存。❸

第二届世界广东同乡联谊大会筹备始末

文 林干（广东省期刊协会侨刊乡讯专业委员会主任）

2002年12月3日，曾见证过许多重大的历史时刻的广州中山纪念堂又一次迎来盛事：第二届世界广东同乡联谊大会隆重开幕，来自60多个国家近3000名海外赤子欢聚一堂，畅叙乡情，共谋发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向大会发来贺信，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出席开幕式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全国政协副主席霍英东、叶选平、马万祺，广东省省长卢瑞华，国务院侨办主任郭东坡出席了大会。回到故乡的第二届世界广东同乡联谊大会以空前盛况成为海内外广东人团结互助、爱国爱乡的里程碑。

原广东省侨务办公室主任吕伟雄向笔者回顾了早期“世粤联会”筹备过程的点点滴滴。

2000年，吕伟雄从广东省旅游局调任广东省侨办主任，上任不久就听到了一个消息：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广东华侨社团想举办一个世界广东同乡恳亲大



⑦ 各国侨团代表进入会场

会，并于1999年就开始推动。遗憾的是，国内没有一个部门表示支持。

但吕伟雄觉得这是一件好事情。他在中山市工作多年，见证了改革开放之初华侨华人支持家乡建设发展的热情，体会到海外侨胞对“根”的赤子情怀。海外侨社也是靠这种乡情、亲情作为纽带维系发展。当时广东省有客属联谊会、潮人联谊会和广府人珠玑巷联谊会，但这些联谊会只是在国内活动，在国外还没有世界性的联谊活动，且都局限在自己民系群众中活动，没有体现广东人的群体优势。广东三大民系的侨胞有3000多万，如果能够有一个世界性的联谊恳亲平台，不论是对广东籍华侨华人的团结，对推动海外广东侨社的发展，巩固海外侨务工作的基础，还是争取侨心，发挥侨力资源，助力广东改革开放，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

吕伟雄重视这一活动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随着20世纪

八九十年代落实侨务政策、招商引资等浪潮过去之后，广东侨务工作刚好处于低潮期。刚好当时江泽民总书记到广东调研，提出广东要“走出去”。吕伟雄觉得侨务也应该从国内为主转向国外开拓，尤其要团结更多的海外侨胞，引导海外的侨社健康发展。他觉得世界广东同乡恳亲大会的想法非常符合江总书记对广东的要求，值得去做。于是，他联系马来西亚、新加坡的社团，邀请他们到广东汇报设想。

根据马来西亚、新加坡侨团最初的策划，大会名称是“世界广东同乡恳亲大会”，吕伟雄觉得“恳亲”有点狭隘，“联谊”涵义更广泛更深刻，而且“恳亲”大会只能在广东召开，如果是“联谊”大会，就可以在世界各地轮流举办，这样可以推动各地广东各侨社的团结，提高他们的声望。最终，“世界广东同乡联谊大会”（简称“世粤联会”）获得了大家的一致认可。

经过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广东会馆及广东省侨办的共同努力，世界广东同乡联谊大会筹委会于2000年7月在马来西亚吉隆坡成立。由11个国家的广东籍侨社发起的首届世粤联会于同年10月在新加坡召开，吕伟雄发动了广东三大民系的230人组团到新加坡参会。这是首次世界性的广东籍乡亲侨社的联谊盛会。

考虑到首届世粤联会需要在侨界有影响力的人团结世界各地的乡亲，吕伟雄提议黎子流为代表团团长。黎子流是顺德人，土生土长的广东干部，改革开放后历任顺德县委书记、江门市委书记、广州市市长，他善用侨力资源，带领顺德发展为“广东四小虎”，推动五邑大学、外海大桥、广州地铁等建设。他从侨乡走来，熟悉侨务，关爱侨胞，重视侨务工作，“在侨乡里面做干部，如果不熟悉侨务工作就不是好干部”。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后，他发起组织了广府人珠玑巷后裔联谊会，通过民间组织联系乡亲，团结侨胞，传承广府文化，吸引侨资支持广府地区发展。经广东

省委批准，黎子流成为广东代表团总团长，带领广东代表团到新加坡参会。为进一步推动世粤联会发展壮大，向世界广东乡亲展示广东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鼓励他们爱国爱乡，吸引他们到广东来和帮助广东“走出去”，吕伟雄提议第二届世粤联会在广州召开，并得到了相关部门的认可和批准。

—

从新加坡回来后，第二届世界广东同乡联谊大会筹委会在广州成立，筹委会主任由分管侨务的汤炳权副省长担任，吕伟雄是筹委会副主任，统战部、侨联、外经贸委、公安厅等多个部门以及各地级市十多个副市长为成员。通过各部门联动机制把侨务活动放在更广泛的层面，在“大侨务”的框架下，侨务部门不再是单打独斗了。

多年来，各侨务部门通过积极努力，联系了许多海外乡亲，但较多集中在东南亚、北美洲、南美洲、西欧等广东人集聚的区域，广东人较少的国家和地区则少有联系。另外，由于历史原因，许多广东籍百年传统侨社与国民党渊源较深，不少侨领是台湾“侨务委员会”海外理事。吕伟雄借世粤联会这股东风让省侨办和各地侨办联系接触更多海外乡亲，扩大和夯实侨务工作基础。他指示联络组加强与鲜少联系的国家和地区的侨社互动，请驻当地的中国领事馆协助联系邀请当地广东社团参会；没有建交的国家，通过有关社团出面联络发动。

从陈水扁上台后，台湾当局有意识地缩小海外华人的定义，只谈论“海外台湾人”。“侨务委员会委员长”张富美抛出“台侨”“侨生”“老侨”的华侨等级论，让海外华侨大为心寒。原先亲台湾的华侨华人纷纷抛弃原有立场，美加一些传统的“亲台”老侨团陆续悬挂起五星红旗。而大部分的“侨务委员”也不赞成台独，他们坚持一个中

国原则，反对“台独”，黄金泉等侨领更是在台湾有关会议上怒斥陈水扁当局的“台独”图谋。为争取他们参加世粤联会，让他们更真实了解祖国内地，了解中国共产党，促进中国和平统一事业，世粤联会专门向“亲台”以及在台湾的广东社团发出邀请，对方纷纷接受邀请，其中就有百年侨团台山宁阳总会馆。台山宁阳总会馆是美国旧金山市台山籍华侨社团，新中国成立后，从来没有派人或组团回过家乡。2002年，台山宁阳总会17位侨领第一次组团回来恳亲，且在他们的带动下，美国中华总会馆、安良工商会馆等其他“亲台”侨社都来了。这些社团返回住在国，积极宣传祖国和家乡的变化。为此，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专门发函表示：世粤年会的召开推动了很多美国“亲台”华侨社团的改变。

第二届世粤联会有3000多人参加，交通是

一个大问题。按礼仪，各国代表团团长和有威望的侨领接送应该用专车，据估算大约需要100台轿车。政府系统内没有这么多公务车可以调用，如果租赁，开支庞大。正当大家一筹莫展之时，吕伟雄提出新思路：发动社会力量支持。他把目光转向当时刚起步的广州本田汽车（以下简称“广本”）。广本是广州羊城汽车厂转型与日本本田汽车公司的合资企业。吕伟雄和广本洽谈，广本的领导当即表示愿意出100台全新小车及司机为大会服务。广本支持大会是有原因的：当年广州羊城汽车厂在海外开展业务得到了侨胞帮忙，所以他们愿意回报侨胞。这件事给吕伟雄很大启发：侨务部门不能关起门做侨务工作，应该利用广东侨乡千家万户都有涉侨关系的特点，构建社会“大侨务”网络，整合社会资源做好侨务工作。



⑦ 第二届世粤联会在广州召开

三

第二届世粤联会突出了“寻根、生根”的文化内涵。广东侨乡的村口大多有一棵大榕树，海外乡亲的故乡记忆和乡愁大都与榕树有关，所以大会的宣传册封面设计采用榕树的根须，以勾起与会代表的乡愁。

3000 多名与会代表分别入住 10 家酒店，如何举办欢迎宴会？经过研究，组委会做了一个方案：同一时间在 10 家酒店里面举行欢迎宴会接待所有与会的代表，广东省政府和广州市政府的领导分散出席，主会场由省长出席，各个分会场由副省长出席，广州市政府的领导也分散陪同，如此每一个会场都有省市领导在场，让与会代表都能感受到省政府和市政府对他们的尊重。在具体的安排上，组委会也别出心裁。来自客家地区的领导到客家社团，说潮州话的领导去潮州社团，讲广府话的领导到广府社团，同声同气，乡情满满。



⑦ 第一届世粤联会确定广州为第二届主办地，吕伟雄与广东省委统战部、省侨联领导一起代表第二届主办方接过会旗

宴会的菜式安排也很讲究，组委会找到了当时最擅长做粤菜的广州酒家的大厨，由他们设计经典的粤菜作为宴会指定菜式，再由广州酒家的厨师做老师，协助培训其他餐厅的厨师制作，做到“各厨同味”，希望到会的侨胞都能品尝到家乡味道。

大会开幕式前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大会预定在 12 月 3 日上午举行开幕式，准备出席开幕式的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原计划在 12 月 2 日晚抵达广州，但因为北京大雾，直到凌晨飞机都无法起飞。组委会启动紧急预案：将开幕式调整至 3 日下午，上午则组织来宾先参观“中华文化在五洲——世界华侨华人书画展”。3 日下午，钱副总理飞抵广州，直接从机场前往开幕式现场。一切顺利过渡，开幕式盛况空前。大会结束后，与会代表兵分七路，去广州、珠三角、梅州等七个地方恳亲。

第二届世粤联会的举办，收获满满——

一是让与会侨胞全面了解广东改革开放的成果。很多侨胞虽然认自己是广东人、中国人，但他们没有回来过，这次大会让他们有了以后“常回来看看”的念头。

二是让大量台湾社团和海外“亲台”社团回国，进一步扩大和平统一的力量。

三是令国内侨务部门和海外社团的联系更为密切，从而推动了广东省不少地区举办恳亲大会，如番禺、顺德、茂名等地更是从此形成了固定的恳亲大会。后来在世粤联会上的基础上还举办了“广东世界青年大会”，促进各国青年侨领的沟通和交流。

目前，世粤联会已经召开九届，虽然第十届会期受疫情影响未能如期举办，但世粤联会成为世界广东人的精神家园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独树一帜的朝鲜华侨组织

文 李天成（武汉大学历史学院项目研究员）

朝鲜华联会的诞生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朝鲜半岛南北分治局面出现，当时朝鲜半岛北部约有华侨6万余人。根据日本投降后苏联驻朝鲜当局的规定，朝鲜半岛北部地区华侨全部获得在朝鲜的永久居留权，同时保留中国国籍。新中国成立后，根据中朝两国的协商，朝鲜华侨自动拥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但并不拥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户籍。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朝鲜华侨进一步融入当地社会，部分朝鲜华侨放弃中国国籍。到70年代末，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部分朝鲜华侨开始陆续返回祖国。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朝鲜约有华侨华人5000余人，其中一半以上居住在首都平壤地区。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华侨联合会是二战以后朝鲜半岛北部地区华侨最为重要的社团组织。1946年12月，随着朝鲜半岛南北对峙局面的形成，为增进朝鲜半岛北部华侨的团结，以及为本地侨胞谋取更多福利和对华侨进行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以使华侨积极支援祖国东北解放战争，遵守朝鲜劳动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积极参与北朝鲜地区的社会经济建设，在中共东北局驻朝鲜办事处的提议下，经朝鲜劳动党同意，朝鲜半岛北部地区华侨决定在平壤成立北朝鲜华侨联合会。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议签订后，北朝鲜华侨联合会更名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华侨联合会（以下简称“朝鲜华联会”），沿用至今。

朝鲜华联会成立初期，接受朝鲜劳动党中央侨务委员会和中共东北局驻朝鲜办事处双重领导。新中国成立后，朝鲜华联会一度划归中国驻朝鲜大使馆直接领导。1958年，志愿军从朝鲜完成撤军后，朝鲜华联会改由朝鲜劳动党中央组织部统战科领导。朝鲜华联会总会位于朝鲜首都平壤，常设机构为中央委员会，下设组织、宣传、总务等部门。同时朝鲜华联会也在朝鲜各地设立地方组织，规模最盛时期，在朝鲜各地下辖10个道委员会，37个市、郡委员会，138个支部。

朝鲜华联会成立前后，正值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爆发期间。朝鲜华联会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主张，动员朝鲜华侨青年子弟回国参加解放军。朝鲜华联会还成立了专门的劳军委员会，广泛开展劳军支前运动，组织朝鲜华侨华为东北解放军捐款捐物，并组织慰问团返回东北。据不完全统计，解放战争期间，约有数百名朝鲜华侨子弟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朝鲜华联会还通过海陆运输为东北、山东解放区转运了大量伤员和弹药。此外，朝鲜华侨华人捐款捐物达到200万朝币，写慰问信数千封，为祖国解放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朝鲜华侨华人积极参加朝鲜人民军，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后，约数十名朝鲜华侨参加了志愿军。志愿军在朝作战期间，由于语言不通，地理不熟，许多华侨主动为志愿军充当翻译和向导，协助志愿军和人民军救助伤员，参与物资运输以及道路抢修等工作。经朝鲜华联会的组织、动员，朝鲜华侨华为志愿军和人民军捐款捐物。尤其在物资匮乏之时，朝鲜华侨及时捐献了大量的蔬菜，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中朝两国军队官兵的营养问题。

朝鲜华侨经济结构的变化

1950年至1953年朝鲜战争期间，朝鲜华侨经济上遭到了重大损失。停战协议签订后，在朝鲜政府和朝鲜劳动党的领导下，朝鲜华侨开启了经济生活的恢复与重建工作。朝鲜政府和劳动党向战争期间遭到较大损失的朝鲜华侨提供了相应的物质支援，并免费重建了在朝鲜战争时期遭受破坏的华侨住宅等。1955年，随着东北亚和朝鲜半岛局势的进一步稳定，在劳动党的领导下，朝鲜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经过社会主义改

造和发展后，朝鲜华侨经济上也形成了有别于世界其他地区华侨社会的特点。

在农业领域，1955年，朝鲜率先开始进行农业合作化改造，朝鲜华侨农民积极响应号召，踊跃参加农业合作社。到1958年3月，约有93.3%的朝鲜华侨成为农业合作社社员。随着农业合作社的发展，朝鲜华侨农民经济收入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升，多数此前较为贫困的华侨农民社员不但有了一定的存款，且生活水准已接近中农水平。1958年下半年，朝鲜政府为进一步促进农业经济发展，决定将农业生产合作社扩建为农业协作组合。此后，朝鲜华侨农民经济上完全被纳入国家计划体系。华侨农民在农业协作组合中，分得的粮食和现金较此前有了大幅度增长，部分华侨还在农业协作组合中担任了领导干部。

在工商业领域，战前朝鲜华侨主要以手工业者居多，华侨商人数量较少。1955年，朝鲜开启农业合作化以后，又对工商业进行了改造。根据朝鲜政府和劳动党的规定，朝鲜华侨中的手工业者联合组成了华侨生产合作社，华商则联合组成销售合作社、饮食业生产贩卖社，并逐步将之改造为国营商店。少数朝鲜华侨经营的有一定规模的工矿企业则逐步被并入国营工业体系，改组为各类协同组合。到1958年前后，朝鲜工商业改造完成后，朝鲜华侨手工业者、企业主基本转变为自食其力的华工，朝鲜华商合作社成员成为朝鲜国营商业部门的职工。

朝鲜华文教育的“本土化”

在朝鲜华联会的组织和推动下，朝鲜各地开始筹建华侨小学。1947年，为解决朝侨子弟升学的需要，由朝鲜华联会总会牵头在平壤筹建了朝鲜半岛北部地区第一所华侨中学。此后，

华侨相对集中的新义州也建立了华侨中学。这一时期，朝鲜的华侨小学、华侨中学主要由华联会负责领导、管理，办学经费主要由中共东北地方党组织和本地华侨予以支持，教师则由有一定文化的华侨担任，教材采用了东北解放区相关教育行政机关审定的教材。到1949年初，朝鲜北部约有华侨小学50余所，学生3000余名，教师150余名。朝鲜华联会还先后举办了各类教师短期培训班，提高师资水平，提升朝鲜华侨教育的质量。

1949年3月，朝鲜中央教育省在普通教育局内设立中国教育部，在各道增设“中国人教育视学”，开始直接领导、管理朝鲜各类华文学校。此后朝鲜华文学校的办学经费、校政建设、师资配备等完全由朝鲜政府负责，华侨教职员享受与朝鲜本土教职员同等待遇。朝鲜华侨中学则更名为“中国人中学”，华侨小学更名为“中国人人民学校”。学校课程、教材基本不变，但增加朝鲜语课时。同时为保证学校教育质量，朝鲜教育行政部门另在“中国人中学”中设立“中国人教员养成所”。朝鲜政府接管本地华文学校后，朝鲜华文教育步入正规化进程。到1950年初，朝鲜战争爆发前，朝鲜地区约有“中国人人民学校”101所，“中国人中学”2所，师生7000余人。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除少数学校迁往乡下，平壤“中国人中学”师生转移到沈阳东北实验中学坚持办学外，朝鲜地区多数华文学校被迫停办。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议签订后，朝鲜华文学校开始恢复办学。由于抗美援朝期间中朝人民间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因而战后，朝鲜政府和人民对本地华文学校给予了极大的支持。1955年，随着朝鲜国内各方面条件的好转，在朝鲜政府的支持下，华联会

在平壤创办了“中国人高级中学”，设高中班5个。同时，为解决朝鲜各华文学校的师资问题，1956年，“中国人高级中学”又设立了“中国人函授师范学校”，专门培养各级华文学校教师。到1961年前后，朝鲜各地有“中国人人民学校”53所，“中国人中学”3所，“中国人高级中学”1所，师生近8000余人。从这一时期朝鲜各级华文学校的办学环境来看，其各方面条件都远胜过朝鲜本地学校，朝鲜的华文教育事业进入了“黄金时期”。

进入20世纪60年代，随着中朝关系的变化，以及朝鲜地区华侨进一步融入当地社会，朝鲜政府进一步加强了对朝鲜华文学校的管理。1963年8月，根据朝鲜政府决定，朝鲜各华文学校校长需由朝鲜人担任，学校一律改用朝鲜教育省编印的朝文教材，并用朝鲜语授课，同时保留中文课，但课时量受到一定的限制。此后，随着朝鲜华侨人数大规模缩减，华联会决定将部分师资、生源有限的华文学校合并办学，朝鲜政府也鼓励华侨子弟进入朝鲜学校就读。到70年代中期，朝鲜华文学校学制完全改同朝鲜学制，仅保留中文课程，以区别于普通朝鲜学校。学校所使用的中文教材，绝大部分内容也翻译自朝鲜课本。自此，朝鲜华文教育彻底完成其本地化进程，有机地融入朝鲜本国教育体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受朝鲜内外相对特殊的政治社会环境，以及中国共产党与朝鲜劳动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之间较为特殊的双边关系的影响，这使得无论朝鲜华侨社会经济结构、华人社团抑或华文教育都经历了较之世界其他地区华侨群体大相径庭的发展变迁历史，也形成了其独树一帜的侨情特点，值得进一步留意和关注。●

一战期间“东线华工”人数探究

文 胡温旭

历史上，人们将“服务于法国战场”的华工统称“西线华工”，而“沙俄招募的华工散布服务于俄罗斯及远东各地”，统称“东线华工”。就国内外学界对一战时期华工问题的研究情况而言，学者们对“西线华工”的研究明显比“东线华工”的研究要深入得多。以台北陈三井、香港徐国琦为代表，学界对“西线华工”的历史始有比较系统的研究。而“东线华工”史的研究在相当长时期内都局限于“华工参与十月革命”及其相关问题，缺乏比较系统的研究。这里面，除了意识形态问题的影响外，主要是语言和资料的限制所致。

一战期间“东线华工”的实际人数究竟有多

少？因一战时期俄国华工的招工黑幕重重，导致当时中国政府各级机构没有完备的华工名单，也致使承担华工运输的中东路局亦无法提供准确全面的华工数据。基于以上因素，学界、政界从无一致看法，众说纷纭。

笔者为此翻阅了大量史料，发现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的阿·格·拉林（Александр Георгиевич Ларин）所用数据来自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Архив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比较可靠。因此，笔者以此数据为基础，经过梳理中、俄文史料，将各类文章和资料中的相关数据列表统计如下（表4-1）：

表4-1：学界政界有关一战时期俄国招募华工数据歧说表

序号	一战东线华工数据歧说举例	具体表述	备注
1	李长傅《中国殖民史》，3万人	“俄国人所招者计三万人” “1916年在东三省之中俄边界及天津山海关招募苦力约三万人”	
2	(苏)И. А.波波夫《华工在沙俄》，49272人	“1916年，就有49272名华工被运入俄国”	同时又记述：俄国计至少雇佣15万华工

序号	一战东线华工数据歧说举例	具体表述	备注
3	1917年2月15日驻俄公使刘镜人函《中俄关系史料·俄政变与一般交涉》，6—7万人	“华工踪迹，遍布欧俄各省，闻其数已达六七万”	
4	(苏)И.А.波波夫《俄国内战中的中国无产者》，8万人 1917年12月31日“参谋部函”《中俄关系史料·俄政变与一般交涉》	“根据《中国公民联合会》的资料来看，从1915年到1917年秋天，有将近8万人流亡到俄国” 哈尔滨谍报员报告：赴俄华工“共计三十余次，约不下八万余名” (此系由铁路公司注册查知)	波波夫同时重复：1916年，单单由中东铁路就运送了将近5万人到俄国欧洲部分
5	1917年12月17日“中华旅俄联合会函”10余万 1917年11月12日“驻俄罗斯使馆咨呈”10万余人	“查俄国自上年夏间迄今，招来华工，其数已逾十万” “我国在欧俄之工商，已达十余万人”	数据为北洋政府所用 此处言“工商”亦当指“华工”
6	(苏)И.А.波波夫《华工在沙俄》，15万人 李永昌《旅俄华工与十月革命》，15万人	“在整个对德作战期间，总共动用了不少于15万华工在俄国欧洲部分服劳役” “仅在大战期间被拐卖到俄国的中国苦力就有15万人”	此人的数据相当混乱
7	A.Г.拉林《中国移民在俄罗斯：历史与现状》，159972人	“自1915年1月至1917年4月，铁路运送159972名中国工人”	
8	陆徵祥《总长（陆徵祥）晤比麦（叶）使问答》，20万人 (苏)Г.诺沃格鲁茨基、A.杜纳耶夫斯基《中国战士同志》，20万人	“麦使云：旅俄华侨若干？总长云：约有二十万人”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运往俄国的中国劳工不下二十万”	

序号	一战东线华工数据歧说举例	具体表述	备注
9	黑龙江省志, 278903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几年间, 经黑龙江地区各口岸出境的华工, 其中1915年为85495人, 1916年为99957人, 1917年为93451人”	
10	中华旅俄联合会, 40万	“查我国侨工在欧西俄统计四十 余万”	数据为北洋 政府所用
11	华侨华人百科全书, 45万人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仅在 欧俄的华工就不少于15万人, 如 果加上远东的华工, 其综述当不 下45万人”	
12	山东省志, 50万人 德驻华公使《欧战华工史料》, 50万人	“当时在俄国的华工共50万人, 其中山东人约44万” “风闻俄国政府拟再募华工五十 余名”	此处为德公 使造谣, 北 洋政府外交 部言“本部 尚无所闻”

根据上述数据表, 学界、政界对一战时期“东线华工”的数据大致存在12种说法。笔者尝试抽丝剥茧地分析, 寻找更接近于史实的说法。

这里分析的是“一战时期东线华工”的数据, 即需要同时满足两个基本条件: 一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 这是时间条件。一战时期的“东线华工”只是俄国整个华工史(自17世纪下半叶迄今)的一部分, 只是指1915年—1918年这段时间, 此前或此后前往俄国的华工不在其内。二是专指战时招募到“贝加尔湖以西”“欧俄地区劳作的华工”(战区除外), 而非俄国其他地区的华工, 并不包括俄国远东地区的“华工”。一战时期俄国招募华工主要是服役于欧俄地区, 而非远东地区。所以, 战时俄国不但在中国境内招募华工, 还在俄国远东地区如海参崴地区招募滞留俄境的

华工前往欧俄地区服役。如果招募的华工可以在远东劳作, 又何必多此一举? 而上述表格中最后四项(即第9、10、11、12)的数据要么将华工与其他旅客混为一谈(第9项), 要么包括俄国远东地区的华工, 故均不合乎条件。

上述表格中前五项也可以排除。因为这些数据明显都属于某个时间段(如1916年至1917年, 此前此后的数据都被忽略)的数据, 不是整个一战期间俄国招募的华工数据, 自可忽略不计。有意思的是, 尽管我们不能采用这些数据, 但不得不说, 绝大多数数据都能在档案资料中找到痕迹。如李长傅的数据, 就可能来自1916年6月20日的“收德使函”; 第3项数据即6—7万主要是1916年—1917年的数据, 与中东路局同期的数据记录基本相符(见表4-2):

**表4-2：经哈尔滨发往俄国铁路、企业和组织华工人数表
(1916年1月1日—1917年9月1日)**

序号	企业或机构名称	人数
1	野战工程管理局 (Полевое строитель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17053
2	尼古拉耶夫斯克铁路 (Николаевская железная дорога)	116
3	北方铁路 (Северные железные дороги)	2164
4	摩尔曼斯克铁路 (Мурманскaya железная дорога)	9133
5	莫斯科-温达沃-里宾斯克铁路 (Московско-Виндаво-Рыбинская железная дорога)	6358
6	神学矿区 (Богословский горный округ)	4323
7	科洛缅铜矿 (Коломенский медный рудник)	176
8	纳杰日金工厂 (Надеждинский завод)	422
9	下塔季里工厂 (Нижнетагильский завод)	177
10	彼得罗马里耶夫斯克和瓦尔瓦罗波利斯克矿场 (Петромарийские и Варваропольские копи)	677
11	诺沃西利采夫矿业协会 (Новосильцевское горнопромышленное общество)	90
12	马里乌波尔冶金协会 (Мариупольское металлургиче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	172
13	库利金工场 (Кульгинская мануфактура)	54
14	图林圣-多纳多林场 (Туринская фабричная дача Сан-Донато)	401
15	乌斯文林业管理局 (Усвийское лесничество)	444
16	科利丘金铁路 (Кольчугинская железная дорога)	68
17	阿拉帕耶夫斯克工厂 (Алапаевские заводы)	848
18	阿巴梅列克-拉扎列夫公爵煤矿 (Угольные копи кн. Абамелек-Лазарева)	2046
19	库拉廷麻纺厂 (Куратинская джутовая мануфактура)	62

序号	企业或机构名称	人数
20	全俄城乡建设公司（Всероссийск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земских и городских строительных партий）	6397
21	黑海铁路（Черноморская железная дорога）	2151
22	特维尔自治市（Тверь-Городское самоуправление）	34
23	顿涅茨克-格鲁舍夫股份公司（Донецко-Грушевское акционерное общество）	118
24	马里佐夫工厂联盟（Общество Мальцовских заводов）	193
25	尼古拉-帕夫季矿区（Николае-Павдинский горный округ）	433
26	沃尔霍沃-雷宾铁路（Волхово-Рыбинская железная дорога）	95
27	特拉比祖德铁路（Трапезундская железная дорога）	66
28	莫斯科喀山铁路（Московско-Казанская железная дорога）	435
29	雅罗斯拉夫汽车厂（Ярославский автомобильный завод）	60
30	滨海铁路（Приморская железная дорога）	322
31	南俄罗斯石炭业（Южно-Русская каменноугольная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ь）	314
32	新托尔然糖厂（Новотолжанский сахарный завод）	540
33	克什特姆矿厂（Кыштымские горные заводы）	178
34	上伊谢特矿厂（Верх-Исетские горные заводы）	712
35	沃罗涅日城市议会（Воронежская городская управа）	174
36	卡姆股份公司（Камское акционерное общество）	509
37	中东路局报告中无法确定作何营生的人数（Перевезено для обслуживания нужд, точно не определенных в донесениях управления КВЖД）	9608
总计		67121

但是，这个表格的数据不包括1915年的数据，也不包括1917年9月以后的数据。很显然，这是一个有很大遗漏的数据。

至于表4-1中第4项，即“参谋部函”所云“不下于八万余名”的统计时间也只到1917年年底。同样，该数据也能在档案资料中找到痕迹。下面是根据陈三井等编《欧战华工史料》

《黑龙江省志》等资料中所出现的俄招华工数据，编成“1914—1917年俄国招募华工数据表”（见表4-3），数目为80853（87353-6500）人，与此基本符合（其中，第1、2两项数据计6500余人发生在一战爆发之前，不应该算作一战时期俄招华工数据，但却是一战时期俄国私招华工的滥觞，故罗列于此）。

表4-3：1914—1917年俄国招募华工数据表

序号	招工企业和工头名称	计划招工人数
1	1914年由富亚公司在哈尔滨招募华工进入俄国乌拉尔地区的彼尔姆省阿拉白耶夫斯克矿区做工	2500
2	1914年哈尔滨天成茶庄和商人张波漾，代莫斯科一铁路工程招募华工	4000
3	1915年6月，俄人克里洛夫、德利金与奉天商人贵鼎三联合招工	11200
4	1915年11月，奉天商人何国忠与俄国阿拉白也夫四克工厂在哈尔滨招工	1203
5	1916年4月，俄国基习尔煤矿招募华工	3000
6	1916年5月，俄国采办处代表达聂尔与长春华商义成公司招工	20000
7	1916年5月，俄国北部布宜丹尼洛甫铁路工程专员祝卜陈司克与山东工头王子兰、温和订立招工合同	2000
8	1916年6月，俄国政府委员聂耳泥何夫斯基与德利金与华人闾芝齐签订招工合同	5000
9	1916年6月，莫斯科洼文连倭雷平斯基铁路公司铁路工程师拉夫连节夫与华商张宝馨、吕泰订立合同	4000
10	1916年6月，山东包工头、杨嵩与俄国那结日金铁工厂在哈尔滨订立招工合同	1000

序号	招工企业和工头名称	计划招工人数
11	1916年6月，王同文与俄国教会炼铁公司招工	2000
12	1916年6月，直隶包工头王作林与俄国招工代表郭焦里尼国夫订立招工合同	2000
13	1916年6月，山东黄县人遇绍久与俄国阿母耳铁路工程局技师特罗申在哈尔滨订立招工合同	2100
14	1916年6月，俄国卫耳西谢特矿工厂工程师杂哈尔与沈阳商人席静庵签订招工合同	1600
15	1916年7月，俄国教会炼矿公司代表坡诺索夫与何果忠订立招工合同	3000
16	1916年7月，拉夫连节也夫与华商张宝髯、吕泰订立招工合同	1500
17	1916年8月，华人任晋三与俄国矿务局订立招工合同	3000
18	1916年8月，何果忠与阿拉白也夫工厂代表签署招工合同	1500
19	1916年9月，福通公司在天津招工	3000
20	1916年10月，德利金在浦口招募华工赴乌拉尔山区	3000
21	1917年7月，郭焦里尼国夫与奉天包工人签署招工合同	10000
22	1916年9月，俄国以三年为期招募开滦煤矿工人赴俄国一些地方煤矿做苦工	600
23	有迹可循的招工，暂不确定招工地点时间：俄人克洛潤夫招工、华人韩春义招工、俄人司作夫招工、华人穆旭九招工	4000
总计		87353

至于表 4-1 中第 5 页中华旅俄联合会的数据“十万”大概是什么依据的。当时，他们创立“中华旅俄联合会”后，一度准备调查欧俄地区的华工数据，副会长刘雯牵头负责调查事宜。

但是，“四月有余，终未能达到本会大调查俄国各处所有华工之目的”。既然未能调查清楚，那何来“十万”确数？很显然，这个数据是走访之后的预估数据而已，并不准确。而驻俄使馆亦没

有实地调查，同样是类似预估的数据。

比较接近一战时期“东线华工”实际数据的是中间三项数据。尤其是第7项数据159972人，拉林引自俄罗斯对外政策档案馆的档案：全宗第148“太平洋部(тихоокеанский стол)”(1799—1922)、目录487(Оп.487)、案卷1060(Д.1060)，主要汇集了有关1897—1917年间有关中国人的档案资料。里面有三处地方(第157页、第192页、第331页)提到1915年1月至1917年4月经过中东路局运到欧俄地区的华工数据。该数据所辖时间段比较长，比较详实可靠，可以作为对一战时期俄国华工数据推测的基础。在此基础上，笔者综合其他资料，对一战时期(1914—1918)东线华工数据做一个比较合理的推测：

1. 拉林数据的时间段为1915年1月至1917年4月，那么，很显然，并不包括1917年4月以后的华工数目。有资料表明，直到1919年年初，黑龙江督军鲍贵卿还报告“近有俄人拟招华工千五百名，变装分运北上”。1917年4月以后，东线华工还在断断续续地继续，应该还有一定数量的华工并未统计进去。

2. 拉林的数据尽管很具体，精确到了个位，但与所有类似数据一样，都来自中东路局的记录。而中东路局的数据往往遗漏颇多。如表4-2中前往摩尔曼斯克修筑铁路的华工人数为9133人，但同时还有其他同源数据存在：有的数据为9246人；还有数据显示：仅仅到1916年中叶，就有4万契约华工经中东路运到摩尔曼斯克；1917年4月7日，到俄国考察的中国使团报告说，他们在摩尔曼斯克看到有修铁路的华工12000名，还有数千名已经死亡。这几份数据之间的差距就达3万人。表4-2第8项“纳杰日金工厂雇佣华工422人”，但波波夫(Н.А.Попов)引用的数据却为“近2000人”，差距达1578人；第18项“阿巴拉列克—拉扎列夫”雇佣华工2046名，但波波夫却说“有将近5000华工”，差距达2954人；

另“彼得格勒将近5000华工”，各类资料均失载。综合而言，这些数据的差距加起来达4万多人。

3. 拉林数据主要属于三类合法的私招，所以，中东路局才留下记录。但是，还有很多非法私招的华工。这些华工手里没有中国政府签发的护照(只有当地俄罗斯领事馆出具的证明)，中东路局不会登记留册。这种“黑”华工不在少数，经常被北洋政府边境检察机关查处。由于当时中俄边境口岸管理松懈，这种非法私招人数当不在少数。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滥招。即实际招收人数远超正规合同所规定的人数。如“长春义成公司与俄人达聂尔招募华工赴俄司木林司基省境包砍木柴一案查其章程订定诚属完密，惟其招工手续实有疑窦颇多，第一条原载明每月招募五千名，四个月为限，共募工人两万名。现查该公司派出招工者计有十五处之多，闻每处拟招之数目均在数千名左右，倘一律招齐，超过原定数目不啻数倍”。关键是：这些滥招的华工极有可能转化为非法私招，从而进一步加剧了确定华工准确数据的困难。

综上所述，以拉林的数据为基础，加上可能的最大限度的统计数据差额约4万人，一战时期奔赴欧俄地区的“东线华工”合理数据当为：

[$159972 - (159972 + 40000 \approx 200000)$]人，即16—20万之间，绝对多于16万。至于上限，根据一份俄文档案：当时中东铁路局限于铁路运输的条件和当时雇用华工本身遇到的困难，曾向俄国政府报告：不太可能将超过20万的华工运到欧俄地区。所以，数据的上限应该为20万人。这与表4-1中第8项数据一致。据此，笔者可以推断：一战时期俄国招募华工赴欧俄地区工作的人数应该在16—20万人之间，相对而言，数量多于一战时期英法所招募14万华工人数。●

[作者系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歌舞剧《百年侨心》：此岸、彼岸，爱、精神

文 李宏新（广东历史学会常务理事）

《百年侨心》是一部气势恢弘的史诗级歌舞剧，也是一部不乏哲理的爱国主义佳构乐章。我原本以为它仅仅是应景之作，未料其如此扣人心弦，每一念起仍“意惹情牵”。

此岸、彼岸

《百年侨心》的时代背景跨越清末、抗战时期至新中国成立，通过一条主线和数条副线交相辉映，推进剧情发展，揭示出身处时代变局中个体的迷惘与抉择，蜕化与升华。

剧中主线由主角“官商二代”陈钱铭、“批商二代”赵嘉华和大家闺秀方慧竹贯穿发展。他们有着三方情感纠葛：陈钱铭对方慧竹情有独钟；方慧竹在舞会上结识赵嘉华，受赵嘉华“要改变国家，首先得改变自己”等进步思想的影响，互生爱意而成为一对革命情侣；辛亥革命前夕，陈钱铭包船只下南洋，方慧竹假装同意与陈钱铭成亲，意图带被追捕的赵嘉华一起出海，面对陈钱铭的不理解乃至鄙夷嫌弃，方慧竹、赵嘉华两人毅然下船，离开码头。

陈钱铭身处彼岸（南洋），赵嘉华身处此岸（大陆），令两者产生联系的是方慧竹（一直在汕头原点）——如此安排本身便耐人寻味。倘若时局平静，陈钱铭、赵嘉华可能自码头不欢而散便不再交集，然而，鳌掷鲸吞的时代洪流终令他们并肩同行。

两者缓解矛盾的转折点在于清政权灭亡。陈钱铭获悉消息后，从痛苦纠结到毅然决绝地剪下

辫子，宣告了自己告别旧世界获得新生，其间的歌舞演绎“辫子”一咏三叹，将这个旧朝代官宦子弟的心理转化过程体现得淋漓尽致。

两者冰释前嫌的一幕出现于抗战时期。陈钱铭亲历家破国亡，意识到个人恩怨不值一提，遂献赎金，委托方慧竹出面成功营救出遭日伪囚禁的赵嘉华，三人在“我们的战斗，至死不休”歌声中立下盟誓，胜利后一起建设新中国。

新中国成立。功成之日，陈钱铭却未能赴约，他因宣扬抗战惨遭暗杀！这一事件是有故事原型的——“首位为国牺牲的抗战侨领”蚁光炎和抗战胜利时遭致命冷枪的侨领陈守明；也可以说陈钱铭赴约了，千千万万侨胞践行了他的诺言——尽管他不在，但“此岸”所得军需善款一直源源不绝。

回首全剧，历经“清廷缉捕革命党”“侨领筹募救国救灾”“壮士断腕拆毁潮汕铁路”“誓死抗争自焚抽纱厂”“前赴后继力保红色生命线”，当陈钱铭幡然醒悟，高声宣誓“海上日月，殊途同归”时，儿女情长已彻底融进家国大义之中了。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修我甲衣，与子同行！陈钱铭在“彼岸”海外各处筹募财物、发动宣传，赵嘉华于“此岸”大陆前线浴血奋战、誓死不休，而方慧竹则在原点“侨胞的精神家园”汕头小公园与敌周旋，沟通着彼岸和此岸，力保红色革命生命线畅通。

“此岸连通着彼岸，原来彼岸就在此岸”，此岸、彼岸都蕴涵于爱与精神中。

爱、精神

《百年侨心》的几个副线从不同的侧面丰富内涵，与主线相得益彰，处处体现潮汕儿女的爱与精神。

潮汕姿娘的形象令人难忘。譬如渔家女阿梅重情守望，殊不知恋人阿信舍身救人、勇斗海盗，逝于首次下南洋船上，该场景的背景音乐恰到好处地烘托出辞别时刻的辛酸场景，这首以民谣《过番歌》谱曲的作品接近传统潮乐“轻六调”，其词曲合弦，节律合理，是近年少见的潮语歌曲佳作。又如富家妇人陈母大义凛然，为避免“让他们（日寇）拿啃我们骨头的钱杀我们中国人”，将自家抽纱厂付诸一炬，并自焚于火海。再如一众抽纱厂女工，尽管在日伪枪口下惊慌失措，但为了掩护受伤“青抗会”队员，仍坚持守口如瓶。这些，都从柔、刚两方面塑造出潮汕姿娘的精神：小爱为亲人为家，大爱为乡邦为国。

侨批业者的形象令人肃然起敬。批局老板赵君生是本分的儒雅潮商，由明哲保身发展到立定决心“今后不再逃避”，一以贯之的是绵延千载

的潮商基因：勤勉敬业、重义守信。勇仔以及数幕蒙太奇手法出现的批脚，均有着勇仔引以为傲的执念：“潮汕人做事，一个义字重千金！”也正因此，这个散布于海内外的族群才能以机智谨慎和碧血丹心铸就“红色革命生命线”（其历史原型应是糅合了汕头红色交通站和侨批东兴汇路），才有了列入“世界记忆遗产”、凸显中国精神的潮汕侨批。

历史人物的点缀真实重现潮汕人的家国情怀。中国电影泰斗级人物蔡楚生（袁兴浩饰）以“过场”形式出场，既连接前后情节，也展示出民国汕头埠的繁华景象。蔡楚生心怀桑梓，尤其关注、帮助发展潮汕戏剧艺术，曾将《迷途的羔羊》交由戏班改编为潮剧，又修改《芦林会》剧本、指导《荔镜记》拍摄等，还多次发表经典剧评、文章，为潮汕文化鼓与呼。粤东民族工业的主要开拓者高绳之并没有出场，但从对白中可知，正是他委托方慧竹帮助赵嘉华的。高绳之一生支持民主革命事业，赞助了庚子惠州之役、丁未黄冈起义等多个革命活动。

反面人物的烘托令正面形象益显凸出。龚老



② 图①②为剧照 赵秋来/摄

九是一个嗜财如命的投机分子，他先后充当清廷鹰犬、日伪爪牙，与进步力量为敌，又首鼠两端，受贿放人仍企图实施灭口，公德私德一无是处。包括歌舞“Money Money”在内，大量舞台语言将其丑陋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而与众多正面人物形成鲜明对比。龚老九最终在群情汹涌中被推下惊涛骇浪，这也许暗示着，缺失爱、精神者根本不配拥有“此岸、彼岸”，其归宿只能是沉沦苦海。

华侨一个最重要的特点

习近平总书记在汕头小公园视察时指出：“华侨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爱国、爱乡、爱自己的家人。这就是中国人、中国文化、中国人的精神、中国心。”

这在《百年侨心》中得到很好的解读。

剧中的侨领陈钱铭一直对乡邦故土深怀感情。他在尚未充分认识革命事业时，便已慷慨解囊，捐款帮助被风灾摧毁的韩山师范学院复校，因为“非振兴教育，不足以立国”；当思想转变之后，他团结侨胞，重组南洋爱国华侨联合

会，不遗余力地支持革命事业。

剧中众多华侨华人尽管在大陆政权更迭时有所恍惚（例如清政权灭亡时的议论纷纷），但在大是大非面前从未有过丝毫疑虑（例如抗战时期的同仇敌忾），“大难兴邦需大爱”激励着他们集腋成裘，持续不断地捐出善款和军需物资，越洋参战者屡见不鲜。

考诸史实，除了上文提及的高绳之、蚁光炎、陈守明之外，还有太多留名或未留名的潮汕侨胞同样功勋卓著：辛亥革命时期，林义顺、林受之、许雪秋、张永福、陈美堂等一大批进步者为革命事业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抗日战争时期，陈振贤、杨缵文、廖公圃、余子亮、陈景川等不计其数的爱国人士奋起救国，不少人奔赴前线，仅计在延安工作的干部便达42名，占广东籍主要归侨干部总数的41.5%；解放战争时期至新中国成立初期，蚁美厚、杜国庠、伍治之、黄声、蔡楚吟等大量革命者在各条战线参与斗争、建设新中国，而活跃于闽、粤、琼数省以及随大军南下的解放军队伍中，更不乏具有长期海外生活背景的归国青年。

可以说，近代以来，中国历次革命事业都有着潮汕侨胞的不朽贡献，历次大型灾害都有着潮汕侨胞的慷慨解囊。在各个时期，潮汕侨胞参与潮汕家乡建设、参与祖籍国的建设，从未缺席，于今犹是。“利万世者，莫非教育，捐资兴学，善莫大焉”，仅以教育领域为例，自改革开放前夕至2018年年末，在汕头捐资兴学的侨胞便达10万人次以上，估算总金额人民币99.6亿元。

这些，莫不是“华侨一个最重要的特点”的阐释，而这当然并非潮汕独有，广大侨胞皆如此。让更多的海内外观众感受这个重要特点，体会“侨心”，并将之化为新时代前行的力量，想来是《百年侨心》创演团队的愿景。●



刘南威：半世纪的南海情

文 《华夏》记者 赵阳欢



② 刘南威赴中国台湾参加学术会议，在世界首座北回归线标志旁留影

日常生活中，我们常用“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来形容一个人知识的广博，而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授、中国南海诸岛地名研究领域专家刘南威，正是这样一个对天文和地理都有所研究的人。

1931年，刘南威出生于广州，聪敏好学的他于1950年考入了广东省立文理学院地理系，两年后，广东省立文理学院地理系并入中山大学地理系。大学毕业后，刘南威被分配至华南师范学院（1982年更名为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系任教，担任地理学家曾昭璇的助教。半年后，由于表现突出，他开始独立授课。

初探南海诸岛

1971年，商务印书馆向华南师范学院地理系约稿，请他们编写一本关于南海诸岛的书。这个任务落在了刘南威和吴郁文两位老师身上。当时关于南海诸岛的资料很少，因此1971年末，刘南威和吴郁文一起赴海南岛清澜港实地调研。

南海诸岛是南海的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的总称。它由200多个大小不等，露出水面或潜伏水中，主要由珊瑚礁体构成的岛屿、沙洲、暗礁、暗沙和暗滩组成。1971年，西沙群岛最大的岛是永兴岛，面积仅1.85平方公里。在文昌县调研时，刘南威和吴郁文得知将有

一艘机帆船前往永兴岛，可以带上他们俩一起登岛。但他们被告知，航行过程中可能会有美军飞机从越南岘港飞来侦查。“他们说有一定危险，问我们去不去？我们说机会难得，去！”当时刘南威和吴郁文登岛的决心很坚定。

刘南威说，海南岛渔民根据分布形势，将西沙群岛分为东、西二群，认为它们分别有岛礁洲7座和8座。渔民从海南岛到西沙作业，一般先到东群，后到西群，因此称东群（宣德群岛）为上七屿，西群（永乐群岛）为下八岛。刘南威和吴郁文登船后，在一望无际的大海上航行了20多个小时。由于当时永兴岛海拔不高，在大海上不起眼，船员并未及时发现，竟开过了头，到达了永乐群岛，而当时南越侵占了永乐群岛的数个岛屿，机帆船行驶到该海域有可能遇到危险。于是船员立刻掉头，开回了永兴岛。

一场虚惊后，刘南威和吴郁文在永兴岛上展开了实地考察。当时永兴岛上没有普通居民，只有民兵，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但自然资源却非常丰富。刘南威考察了四季繁茂的原始热带树种麻风桐，观察了被渔民们称为“导航鸟”的鲣鸟，还和渔民一起摸海螺、砗磲等。

由于往来的船只很少，刘南威和吴郁文在岛上待了足足20天后才有一艘军舰来接他们回去。这一次返航，又遇到了险情——由于当时军舰运给民兵的物资已经全部送上岸，空船返航时因为重心不稳，在大风浪中容易大幅度摇摆，有潜在危险，所以船员们从海里打捞了珊瑚沙来压舱。军舰离开永兴岛1小时后，忽然颠簸得厉害，船员这才发现由于珊瑚沙里含有大量海水，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海水和珊瑚沙分离了，珊瑚沙占据了船的一侧，而海水占据了船的另一侧，所以船体发生了倾斜。船员们赶紧将水和沙再次混合均匀，同时掉头回到永兴岛休整，第二天才再次出发，将刘南威和吴郁文平安送回海南岛的榆林港。刘南威和吴郁文的这次考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中国地理工作者对西沙群岛的首次考察。他们获得了大量的一手资料。回到华南师范学院后，刘南威、吴郁文以及曾昭璇编撰了《美丽富饶的南海诸岛》一书，1981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86年刘南威还参编了《南海诸岛》（曾昭璇主编）一书，该书获评全国地理科普读物优秀奖。

“裸掌测星”的民间智慧

1976年，华南师范学院地理系接受了“我国古代航海天文科研小组”下达的任务，由刘南威牵头，华南师范学院、北京天文台、上海海运学院和广州造船厂一起成立了航海天文调研小组，于1976年4至5月，1976年10至11月，1977年2月，1980年12月至1981年1月先后到海南岛的海口、文昌、琼海、崖县，广东省的阳江、海丰、陆丰、潮阳，广西北海，福建的福州、闽侯、惠安、泉州、厦门，浙江的杭州和舟山岛普陀、定海，山东青岛等地进行了社会调查，访问了航运局、航管局、水产局、交通局，向七八十位有丰富经验的老渔民、老船工、老导航学习、请教。从中刘南威发现了一些遗落在民间的“明珠”。

刘南威说，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内陆与海洋共同交织出的文明之邦。古代的中国曾经是历史上世界最强大的航海大国之一。早在新石器时代，中国先民就开始捕捞海洋资源为食。3000多年前，殷商的甲骨文就有“舟”字的可靠记载。先民利用“观落叶浮，因此为舟”的原理，创立了造船事业。虽然有了船，但要在汪洋无际的大海上航行，没有可靠的导航显然是极为危险的，如何找到合适的参照物呢？先民们仰望天空，“夜则观星，昼则观日”，于是，最早的航海天文就这样诞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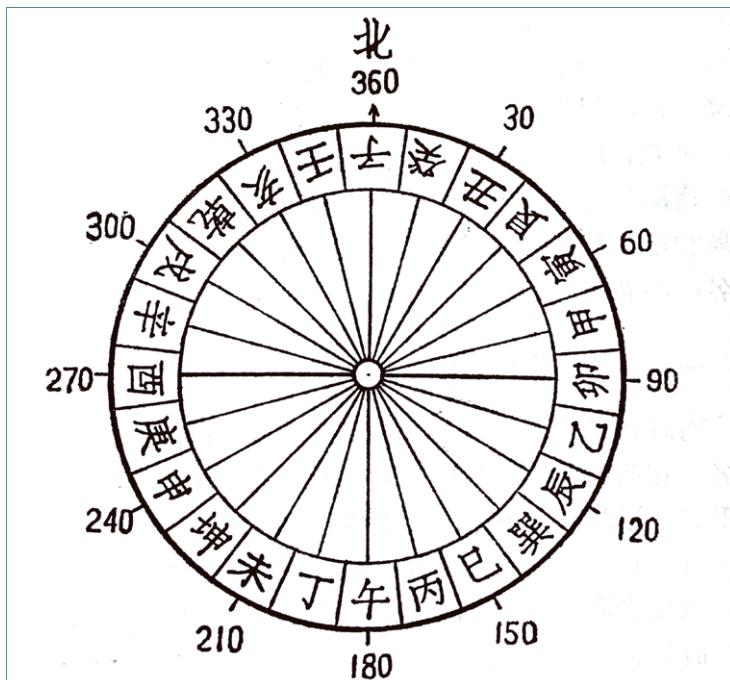
古代的中国舟师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判断航行方向。11世纪末至12世纪初，中国已将指南



针应用于航海，把导航仪器罗盘同航海天文导航结合起来，是航海技术史上的一次伟大革命。然而，民间使用的木罗经容易失灵，且尺寸很小，夜间使用非常不便，因此常年出海的渔人舟子一般都熟知太阳在一年中逐月的出没方位，通过观察太阳的出没，近似地测定航向。在刘南威的调查过程中，就记载了海南岛琼海县老渔民郁玉青、老舵手何良义的口诀：“太阳夏天出在甲，没在辛。冬天出在乙，没在庚。春秋出在卯（正东），没在酉（正西）。”

然而，航海定向只能辅助判断船只行走的方向，而不能确定船只的位置。于是，通过长期实践，渔民发现了恒星的周日运动和周年运动，使得星空成为海上的天然星盘、时钟和日历。公元前140年成书的《淮南子·齐俗训》中记载：“夫乘舟而惑者，不知东西，见斗极则寤矣。”舟师们发现，随着航船往南，北极星的高度越降越低，南天恒星越升越高，北天恒星越来越小，南天常现星斗越来越多。所以，利用北极星的高度或者南天某个易于辨认的亮星对的高度来判断船只的地理纬度成为千百年来舟师们的常识。舟山舟师有言：“知南斗北斗，天下可走。”

随着时间的推移，古代舟师对航海天文的研究越来越深入。1405年到1433年间，郑和率领大明帝国的船队七下西洋，从江苏太仓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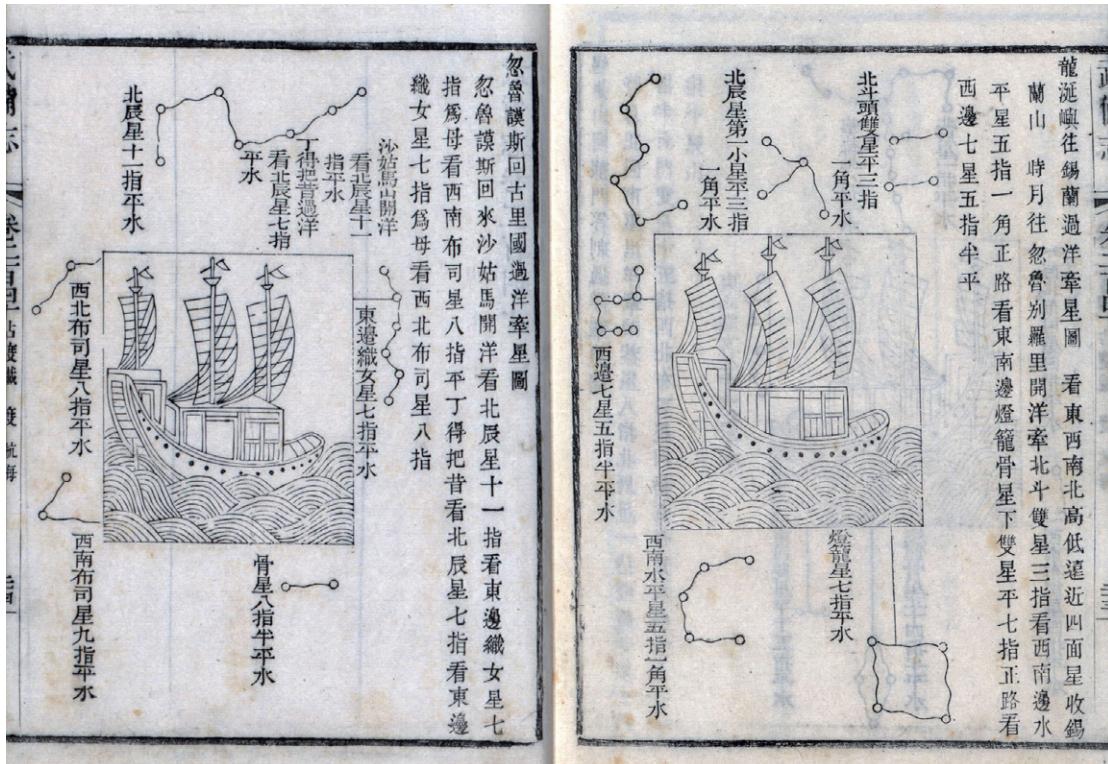


② 民间测定航向的口诀图

家港到亚丁湾，泛海九万里，先后访问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根据郑和船队的航路编写而成的《郑和航海图》共有40幅，载于明代茅元仪所著《武备志》第240卷中，原名为“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图”，这是中国地图学史上最早的海图。

《郑和航海图》中有四幅图与众不同，一律上北下南，画面中央是一艘海上航行的帆船，四周则绘有星座，并标注着方位、名称、指数等文字内容，这些图都以“某某过洋牵星图”为名。所谓“过洋牵星”，就是古代的天文导航。当一个人位于地球上的不同纬度时，同一星座或者恒星在地平线上的高度看上去是不同的。由此可以通过专用仪器“牵星板”观察星辰来确定船只所在的纬度。明代李诩在《戒庵老人漫笔》一书中这样描写牵星板：

“一副十二片，乌木为之，自小渐大。”牵星板最大一块为十二指板，最小为一指板。使用时，左手拿牵星板一端中心，手臂伸直眼看星空，使牵星板板面与海平面垂直，观测北极星离海平面的高度，从而计算出所在地的地理纬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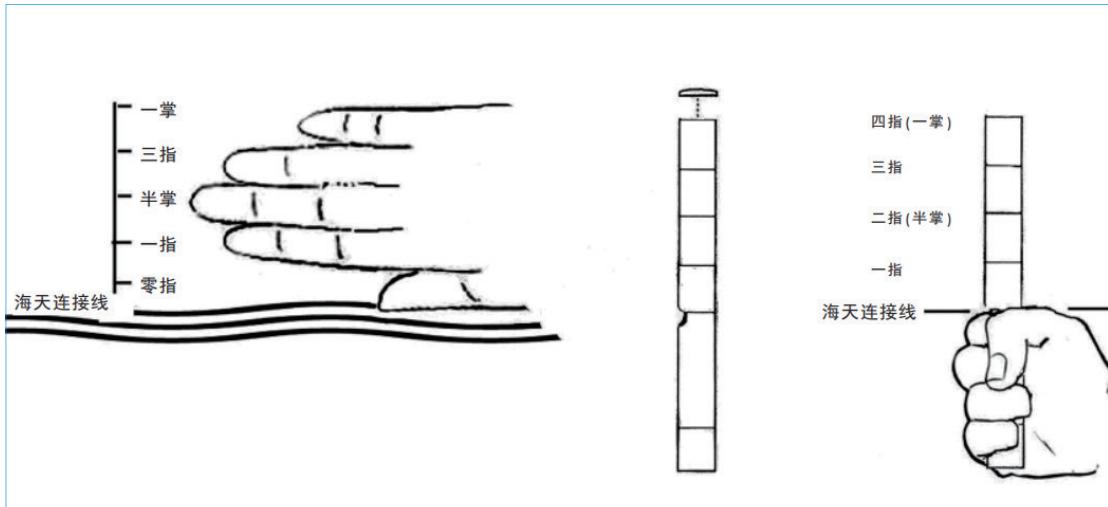
⑦ 《郑和航海图》中的过洋牵星图

这种观测星辰的仰角以确定海上船舶南北相对位置的方法被称为“牵星术”。

然而，郑和船队使用的牵星术固然十分先进，但在民间，普通渔民出海时显然不可能在每艘船上配备一副牵星板，那么他们在航行时是怎么判断自己的方位呢？在刘南威的调查过程中，他发现了一种民间的牵星术——海南文昌县清栏岛的渔民仅用裸掌就可以衡量北极星的出水高度。出海时，他们在海平面上方伸直右臂，手指指向左侧，拇指向下与海平面相接，小指朝向上，当恰见被测恒星时，称为一“掌”（四指），约合20厘米。刘南威采访的时年77岁的老渔民黄华荫在海南岛附近海面测得的北极星高度将近一“掌”，船在越南中部海面的北极星高度指数为半“掌”（二指），按照一掌等于22度38分来换算，黄华荫测得的海南岛纬度为20度左右，越

南中部纬度为11度24分。而实际上海南岛北部正处于北纬20多度，越南中部金兰湾一带所处纬度为11度55分，因此可以看出，这种裸掌测星的精确度是相当高的。

此外，刘南威还发现海南岛文昌县保线大队的船工是用尺来计量恒星高度。测量时，船工以手竖直持尺，尺的下端与海面相切，同时估计被测恒星的寸数。而这一发现，恰好与1974年福建泉州后渚港宋元沉船出土的一件竹尺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一古代竹尺的特殊结构在于全尺长20.7厘米，一端刻一格，另一端刻四格，中间间隔约三格位置没有刻画，每一格间距约2.6厘米。经专家考证，这是一件宋代航海的量天尺，中间空着的三格正是舟师拳头握手之处，或者安装支架或手柄处，使用时四格刻度的那段朝上，四格恰与裸掌测星的一“掌”相当，舟师向前伸出手



② 左：海南文昌“裸掌测星”法；中：泉州宋元沉船“量天尺”；右：量天尺使用法复原（吴春明画）

臂，紧握没有刻度的一段，拇指与食指间的平面对准尺子的上端的第一刻度，并与海天连接线相切，这样一来，北极星在四格刻度上的位置，正是其出水高度。如此看来，宋代的这把竹尺的使用方法与现代海南保线大队船工的使用方法是一致的。由此可见，这两种民间沿用的量星法与昔日广为流传的牵星术有着密切的渊源，也许正是宋明以来航海量天尺、牵星板等专用测星工具的前身。

海南渔民的这两种测星方法，此前并无任何文字记载，掌握此种技术的渔民也多年过世，刘南威的这次调研采访，恰是抢救了这一民间智慧，为子孙后代留下了一笔珍贵的财富。后来，他将这些内容整理出版了《中国古代航海天文》一书。

历史的“铁证”

有了识别航向、辨别方位的方法，海南的渔民开始往越来越远的海域进行探索。这种探索原始而危险。最早的海南渔民驾船去西沙、南沙全凭经验，他们航行了一段时间后，遇到

陌生的岛礁，首个问题就是给这些陌生的岛礁命名。没有名字，他们就没办法定位这些岛屿，更无法交流各自的经验。除了岛礁的命名，还有哪个岛礁朝哪个方向，走多少航程能到另一个岛礁，等等，这些一辈又一辈渔民用汗水甚至生命换来的经验都需要牢记于心，并以渔民能够看得懂的文字记录下来，以传后代，这就是《更路簿》的由来。《更路簿》，又称《南海更路经》，是海南渔民以口头或文字代代相传的南海航行路线知识，它们详细记录了西、南、中沙群岛的岛礁名称、准确位置和航向、距离以及岛礁特征。年轻一辈的渔民，通过《更路簿》将先辈们曾经经过的海域和岛礁熟记于心，在航行时遇到困难，亦可以靠它指点迷津。据专家考证，《更路簿》至迟在明朝初年就已出现，成熟于清朝，盛行于清代末期和民国前期。目前已发现的《更路簿》上记载的地名约有130多个，记载的航线有200多条。

在《更路簿》中，海南渔民用本地俗语为南海上的岛、礁、沙进行命名，这些名字形象生动，例如南沙群岛中的司令礁，因为环礁中有一沙洲，把湖一分为二，形似眼睛，渔民便称之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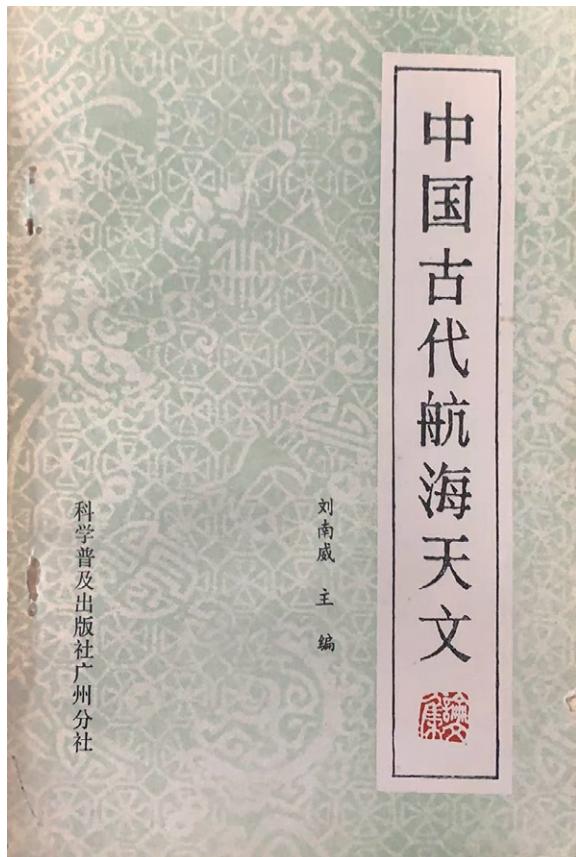
“目镜铲”。这种流传在海南岛民间的南海诸岛土地名，又称为“南海诸岛琼人俗名”（以下简称琼人俗名）。而刘南威则是中国首个从地名学角度研究《更路簿》的学者，是中国《更路簿》和南海诸岛地名研究的集大成者之一，最早对《更路簿》做定义，并对《更路簿》的性质、产生背景、形成、发现、起源和价值等进行了探讨。

刘南威介绍，《更路簿》上的南海诸岛地名与如今使用的南海诸岛地名有着一脉相承的联系。

史料记载，中国政府对南海诸岛正式命名始于清末，经过了一个漫长而不断修订的过程。1909年5月，两广总督张人骏派广东水师提督李准率领海军官兵到西沙群岛勘探及绘制地图，对15个岛屿进行了命名，并悬旗鸣炮，公告中外。这是中国政府首次对南海诸岛地名进行审定。1935年，国民党政府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根据当时的外国海图，审定公布南海诸岛地名136个，并在次年出版的《中国南海各岛屿图》中标绘出来，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正式审定公布的详细的南海诸岛地名，可惜这些地名几乎全是翻译外国名称，并未采用任何琼人俗名。1947年国民党内政部审定正式公布的《南海诸岛新旧名称对照表》，是中国历史上公布地名最多，得到国际上承认，影响最大的一次南海诸岛地名审定。然而与前一次一样，国民党内政部在审定南海诸岛地名时，对中国古籍中有关南海诸岛地名的记载没有进行系统整理和分析，对琼人俗名也没有进行调查和收集，反而采用了不少外来译名，因此审定后的地名并未得到南海渔民的认可，在实际应用中，当地渔民并未采用国民党的官方地名，而是仍然使用约定俗成的琼人俗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决定要重新审定南海诸岛地名，并开始重视琼人俗名的历史意义。那么，琼人俗名到底有何重要性？翻开厚重的法律书籍，我们可以看到，根据国际法的一般原则，断定某个岛礁是否属于某个国家，必须要看它是否满足“四个最早”的条件，也即“最早发现、最早命名、最早开发经营、最早持续不断的形成管辖”。

在《更路簿》中，记录了由古至今海南渔民对三沙岛礁、南海海域的命名等主权行为。这些行为被中国政府通过汇编地方志等行政行为所吸收，而逐渐上升为国家行为。因此《更路簿》反映了中国历代渔民在南海进行独占性、排他性国内经济活动所形成的各种关系，体现了中国自始至终的南海区域的持续性的主权存在。这一本本无言的、泛黄的册子不仅是南海渔民



⑦ 刘南威主编的《中国古代航海天文》

在南海海域及诸岛礁生产、生活实践经验的总结，更是三沙主权自古以来就是属于中国的历史铁证。

也正是基于这个原因，在南海诸岛地名审定时必须充分使用中国人民对南海诸岛的命名，才能从地名角度反映领土主权。

20世纪70年代，刘南威搜集、整理、撰写的南海诸岛资料和研究成果多次被送交广东省外事办公室及中国外交部，为中国南海诸岛及周边海域的主权斗争提供了重要证据。1974年，西沙群岛自卫反击战发生后，中国外交部要求广东省外事办公室提供南海诸岛的主权资料供有关部门参考，刘南威和其他四位专家学者应邀集中到广州沙面胜利宾馆，历时一个月收集整理南海诸岛资料，产生了两项主要成果，其中《南海诸岛地理概述》主要由刘南威撰写，并于1976年1月由广东省外事办公室内部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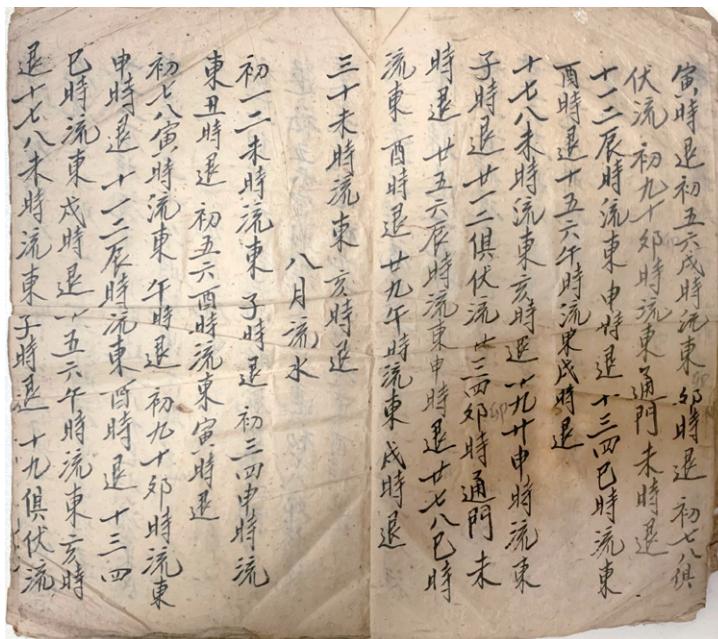
刘南威还是中国南海诸岛地名普查和审定的亲历者。1980年至1982年4月，他全程参与了广东省测绘局组织的“南海诸岛地名普查”，并撰写了《现行南海诸岛地名分析》《南海诸岛古地名初探》等论文。1982年5月，刘南威出席了由中国地名委员会在北京召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次“南海诸岛地名审定会议”，此次会议审定结果《我国南海诸岛部分标准地名》由中国地名委员会授权公布，在1983年4月25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此次地名的审定原则

中，首要一条就是“名从主人”原则，中国人民最早发现且最早命名南海诸岛，只有名从主人，才能在地名命名方面维护中国主权。因此，此次公布的标准地名，最大特点是把渔民地名与政府公布地名融合在一起，地名表中287个标准地名，附有125个渔民习用地名，加以对照。以渔民的方式来进行命名，然后再通过国家的立法行为把它上升为国际认可的标准地名，实际上是一个国家在实践行使主权的一种形式，对于中国捍卫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主权有着重要的作用。

从1971年至今，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光里，刘南威一直专注于南海诸岛的研究，出版了6部著作，发表了30篇论文，是南海诸岛史地研究权威和奠基者，1990年开始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岁月似乎对刘南威格外宽容，晚年的他依然精力充沛，聚焦南海诸岛等研究领域，笔耕不辍。2020年8月，89岁的刘南威出版了《中国南海诸岛史地研究论集》。2021年年底，中国地理学会发布“2020—2021年度中国地理学会科学技术奖—终身成就奖”评选结果，刘南威名列其中。

《论语·雍也篇》，子曰“智者乐，仁者寿”，刘南威正是这样一个仁者寿的例证。●



② 刘南威收藏的林鸿锦《更路簿》手抄本



广东侨联工作

联谊联络品牌

情系
南粤

拓展内外朋友圈，画好最大同心圆，以侨为桥，以情聚谊，共促中外人文交流，增进中外友好合作。

以





广东侨联工作

仁 爱 公 益 品 牌

侨爱
南粤

爱侨护侨助侨，因应侨界需求，以人为本，以
爱润心，引领侨界大众，共建华夏一家。



廖琪：时代的歌者

文 高小莉（广东省作家协会报告文学创作委员会副主任）



蔡化生 摄

廖琪，中国作家协会原全国委员会委员，广东省作家协会原党组成员、专职副主席，文学创作一级。现任暨南大学中国报告文学研究院副院长、教授。著有长篇小说《茶道无道》，长篇传记文学《庄世平传》《扶贫状元陈开枝》等。

提起廖琪，人们会说，这个作家是写报告文学的，他写的《庄世平传》再版了10次，在人民大会堂开研讨会影响巨大。后来又有《扶贫状元陈开枝》（与曾平标合作），也是报告文学，引起广泛关注。还有报告文学集《南粤之春》《大地保护神》《水龙吟》《胆剑篇》《创举》《感动》等，说他是报告文学作家，实至名归。

但是，他是从写小说开始的，得过各种奖，在圈中也有一席之地。长篇小说《东方马利亚》《燃情经历》《茶道无道》《小镇纪事》，中短篇小说集《茶仙》《等待判决的爱》，一部部小说作品，就是他用文字垒起来的个人印记。

无论写报告文学还是写小说，他都很投入，倾注了心血和热忱。廖琪说：“投身生活，书写时代，这是作家的使命。”

1953年，廖琪出生在广东省普宁市洪阳镇。他这样讲述他的家庭：“我母亲是一个很能吃苦、很勤劳的女人，她是童养媳，6岁就到我家里来了。为什么6岁就到我家里？因为那时家道中落，且家族世代单丁，从我太爷到爷爷到我父亲，三代都只有一个男丁。在我们传统的观念里面，一个家族人丁不旺，那种危机比什么危机都大。母亲刚来家里时，常常像佣人一样被使唤，等到她16岁，和我父亲结婚后，就开始生孩子，生了5个孩子。她开头生的是两个女孩子，我的大姐、二姐。母亲作为童养媳到家里，主要是为了给我们家传宗接代的，所以连续生了两个女娃的母亲在家族里面受尽了白眼。

好在我来了，我在家里排第三，下面又是弟弟最后一个妹妹。”

“大家把整个家族兴旺的希望寄托在我身上。五个兄弟姐妹里面，只有我和我小妹读完高中。我母亲从我读书开始，几乎每个晚上都陪伴我，虽然她不能在功课上帮我，但是对我竭尽所能的关心。”

廖琪历经生活的艰辛，懂得民间疾苦，了解生存的不易。所以对陈开枝的扶贫壮举，他由衷地敬佩，自己也慷慨解囊，扶助贫困学生。感同身受，惺惺相惜，长篇报告文学《扶贫状元陈开枝》的诞生也就顺理成章。

同样是非虚构，《庄世平传》30多年前就诞生了，而且经过时间检验，印证了一个经典。无论廖琪这辈子写过多少作品，得过多少奖，毋庸置疑，影响力最大、生命力最强的还是《庄世平传》。

1986年，廖琪已经是著名作家，特别是在潮汕地区名声很大，他对潮汕的本土风情、历史文化，尤其是茶文化很有研究。

改革开放初期，庄世平在创办汕头特区、创办汕头大学等重大项目中，以及给家乡、给广东、给中国很大支持。仅是从资金计算，当时他从国外募捐送给国内进行建设的资金算起来超过16亿人民币。作为汕头特区管委会主任、党委书记的刘峰，总在想如何才能报答庄老的恩情。时任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给刘峰出了个点子：请作家给庄老写一本书，让全国人民、让广东人民、让家乡人民永远记住他。

于是，刘峰找到了廖琪。

廖琪口述：

1986年6月13日，当特区管委会主任刘峰用恳切的口气对我说：庄世平先生对家乡、对特区、对国家的贡献太大了，我们无以为报，只好请你为他写一本书聊表我们的心意。我虽然口头

上答应了，内心却不以为然，误把庄老当作有了钱就求名的大亨。

好在同年年底我出席全国青年作家代表大会期间，顺便采访了他生命历程中的两个重要的见证人苏慧和李启新。平淡的采访却爆出了两个至今震撼我心灵的大事件：一是把他亲手创建的香港南洋商业银行和澳门南通银行，无偿地捐赠给了刚刚建立的新中国，为新中国打破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作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二是他的四个儿子没有一人在中银或中资机构中任职，有一个儿子还住在港英政府的廉租公屋。反差如此之大，却就像两块巨大的基石，支撑起一座以人格力量服人、以人格力量教人、与人格力量感人的巨大雕塑，时时引领着中华民族的伟大传统文明的延伸和拓展。至此，采写《庄世平传》，才成了我自觉的决心和行动。

采访、磨合、资料整理、创作、修改，廖琪整整用了8年。8年里，廖琪去了两次泰国，无数次去了北京、上海、重庆、潮汕，采访超过300人。

庄老一开始对写书并不热情，对廖琪也不冷不热。一来他实在太忙了，二来对社会上那些怀着各种目的的文化人见得太多了。好几年，廖琪都在外围采访。事情转机发生在1991年的夏天，在香港南洋商业银行的会客室里，廖琪介绍他已经走访了北京、上海、广州、潮汕以及东南亚等地，采访的对象不下100人，已经收集了很多资料。庄老默默地听完，看着廖琪好一阵子，然后对廖琪和他太太说了一句话：“吃饭去。”

在香港南洋商业银行大楼后面的茶餐厅里，庄老点了简单的四菜一汤。餐后水果是餐厅赠送的每人一碟6块的冰镇西瓜，廖琪的太太胃寒，对冰镇西瓜不感兴趣。庄老吃完自己的那一份，盯着廖琪太太的那一碟西瓜，突然笑着说：“弟，

我们把弟妹这一份分了吧。”他拿过碟子往自己的碟里扒了3块。廖琪十分激动，他知道，从这一刻起，庄老接受了他。

而这一刻距离他接受创作任务的1986年，已经过去了5年。此后，他跟庄老的接触多了起来，有了亲人般的陪伴和推心置腹。

又过了3年。1994年10月，《庄世平传》出版。同年12月8日，由中华全国工商联、中国侨联等8个单位联合主办的首发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首发式规格之高，阵容之豪华，令人难以想象。来了一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一位全国政协副主席，近10位部长级和几十位司局级的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加上从海内外赶至北京的各方人士，浩浩荡荡达120多人。副院长程思远用颤抖的声音说：“因为我和庄世平先生相交甚久，是知心朋友，写他的书，我不能不看。这次盛会我不能不前来祝贺，非如此不能表达我对庄先生的友情。”如此深情厚谊的语言，出自一位曾经沧海、见惯了风风雨雨的德高望重者，何等的分量！

这之后，《庄世平传》几乎每5年再版1次，热度不减，也不断有新的章节加入。

廖琪口述：

《庄世平传》从第1版至第4版，由庄老直接向我介绍的情节并不多，全赖我用8年时间锲而不舍的跟踪采访了各类事件的核心人物、直接的参与者，在长年累月的采访中获取大量资料之后，以真诚和坚韧才最终获得庄老的接受，继而成为他的忘年交——他见识过太多形形色色打着小算盘来到他身边的“文人”，对我也不能不来一番考察。第1版的《庄世平传》是我们利用了将近4个月的周末假期，于深圳蛇口南海酒店由我一字一句地念，他一句一字地听，有时甚至带上老花镜，逐字逐句地修改，才最终定稿的。但到了第二稿，他已无暇听我念稿，更无暇自个修

改，仅仅说了句：“你自个再掂量掂量吧，认可了就可发稿。”这样的信任让我诚惶诚恐。

“认识庄老，是我这辈子的幸运！”廖琪说得情真意切。于他而言，不仅完成了这部作品，更重要的是庄老对他的影响。庄老对他可谓亦师亦友亦父。

《大好人庄世平》一文，廖琪写于2007年庄世平与世长辞之后。他用饱蘸深情的笔墨，切身的体会，开阔深远的视野，展现了庄老崇高的人格魅力和非凡人生，“庄世平以其大胸怀、大智慧、大勇气、大慈悲，铸就了他完整而高尚的人格，成就了他一生美好而传奇的精彩和辉煌”“记住他，当然是为了学习和继承”。

采访中，我开玩笑地问廖琪，《庄世平传》再版了10次，稿费一定挣了不少吧？民间传说，廖琪写这一本书，都够他吃一辈子了。

他当即很响亮地回答：“哪止这辈子？下辈子也吃不完。”随后话锋一转：“我从庄老的身上学到的东西太多了，庄老留给我的精神财富无穷无尽。”因为很熟悉，他也就实话实说，这本书其实没有多少稿费，后来多次再版，都是让要书的人直接去印刷厂拿书。他说：“我的收入也不低，我爱人还有一份工资，这辈子够够用了，要那么多钱干嘛？退休后能写作，能写字，日子多开心！做人哪，就要有个好心态，知足常乐。就像《扶贫状元陈开枝》的稿费一样，我都用去资料搜集、推介和帮扶贫困儿童上了。我绝不会利用庄老的名声赚稿费。”

《庄世平传》1994年11月出版，12月得了全国优秀传记文学奖，后来还拍成了6集电视专题片。

知足常乐，心怀感恩，无论走多远，无论有多大的成就，生命里都是本性中最淳朴的情感。他叙述的一个小故事，一下子把我们拉回到曾经的岁月。

廖琪说：“我的母亲把她毕生的希望绝大部分都寄托在我身上，什么苦都能吃。她把我的苦当成她的苦，把我的乐当成她的乐。1977我来省作协当文艺学徒，当年回去的时候，朋友给了我六七斤腊肉，她舍不得吃，整条村五六十户人家，她每户人家都斩一块去送，并且对每一户人家都说这块肉是我孩子从广州带回来的。她舍不得自己吃，把它当成一生的荣耀：当时我们国家的经济还是很困难，要吃肉不是很容易，并且是从广州带来的腊肉。对潮汕人来说，这是很珍贵的一个食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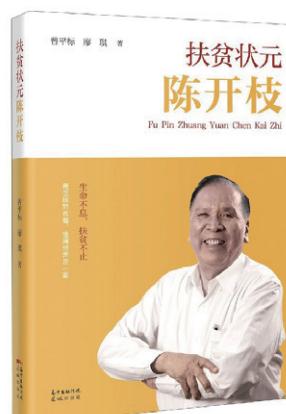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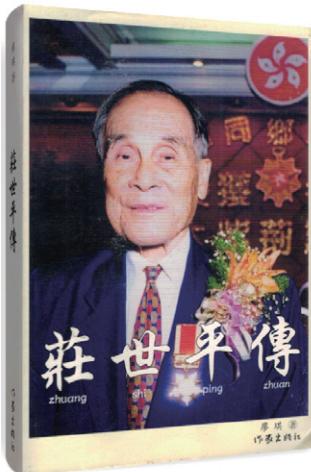
廖琪说的1977年到广东省作家协会当文艺学徒，指的是可以载入广东文学史的广东省文学讲训班（以下简称文训班），于1975年12月开学，至1977年12月毕业。文训班由当时的广东省文艺创作室（即“文化大革命”前的“四协”合并而成：作家协会、音乐家协会、美术家协会、戏剧家协会）创办。“文化大革命”后期，广东文学处于瘫痪状态，人才严重断层，一些老文艺家对中国革命文艺事业繁荣发展充满期待，初心不变，相信文艺界的春天总有一天会到来。为解决文艺战线青黄不接问题，文训班应运而生。可以说是倾全省文学之力，授课老师有欧阳山、陈残云、秦牧、

肖殷、吴有恒、于逢、黄宁婴、华山、韦丘、郁茹、沈仁康、仇智杰、西彤、黄培亮等，还有著名电影导演方荧。

当年文训班的学员谭方明在《广东“文训班”，一群文青的始发港湾》一文中说：“我们虽然没有巨著传世，但我们有幸在青年时期，能来到那么多的文学大师甚至文艺巨匠的身边，读书、听课、写作、观察、思考，耳濡目染，接受他们的言传身教；不仅学会了写作，更重要的是学会了如何读书，如何思考，如何正直，如何不屈，如何努力，如何拼搏，如何做人。用欧阳山老人的话说：‘文训班这两年你们学到了人学’。当年省文联和省作协老一辈文学艺术家们优秀的艺术素质、道德情操、行为风范，像春风，像温泉，一直熏陶和滋润着我们特别年轻稚嫩且颇是干枯的心田！所以说，文训班的两年，是我们人生的起点，是我们走向社会的起跑线，是我们人生扬帆起航的始发港湾！在我们人生的历程中，它是永远竖立不倒的一座丰碑！”

文训班毕业后，廖琪被分配到了广东省作家协会工作，这是他人生重要的转折，也是新的起点。

廖琪文学上的引路人名叫李作辉，20世纪



② 廖琪创作的人物传记《庄世平传》
《扶贫状元陈开枝》

50年代就在普宁县文化馆任馆长。1971年，廖琪高中毕业后，为了生存，干了很多份工作，剧团、果子厂、机械厂、医院都干过，都是最苦最累的活。到了1971年年底，他有机会去当一名民办教师。当时农村的文化人不多，要找一个民办教师也不容易，而廖琪在县的《普宁文艺》上发表过作品，引起了关注，算是搞文艺的人了。廖琪的处女作《庆七一》，一首8句的诗歌，给文化馆的人改了4句。这个帮他改稿的人就是李作辉，廖琪由此认识了他。

廖琪说：“李作辉是农民出身，靠经验写作，我幸亏碰见了这个人。比如写小说，他说你一定要用形象写人，用细节写、用情节写，你不要去规定某个概念去写人。他的话对一个刚开始写作的人是很珍贵的，正在你找不到方法的时候，有个人有一套从生活出发、从现实出发，以刻画人物为标准的一种写作方法，传授给你，指点着你，这是多么珍贵。我这个启蒙老师，对我恩重如山。”

后来，恩师成了他的岳父。廖琪的太太也成为他一辈子从事文学创作和文学事业的坚强后盾。“我很幸运，遇到了很多生命中的贵人。我的母亲、我的太太、我的恩师李作辉、庄世平先生、吴南生书记、老朋友刘峰，作协的主要领导欧阳山、陈残云、黄培亮、秦牧、仇智杰、梁梅珍等等这些人，都是我生命的贵人。在他们身上，我学会了怎么写作，我也学会了怎么做人。”

廖琪说：“1985年，我陪秦牧、黄培亮、欧阳翎等一帮老领导去珠海。出发的时候，我作为《作品》的编辑，把公家要送人的书、杂志、公家的用品搬上车，然后我又跑回来，首先跑到秦牧老先生那里，要帮他把他的箱子搬上车，谁知道他拦住我：‘廖琪，你最年轻，以后公家的东西你多做，你也应该去做。但私人的东西，除非他拿不动，你才来帮忙。像我身体这么好，你不用帮我。我和我太太只有一个箱，只有这一点点行李，不用你来帮忙。’这是什么精神？这就是一种身体力行，这种精神在我以后的工作生活里面，我一直在提醒自己，你是谁？秦牧那样的大师他都可以这样谦卑地为人，你廖琪是谁？你还能不谦卑吗？”

廖琪1977年进入广东省作家协会工作，直到退休，一干就是四十几年，既是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文学创作一级，又是广东省作家协会党组成员、专职副主席，报告文学创作委员会主任，广东省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为文学服务，廖琪为广东文学事业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热血和忠诚。

廖琪，勤奋、吃苦、感恩、悲悯、知足、朴实，有那么一点率真，有那么一点大大咧咧，还有那么一点不会转弯抹角，感性得有时候让人下不来台，理性得心里永远有杆秤，称得出自己的分量，掂量得准哪是公哪是私。一个人幸福的根本就是心安理得，心安，满眼花开。●

又见一片星辉

文 程学源（中国侨联党组成员、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黄星辉，广东惠州人，出生于黑龙江，1979年考入军事院校，在解放军的大熔炉里锤炼多年，曾在武汉军区、广州军区多个部队任职，20世纪80年代中到深圳，先在深圳警备区政治部任宣传干事，后转业到深圳市委办公厅任市委常委秘书，同时加入深圳市作家协会，工作之余笔耕不辍，为深圳文学界的常青树，其作品散见于国内多家刊物。

我与星辉相识在三十多年前的深圳。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深圳，到处都是热火朝天、蓬勃建设的景象。

初见星辉，瘦削高大的他，眉宇间透着英气，一副挺拔干练的模样，令人印象深刻。

那时我俩都刚到深圳市委工作，他刚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在市委办公厅任市委常委会的秘书，市领导的活动安排等工作他也承担了不少。工作中，我经常读到他起草的会议纪要、工作报告等公文，行文严谨，逻辑缜密，精炼务实；工作之余，也时常在《深圳特区报》和《特区文学》等报刊上读到他发表的诗歌和散文作品，无不文字朴实，情感真挚，清新隽永。

同属来自粤东北地区的我俩，也算是一对“小老乡”，因了这份缘由，多了许多亲切。我们在一起时，聊理想、聊生活、聊诗歌，那些个意气方遒、坐而论道的场景，回想起来，总是不觉莞尔。那基于相同性情和相互欣赏而建立的纯洁“发小”友谊，也一直延续至今。

后来，我们都离开了深圳市委。星辉辞去了体制内的工作，踏着改革开放的春潮，到商海中去打拼奋斗了；我也先后转到了一个个新的工作岗位，在“赶考”路上爬坡过坎，在追求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星夜兼程。

时间流逝如白驹过隙。斗转星移间，我俩已过了知天命的年纪。现在的星辉，尽管早已不再为生计而披星戴月、案牍劳形，早已过上了得闲时可以打打高尔夫、抽抽雪茄的有品位的生活，但年轻的诗心仍在，诗性仍在。时代大潮的波澜起落、生活中的点点

滴滴、人生和商海经历过的沟沟坎坎，往往又一次次激起他写作的冲动，让他诗兴勃发、笔耕不辍。直到有一天，星辉将自己的诗作整理成册，用微信发给了我，使我得以有幸第一时间较为完整地读到他的作品，感受他诗中的美好意境，感悟他创作当刻的心境。付梓之际，他嘱我为他作一篇序。于是，我将他的作品捧卷重读，再次细细品咂思忖，不得不说，每读一次，体悟就更进一步，共鸣有增，收获有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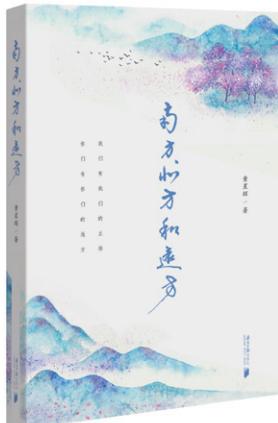
在他的诗里，找不到刻意堆砌的华丽辞藻、故弄玄虚的艰涩意象，找不到“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无病呻吟，看到的尽是充满生活气息的真情实感。他用独特而锐利的眼光去捕捉生活中普普通通的事物，用朴素却饱含深情的语言呈现给读者，大至太阳、山海、台风，小如雏鸟、烟斗、蜗牛，贴近生活、融入生活，又高于生活。

“回到家中又看见了秋葵花开放 / 一只雏鸟飞落在中庭花园的鱼池旁 / 一张小嘴稚嫩金黄 / 一双羽毛细细的翅膀 / 慌慌张张还没有力量 / 怎么飞也飞不上楼顶 / 无奈落在了三楼的窗台上 / 一双明亮的眼睛充满了惊慌 / 太阳照在它的身上 / 风和日丽 / 羽毛闪着亮光”（《和鸟儿一起歌唱》）；“海风 / 清凉 / 变得不那么疯狂 / 海浪 / 沙哑着 / 一浪小过一浪 / 夜色 / 肆无忌惮地 / 撩人荡漾 / 茶水 / 静静地沁出酽汤 / 溢出淡淡的清香”（《无题》）；“他只是 / 静静地坐在田埂上 / 一支烟 / 一头牛 / 一片金黄 / 天空中挂着明晃晃的太阳 / 照在他的草帽上 / 徐徐的风吹过他的脸庞 / 他纹丝不动 / 没有丝毫的荡漾 / 他的心中只有那头牛 / 和他身后的村庄”（《牧牛人》）……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记得古人有言：高手不从时尚体，好诗只说眼边情。星辉可谓得其真传了。一个个平凡普通的生活场景，被诗人情真意切地娓娓道来，将画面层层推送到我们眼前，犹如一幅幅油画，悠扬、美好、温馨。在诗人眼里，它们都是一处处小小的、让人温暖的光芒，正如诗人自白的那样，“生命中某些珍贵的片刻，其实都来自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譬如说你的影子，它只是你生活里的一个影子，或长或短，或左或右，或前或后，却在你的生活中占据很重要的地位，它与你的生命须臾不离，即使你一个人在广袤的旷野里独行奔跑，它都会陪伴着你呼吸跳动，在你的心里燃起生命的小小光芒，让你无时无刻都无法忘怀……”（《生日自说自话》）。

他的诗里，充满了向上的、乐观的、蓬勃的意象，给人的感觉是明亮的、温暖的。写夕阳，不见“只是近黄昏”的感叹和英雄易老、美人迟暮的惆怅，而是“我

愿意相信 / 你就是一只火红的凤凰 / 狂舞在苍穹之上 / 炫耀出万丈光芒 / 我愿意相信 / 你就是一条彤红的锦鲤 / 奔腾在苍茫之海 / 抛洒满天的吉祥”（《苍穹之上》），从这些诗句当中，读者很容易体会到什么是心灵的纯净和宽厚。诗人对大自然给予的普遍启示，总保留一种平和的感恩之心予以回馈。甚至于写那爬行在干燥水泥路上即将耗干体液的蜗牛，也是“它是用生命在寻找快乐的方向 / 它是用生命在寻找的路上歌唱”（《一只蜗牛》）。诗人没有为鱼儿七秒的记忆感到哀伤，而是为它们感到幸福，“有人说鱼的记忆只有七秒 / 或许这七秒 / 就足够它



《南方、北方和远方》

作者：黄星辉
出版社：南方日报出版社

们快乐地呼吸、觅食、发情、产卵、繁衍 / 下一个七秒 / 它们依然快乐地呼吸、觅食、发情、产卵、繁衍 / 而七秒和七秒之间 / 它们全然没有痛苦烦恼 / 更没有彷徨 / 它们唯一离不开水 / 它们在水中自由自在地游来游去 / 七秒或许就是它们的幸福永生”（《七秒钟的幸福》）。

在题为《折磨》的诗里，诗人将自己苦苦求学而未得所愿、向往爱情却互相伤害、心怀理想却被现实扑灭等苦楚，真切地展示给我们，然后用豁达乐观的人生态度，将“苦难的修行和痛苦的折磨”化作力量，坚守终将面朝大海的信念，使人生得以升华和解脱。在题为《选择》的诗里，诗人更是直白地写道，“你无法摆脱黑暗 / 但是你可以在心里点亮一盏明灯 / 在黑暗中看得见自己孤苦的身影 / 犹如飞驰的骏马驮着冷雨黑夜 / 在旷野中狂奔 / 让风托起灵魂 / 四蹄溅花风雨兼程 / 踏响往事的琴声 / 跨过黑暗烦扰的泥坑 / 踏破夜空 / 冲出黑暗迎接黎明 / 向朝阳鞠躬”。蓬勃向上的意象，体现了诗人永葆乐观昂扬、充满希望的人生态度。这可能也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深圳留给我们这代人的一份宝贵的财富吧。

星辉的诗文有着结实的人间悲欢离合，纵然他的人生经验疆界在不断地走向辽阔和幽深，依然可以看到诗人有颗敏锐善感的心，琐细的生活里透着烟火气。如《我的同学佐藤武志》，叙述他与佐藤武志（大学同学孙维科的日文名）的那份交情和他乡遇故知的那份欣喜与牵挂。结尾处

写道：“到了机场，四十年的同窗兄弟再留一张惜别的合影，青春年少的那个身影又一次浮现脑海跃然心中，安检闸口里外两只手不停地挥动，不忍离别，双眼泪雨朦胧。”不动声色地渗透和缠绕着那种伤怀、不舍、相连与相离……四十年的交情，在中日两国间的四次见面，见证了同窗之间情越长越化不开的柔软内心。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来日方长，现实的光景更多的是见一面少一面的无奈，也许世间最好的默契不是有人懂你所有的言外之意，而是有心疼你所有的欲言又止，就像他与佐藤武志离别时的画面一样：道一声珍重，从此各安天涯。

或许是人生阅历的丰富，或许是经历过寒夜的微冷又沐浴过暖阳的人生境遇，我看到了诗人探寻人生意义的那份勇气与力量、豁达与通透。在忙碌而又充实的生活当中，他始终保持诗文表达的热情与抒写，不会因为生活的琐碎而忘记了对笔下每一段诗文的热爱。正如诗人在《选择》一诗中所写的那样：“找寻遗忘的乡土 / 找寻残缺的记忆 / 找寻破碎的心灵”，敬畏而自审，谦和而自强，对星辉而言，就是讴歌这片倾注了他深沉情感的苍天厚土与这个美好的时代。

难能可贵的是，在他的诗里，我还看到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那种物质相对匮乏但充满机遇的时代景象，以及那个时代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实干奋进的精神风貌。正如白居易所言，“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作为生在北大

荒，又在南粤大地打拼的“南归雁”，星辉丰富的人生经历，本身就是一个时代的注脚，他的作品，也无不烙上这个时代的鲜明印记。北方与南方文化的交融，部队与地方的磨炼，从机关到商界的打拼，从生活的践行到诗歌艺术的追求，都融解在星辉的诗文里。

在《梦见，一九七九，那个军马学堂》中，诗人“梦见了睡梦中紧急集合的哨子吹响了十公里武装越野一个个衣装凌乱丢盔弃甲的狼狈相 / 梦见了炊事班的厨房和墙上挂满饭盆袋子与饭堂饭桌上的高粱米饭和没有油星的白菜汤 / 梦见了八〇年的夏天在学校农场从早上六点到中午十二点铲了半天玉米地吃了十二个包子撑得无法动弹手里还拿着四个包子躺在大树下的雨衣上 / 梦见了冬天的寒夜里背着冰刀翻过铁丝网的院墙偷偷地溜进滑冰场 / 梦见了西安大路沙土地的足球场上尘土飞扬 / 梦见了同样是沙土地的排球场上你争我抢”……寥寥数语，将那个年代里军校大学生枯燥艰苦却苦中有乐的生活生动地描绘出来，令人忍俊不禁又感同身受。

在序诗《爷爷的南方，爸爸的北方，你们的太平洋……》中，诗人写出了三代人不同的时空和心理方位，父辈——“为了建设富强的新中国 / 爷爷从南粤第一学府毕业 / 就踏上了征程 / 远离了南方的家乡 / 他翻过粤北的群山 / 跨过长江 / 越过黄河 / 穿过山海关 / 去到他做梦都不曾见过的 / 举目四望尽荒凉 / 蓝天黑土的北大荒”；自己——“爸爸完成学业 / 追随着爷爷的脚步 / 也来到了从小就向往 / 却从未见过的南方”，

女儿——“你们的营养不再来自大豆高粱 / 你们的喜怒哀乐靠的是互联网 / 你们在 Wi-Fi 中成长 / 中西最优秀的文化 / 是你们的精神食粮 / 你们的眼光不再狭窄 / 你们放眼的是宽广的太平洋”……在诗人眼中，北方、南方、太平洋早已经融为一体了，三代人的经历，是跨越了时间、地域、国界的情感，正如诗中所说：“我们有我们的主场 / 你们有你们的远方”。从父辈背井离乡建设北疆，到吾侪将青春和激情挥洒在特区的大街小巷，见证特区乃至国家的崛起，再到后辈可以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不以山海为远，用全球的视野拥抱这个崭新的时代，这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时代。北方、南方、太平洋，已经不仅仅是地理领域的时空变换，而是诗人心中最重要的心灵方位、人生经验和情感寄托，更是国家发展进步历程中一代又一代人成长、奋进的时空写照。星辉和我，以及我们的父辈、子辈乃至孙辈，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幸是这个伟大时代的见证者、参与者，更应是这个伟大时代的奋进者。

写至此，夜已深。我抬头望了望窗外的夜色，北京宁静的秋夜里，行人寥寥，匆匆忙忙，唯有灯火和星汉，阑珊可亲，如诗温暖，照亮着稀松枝杈掩映下的街道。

人生已半百，回首来路，仿佛又见三十多年前拼搏在深圳大地上的年少的彼此，又见那一片属于青春和诗歌的璀璨星辉。

时代如此美好，愿我们诗心永在，青春永在。●

粤曲名家黎佩仪的子喉骨子腔

文 莫寒（东莞市作家协会秘书长）



② 黎佩仪

在中国传统戏曲日渐式微的情形下，有一位曲艺演员却逆流而行，凭借着扎实的专业能力，不仅创建了粤曲唱腔新的流派，而且使这个新流派发扬光大，在广东戏曲界广为传唱，风靡一时。这个人就是子喉骨子腔创始人黎佩仪。

梦想的种子生根发芽

1947年9月17日，在广东顺德陈村，随着一阵响亮的啼哭声，一个女婴降生了。黎家人如获至宝，给她取名为佩仪。

顺德是粤剧粤曲发源地之一，是中国曲艺之乡，人才辈出。正是因为这片沃土的滋养，才为一代粤曲传奇“子喉骨子腔”的诞生埋下了种子。多年之后，黎佩仪赋予了曲艺不一样的内涵，她把曲艺带向了更高的境界和更远的国度。

任何人的成功都绝非偶然，黎佩仪也不例外。

20世纪60年代，交通不便，人们从顺德去广州需要颠簸几次才能到达。从小喜欢粤曲的小佩仪特别喜欢去广州的舅舅梁植标家，因为舅舅是一名铁杆粤曲迷。每逢寒暑假，小佩仪都会到舅舅家，她一边帮舅舅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一边听着电台播放的粤曲。小佩仪自幼便展露出独特的曲艺天赋，一首曲目只要听过一两遍，就能一字不差唱出来。因此天赋，

小佩仪成为陈村乡镇文娱组的成员。有一次，小佩仪在舅舅家学到了几首新粤曲，回到陈村后在乡亲们面前演唱。她那稍显稚嫩却精彩有趣的表演让乡亲们对她刮目相看，大家都赞她声音清脆甜美，争先恐后与她合唱。

从那以后，小佩仪满脑子装的都是学唱曲、练身段、睇大戏。粤曲的魅力仿佛一块巨大的磁铁无时无刻不吸引着她。凭着过硬的基本功，小佩仪很快成为当地小名人。文娱组表演场所每天晚上都被挤得水泄不通，粤曲声回荡在乡镇的夜空，听得人如痴如醉。小佩仪就这样带旺了文娱组，但她的学习成绩却一落千丈。为了孩子的前途，小佩仪的父亲不准她晚上出门唱曲。就这样，小佩仪与心爱的粤曲短暂告别。

理想的种子一旦在土壤里扎根下来，就会慢慢生根发芽。小学毕业后，小佩仪正式开始了寻梦之旅。小佩仪来到舅舅家，等待机会。梁植标是音乐美术老师，在广州文艺界有一些人脉，认识不少曲艺界的人。他四处打听消息，只要剧团招人，就带小佩仪去碰运气，可都只招广州户口的。一次又一次，每次都是满怀希望而去，最后总是失望而归。如此反复而毫无结果的奔波让小佩仪打起了退堂鼓。

“这世上的钢铁哪块不是千锤百炼才形成的？求艺的道路上，怎能半途而废！”舅舅语重心长的话一下子说到了小佩仪的心坎里。恰巧，广东音乐名家陈德钜在市二宫开设粤曲班，小佩仪幸运地进入该班学习并得到陈老师精心栽培，所被收入二宫曲艺团，每晚参加演出，平时练习演戏身段，如“水波浪”“拉山”“扎架”“走圆台”等简单戏曲舞台程序。

有一天，舅舅兴奋地对小佩仪说：“广东音乐曲艺团招新人啦，没有户口限制。”当晚，舅舅便与小佩仪购票到西关红荔曲艺厅观看广东音乐曲艺团的演出。曲艺团节目形式多样，内容丰富，让小佩仪大开眼界。

广东音乐曲艺团初试非常严格，不仅要求考生具备过硬的基本功，对年龄、身高、长相的要求也极高，考生还要即兴朗诵诗歌和演唱粤曲。黎佩仪初试时唱了一首红线女在《苦凤莺怜》一剧的“平湖秋月”唱段。她一开唱腔，所有的考官都眼前一亮，但她的文化考试没有过关。后来，评委因为惜才而破例让她通过初试。

初试险过，还有复试。考官和监考人士包括大喉名家白燕仔、熊飞影，平喉名家黄少梅，子喉名家谭佩仪、何紫霜，音乐大师刘天一，还有音乐老师和唱功老师叶孔昭、苏文炳、屈庆、黄少敬等，其中刘天一是当时的曲艺团长。如此强大的阵容让小佩仪紧张，幸好《洪湖女儿》《江姐上山》是她的拿手曲目。黎佩仪最终被广东音乐曲艺团录取。

艺海无涯“勤”作舟

在曲艺团，黎佩仪白天跟上一届学员进行群体练声学唱，晚上观看曲艺团的演出，从老一辈艺术家的身上吸取艺术养分。熊飞影声如洪钟的大喉独唱、白燕仔技惊四座的唱腔，以及“星腔”传人李少芳、何丽芳、黄少梅等老师声情并茂的演出都让黎佩仪受益匪浅。1964年，广州市文化局决定成立专门的中专艺术学员培训班。这个班的学员来自粤剧、曲艺、木偶三个艺术团体。在曲艺考试中有着不俗表现的黎佩仪成为培训班的一员。中专班学员是广州市文化局重点打造的艺术人才，请来了当时业内优秀专家来授课。

对于曲艺演员来说，“声训”是必不可少的课程。上午，学员要进行“声训”和身段训练，以及学习音乐基础理论和粤曲理论；下午，按专业不同，老师对学员进行“一对一”艺术辅导；晚饭后稍作小憩便进行分组练唱，练习当日教唱的曲目和排练曲艺节目及折子戏。黎佩仪是班里的

尖子，老师特意安排《东湖春晓》等一些难度较大的独唱曲目给她练习。尽管学习任务繁重，但黎佩仪从不喊苦叫累，她将所有精力都放在技巧学习和艺术钻研上。

每天天蒙蒙亮，她就起床了，带着定音器偷偷走到宿舍旁边的小山坡上进行半小时的练声，之后她又静静地回到宿舍等待参加集体的练声课程。寒来暑往，从不间断，小山坡上总有她的身影。经过持之以恒的努力，黎佩仪的“声训”基础比其他人扎实。培训班的全面强化训练更让黎佩仪成了“一专多能”的优秀人才。

1965年年底，为了向建国十五周年献礼，广东省文艺界决定以北京版《东方红》为蓝本，从广东各艺术团队中抽调青年演员排演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演出队伍完全按部队班、排、

连的建制实施管理，由舞蹈连、表演唱连、合唱连、器乐连、灯光音响舞台美术连、后勤伙房炊事班、导演组、服装化妆师班等连、班组成，整体运作有三千多人。黎佩仪被分派到表演唱连，担任小童角色，如女童军扛红缨枪、集体女伴舞、少先队舞、抗日游行学生等。演出团队犹如一个大熔炉，黎佩仪的表演技艺得到升华。

1965年7月1日，《东方红》在中山纪念堂进行首次公演。30多首歌曲、9部大型舞蹈、18部歌舞表演、18段朗诵等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表演一炮而红。

《东方红》公演历时11个月，演出200场。在一场又一场的演出中，黎佩仪的表演技巧不断得到提升。就在此时，“文化大革命”让黎佩仪失去了表演的舞台，她被安排到广州商业系统当售



② 黎佩仪登台演出

货员。此时，她遇到了一生的伴侣——广东音乐曲艺团有青年音乐“头架王”之称的李逢炎。

机缘巧合下，黎佩仪加入广州市商业局文艺宣传队。在一次庆祝表演中，黎佩仪精湛的表演、独特雅致的唱腔引起了商业局的一位热爱艺术的领导的关注。领导在局内成立了文艺宣传队，从系统内抽调有文艺特长的职工成为队员。宣传队组成后，队员脱产进行排练。由粤剧、曲艺、话剧、杂技、魔术、歌舞、音乐等各种文艺人才组成的宣传队具有相当的实力，他们在商业局基层单位及市内“三宫六苑”和郊区一带演出。鉴于当时的环境，文艺宣传队表演的节目主要结合形势，以宣传好人好事为主，间或唱些群众喜闻乐听的名曲《东湖春晓》等。文艺宣传队再次点燃了她对粤曲的梦想。

正当黎佩仪在商业系统文艺宣传队干得如火如荼时，她怀孕了，又再次暂别“舞台”。产后，她重返宣传队，担当主角，先后排练出一批质量高的节目进行巡回演出。

“骨子腔”的魅力惊艳世人

随着国家的拨乱反正，一股清风吹遍神州大地，文艺的春天随之而来。全国各地的文艺团队开始召回人员，恢复建制。由于她在商业局的光芒太盛，商业局舍不得放她走。后来，她对局里领导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终于说服了领导同意她的调离，如愿回到曲艺团。她的丈夫李逢炎也被调回了曲艺团。

1976年，回到曲艺团的他们与失联多年的何伯夫妇联系上。何伯是一名热爱音乐曲艺的发烧友，家境富裕，古道热肠，在文艺界认识很多曲艺名家大腕。作为李逢炎父亲的世交，何伯夫妇对李逢炎夫妻的艺术成长关怀备至。何伯一直欣赏黎佩仪的唱功，关注她的成长。热心的何伯经常安排音乐师傅为李逢炎一家三口开“私伙局”。

“私伙局”一开就是一整天，让黎佩仪过足了“唱瘾”。何伯还将他的同乡世交老友——著名粤剧编剧家陈冠卿介绍给黎佩仪认识。

陈冠卿听完黎佩仪的唱曲，对她赞不绝口，为她撰写了第一首粤曲《妙姑求鸾》，并请黎佩仪亲自伴奏，指导黎佩仪练唱此曲。陈冠卿每次给黎佩仪写新曲，都会详细解析该曲的内容，表达人物及唱腔内心活动和情感处理上的细微之处。在陈冠卿的言传身教下，黎佩仪进步神速。20世纪80年代，黎佩仪在南方剧场首次演唱《妙姑求鸾》，陈冠卿赞叹黎佩仪的唱腔“够骨子（粤语，意为精致、细腻），够幼细”。从此，“骨子”成为黎佩仪的艺术标签。

数百年的粤剧历史中，能创造出个人独特的“腔口”的艺术家寥寥无几，能为众人所知悉的“腔口”也不过只有新马腔、红腔、风腔、薛腔、星腔、凡腔、芳腔、虾腔等10来种而已。“腔口”即是唱腔，是广东人的口头语。“腔口”是艺术家们演唱的技巧与个人特色，这种唱腔是独特的，与众不同的。但“腔”与“腔口”不同，粤曲中“腔”有三种：大喉、平喉、子喉。在过去，极少有音乐唱腔设计，演员们拿着文字剧本，没有简谱，就凭板式去唱。演员们会掂量自己嗓子的优劣，由此去摸索一条新路子。他们可以自由发挥，唱得舒服好听，就渐渐地形成自己独有的“腔口”。“腔口”一旦被群体喜欢，便广为流传。如今，有了音乐唱腔设计，演员就有了依赖，唱腔设计可以说是一条绳索，制约演员的发挥，但这也是粤剧曲艺发展的一个进步。

黎佩仪的“子喉骨子腔”给当时的粤曲世界注入了一股新的活力和生命力。

陈冠卿谱写了《金钏投井》《晴雯补裘》《晴雯撕扇》等独唱曲目来巩固陈佩仪在曲艺舞台上的地位。陈冠卿认为，一个新人要成名，与名家对唱无疑是一条很好的路径。为此，他特意为黎佩仪和大喉唱家白燕仔量身定造，撰写了大子喉



对唱《潞安州》。所谓量身定造，是因为当时黎佩仪和白燕仔唱这首曲是用D调来定调的，而D调用子喉唱来十分刺耳，陈冠卿便特意让子喉唱下行腔，高亢的旋律由大喉演唱，一个高亢，一个低婉，突出曲中两个人物，刻画了陆登夫妇二人死守潞安州的心理活动。在《潞安州》里的一段“反线二王”有高低跌宕，有小“润腔”，有情“润腔”，腔随情转。此曲一面世就一战成名，成为曲艺团的保留曲目。

后来，黎佩仪成为曲艺团二团的子喉担纲独唱演员。她凭着与众不同的“骨子腔”令观众耳目一新而备受瞩目。广东人民广播电台、广东电视台经常邀请她进行采访、录音、录像，节目一经播出即得到受众的认可。1983年，她与白燕仔在广东人民广播电台录唱的《潞安州》更是使她声名远播。今天，《潞安州》已是家喻户晓的经典名曲。而黎佩仪也凭着这部代表作成为人所共知的粤曲名家。

1985年年初，黎佩仪得到著名唱家何丽芳的赏识，何丽芳亲自找蔡衍棻撰写了一首对唱曲《风波英魂》。《风波英魂》是一首真正的上乘之作。黎佩仪把握好此曲的精髓，亲自设计唱腔，李逢炎进行音乐设计。整首曲调慷慨激昂、悲壮激烈、感人肺腑，黎佩仪每次演唱时都让人有一种潸然泪下的感觉。遗憾的是，何丽芳在1987年因病离世，致使这首佳作未能流传下来。

为了让青年演员有更多的发展机会，曲艺团决定成立“青年曲艺团”。黎佩仪成为“青年曲艺团”的顶梁柱。在黎佩仪的组织带动下，青年曲艺团得到了快速发展，经常到珠三角地区演出交流。

1987年秋，为了将曲艺带给海外华侨，弘扬传承中国传统文化，曲艺团以中国代表团的名义首次赴美国、加拿大等巡回演出。黎佩仪和同伴们几经辗转抵达美国，当地华侨用最隆重的礼仪接待他们，之后就是连轴转的演出。班主为节省

开支将演出档期安排得很满，上一场还没演完，台下的演职人员就开始动手准备下一场。一个地方的演出结束后，所有演职人员上车，吃饭就在车里解决。有时候还连夜赶路，大家就在车上睡觉。

大家马不停蹄地工作，但没有人喊苦喊累。在美国纽约，大家连演了7场，黎佩仪印象最深的是与陈笑风的徒弟对唱。陈笑风是早年移民到纽约的粤剧老前辈，他的徒弟热情邀请表演团到当地乐社举办两地大型联欢会。联欢会上，团长突然找到黎佩仪，要她代表表演团与陈笑风的徒弟对唱一曲。黎佩仪与陈笑风的徒弟商定了对唱《落霞孤鹜》。没有时间练习和彩排，两人只能即兴表演。舞台上，黎佩仪落落大方的表演，别致的“子喉骨子腔”唱腔，与陈笑风的徒弟的精彩对唱，博得观众一片喝彩声。

此次出国演出任务的圆满完成，让海外观众记住了这位将“伶腔”和“班味”完美结合的“子喉骨子腔”演唱家。回国后，黎佩仪经常被单独邀请赴美国、加拿大、澳洲演出，她的演出活动受到众多海外华侨的热捧和认可。

奔赴异国他乡寻梦

20世纪80年代后期，港台流行音乐席卷内地市场，粤剧日趋式微。曲艺团青年团以与社会接轨、创收为名，要求所有青年演员都必须转唱流行曲。黎佩仪夫妇拒绝参加流行曲演唱，因转唱流行曲可能会破坏她的子喉骨子腔。

恰在此时，黎佩仪收到一封来自加拿大警魂剧社的邀请函。警魂剧社是加拿大温尼泊市一家华侨音乐社，特邀她和家人以技术移民形式移民加拿大任教，并为她一家规划好了美丽蓝图。这个机会仿佛是黑暗中的一缕微光，黎佩仪一家决定出国。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李逢炎被确诊为中晚

期肝癌。黎佩仪不得不推掉警魂剧社的邀请，留下来照顾丈夫。18个月后，李逢炎还是离开了他的妻女。当黎佩仪深陷丧夫之痛时，加拿大的移民通知书再次寄来。在亲友的劝说和支持下，黎佩仪安排好女儿的工作后，于1991年5月只身飞往加拿大。

在加拿大，黎佩仪被安排到粤曲发烧友顺德同乡黎姐家中居住，她本以为可以在异国大展拳脚。然而警魂剧社只是业余粤剧社，仅周日晚上才有活动，黎佩仪只能在黎姐开的餐馆帮工。这样的生活，黎佩仪在温尼泊坚持了一年有余，视曲艺为生命的她十分煎熬。终于有一天，黎佩仪接到一个陌生电话，对方自称是加拿大亚伯达省卡城艺声音乐社的人员，邀请黎佩仪在社庆时表

演折子戏。卡城是亚伯达新兴城市，是华人聚集区，艺术氛围浓厚，有不少华侨剧社，当时还有许多香港移民不断涌入。艺声音乐社的社庆演出安排在卡城最具规模的金禧大会堂。演出当日，大会堂两旁花团锦簇，场内观众如云，黎佩仪所表演的节目是《斩经堂》，她的独特唱腔瞬间就吸引住观众，令艺声音乐社的负责人激动不已。庆功宴后，艺声音乐社众理事与黎佩仪商谈，请她到卡城设馆授徒，并开出优厚条件，黎佩仪欣然答允。

在卡城，黎佩仪开始了新的艺术生涯。她的学员大多是未经专业训练的华侨子弟，有的甚至连基本的启蒙教育都没有，黎佩仪凭着自身深厚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编排了适合学员的教学



⑥ 黎佩仪、黄俊英等与原广州市市长黎子流等上台谢幕

方案。黎佩仪把学生分成初级班和中级班授课。黎佩仪针对每个个体进行分析研究，她上课时习惯在课堂上模仿学生存在的缺点，引导他们学习正确的发声位置、发口、咬字、运气等等。随着学生的增多，黎佩仪的培训馆升格为黎佩仪剧艺学院，教学训练也越来越规范，越来越系统，学生白天练声、练身段、上唱功课、学戏课，晚上练曲排戏。经过严格训练，学生进步神速，每每演出都能获得观众好评。

寄情于艺术的她开始重新整理她的唱腔。为了让《潞安州》的唱腔更深入人心，让人物情感更饱满，黎佩仪重新加强“反线二黄”的唱腔，用中慢速创作了长腔，来表达陆登夫人对丈夫战败归来内心的痛和对金兵的恨，听来如泣如诉，催人泪下。这是她在加拿大创作整理的第一首唱腔设计教材，采用的是她在广州与姚志强录音的版本。从此，黎佩仪对其他粤曲实施唱腔设计整理，她的“骨子腔”腔口正式系统形成。

在黎佩仪的大力推动下，粤剧文化不仅在华人聚居地广受欢迎，也走入了西方社会艺术界。卡城大学历史系李教授致电黎佩仪，请她带学生到卡城大学表演一场广东大戏。双方商定了2个小时的表演细节，节目要形式多样，短而精，每一个节目3至6分钟，并带翻译讲解，要让西方学生看得明白，才有可能产生兴趣。黎佩仪把几十个参加表演的学生分成多组，每人每次穿戴不同角色的服装出场表演，如扮演小姐、夫人、小旦、小生、老生等等。他们出场的表演由翻译讲解，阐释每个表演动作所要表达的意思，如观花、赏月、照镜、骑马、坐车，还有刀、枪、剑、戟、铃子、马鞭、拂尘等用法。负责翻译的李教授需要配合准确，不能有半点失误。最终，演出圆满结束。台下的观众在演出结束后蜂拥上台拍照，抢先试穿大戏服装，在台上舞刀弄枪，尝试模仿。作为一个中国新移民的戏曲教师，能在异国高校

策划导演这一场成功的演出，黎佩仪感到无比欣慰。

卡城大学的演出活动让黎佩仪剧艺学院声名鹊起，附近的大小城市、埠仔也经常邀请剧艺学院的师生去表演。2004年，黎佩仪带领学生赴澳洲墨尔本为文化推广节作艺术交流表演，之后，剧艺学院的师生多次赴美国三藩市演出，所到之处受到当地观众追捧。

岭南再次响起天籁之声

十几年的传艺生涯，让黎佩仪的艺术之路越走越宽。在黎佩仪的众多弟子当中，当属广东音乐曲艺团的吴思拓、禅山戏曲艺术团团长潘兆洲，以及佛山粤剧院的张娜、彭永东最为优秀。与此同时，以周艳芳、黄晓莹、罗绮华、冯妙裳为代表的业余唱家也成了粤曲传承的佼佼者。

人到暮年，黎佩仪越发想念故乡的一草一木。2000年，黎佩仪回到国内，当时正值“孔雀廊”影音公司大张旗鼓录制粤剧折子戏VCD产品的盛行时期。黎佩仪首次与“星腔”第三代传人黄少梅合作对唱，录制《秋月琵琶》《啼笑因缘之送别》《雪夜访珍妃》3首曲。黎佩仪在尊重原唱的基础下，以自己独特的见解和处理心得用一种新唱腔重新处理人物。作品一经面世，曲迷争相购买并传唱，成为热门经典名曲。

近半个世纪的艺术生涯，黎佩仪的“子喉骨子腔”已经成为独树一帜的唱腔，不论是发声方法、气息控制、旋律融合腔调、装饰音恰当运用上都独具特色，具有细腻传情、腔随字转、含蓄深切、浅唱低吟、声情并茂的效果。2004年，第四届羊城国际粤剧节开幕，黎佩仪在阔别祖国十多年来重返故土舞台。之后，黎佩仪在广州、佛山、顺德、香港等地进行多场演出，她的“子喉骨子腔”魅力再次风靡舞台。●

非遗洪拳的传承

文 《华夏》记者 赵阳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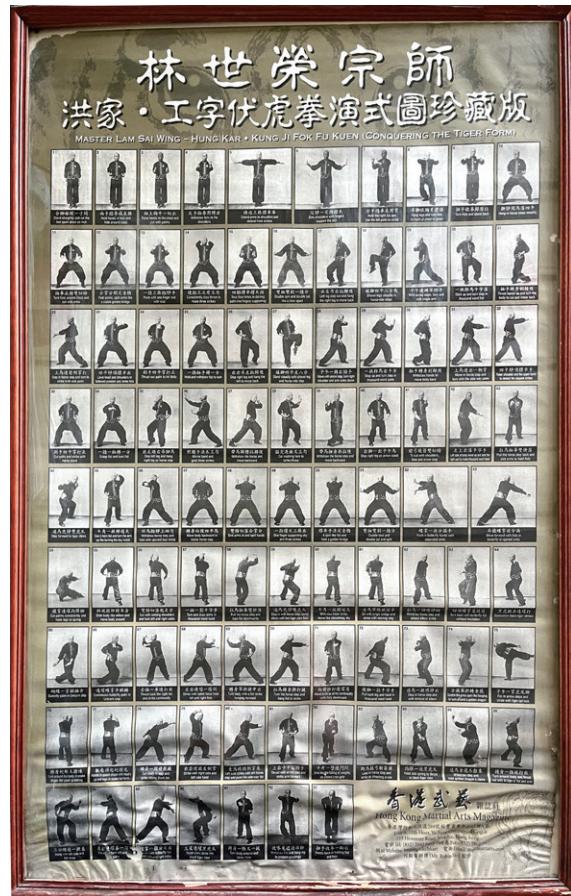
“傲气傲笑万重浪，热血热胜红日光……”这首由黄霑填词，改编自古曲《将军令》的歌曲自1991年面世，迅速红遍中国。铿锵高昂的节奏，豪迈霸气的歌词，再加上专属林子祥的“铁肺”唱法，让这首歌成了经典之作。而与此同时，由李连杰、关之琳主演的《黄飞鸿》系列电影不仅使黄飞鸿成为家喻户晓的武术家，也使“黄飞鸿”这个人物形象成为经典武侠IP。

与2008年大火的由甄子丹主演的《叶问》系列电影不同，看过《叶问》的观众，大多都知道叶问是咏春拳宗师，也能模模糊糊地描述出咏春拳的特点，但看过近20年翻拍的各类有关黄飞鸿的影视作品的观众，却未必能说出黄飞鸿所擅长的拳术名称和拳术特点。就连甄子丹也曾在某次访谈中提到，李连杰饰演的黄飞鸿展示的招数大多是北方大开大合的拳法，并不是历史上黄飞鸿真正所擅长的拳法。

那么黄飞鸿擅长的到底是什么拳术，又对后世有着怎样的影响呢？带着这个问题，我采访了黄飞鸿第五代传人——澳门女孩何泳仪。

广东洪拳的师道与传承

黄飞鸿的拳术，要从南拳说起。南拳又称南方拳，是明代以来流行于南方的拳种的总称，它以广东为中心，广泛流传于长江以南地区，同时广泛流传于东南亚、欧美。南拳门派



② 林世荣工字伏虎拳演示图

众多，如广东洪拳、白眉拳、咏春拳、蔡李佛拳等。

关于广东洪拳的起源，目前有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清军入关时，福建南少林寺成为汉人抗清中心。清人火烧少林寺，迫害其僧俗弟子，部分少林弟子南逃到岭南一带，其艺流传为少林南支，后来衍生出了

广东洪拳。第二种说法称洪拳是清代南方民间秘密结社三合会（洪门）假托少林所传习的一种拳术。第三种说法认为洪拳是由元、明时期陕西地方拳术加上其他拳术演变而来，已有300多年的历史。

后世记载，南逃的少林弟子陆阿彩有个徒弟叫黄麒英，是“广东十虎”（王隐林、黄澄可、苏黑虎、黄麒英、周泰、谭济筠、黎仁超、陈铁志、苏灿、铁桥三）之一。黄麒英生了个儿子，取名为黄锡祥，字达云，号飞鸿。黄飞鸿自幼酷爱习武，先是跟随父亲学武，习得虎拳、鹤拳。1871年，15岁的黄飞鸿仗义搭救铁桥三的大弟子林福成，林福成为了报恩，将铁桥三真传的洪拳中最难上手的铁线拳和飞砣绝技传授给黄飞鸿。此后，黄飞鸿对洪拳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整理，并将这套拳术传给了林世荣等一众弟子。

林世荣师从黄飞鸿20多年，曾获清末在广州东较场举办的首届广东武术比赛第一名。林世荣曾在广州西关长寿大街开设武馆，晚年到香港设馆授徒并著书立说，是黄飞鸿门下最有成就、授徒最多、在广州及香港影响最大的弟子。



⑦ 何泳仪参加第十届广东省大学生运动会

20世纪20年代，祖籍广东省罗定县的黄达生和弟弟黄达雄、妹妹黄玉珍拜林世荣的弟子吴少泉为师，兄妹三人一起练习洪拳。黄达雄后来成了广州武术馆总教练及广州市体委业余体校武术教练，向广东省武术队输送了十几名运动员，还培养了梁艳华、卢伟棠、杨世文等一批全国乃至世界南拳冠军。何泳仪的祖父是传统中医师，擅长驳筋接骨，内外全科，也喜练洪拳，结识了不少练武师傅，其中就有黄达雄。何泳仪的父亲何昭雄4岁就在蔡李佛拳师傅卢强家中，跟随卢强练习洪拳、蔡李佛拳，成为卢强唯一的入室弟子。后来经卢强同意，何昭雄又拜黄达雄为师，成为黄飞鸿系洪拳第四代传承人。何昭雄是广州市一级教练员、中国武术六段及国家一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并担任国际A级武术裁判及教练、广东省洪拳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广州市武术协会委员等职务。

出生于1999年的何泳仪，近水楼台先得月，刚上小学时就被爷爷和父亲“逼”着去习武。“我觉得如果不是我爷爷和爸爸逼着我练，我可能都不会去习武，毕竟扎马步是一件很累的事情。”何泳仪回忆，小时候爷爷对她和哥哥管得很严，每天早上6点起床，15分钟内洗漱整



⑦ 何泳仪和爷爷、父亲、哥哥一起练武

理完毕，然后就开始练功，练到7点就赶紧收拾准备去上学，一年365天，无论刮风下雨都是这样过来的。“我们当时是有一帮师兄弟一起练的，虽然累，但也很开心。等长大一点，体会到武术的奥妙之后，我就慢慢喜欢上了练武。”何泳仪的努力没有白费，参加比赛频频获奖，后来还成为特招生到澳门读书，代表澳门参加国际级武术赛事，先后获世界青少年武术锦标赛冠军、世界传统武术锦标赛蝉联冠军、世界太极拳锦标赛季军等。

胆似铁打，骨似精钢

据何泳仪介绍，洪拳马步稳健、力稳桥沉、形威势烈，具有“硬桥硬马，刚柔并制”的特点。所谓“马”指的是马步，“桥”指的是双手前臂。

在洪拳里面，桥占主导地位，所以对桥的训练是要花费最多功夫的。所谓硬，有两层意思，一个是对骨头练得很硬，这样习武之人就不怕痛，另一个是把力道练得很沉。所以学习洪拳就要先学扎马步，古时闽粤一带的人较为瘦小，力气也相对弱些，因此南拳特别重视下盘的稳定性。何泳仪说，她的父亲小时候习武也是每天要花一个半小时扎马步。“但是现代人生活节奏快，小朋友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和毅力来扎马步，所以我们现在扎马步的时间就不会那么长。”

之后是学习基本步法，如弓步、丁八步、虚步、盖步，以及基本手法如拳、指、掌、爪、桥、肘等等。在手法中，桥手是洪拳的一大特征。洪拳认为人的力量来自身体，发力要通过手掌，而双臂就是力量传递的桥梁，因此洪拳特别重视双臂力量的练习——也就是桥手练习。桥有长桥、

短桥之分。直臂为长桥，屈臂为短桥。洪拳桥手有“洪家十二桥手”之说，讲求要把自己的双臂练得像钢铁那样坚硬，在实战的时候，当对方一拳打过来，只要一个桥手，就能够把对方的手臂折断。

练习桥手时，可以用打木桩或双人对练等等。双人练习桥法也称“搭桥问打”，相当于太极拳的推手，目的是为了“懂劲”（也称“听劲”），懂劲训练之后，人对力量的把握有了一定的认识，接下来就是力量的增强训练。洪拳中力量的训练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静力训练，说白了就是跟自己的肌肉较劲，训练时会用到铁锁、铁圈来负重练习。静力训练是为了使自己的桥沉，在跟对手一搭手的时候要让对方有泰山压顶的感觉。第二种是寸劲训练，也即爆发力。寸劲讲究的是“运松落紧”，简单来讲，就是挥拳的时候要肌肉放松，但拳头落在对手身上的瞬间肌肉要绷紧，因为只有自身舒展才能劲力透达，落在对方身上才能“无坚不摧”。

数十年来，洪拳通过一代代的弟子在海内外广泛流传。洪拳主要有两大体系，一种是前五虎体系（又称老洪拳），特点是高马快步，相传是黄飞鸿的师父“铁桥三”留下来的，现在练这种拳术的人已不多。另一种是后五虎体系，它的特点是长短结合，长桥大马，既有前五虎短桥的手法，又糅合了长桥的手法，马步开得很大，手伸得离对手很近。据传，后五虎体系是由林世荣将黄飞鸿的拳术进行提炼总结后整理而成的。目前流传的大多数洪拳套路都是从林世荣这一派流传下来的。林世荣编写的有关工字伏虎拳、铁线拳及虎鹤双形拳这3套

洪拳套路的拳谱是所有练习洪拳之人必须学习的。

“我们洪拳子弟有‘入门先伏虎’的说法，这也说明了工字伏虎拳是洪拳的‘母拳’，其中包含了洪拳绝大部分的步形步法、手形手法。”何泳仪介绍说，工字伏虎拳之名是由于此拳之步法成一“工”字，练好此套路，便获得了洪拳的基础。而虎鹤双形拳里则大量使用了长桥大马的手法，套路中既取虎的“劲”（如虎之猛）和“形”（如虎爪），又取鹤的“象”（如鹤嘴啄食）和“意”（如鹤的灵秀飘逸），刚柔并济，能“以小击大，以弱击强，千斤之力得以半两消之”，不但具有实战性，也颇具观赏性。铁线拳是一套高级内功拳法，注重练习气和形，以锻炼五脏六腑，强健体魄为主。

如今不少洪拳训练中心（馆）都会让学员练习以上3种拳种。洪拳还有一种最具特色的兵器——板凳。“板凳在古时随手可得，是最常用的兵器。板凳有撞、顶、扫、砸等多种用法，凳面可以格挡，四条腿和四个凳角可以作为攻击点撞击敌人，实用性非常强。”何泳仪说，所以武装



② 何昭雄（前排右二）自4岁起开始习武，在师傅黄达雄（后排右二）的带领下参加各种武术比赛



⑦ 天竣训练中心的师生受邀参加第六届岭南祠堂文化节

剧里或打斗中，一旦有人提议“拔架撑”（操家伙），只要抽起板凳就可以迎战了。

除了板凳以外，洪拳还有枪、鞭、单刀、扇、蝴蝶双刀、双匕首、棍、伞等兵器，种类繁多，学习者可以选择自己喜欢或与体格、性格相适应的兵器进行练习。

用我百点热，耀出千分光

在古时，中国传统武术并无考级、段位之说，习武之人往往是从自身经验及与他人对练中来判断自己的武艺进展情况。所谓“一日练一日功，一日不练百日空。三天不练门外汉，四天不练瞪眼看”。何泳仪对此深有体会，“练着练着你就会发现自己出拳速度更快，力度更强了，跟师兄弟打三星散手的时候，打完之后也会觉得没有以前那么痛。你会明显感受到自身筋骨、肌肉都有变化。”但显然，并非每个洪拳子弟都有像何泳仪的家学渊源和习武氛围，相比起中国传统武术，不少中小学生会选择学习跆拳道、柔道等考核标准更清晰的武术项目。如何能够将洪拳的拳术和丰富的文化内涵传承下去，成为洪拳子弟必须思考的问题。

2007年，何昭雄在广州市海珠区官洲街道成立了广州市天竣武术训练中心，成为广州市武术协会洪家拳会下属的九大训练基地之一。天竣武术训练中心秉承着“武术从娃娃抓起，武术进院校、进社区”的工作方

针，与穗华仑头幼儿园、海珠区基立道小学、海珠区仑头小学、体育东路小学兴国学校、大元帅府小学、广州大道南小学合作开展“传统武术进校园”活动，并赞助举办幼儿武术比赛。据学校反馈，学习洪拳不仅有效提高了孩子们的体质，练就精气神，还增强了孩子们的文化自信和爱国情怀。

随着时代的进步，中国传统武术也在与时俱进，弘扬中华武术传统文化，除了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同时也必须对洪拳本身进行一些规范，比如推出洪拳段位制。目前，洪拳有6个段位套路，以适应不同人群。2017年和2018年，洪拳黄飞鸿派分别列入广州市级和广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2017年，因广州中医药大学开放澳门生保送制度，受家学影响的何泳仪又再次回到内地读书，就读广州中医药大学国际学院中医学专业。所谓“医武同源”，攻读中医的何泳仪也时刻没有忘记洪拳的练习，正在医武同修以武助医和医武同修以传承弘扬武术的道路上努力求索。●

张尔腊的爱国情怀

文 张高徊（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张尔腊，1907年出生于广东梅州大埔县西河漳北渡船头，是晚清进士张薇的孙女。她自幼知书达理，长大后嫁给了在印尼雅加达经商的饶啸林，婚后第二年便去印尼居住。

张尔腊生有三男七女，丈夫提出雇佣保姆，勤俭持家的她拒绝了，就连儿女们的新衣裳，她也亲自缝制。一次，女儿在校参加舞蹈班，需要统一服饰，张尔腊借来样衣自己缝制，她还学会了制作舞鞋。儿女说不如去商店买，她回答：“我的祖父教导我们‘治家以勤俭为基’，这就是勤俭。凡自己可以做的就要自己做，免得多花钱，花钱容易挣钱难。”

张尔腊只要有空闲，就给儿女们讲《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与他们下象棋、军旗，打乒乓球、羽毛球以及做体操，培养儿女的兴趣爱好。

张尔腊十分热爱祖国，虽旅居异国，却念念不忘自己是中国人，长期和家乡的兄长、子侄书信联系。家乡的亲友生活较困难，她除了年节固定寄钱外，遇特殊情况还另外接济。她搬新居，就提前把新地址告诉家乡的亲戚，让大家不要断了联系。她与丈夫为预防政治局势不利，除了让大儿子入印尼国籍外，一家人都保留了中国国籍。即使在印尼排华很严重的时期，她也没有丝毫动摇。她对儿女们说：“我们是中国人，祖先的根在中国，你们读书、工作时可以讲印尼语，回到家里一律要讲家乡话。”她的儿女至今能说一口流畅的家乡话，与家乡人沟通时，人们都不知道他们是“番客”。

1955年4月，周恩来总理率团去印尼出席“亚非会议”，应华侨请求，周总理在雅加达街

道坐敞篷汽车经过，与大家见面。

张尔腊知道后十分高兴，与丈夫一起带儿女们早早就守候在人群中，等待周总理到来。事后她给家乡亲人写信诉说兴奋的心情，形容周总理“面带



② 张尔腊

笑容，精神奕奕，红光满面”，她为能见到中国领导人而骄傲。

1964年，中国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震动了全世界。美国一些政客则说，中国研制原子弹的专家是美国培养的，否则研制不出原子弹。张尔腊非常生气，她写信给家乡亲人时说：“明明是中国志士的聪明才智，他们却要贪天功为己有。美国许多科学技术都少不了中国专家参与呢！”

新中国成立不久，张尔腊看到了新的希望，有了新的打算。她和丈夫商议后，从1956年开始陆续把三女一子送回中国读大学。这四个孩子毕业后在福建、广州和香港等地工作，为建设新中国服务。其时，国家比较贫穷，出台了政策鼓励华侨回国投资建设。大埔县分管华侨事务的副县长徐鹿琴把政策宣传到了印尼。1958年秋，阔别祖国四十年的张尔腊和饶啸林回国，投资建设高陂华侨瓷厂。20世纪80年代后期，饶啸林已去世，张尔腊年事已高，孩子生意也惨淡。但当她听说家乡要建“漳北大桥”时，还是动员儿子捐款，为造福桑梓尽一份力。1993年秋，张尔腊因病逝世，享年87岁。

辉映纳西学园地的白族五朵金花

文 白庚胜（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作为共同生息于滇西北大地的纳西族、白族，自古拥有深厚的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纳西象形文字经典《创世纪》称，纳、藏、白是开天辟地之后同父同母所生的三兄弟；作为玉龙雪山化身的纳西族保护神三多被白族视为本主神；鸡足山悉檀寺由纳西族木增土司所捐建；明清时代白族文人文学对纳西族“木氏六公”诗文、近现代创作的影响有目共睹，甚至和积贤、赵式铭等纳、白前贤还一起于1912年共同创办过中国最早的白话报之一《丽江白话报》。

如今，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深化的新时代，纳、白两个民族在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继续书写着血浓于水、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的壮丽史诗。其中，最美丽的篇章之一，便是纳西学园地所辉映的白族五朵金花。

纳西学是20世纪80年代才拓荒的一方学术园地。它从一开始沐浴着党和国家的阳光雨露，并得到国内外学术江海的润泽滋养。在纳西学学术积累、人才育成、成果交流、活动开展过程中，纳西学首先得到白族作家景谊的援手。当她得知我组织策划的第一届国际东巴文化艺术节行将举行，我拟任会长的国际纳西学学会就要举办，我拟任主编的《国际纳西学学会通讯》正在筹办之后，兴冲冲自费从她所供职的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下属民族文化宫赶往丽江，前去探访友好邻居的土地上所出现的文化盛事，用短短18天的时间写成报告文学作品《节日与生存》，向外界真实报道了丽江及其纳西族的当代文化自觉，在全球化席卷而来的背景下所采取的主动应对与精神赎救，以回答当时正在困惑中的有关文化、文化遗产与现代化、全球化的种种问题，强有力地肯定了当地政府与纳西族社会珍视优秀传统、再造新文明、助推旅游业的积极意义，有力回答了优秀传统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地域的政治、经济、社会、精神价值。当她了解到这些文化行动面临巨大的经济压力后，还四处奔走帮助求援，以支持《国际纳西学学会通讯》的创刊及运转。《节日

与生存》出版后，在中国文学界引起巨大反响，并间接促成了中宣部主持的“我们的节日”系列主题活动及其中央电视台同名电视系列专题片直播，同时对我与冯骥才主持的“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及其传统节日保护项目作了最直接的策应。吃水不忘挖井人，正是景谊这一朵金花的凛寒怒放，纳西学及它所代表的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保护在起步阶段清香四溢。

第二朵金花叫段英。她是四川成都出生的“白二代”，父母都是出版家。其中，母亲是汉族，父亲是白族，奶奶是纳西族。出于这样一种地缘、血缘、文缘的原因，当我于20世纪初年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调动至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持工作，并于不久之后发起主持“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之际，段英先是参加了我于2003年开办的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生班的学习，并代表她所在的文轩出版集团前来“请战”，希望把抢救工程成果全部交由他们出版，还在我主编的《中国民俗志》丛书出版上煞费苦心。后来，当她了解到我继主持召开“20世纪纳西族文学创作讨论会”并出版一套40卷本“纳西族现当代纳西族作家作品集”丛书却受到出版掣肘后，立即安排她任职的光明日报出报社让我遂愿，使之成为即将召开的“21世纪纳西族文学创作讨论会”的重要准备，又一次大大充实了纳西族文学史。目前，她又忙头于为白浩等纳西族本土作家作品走向省外作进一步的努力。说来，白族学人如此助力纳西族文学刊行的盛举早在清末就已开始。

如，赵式铭编《丽郡诗征》《丽郡文征》就是这方面的遗产。段英当是当代社会历史条件下对此传统的一种赓续。

第三朵金花当是发现于2009年至2011年我在云南省政府挂职锻炼期间所认识的杨文顺。那时，我总在丽江及其纳西族同乡集聚的文化活动上看到一个清丽女子的身影。她时而纳西装纳西语，时而白装白语，时而汉装汉语，一切都游刃有余。正当我疑惑于她的民族身份之际，她主动向我认乡亲，说自己是出生于丽江古城区金山乡的白族，不久前已成为纳西族媳妇，并在获得博士学位后任教于云南民族大学。作为同出一乡并初通白族话的乡亲，我便与她亲近了许多。在我幼小的时候，曾记得当地白族女孩一般读书只读到小学五六年级，想不到改革开放以后教育普及在丽江白族社会如此深刻，竟已培养出自己的大学教师、博士，而且做起了纳西、白、汉文化交流的友好使者，我心暗暗称奇。后来，据其他乡友介绍，才知她爱人木永跃是云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两人都是丽江与昆明，在昆丽江人、纳西人所举办纳西学活动最优秀的组织者、参与者。低调、平和、细腻，使杨文顺在旅昆丽江同乡中口碑极佳，并为纳西学提供了最优质的服务。大概缘于她有如此仁厚的宅心所致，不日前再次与她相遇，方知她目前已是中共云南民族大学委员会统战部副部长，以及该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院副院长。

至于第四朵金花段士爱，与我同为乡亲，我至今只闻其香、未蒙其面。她留日归来之后任教于丽江师范专科学校，并先后在丽江师范专科学校之前身丽江教育学院学习、工作。这朵金花虽然唯有暗香来，却沁我心脾，挥之不去，主要是出于从2013年起我与木府博物院原院长黄乃镇筹划主编的“国际纳西学译著”丛书被她承担起翻译日本学者山田勅之《木氏土司政权研究》的重任。起初，由于闻所未闻，我对她的翻译能力心怀疑虑。然而，她将译稿寄来，我的担忧骤然冰释，译文明白晓畅，堪称信、雅、达的佳作。在此之后，因某些糊涂审查官的误判使这部译著的出版障碍重重，去年才在贵州民族出版社的帮助下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在其四处求索突破其出版困局的过程中，我偶尔与她通话一二，她都那样从容、淡定、大气、灿烂，毫无怨言与悔意，更无名利之念，让我这个男子汉也自愧弗如。

最后一朵金花叫段然。她与我相识于云南大学出版社和我的一系列出版合作之中。她本要在云南大学硕士学业结束后报读我的博士生。但是，当得知我早已学剑不成改而从政，不能继续带徒授课之后，她感动于我几十年如一日为耕耘纳西学这方园地而呕心沥血，便决定助我一臂之力。在她看来，我们都是丽江古城区金山乡乡亲，同饮一河水，同戴一片天，纳、白一家亲，且推进纳西学的进步也是繁荣本土文化、参与中华新文明建设的题中之义。她多

次对我说起的一句话是：“我已经不知道自己的具体民族属性所在了，只知道我是在为中华民族做事”。果然，经过数年的努力，她已经成功组织出版了一套由西南师范大学喻遂生教授任总顾问、李晓亮博士为翻译、我任总主编的“境外东巴经释义”丛书，让纳西学的长城又增添了新的堞垛。我知道，这虽借了国家支持出版业、支持少数民族学术繁荣的强劲东风，却也一定花费了她的许多心血，注入了她的无限爱心。毕竟，我曾经为学术出版的艰难而几至头破血流，往事不堪回首，深知其中的三昧。更难得的是，眼下她又在积极促成我与她所在的云南大学合作出版美国国会博物馆收藏的3000卷东巴经典工程立项。

至今，我和我的民族、我的学术团队，从汉、藏、白、彝、苗、傈僳、普米等民族学者，从大理、昆明、成都、重庆、贵阳、上海、北京等地学术、教育、出版部门那里，已经得到难以计数的支持，并感受到了像白族五朵金花这样太多的关怀、关爱、关切，让我与纳西学界永远难忘、别样感动。

由此，让我感铭、感怀的是，小小的纳西学尚且如此，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的其他领域、另外分支、别的民族的文化建设，又该有多少各民族兄弟姐妹守望相助、共圆梦想的精彩故事？对于这一个有血有肉、有形有魂的生命共同体，我们每一个成员难道不都是共建者、共享者？不都应该倍加珍惜、爱护？

梁启超故居游记

文 张梅（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我有个习惯，每次去参观名人故居或风景名胜，都会在这些景点卖纪念品的地方淘书。因为在这些地方，有可能买到小众冷门书。这次在广东新会参观梁启超故居纪念馆，也不例外。多年前，我单位曾组织参观过梁启超故居。那时由港商谭永廉捐赠的新馆还没建好，自然没有卖纪念品的地方。那次参观正好碰上晒陈皮的季节，故居前的水泥地上晒着一朵朵陈皮。

这次去参观梁启超故居，也正是新会陈皮飘香的时节，梁启超故居纪念馆新馆已落成。我听完讲解后，就直奔卖纪念品的店铺，淘书去。果然幸运地淘到了两本梁启超先生的著作，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书法指导》和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欧游心影录》。

梁启超先生才高八斗，1873出生于广东新会县茶坑村。11岁中秀才，16岁中举人，17岁入康有为的万木草堂，从此“康梁”携手闯出天大的名气。他出生时有没有祥瑞，比如说地里长出一棵两苗共秀的嘉禾，史书没有记载。但离他出生地不远的地方，就有一棵举世闻名的独木成林的大榕树，主体长于明末清初。因为历史久远，榕树的气根连气根，扎入土中，成为新的树干。随着时间推移，大榕树中栖息着成千上万只鸟雀，一到黄昏，上万只各种形态的鸟雀鸣叫着飞回大榕树的怀抱，蔚为壮观，又曰“百鸟归巢”，成为广东著名景点——小鸟天堂。

《欧游心影录》是梁启超先生在1918年筹措10万元经费，精选一批学有专长的名人，如外交

家刘崇杰、地质学家丁文江、政治家张君劢、军事理论家蒋百里等，进行了1年的欧洲游历后回来写的。这一年，他刚辞去了段祺瑞内阁的财政部长，退出政坛。《欧游心影录》发表于1919年，细节很多，里面除了他的政治理念外，还写到了沿途所见的人物风俗。比如说在法国住在离巴黎20分钟火车路程的白鲁威，那里是巴黎人的避暑胜地。但因为他们到的时候是冬天，因此冻得苦不堪言，梁启超先生作为广东人更是受不了。“我们同住的三五个人，就把白鲁威当作一个深山道院。巴黎是绝不去的，客人是一个不见的，镇日坐在一间方丈把尺的屋子里头，傍着一个不生不灭的火炉，围着一张亦圆亦方的桌子，各人埋头埋脑做自己的功课”，而在之前“坐了几千里的铁路，游了二十几个名城，除伦敦外，都没有一处住过一来复以上。真是走马看花，疲于奔命”。这些都道出了出游的劳顿。那时梁启超已经45岁了，人到中年，这样奔波也确实辛苦。书中的行文还用了一些广东话，如“通声气、镇日”等。可能是因为梁启超已有疲倦之意，所以整本书也未见有振奋之声，“十九世纪末，全欧洲社会，都是阴沉沉地一片秋气”。10年后，梁启超在北京去世，终年56岁。

在江门五邑华侨博物馆看到梁启超一张照片，浓眉大眼，英气勃勃，眉宇中透出远大的志向，是他26岁时所拍摄，身上的西装上还别着一朵襟花。他和他的老师康有为一样，离开家乡后为自己远大的志向奋斗终生，再也没有回到故乡。

广州市第二中学是我的母校，现在二中的校址是梁启超先生当年就读的学海堂旧址。二中的李颖校长告诉我，梁启超是在1885年进学海堂的，学海堂是当时广州最高学府。学海堂位于广州市越秀山脚下，后来改成应元书院，所以门前的路更名为应元路。我小时候的家在盘福路，也连着越秀山。那时的应元路两旁种着紫荆树，紫荆是亚热带城市的树种，四季开着紫色的花朵。据史书记载，学海堂的创始人两广总督阮元对学海堂选址可谓煞费苦心。三易其地，“初拟于前明南园旧址，略觉湫隘；又拟于城西文澜书院，以地少风景；最后拟于河南海幢寺旁，亦嫌近市。相视久之，遂定于粤秀山”。粤秀山“山半石岩，古木阴翳，绿榕红棉，交柯接叶。”当时的粤秀山即现在的越秀山。南园和海幢寺对广州人来说都很熟悉。我的小说《成珠楼记忆》里也写到海幢寺，南园则是广州少有的带园林的酒家，和泮溪酒家、北园酒家齐名，历史则比后两家久远。

梁启超先生赴广州学海堂读书的时候，从家乡新会过来，也要走个两三天吧。这么小的孩子，是和书僮一起上路吗？还是他的父亲送他来省城读书？他家并不是很富裕，估计是他父亲送他到广州城，提着一只藤箱，可能还摇着一把新会的特产葵扇。新会出产的葵扇是很有名的，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因为那时没有风扇，更别说空调了。一到夏天，大人小孩手里

都摇着一把葵扇，靠它消暑。箱子里会不会有陈皮呢？或者是新会一带的特产，像腌黄皮之类的。那时的粤秀山上的树木不知道是否和现在差不多，榕树和木棉，木棉盛开时艳丽无比。我工作的单位也在越秀山下，门前有两棵硕大的木棉，一到开花的季节，那些肥大的花朵掉满一地，总有街坊过来捡。木棉花可以入药，广东人喜欢用它来煲汤去湿。越秀山是广州人最喜爱的山，因为在城中，因为有历史，因为有木棉。

梁启超故居纪念馆由著名建筑家莫伯治设计，中西合璧，既有晚清岭南园林的特色，又结合了梁先生饮冰室的理念，莫伯治是第一届梁思成建筑奖的获得者。梁启超一生勤奋，著述宏富，各种著述共计达1400多万字，在将近36年的政治活动占据他一生大部分时间的情况下，他每年平均写作达39万字之多。

这次参观，引出了我的联想和感悟。愿梁启超的智慧之光能驱除我的愚钝，照亮我心。●



◎ 梁启超故居 温朝晖/作

一个团子里的幸福史

文 朱学东（《南风窗》杂志原总编辑，《中国》周刊原总编辑）

团子是我江南故乡一种食物。故乡盛产大米及各式蔬菜野菜，这就是团子成为故乡美味的地理和物质基础。

做团子很简单，将用米磨成的粉和开水揉成粉团，让粉团醒一会，再搓成长条，切或摘小段，用手掌搓揉成圆形，搓的过程也是继续增加其黏性和韧性，之后用两根大拇指在粉团正中摁下，双手盘捏粉团，十指配合将粉团中间盘捏出凹空来，然后在中空加入适当馅料，用一掌托着，另一只手边捏边转盘圈，收口将馅料包住。粉团四壁不要太薄，太薄了容易漏馅。一般收口会多出一点粉来，摘掉之后团子就做好了。

团子的形状有几种，根据馅料不同而定。一种是圆锥形，是萝卜丝肉馅团子，它的底通常是平的，这是一种约定俗成。乡亲看到这种形状的团子，就知道是萝卜丝肉馅的。一种是圆形，形似北京人所谓汤圆，个比汤圆大许多，通常是放青菜馅、芝麻馅、豆沙馅、猪油米粉糖馅。青菜馅因煮时间稍长，容易变黄，通常是日常吃，做好了就要赶紧吃掉。过年时，如果几种馅料的团子都做，通常芝麻馅的用白粉圆形，而豆沙馅则用绿芝麻叶汁揉粉团（即青团），为区分各种馅料的团子，可能会在其中一种团子上面点红。

猪油米粉糖馅团子在我小时候过年时常见，如今似乎在乡下已不见踪影。饥饿时代的美味，有时也会被更好的美味淘汰。比如，后来故乡也常用荠菜做团子，还有马兰。我小时候没有吃过马兰馅团子，2020年春天在宜兴雅达书院做读书分享，我第一次吃到，感觉非常好，后来就让母亲做了马兰肉馅团子，至今难忘其味。

当然，平常也有做没馅的团子，压扁圆而已，俗称瘪死团子。还有一种团子，以前过年时会做很多，比北方的汤圆略小，比故乡元宵节或者结婚上梁用的糖圆大许多，类似巨峰葡萄大小，俗称细团子子，又称谢宅子子，通常在新房入住时谢宅用。这种团子，蒸熟，储存后会粘连一起，就像一



② 朱学东

串串巨大的白葡萄。没馅的各种团子，通常是用米粉加水煮，这叫糊粥团子，或者再加些青菜和盐，叫咸汤团子、糊汤团子。

我小时候特别盼着过年，家家户户都会做团子。我家每年都会蒸很多笼团子，萝卜丝肉馅的、芝麻馅的、豆沙馅的、谢宅子子等等，蒸熟、凉却后用井水储存，可以吃到正月十五，甚至更久。小时候过年前后遇上安徽过来讨饭的，父亲和祖母都送两三个团子。

如今我家里还保留这个习俗，因为我家都喜欢吃团子。但品种比过去少了许多，只做萝卜丝肉馅和豆沙馅的，连芝麻馅的都少做了。从前，做团子是过年的象征，如今随时都可以做，这是物质丰裕的一种体现。

以前过年做团子，村里如果谁家先做了，无论大人小孩经过，主家都会豪爽地夹一个新下笼的团子，分享这份快乐。新蒸熟的团子热气腾腾，最好吃。

过年前做团子，是冬日的盛事，也是一种重要的社交活动。因为做的量大，通

常会请亲友和关系好的邻居帮忙，都是女眷。大家一边围拢做团子，一边闲扯，小孩们也围着玩，灶间蒸团子的热气弥漫，整个气氛，热闹和谐。

除了过年会有团子，一些传统时节也出现团子。比如清明前上坟，祭品里会有青团；农历八月廿四谢灶神，通常吃咸汤团子。灶神主收成，有“千谢万谢，不如八月廿四一谢”之说，托灶神福，家家户户这一天都吃咸汤团子。过去这咸汤团子必是素馅，用嫩黄豆和青菜豆制品之类混杂做馅，烧团子时用米粉搅糊粥，糊粥里加青菜、加盐，所以糊粥汤是咸的。我母亲当家后，就改吃肉馅的。母亲说：“过去吃素馅，是因为穷，我相信灶家嬷嬷也喜欢吃带肉的。”对于母亲改弦更张的革新，祖父母也未反对。

我小时候，乡下请人造房子、打家具，主人家都会给匠人师傅做团子吃，因团子不易消化，不像咸粥之类的“软饱”，属于“硬饱”，能撑时间长，匠人吃饱了才有力气干活。这也是旧社会地主或主家农忙时待长工短工的遗风，他们需要长短工吃饱了卖力干，而团子很经济实惠。

如今家里吃团子已是很平常，不像以前要在特殊时节才能吃到。

我的故乡虽是物华天宝之地，但旧时生产力低下，种子质量不好，肥料较差，且没有农药防治病虫害，所以种植的农作物收成都不高。且彼时对农村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农民要交公粮，能自由调配的粮食也不那么充沛。我家就是靠父亲吃公粮的朋友周济才渡过难关的，我们家自己种的菜要拿到集市上卖以贴补家用，购买油盐酱醋。所以只有过年时，我们才能真正放开吃团子。这是一年辛劳节衣缩食的自我犒赏。

而能吃饱饭，能放开吃自己想吃的团子及其他食物，一直要到分田到户承包之后几年。刚分田的时候，虽然生产力依然不高，生产组织方式也原始，但是农家的责任心和动力被解放激发，加上种子、肥料和农药工业也有了进步，农作物

产量迅速提高了，米囤真正满了。但米囤刚满的时候，农家还是不敢放开吃，想着多存点，以备荒年。因为饿怕了，穷怕了。就像我母亲，直到今天，家里每一个人的生日，她都要组织大家吃面并敬谢灶家嬷嬷。母亲说：“敬了灶神，一年就不会饿肚子。”这是饥饿留下的难以忘却的记忆和创伤。所以，连续丰收两三年后，大家盘了好几个新米囤，局面和心态才真正稳定了。

这是时代之变。

随之而来变化，在团子身上也发生了。

萝卜是宜兴太湖边渎上人家种植的，那里的土壤适合种萝卜，产量高，口感好，价格便宜。每年过年前的冬日农闲，渎上人家就会摇着船，顺着永安河，来到我们邻村的码头，船上人走村串户，喊着萝卜来了，周知四方村民。村里当家男人，都挑着苗篮去码头买萝卜，家家户户都会买很多，这既是过年的当家菜，也做馅。错过了几次船来，就得自己去渎上买萝卜了。祖父年轻时，就跟村里人去渎上买过萝卜，一个来回四五十公里，靠肩挑脚走啊。

我家过去也种萝卜，主要是红萝卜，分田后粮食不缺了，开始腾出地方种白萝卜，产量口感也不输渎上人家种的。于是，渎上的萝卜船消失了。随着粮食的充裕，故乡已经工业化城镇化，我家种水稻的面积越来越小，很多良田种上了水果树。果园也开始种荠菜，甚至马兰。这些年回家，我不仅能吃到萝卜丝肉馅的、青菜肉馅的，还有荠菜肉馅的、马兰肉馅的。

20世纪80年代，我到北京上大学，每年寒假开学，乡亲让我捎土特产给他们在京的亲友，米粉是最重要的，这是故乡的思念。我成家后，早些年回家探亲除了带芝麻、青豆、莴笋干、豇豆干等土特产，还有就是煮熟的萝卜丝肉馅团子，而如今各地特产都可以在网上购买，十分方便。

团子，我童年的味道，青年的思念，中老年慰藉。

品茗之水

文 刘释之（《看世界》杂志原总经理）

作为茶道中人，宋徽宗赵佶不但善品茶，还具有相当高的茶理论水平，写出了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茶学专论《大观茶论》，并在其中最早提出了喝茶的水标准。

他认为：“水以清、轻、甘、冽为美。轻甘乃水之自然，独为难得。”后人又在他的基础上增加了个“活”字。像北宋苏东坡《汲江煎茶》诗中就提到：“活水还须活火煎，自临钓石取深清。”唐庚《斗茶记》也提到：“水不问江井，要之贵活。”唐代政治家李德裕更认为：“烹数千里之泉”，不及“今吾提瓶支龙塘，无数十步，此水宜茶”。南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说得更直接：“茶非活水，则不能发其鲜馥。”明代顾元庆《茶谱》中也说：“山水乳泉，漫流者为上。”清人梁章矩在《归田录记》中认为，只有身入山中，方能真正品尝到“清香甘活”的泉水。凡此等等，都说明烹茶水品，当以“新”“鲜”“活”为贵。在中国饮茶史上，曾有“得佳茗不易，觅美泉尤难”之说。烹茶用水主要是追求新鲜和活性，而不是名泉。

为了能喝上新鲜的美泉，古人也真是各尽其法。无锡惠山泉水被茶圣陆羽列为天下第二泉，李德裕听说惠山泉的美名，就想尝尝山泉水的甘甜。他下令建立起一条自京城到无锡汲取惠山泉的特快专递线，这条专递线后来被人们称为“水递”，规定一天一夜之内，必须将水送到西安。

无独有偶，宋徽宗经过反复尝试，发现宫中所储之水一个月内都能保持鲜活，所点之茶色香味也俱全。于是，他下旨责令各地名泉贡水务鲜务活，特别诏令两淮两浙路发运使赵霆当“按月贡水”。

与官僚资本不同，同样为喝到新鲜的“活水”，明代画家李日华就只能利用民间集资的手段发起《运泉约》，组织嘉兴的友人们雇船运送惠山泉，“每坛偿舟力费银三分”，“月运一次，以致清新”。他的斋号就叫“味水斋”，爱水成癖可见一斑。

千里快递活水，固为豪气；百里而致清新，乃见痴心。古人对新鲜活水热衷如此。但更讲究的人就连取水方法也大有学问。明人张岱《陶庵梦忆》里面的《闵老子茶》，就记载他曾经到著名茶师闵汶水处请教。闵汶水煮好一杯茶端给张岱品尝，张岱感觉不俗，问他用什么水煮的茶，答曰惠泉水。张岱奇怪：“惠泉离这里上千里，这么远运过来，而泉水依然新鲜无比，棱角分明，是咋回事呢？”闵汶水说，这可费了牛劲了！我取惠泉水，一定事先把井底淘干净，夜里静待新泉涌上来后，马上打上放进瓮里。而瓮底早就铺好了磊磊山石，既可养味，又能澄水。运输时，从不摇船，但凭自然风吹着船走，“山石磊磊籍瓮底，舟非风则勿行，故水之生磊。即寻常惠水犹逊一头地，况他水耶”，妥妥地在大文学家面前炫耀了一番！古代由于交通不便，以致“汲泉远



⑦ 天人山水 闻蛙草堂/供图

道，必失原味”。而闵汶水却“以石养水”“虽养水味，亦可澄水，令之不淆”。此水质保鲜法确实令人称奇。

名泉之水，古人通过“以石养水”来保持水质，但名泉之水实在可遇而不可求，所谓“居家，苦泉水难得”。古人还尝试过用其他的“养水”方法，目的是为了使普通之水能达到名泉之水的泡茶效果，如“以露养水”。明代的朱国桢把日常用水煮开后倒入大瓷缸，到了夜里“开缸受露”，这样“养水”三天后，据说“烹茶与惠泉无异”。

清人顾仲在《养小录》中记载了一个十分复杂的“顾氏养水法”：“于半夜后舟楫未行时，泛舟至中流，多带罐、瓮取水归。多备大缸贮下，以青竹棍左旋搅百余，急旋成窝，急住手，箬篷盖盖好，勿触动。先时留一空缸，三日后，用木勺于缸中心轻轻舀水入空缸内，原缸内水取至七、八分即止，其周围白滓及底下泥滓，连水洗去尽。将别缸水如前法舀过，又用竹棍搅，盖好。三日后，又舀过，去泥滓。如此三遍，预备洁净灶锅，入水煮滚透，舀取入罐。每罐先入白糖霜三钱于内，入水盖好。一二月后取供煎茶，与泉水莫辨，愈宿愈好。”顾仲的养水方法可谓复杂，这种乐趣恐怕平常人是鲜能体会得到了。

以上说了取水、运水、养水，其实，在茶客眼中就连煮水也颇为讲究。初沸小水泡如鱼眼，水还很鲜活，尚未煮老，此时将刚刚烤软捣碎的茶叶放入最好。边缘如涌泉连珠为二沸，波浪般翻滚为三沸，再煮的话水就已经老了。●

客家山歌在东南亚的传播与融合创新发展

文 陈彦 陈菊芬

客家是汉民族的一个重要分支，是唯一不以地域命名的民系。客家人是中原南迁的汉民，至今还保留着部分古代中原口音。在 2000 多年前的秦朝，客家人为躲避动乱从山西、河南等中原地区向南迁移，在南迁的过程中与南方少数民族文化产生碰撞与融合。目前，国内客家人口已超过 5000 万，主要生活在江西、广东、福建、广西、四川、湖南等地。《广东统计年鉴 2010》记载，旅居海外的客家人分布在 21 个国家，东南亚是客家华人较为集中的地区——其中印度尼西亚约 800 万，马来西亚约 150 万，泰国约 100 万，新加坡约 40 万，该地区约占世界客家华人的 80% 以上。19 世纪中叶，受太平天国运动失败株连以及西方诱导契约劳工的双重影响，客家人开始大批向南洋迁徙，尤其是广东梅县地区。有民谚云：“梅县番客（华侨）断家不断屋。”近代以来，部分客家人开始漂洋过海，向邻近的东南亚迁徙并留在当地发展，并与当地隶属其他方言的群体相融合，组成了东南亚华人社会。

随着客家人的迁徙，客家山歌也漂洋过海来到东南亚，这是客家先民在迁徙过程中传播过去的一种移民文化。总的来看，与当今国内流传的传统客家山歌如出一辙，但又融合了具有东南亚特色的元素，形成了新式客语歌曲。本文将从客家山歌在东南亚的传播途径、融合发展、创新模式和时代特征 4 个方面切入，探索新时代客家山歌在东南亚的传播和发展态势。

客家山歌在东南亚的传播途径

18 至 19 世纪，大批客家人赴马来亚打工谋生。当时的马来亚以丰富锡矿资源成为全球最重要的锡产国，其霹雳州首府怡保曾有“锡都”之称，早期客家人在马来西亚谋生，主要从事锡矿业和橡胶业。《洗琉琅》是一首描写客家劳工在马来亚进行矿业生产的山歌：

洗琉琅，洗琉琅，赶着好阳光。
走到沟尾上，白色沟尾沙。
掏出黑金矿，年轻琉琅妹。
两手洗到软，两脚站到酸。
从早洗到晚，难求温和暖。

“洗琉琅”指琉琅法，是华人最原始的采锡途径。干这一行的多为客家女性，有些从十几岁就开始“洗琉琅”。她们每天劳作十几个小时，从早到晚不能停歇，工作量非常大。从歌词“两脚站到酸”“从早洗到晚”可以看出客家女子作为劳工的艰辛和在海外谋生的不易。

20 世纪 30 年代，马来西亚遭遇百年一遇的经济大萧条，国家经济发展受到严重打击，矿场、橡胶厂的倒闭，导致失业的客籍矿工和胶工在马来西亚大街小巷四处游走，沿街乞讨以维持生计。因此，当时流行的客语歌曲大多数是在诉说劳动的艰苦和生活的困难，唱出了在异国他乡不幸失业的客籍劳工们痛苦、绝望和无能为力，如一首

不知名山歌：

天大光 Kepala (马来语，指工头) 喊出门，
举锄头，担畚箕，担到佛廊头 (马来语，指
矿场)。

锄啊锄，担啊担，担到两角钱，不够买糕点。

客家山歌在马来西亚的传播孕育出一批有名的客语歌曲创作家、歌唱家。如在东南亚影响较大的山歌演唱者丘惠中，因生长于马来西亚这个客家文化浓厚之地，从小就受到客家山歌潜移默化地影响，一生都在为延续客家山歌的生命而奋斗。1937年抗战爆发以来，是马来西亚的客家山歌传唱最活跃的时期，山歌手以客家山歌作为政治鼓舞和传播手段，激发当地民众的抗日救亡精神。在一些筹款义演或宣传活动，客家山歌都曾担任重要角色，并成为当时社会部分民众的精神支撑。1987年马来西亚大选，丘惠中被马华公会政宣部选中为此次候选人的选战宣传队伍撰写并录制了一首励志歌曲《客家山歌情》，作为争取选区大多数客家人选票的“秘密武器”：

看来看去费思量，选出代表意义长。

民生问题待解决，不能只是用口讲，实际服
务才应当……

20世纪90年代，丘惠中常在东南亚各地的华人社区举行客家山歌演唱活动。他组织了一批当地的音乐创作者将客家山歌曲调和歌词与马来西亚民歌相融合，创作了一批具有马来西亚风情的客语歌曲，得到了广泛的传唱。他的歌曲《心爱的家乡》闻名中外，唤醒了马来西亚客家华人的思乡之情：

日头出山照四方，一照照到我家乡。
心爱的马来西亚，政治稳定少灾殃。
人民团结勤劳动，国家进步又富强。
三大民族共建设，多元文化露芬芳……

与马来西亚一衣带水的新加坡是东南亚最

发达的国家。20世纪50年代，客家山歌在新加坡得到迅速传播和发展。在客家人聚居的新加坡美芝路开展了很多自发性的山歌传唱活动。到1965年新加坡正式成为独立国家后，客家山歌的传播开始弱化，逐渐销声匿迹。直到21世纪初，随着全球经济缓慢复苏，当地客家华人的生活才得到逐步改善，一些客家山歌相关的活动和创作才随之兴起，出现了客家歌唱班、小型客家歌谣演唱会、观摩会等，引进了不少境外现代通俗乐曲。如第一届“客家歌谣观摩会”于2004年在新加坡茶阳（大埔）会馆开办，由于这类地方色彩浓郁的山歌盛会第一次在新加坡举行，受邀参加观摩会的客属会馆共有26所，吸引了300多名客属会馆会员前来观看。新加坡“客家歌谣观摩会”至今已经举办十余届，受到当地民众的广泛好评。

21世纪以来，新加坡各客家会馆开始举办客家山歌歌谣大赛，每两年一届。从早期的儒乐社、汉剧社，发展为现在的华乐团、山歌班、客家合唱团等，新加坡各客家会馆经常邀请中国艺人来交流学习，并多次回中国参加山歌联谊活动。

在新加坡，客家山歌兴盛的原因主要来自客家华人群体对客家文化的认同。新加坡南洋客属总会、会馆及其下设客家山歌培训班起到“客家文化堡垒”的作用。客家社团是新加坡山歌传播的中流砥柱，现下设26所规模不一的客属血缘性和地缘性宗乡会馆。虽然这些艺术团体都是业余的，但对艺术的追求却时刻以专业为标准，常在海内外客家华人社团的联谊、庆典等活动中演绎山歌，致力于传播客家山歌文化。新加坡缺乏悠久的历史与深厚的积淀，客家山歌发展和演唱的水平只能算是一般，但聆听者却能从歌曲中感受到一种其乐融融的氛围。新加坡人民善于学习，他们从毗邻的马来西亚以及中国请来客家山歌的演唱者与研究者进行友好交流、学习，不断提升自身山歌演唱水平和能力。

传统山歌与东南亚音乐文化的融合

改革开放以来，许多海外客属公会组织邀请中国内地客家歌手前来东南亚进行演出交流。传统的客家山歌在东南亚生根发芽，并与东南亚本土音乐文化相互借鉴交流、融合发展，最终形成了极具东南亚特色的的新式客语歌曲。这个时期，客家山歌开始从田野乡间走向音乐殿堂，同时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客家山歌代言人、传承人。他们四处收集客家山歌，并将其中调性相近的歌曲有机融合在一起，通过乐段的组合、复合拍子的运用以及速度变化等音乐创作手法，将原有的四句体乐段结构的客家山歌编创成了一首完整的乐曲。

1. 班顿民歌与山歌的融合

马来西亚的传统歌谣——班顿通常是由四行组成，被称为“马来四行诗”，歌词以抒情达意为主。班顿四言一句，四句一章，开头两行通常

是用作暗喻的字句，运用起兴手法，后两行才是传达主要意义的部分。这种艺术手法与《诗经》的创作手法类似，是班顿与中华客家山歌的最大共通之处。在韵律方面，班顿的韵脚多为“平仄平仄”的形式，一般为隔句押韵，一三行与二四行各押一韵，即使四行同押一韵也未尝不可。每句由8至12个音节组成，重顿挫，富有音乐节奏感。

要推动客家山歌在马来西亚的发展必须与当地文化进行交流与融合。马来西亚客家华人常说：“山歌是客家人的班顿，班顿是马来人的山歌。”《拉沙沙央唱山歌》是新式客语歌曲的典型代表，歌曲的旋律是马来西亚著名的班顿民歌，歌词则是传统山歌《客家山歌特出名》的唱词。这首歌曲既是客家文化与马来西亚当地文化的巧妙融合的代表之作，也是客家人情感在海外的生动体现。班顿民歌与传统客家山歌的融合，就以《拉沙沙央唱山歌》和《客家山歌特出名》为例：

拉沙沙央唱山歌

⑦ 谱例1：马来西亚新式客语歌曲《拉沙沙央唱山歌》

客家山歌特出名

梅县山歌

⑧ 谱例2：传统山歌《客家山歌特出名》

谱例1展示的《拉沙沙央唱山歌》这首作品，在曲式结构上是A-B-A1的再现曲式，A乐段与B乐段都是由4+4的乐句组成，A1是A乐段的再现部分；B乐段中采用了传统客家山歌的唱词，音与音之间充分利用二度模唱的方式进行融合演唱，最后再进行A乐段的反复。整首歌曲旋律欢快活泼，传唱度非常高。

谱例2展示的《客家山歌特出名》这首作品，旋律完全采用了广东梅县松口客家山歌，曲调丰富多彩而有特色。这首山歌属于七言体结构，朗朗上口，歌词朴实简单却富有诗意，且多用修辞手法。歌曲的曲式结构为A+B结构，A、B乐段各为4+4的乐句组成，整首山歌由四句构成，骨干音调在mi、re、do、la四声音阶中。A乐段反复强调“re、mi”，“la、do”作为迂回装饰，B乐段开头承接A乐段的尾音“la、do”，并在B乐段反复强调，“re、mi”作为迂回装饰，最后落在“la”音上结束，整首歌曲的结构非常丰富有趣。

班顿的唱法、唱腔和表达的形式都与传统的客家山歌如出一辙，歌词排编和旋律方面也与客家山歌十分契合，两者巧妙地融合到一起就形成了当代蕴含着浓郁东南亚风情的新客语山歌。丘惠中先生的山歌《生命加油站》体现了两种音乐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拉沙沙央配山歌，文化交流真唔错。
优良传统齐爱惜，山歌班顿将手拖。

班顿与客家山歌融合后有一定的改变：一方面是曲式的改变，客家山歌是四句一首的乐段式，跟班顿民歌融合后，形成了A-B-A段式的结构，也就是一个完整的歌曲结构；另一方面则是歌曲演唱风格的改变，传统客家山歌的形成与其历史和当地文化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常常要求具有诗意和音韵美。山歌创作者在自编自唱的过程中，也会受到客家方言、腔调的影响。总的来说，客家山歌的曲调较为平稳，旋律较为忧伤，

整体上给人的感觉比较抒情，在跟相对快节奏的马来班顿民歌融合后，形成了这种有节奏、有动感的新式客语歌曲。

2. 马来西亚日常生活融入山歌

客家人喜爱唱歌，山歌是客家人民日常生活中最重要、最常见的表情达意途径。客家山歌产生于劳动生活中，是客家人的口头文化传承方式。对于客语流行音乐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张少林是马来西亚的客家山歌代言人，也是一位草根歌手。张少林祖籍广东惠州，出生于马来西亚，至今已创作近千首客语歌曲。他的作品大多是描述马来西亚客家华人的日常生活，歌词、旋律纯真朴实，贴近底层劳动人民，受到马来西亚客籍华人的喜爱。聆听他的歌曲，在字里行间可以感受到客家华人在东南亚的最真实生活状态。张少林创作的客语歌曲用最简单的方式和歌词表达了客家人漂泊在海外的艰苦、朴素生活。张少林的出现对客家山歌在马来西亚的发展起到了强有力的推动力，也为新式客语歌曲在东南亚的传播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歌王斗歌仙》是20世纪70年代首创新潮爆笑的客家歌剧，由邱清云、谢玲玲、张少林三人演唱。由于歌词幽默诙谐且贴近劳动人民，当年红遍大街小巷：

诶，话𠵼系歌王，
讲到唱歌名震四方。
齐家听过都晓赞扬，
𠵼的师傅系姓张，
天光清早就来唱。
鸡公都讲𠵼条气比其长，
人人听过就晓早巷。
大众给我，𠵼系歌王……

客家话是客家文化的传承，“𠵼”字就是一种象征，“𠵼系客家人”即“我是客家人”，我为客家代言。张少林填词的客语歌曲《𠵼系客家人》

以一个客家人的角度自述，赞扬了客家人吃苦耐劳、艰苦奋斗、努力拼搏的优良传统美德。这首新式客语歌曲曾传遍整个东南亚，唤醒了许多海外客家华人对故乡的思念和情感的共鸣：

𠵼系正宗个客家人，勤劳𠵼好有冲劲。
前方路艰苦有浪涛，没惊一个人去拼。
𠵼又大方又好热情，人人其都来相信……

东南亚客家山歌的创新发展模式

现阶段，流行音乐处于欣欣向荣的黄金时期，流行音乐与民族元素的融合也碰撞出前所未有的火花，流行音乐民族化成为新的发展趋势。对标客家山歌来看，现代流行音乐与传统的中华客家山歌互为依托、互相借鉴，将二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能够创作出具有东南亚特色的的新式客语流行歌曲。

1. 新时代山歌的呈现平台

近年来，中国与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的民间交流日益频繁，世界客属恳亲大会也多次在中国举办。如1971年第一届恳亲大会在香港崇正总会召开，21世纪以来每年举办一次。世界客属恳亲大会不仅是海内外客属乡亲情感沟通的重要途径，还为世界各地客家人开展经济合作、政治交流以及文化传播提供了广阔的平台。恳亲大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全球客家群体间的文化交流，尤其在客家山歌的传播方面，大量的中国新创作客语歌曲作品流传到东南亚，并获得了当地客家华人的一致认同和喜爱。客家山歌多次在客属恳亲大会上亮相，如第9届“梅州客家山歌团”的代表在文艺晚会上的表演独领风骚，第15届举办了“客家山歌演唱会”，第21届有客家山歌团参与演出，第27届有客家山歌《撑船调》《唔怕山高水又深》的演绎，第30届参会嘉

宾集体演唱了陈善宝创作的主题曲《Hakka客家》。

客家人是华人当中较早来到马来西亚的，是“下南洋”和“过番”的主要力量。自2004年以来马来西亚每年都会举办客家文化节，活动以客家文化为主题，以弘扬、发展、创新客家文化为目的，为全球各地客家人建立一个长期的文化交流平台。至今，客家文化节已举办十余届，获得了马来西亚客家华人的大力支持和赞赏。2018年沙巴客家文化节客属情深联谊晚宴大型庆典活动上，龙南县客家山歌队作为唯一一支来自中国的客家文化表演团演唱了《开口一唱歌成河》《千树万树桃花开》《九条河》等多首客家山歌，赢得全场客家乡亲热烈的掌声。在东南亚许多活动和客家山歌演唱会现场，来自世界各地的山歌爱好者和歌手产生联动，他们即兴对歌、放声歌唱，美妙的歌声与爽朗的笑声交融在一起，使得活动现场的气氛十分热烈。

2. 注入流行音乐元素进行创编

客家山歌是中国文化的传统瑰宝，随着时代的变迁，用多元曲风演绎的山歌受到越来越多年轻人的喜爱。如今的东南亚有一群创作者用流行音乐传唱不老的山歌，致力于用现代多元音乐元素去表达和传播民族文化，让更多年轻人听山歌、唱山歌。东南亚流行的客语歌曲在传统客家山歌的基础上注入了新时代元素，并结合符合现代审美的流行音乐创编成了新式客语歌曲。这些歌曲经过改良后仍然保留着客家山歌原有的韵味和风格，以及客家传统歌曲亲切且富于特质的形象。如今会说客家话、听客家山歌的年轻人越来越少，让山歌新唱，吸引更多的年轻人，不仅是出于对民族音乐的情感，也是责无旁贷的音乐使命。新时代客家山歌的创作应继续回归到客家山水之间，继续探索原生态的山歌与现代流行音乐的融合之路。

采用流行音乐风格创编的客语歌曲往往保留



② 福建漳州南靖土楼——梅林怀远楼

着客家山歌的古老传统——用客家话演唱、唱词与唱腔紧密结合、装饰音风格特别、强调衬词、自由和混合拍子和口语化等特点。东南亚多为岛国，属海洋性气候，相对久居大山的客家人而言山的概念会淡薄许多。也正是这个原因，在东南亚传播的新式客语歌曲相比传统客家山歌少了一分高亢嘹亮的韵味，但却又多了一分平和铺陈的口语化感觉。

东南亚客家山歌的时代特征

1. 保留优秀文化内涵——继承性

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对客家山歌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客家山歌的传承面临巨大难题。面对新时期环境的变化，我们首先需要做到“继承传统，推陈出新”，就是要继承客家山歌中蕴含的优良传统美德和寓意。与此同时，也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有效识别客家山歌中蕴含的文化内涵，保留其积极的、有意义的、符合时代发展的部分，摒弃消极的、落后的、陈旧的内容。

客家人在迁徙的过程中风餐露宿、居无定所，这使得他们的性格中闪烁着吃苦耐劳、不畏艰苦的光芒，这正是中华民族勤劳勇敢、自强不息、奋发图强的优秀品德体现，这种精神品质也深刻地烙印在客家山歌中。通过聆听客家山歌，可以使听众感受到客家先人一脉相承的精神力量。山歌中丰富的文化内涵可以让莘莘学子受到优秀文化的熏陶，从而增强其民族自豪感与文化自信。在聆听客家山歌时我们能感受到山歌歌词背后流淌着的历史和生活，使人产生强烈的共鸣。此外，客家山歌中还包含许多有关崇文重教、忠孝传家的训导。古时的客家人大多依山而居，居住环境恶劣，他们坚信学习是唯一能够改变生活、改变命运的渠道。这样的精神鼓舞着无数的客家后辈努力学习、积极向上，都是值得保留的优秀文化内涵。

2. 积极融合当地文化——包容性

客家山歌具有很强的包容性，主要体现在对东南亚文化的兼收并蓄上。客家山歌在创作过程

中始终遵循“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基本原则，积极吸收东南亚本地优秀音乐元素进行演唱形式、歌词、曲调、旋律等方面改变，从而创作出一批具有东南亚本地特色的新式客语歌曲。这种创作形式受到东南亚当地人民的喜爱，也使客家山歌在东南亚的传播有了新的发展方向。

东南亚的客家文化与众不同，一方面保留了中原文化本身的特征，另一方面又汲取了当地民族文化的精华。这里的客家人将本土山歌与当地优秀的文化艺术风格相结合，并进行不断的创新发展，最终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独特的新式客语歌曲。比如前文所提到的马来西亚班顿民歌与中华客家山歌的融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马来西亚青年与体育部副部长拿督廖中莱曾这样说道：“我们的文化虽然源自于中华文化和华夏文化，可是我们不但继承了中华文化的精粹，而且和其他友族文化互相交流、融合与丰富，早已经形成马华文化的独特性，如今天大家学习的客家山歌很多都是本地创作，已经形成了具有‘本土性’的客家山歌。”

3. 充分运用现代媒体技术——时代性

世界迈入新媒体时代，传播模式逐渐变得多样化和信息化。然而此时的客家山歌仍然停留在“口传心授”的阶段，这也使得其传播发展面临巨大困境。

众所周知，山歌是客家人在生产劳动过程中传唱的。在古代，客家人大多居住于山区，平日在田野山岭间劳作，跟外界没有过多交流，缺乏大众化娱乐，只能通过山歌抒发自己的内心情感。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交通条件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居住于田野山岭的客家人开始离开祖祖辈辈生活的农村和田地，移居到了东南亚，这也直接导致客家山歌失去了长久以来赖以生存的土壤和环境而日渐式微。与此同时，现代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大众有了更多渠道满足自身文化需

求，不再局限于通过传统渠道聆听客家山歌，而是通过电视、手机、电台、互联网等现代方式聆听来自海内外四面八方的美妙歌声。

对于东南亚客家山歌发展的问题，我们需要寻求创新性，现代媒体技术就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比如为客家山歌制作伴奏，并把其刻录成 VCD、DVD 光碟上市发售，让更多东南亚当地人民接触、欣赏客家山歌。再比如，近年来短视频 app 的火爆，诸如抖音、快手、火山小视频等已经逐渐成为当今文化传播的重要渠道。客家山歌可以借助这些新媒体传播渠道提高自身的大众认可度和接纳度，还能借此向东南亚民众宣传岭南优秀文化和中华传统文化，可谓一举两得。

客家山歌在东南亚的发展呈现出传播渠道的多样性、民族音乐的融合性和编曲的创新性等特点，都为新时代客家山歌在海外的传播模式提供了蓝图，并奠定了一定的前期基础。

从文化联系的角度上看，客家山歌在东南亚的传播，是海内外客家人同根同源、一脉相承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重要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十九大会议上指出：“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如此看来，客家山歌在东南亚的传播与融合创新发展，不仅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中国强大的民族文化自信，还展现出中华文化寻求多元文化的融合，促进中华客家山歌真正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作者分别是广东技术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硕士研究生、教授。本文系 2018 年度广东省教育厅普通高校特色创新类项目《岭南歌谣在新时代的传承与弘扬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18WTSCX080]

波密雪域的嘎朗王朝

文 王厚基（广州市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专业作家）

距今大约 1500 年前，在神秘的雪域藏地上，部落与王室之间为争夺权柄，穷兵黩武，战争频仍，古吐蕃王国飘散出了最初的血腥气味。一个叫夏赤的王室后裔为逃避杀戮流落工布之东，其子孙后代就在这个后来称作波密（古称博窝）的地方落地生根，被拥戴为王，延续第巴（土邦首领），代传霸业，最终建立了权盛一方的嘎朗王朝。

如今，王朝早已湮灭，坐落在波密古乡嘎朗村嘎朗湖畔桃苑密林深处的昔日王宫，给这个世界留下的仅是一道道高矮不一干疮百孔的破败城墙，残垣断壁间已丝毫看不到王者往昔的荣光与骄傲，那粗朴深沉的雄风也早已被冰川冻土所覆盖。

然而，默默行走在帕隆藏布河北岸，走在这片神奇辽远的雪域藏地上，被远远近近的神山、圣泉、魂湖、密林所包围，仍会赫然入梦，梦回嘎朗第巴那世代的荣耀与忧伤中去，听到昔日的王者为曾经的荣耀与风流惊呼，为开疆拓土励精图治呐喊，在杀戮的血泊中悲歌，在灾难和罪孽中痛泣……

仿佛，那些孤独的魂灵们，正向藏王故里的来客倾诉，倾诉一部鲜为人知的尘封千年的虽败犹荣史。

波密之王血脉缘起于古吐蕃王朝始祖聂赤

赞普。

据传，最早的藏王聂赤赞普生于雅砻河畔一个至高无上的尊贵家庭，降生时分，即显王者之相，众皆惊为天人，遂冠以聂赤赞普之名。赞普，是对王者的敬语。

那是公元 3 世纪，聂赤赞普征服了各地土邦诸侯，驻居于青瓦达孜，建立了部落奴隶制的博王国，从而作为雅砻部落的第一个王出现在西藏的历史上，雪域藏地从此进入部落联盟时代，古吐蕃王室便由他而始。

据《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载，王室传至第六代止贡赞普，部族械斗，赞普遇害，其子夏赤、聂赤和甲赤纷纷避难于工布、娘布和波布。战乱平息后，其子皆被当地土邦推为首领，长子夏赤则被接回山南，继位第九代古吐蕃王室藏王。而夏赤在工布之东所生子嗣则扎根于波密，遂成邦王，并世代相传。

由此，古老的藏地上便先后形成了两个王权分支——一支是延绵数百年的藏王传承体系，以聂赤赞普后裔松赞干布为代表的统一青藏高原各部落的吐蕃王朝盛世。而另一支则是后起的波密土王传承体系，以夏赤后裔森格章为土王始，血脉传承，至贡尼波布的出现，在形似狮子口的色沃山脊密林中盖起波密第一座具相当规模的城堡，标志着波密地方政权——嘎朗王朝的诞生。

从最初的波密小邦土王算起，到末代嘎朗王旺钦顿堆止，整整五十四代，把这个数字和它的

岁月年轮镌刻在一个民族和王朝历史的碑碣上，是那么的炫目！

三

在中国辽远的西域，藏地自古是中国的一部分，在其历代地方政权传承体系的漫漫长卷中，为何会另有一个王朝在其管辖之地延续千年？据《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以及《西藏地方古代史》等书载：藏地历朝政权和世代藏民皆持同一观点，古代七赤天王之首聂赤赞普的本家在波密，嘎朗王朝的根系血脉缘起于古吐蕃王室始祖。

祸兮，福之所倚。一场灾难孕育出后世的希望与崛起。

藏王止贡赞普蒙难，而皇族血脉夏赤后裔扎、珠、董三个家族世系却才人辈出，匍匐波密，高擎先祖的精神旗帜，将祖训发扬光大，建功立业，特别在传扬佛教上，将藏传佛教带入当地，并开创出“拉杰贝江”教派，被拥为地方主教。世系中后来又分支出嘎、纳、查三大家族，扎的家族

中出了拉杰白央、松赞玉松、努岭顿巴等兄弟几人，他们承继祖辈衣钵，在波密讲经传法，继续大兴佛教，并修寺建塔，从四面八方慕名而来的僧俗信众络绎不绝，令兄弟声望日隆，为日后的扩展和掌控波密地方政权奠定了坚实的政教基础。

不久，努岭顿巴和他的儿子本根阿娘，在帕隆藏布河北岸的色沃山上，盖起了波密的第一座城堡。这是一座不算十分雄伟的城堡，却寄托了一个王室家族在复兴路上的全部梦想与希望，是他们从土邦迈向王朝，为子孙踏上政治旅程的首发站。

此时，历史的年轮已滑向1180年，吐蕃王朝金戈铁马铸就的辉煌早已落幕，嘎朗王朝却如旭日冉冉初升。由夏赤家族继往开来的土邦王族在波密世代坚守，仿佛都在为迎接一个伟大时代的来临，数百年间，一切奋斗和进取似乎都在等待一位杰出王者的诞生。

四

这个掀开嘎朗王朝盛世序幕的王者便是贡尼



⑥ 嘎朗村掩照在一片桃苑密林中

波布。

传说，本根阿娘之子贡尼波布即位时，曾得一高僧指点，说嘎朗村地形险峻，易守难攻，那座像极了卧狮的山后，有形似孔雀开屏的大山拱托，狮子口远望仿如一个金碧辉煌的宝座，王宫建于此地，必会荣华富贵，万民拥戴，且代代相传。于是，贡尼波布在嘎朗湖畔的色沃山上大张旗鼓扩建王宫。据《普龙寺志》记：“城堡盖在这块风水宝地上，大地像八瓣莲花，天空像八幅法轮，下有不变狮子座，前有不变鲜血湖，城堡建在不变孔雀翎下。”

贡尼波布风华正茂，少年亲政，呼啸一声登上金光灿灿的狮子宝座，在那片“白色的天空”（藏语，“嘎朗”之意）下，彻底送走了此前数百年小邦土王的历史，作为史称的第一代嘎朗王，开始了一个王朝政治上的励精图治，并由此带领他的子民进入史无前例的波密盛世。

其时已是 1240 年，冰雪王国经历了与唐朝的纷争、会盟，经历了唐太宗时期“天有日月一对，地有赞普甥舅”，松赞干布迎娶文成公主，汉藏亲善，往还友好，经历了吐蕃王朝崩溃，部族分裂割据，地方政权向宋王朝纳贡，宋仁宗对藏地最大的部落首领唃厮啰加官晋爵，其部落属地全数改为宋朝郡县……历史已进入 13 世纪中叶，蒙古人成吉思汗风卷残云，横扫整个欧亚大陆，雪域藏地已被正式纳入了元朝管辖的广大版图。

贡尼波布把管治领地迅猛扩至山南、贡布、康区等地，建立了一整套王朝体系和制度。他任命三位大臣分别掌管辖区内的军事、法制和税收，任命一位得道高僧统管佛教事务，属下首领各尽所能，各司其职。又设立易贡宗、布堆宗、曲宗，由他亲自派出内臣担任宗本（县长）。在他的管治之下，波密社稷安宁，藏民僧众安居乐业。而继他之后的十数代，均承其福荫与衣钵。从 13 至 17 世纪，悠悠数百载，波密地区佛光普照，四方绥靖，经济稳定，名闻于世的普龙寺、

倾多寺、松宗寺、曲宗寺等寺庙便是这时期的杰作。此时的波密大地果如那位高僧所言，江山代传，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五

公元 1717 年，嘎朗王朝传至第二十代本根，远近教派纷争，烽烟突起，原本就与蒙古部族有教派积怨的嘎朗人与蒙古人发生了一场血战。悍勇的蒙古兵冲入王宫，焚烧佛文经书，烧毁官邸，王宫被毁于一旦，本根走投无路，遣散大臣，自己投奔山南的亲戚去了。然而，坚强的嘎朗人并没有因此一蹶不振，战火平息后，嘎朗王本根从血泊中顽强爬起，收拾残局，召回旧部，在嘎朗湖畔后半山的雪瓦卡村重新矗立起一座宫殿，这是嘎朗建朝以来修筑的第四座王宫。如同藏地阿里的札达土林、前藏的拉加里、后藏的萨迦一样，嘎朗王朝再度崛起于藏王故里。

也许，蒙古人的战火引燃了嘎朗人渴望舒展与搏击的强烈欲望，本根逝后，其子尼玛杰布亲政，他有一种王者的深谋远虑和强烈的宗教使命感，继位之初即一展王者霸气，一路披荆斩棘，收复统一了波密周边偏僻地区的多个部落，扩大了王朝的地盘，分别在嘎朗、易贡等地区建立分治政权，重新派出大臣前往各宗任职，制定新规，每年向臣民征收一定的酥油和牛羊做税收，拿出部分上缴清中央政府册封的班禅政权和清驻藏大臣衙门，余下的作为王国的开支和积累。在波密境内建起了多东寺、巴卡寺和易贡寺。又常带一班手下大臣前去膜拜供奉享有藏佛教权威地位、设在王权中心拉萨的哲蚌寺、色拉寺和甘丹寺，并出资对这些寺进行大力的修缮、修建。这位身上流淌着藏王祖先血脉的波密王着实感动了朝野，尼玛杰布每到拉萨朝贡，西藏地方政府均派官员远道接力相迎，奉为上宾，足见五世班禅和达赖对其器重。

六

然而，世事的惊变与残酷令人慨叹。历史来到 19 世纪第 21 个年头，波密大地风云突变。

是年，功德圆满的第二十一代嘎朗王尼玛杰布病逝，膝下无嗣，近亲支脉手下头目扎布与汪鲁为争夺王位，抢夺土地，内乱顿起，历十余年械斗不止。

1832 年，拉萨噶厦政府派员调停，均遭双方拒绝，于是派兵查办。扎布以为官兵来夺王位，即与之交战，藏军首领比西中箭身亡，仲尼龙珠旺结被俘后亦被波密人用两骡拖死，藏军死伤无数，据说官兵的血把杂雅洛河都染红了，扎布还率众抢劫边坝和硕板多牧场的粮仓。为保波密政局稳定，噶厦政府奉清廷之令再派重兵讨伐，波密民兵如何敌得过政府军？首犯丹巴噶木和如那结等人纷纷被擒遭杀，头人扎木、汪鲁只得率属民归顺。

而此时的归顺，只是一种慑于对方军威的无奈，并非出自真心。如《清宣宗实录》所述：博窝（波密）人“旋服旋扰”，使藏东南不得安宁，直至大兵压境，方才“捆献贼酋”。在随后的五年间，波密境内又发生了两次大的动乱，扎木自恃盘踞波密下部山高林密险峻境地，常伺机率众疯抢工布商旅牛羊什物，残害百姓，围困官寨，截夺政府公文，焚烧帐房，杀害噶厦政府驻波密营官，抢夺粮食，追杀官兵，烧毁曲多木总管府前桥梁，在边坝、巴里郎等地肆虐作恶。于是清朝廷降旨，噶厦官兵再次奉命与清军一道，1835 年和 1837 年两次会剿波密，最终将罪犯番民制服，正法扎布父子，重兵之下，波密始复平静。

七

波密事件过后，如《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史》中所述：“第巴随后在倾多、许木等地设官，

并订立了出牧、纳差的章程，使波密地区初步纳入（噶厦）统治。”朝廷驻藏大臣派出官员赴波密清查户口，勘定界址，噶厦政府派出一名四品营官率兵驻守倾多。汪鲁则登上第二十二代嘎朗王宝座。在其后的近三十年中，子孙顺利守业继位，成为第二十三、二十四代嘎朗王，嘎朗王朝臣服于拉萨噶厦政府，与外间相安无事。

遗憾的是，这时候上天没有再次降临一位拨开迷雾指点江山的明君，令这片伤了元气的土地得以休养生息，反而让祸乱重蹈覆辙。

1862 年，王朝大臣扎玛私自在通麦、边坝一带设卡拦路，抢劫和杀害过往行商，并向嘎朗王朝抗税，后来竟发展至公然与嘎朗王桑阿正面对抗，据说扎马最后被桑阿怒杀于色容卡。而由此，导致各部族之间篡夺王位祸乱又起，相互倾轧。自 19 世纪下半叶开始，王朝内部族之间再度陷入无休止的械斗和仇杀中。

此时，嘎朗王已传至第二十五代索朗央坚，王者身上吐蕃祖先的基因恐怕早已稀释，贡尼波布开创王朝慈悲为怀的佛偈圣训早已淡忘，失去了尼玛杰布厚德载物的王者风范，在他为王的岁月里始终扮演着不太光彩的角色。也许，门巴、珞巴两部族不该在他执政之年祸起萧墙，导致他从中插手，在门巴、珞巴两部族间不断自相残杀中渔翁得利，并以此向噶厦政府索取利益，在贪婪的权欲中将王朝再次带入邪路。他对待两个部族矛盾的办法，竟是时而纵容时而调解，时而看似劝和却又实质袒护，时而又好坏不分，挑起事端，令双方仇恨的火焰此起彼伏。

可怜波密这片神山圣土饱受血腥与恐怖的煎熬，又一次坠落灾难的深渊。而索朗央坚最终也未能逃脱悲惨的命运，成为手下部落头领曲丹玛族人的刀下之鬼，轻易地将生命结束在许木寺旁的部族谈判桌上，可悲可叹！

此时的嘎朗王朝，彷如一个骄横无度且失去自控力的老者，已无法挽回衰老病弱的天命，正

蹒跚在历史前行的路上，自愚而不自知，一步步走向穷途。

八

公元 1909 年，跨入 20 世纪的第 9 年，尽管这时清皇朝已走向末年，但自 13 世纪中叶蒙古人将青藏高原纳入统一施政管辖的版图后，华夏大地经历了元、明、清几个朝代的政权更迭，西藏历代地方政府一直臣服于中央朝廷，嘎朗王室虽是藏地历代政府相对分散的地方政权，但随着波密地区动乱的加剧，此时不能不受到西藏噶厦政府和清朝廷的格外重视和进一步管治。

是年，索朗央坚赞婿、第二十六代嘎朗王白才旺属民在忠义沟喇嘛庙抢劫行商，行凶作恶，扰攘唐古忒大道，噶厦政府派兵前往整肃。此时正值英军二次侵略西藏，攻陷拉萨，胁迫清朝廷和西藏噶厦地方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拉萨条约，皇朝内外交困，白才旺竟屯兵七千之众，恃波密之险抗命，噶厦官兵被击退，清驻藏大臣联豫派员招抚亦被其拒绝。

次年，朝廷命统领钟颖率新军大举剿办，钟颖先礼后兵，派员招抚，又遭伤害，于是进军冬久，两旅交战于纳玉，藏军一再退败。噶厦政府一边再派左参赞罗长倚率军东进，一边向驻藏清军、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求援。于是清藏联军长驱包抄直捣波密，大捷，两军会师于易贡，白才旺则败走白马岗（今墨脱）。1911 年 6 月，噶厦官兵与驻藏清军一道乘胜追击，兵分东西两路，势如破竹，再次进剿波密。7 月 3 日，倾多寺众僧缴械投降；7 月 8 日，克取宿木宗，歼波密军百余；7 月 17 日抵达嘎朗村，攻陷波密全境。同日，藏军进驻达兴寺，从此地翻越冰川金珠山，抵达白马岗穷追白才旺。白才旺率残部数百节节还抗，屡战屡败。

据说，清藏联军压境波密之时，白才旺慑



② 昔日古乡成为今天的旅游胜地

于清军后营管带程凤翔声威，意图投诚噶厦，但遭其弟德色吉古极力阻拦，德等人集合汤墨、易贡、许木、宜鲁等各寺藏族僧众抵抗。清藏联军攻破各寺，白才旺败走白马岗后，再有意请人从中调解投诚，但又遭其兄洛冗等人反对，并纠集各寺“野番”千余人负隅还抗。在白马岗，清藏联军得到当地一位深受藏族、巴门族人信奉的活佛吉仲大力协助，没费多少枪刃，双方并无兵戎血战，白才旺就被当地宗本道布送去的假情报诱导，陷入重围，最终被珞巴族士兵用毒箭射杀于西姆河畔，并被割下首级，和其兄弟首级一并献与藏军，其余各部头领望风而降。至此，波密残兵余部全数归顺清藏联军。

白才旺哪里会想到，从他倒毙于西姆河畔冰川冻土上的那一刻开始，衰老的嘎朗王朝已经和他一起与千里之外的清皇朝一道敲响了丧钟。他在波密这片圣洁而亘古的雪域藏地上，在厮杀的铁蹄下洒下洇红的鲜血，给世人留下的是一个王朝重重的疑虑与哀伤。

九

也许，1911 年那个初冬，在细雪纷飞的西姆河畔，白才旺被割下头颅前的每一个瞬间，他还在用尽气力撑起他那伤痕累累的身躯，用血红

的双眼茫然四顾，寻找他多年前选定的驸马旺钦顿堆，那一刻，他是多么渴望他的贤婿能将千年的王朝延续下去。

不知是白马才旺眼光独到，还是嘎朗王朝天数未尽，清藏联军虽然攻陷了波密，但彼时外面的世界已经换了天日，清朝覆灭，西康建省之事被搁置，川军在藏哗变，西藏发起反清运动，朝廷边军草草撤走，波密交还噶厦地方政府。对这片雪域的管治最终还是回复到以前的状态。

旺钦顿堆重整旗鼓，一登上王位当即做了两件大事：一是顺应民心，实行轻徭薄赋。二是招兵买马，扩充地盘，南面的墨脱、察隅，西面的工布，东北面的八宿、昌都一带在他凌厉的攻势下都成为其势力范围。这两大举措奇迹般地令嘎朗王朝绝处逢生，东山再起。

然而，与其说时局不可估，还不如说旺钦顿堆生不逢时，纵然他有天赐的智慧和雪域雄鹰般的体魄，也难以抵挡来自喜马拉雅南端的黑色暴风。

+

公元1914年，英国侵略者在其殖民地印度炮制“西姆拉会议”，加紧了侵略西藏的部署，亲英分子藏军总司令擦绒·达桑占堆授命率师东进，欲从拉萨进军昌都，波密被视为藏军最佳屯粮后勤基地。东进则要先克波密，而波密地势险峻，山高林密，噶厦军不敢妄动，正无计可施之际。忽传旺钦顿堆妻子病故，擦绒·达桑占堆大喜，即心生一计，抓住时机将亲妹妹次仁卓玛下嫁于他，并许下日后赏地封官承诺。旺钦顿堆不知是计，迎娶了次仁卓玛。

噶厦政府趁藏波联姻取得了嘎朗王的信任后，委任昌都总管的亲信贡布索朗到波密做商务总管，暗中搜集、窃取情报，为军事攻占波密做准备。不久后，擦绒·达桑占堆让旺钦顿

堆携妻返拉萨探亲。夫妻分批出发，到达通麦后，忽被易贡首领前来挡驾，揭穿阴谋，告诫去则被杀，嘎朗王恍然大悟，立即返回波密。而次仁卓玛早已携贵重财宝，窃去区内机密，一去不归。

此时，回到波密的旺钦顿堆也发现了贡布索朗的阴谋，遂连夜围捕，贡布索朗一路狂奔逃往昌都。两年后，噶厦政府又以普查土地、人口、牲畜为名，派达瓦那为团长率五百官兵驻扎达兴寺，要求嘎朗王朝向噶厦政府交税，旺钦顿堆率众对抗，并先发制人将五名来使诛杀，并向达瓦那宣战。1928年秋，达瓦那率军大败旺钦顿堆。然而，就在达瓦那向昌都报捷后的一天，在达兴寺门前对军官训话时，突然被密林深处射出的冷枪命中腹部丧命，官兵四散，数十人被嘎朗民兵趁乱诛灭。噶厦龙颜大怒，即调集五千重兵，从五路包围波密，藏波之战由此再次打响。

重兵之下，嘎朗民兵寡不敌众，尼洛、喀达、喀多、宗达、贡扎、雪瓦卡等地首领相继被擒，旺钦顿堆则藏身一座寺庙内，化装成僧人逃出，回到雪瓦卡后，发现大势已去，一把火把嘎朗王宫焚毁殆尽，带着数名随从和金银珠宝贵重之物，经玉普绒、然乌、桑昂曲宗、察隅一路逃往印度的萨地亚。

雪瓦卡村那一把通天大火把嘎朗王宫烧得荡然无存，熊熊的大火宣告着一个王朝的彻底覆灭。嘎朗王国从此化作一片灰烬，深埋在雪域藏地的冻土之下，千年王朝最后留给这个世界的竟是一片谜一样的历史的茫然。

公元1928年的深秋，遂成寇的末代嘎朗王旺钦顿堆穿越茫茫冰川莽莽林海，孤独地去往他国。不知道行色仓皇的他可有频频回首北望，抱憾从此离开这片与天接壤的藏王故里，离开波密这片生他养他的冰川雪原，抱憾离开伟大的华夏大地，不知道半生戎马的他可有为此洒下一掬难舍的英雄泪？

德和里之心

文 谢锐勤（法学博士，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

正月初五，吃完两碗软糯可口的东里猪脚饭，午后游海上丝绸之路三大起源地之一的樟林古港，接近黄昏时回到德和里大夫第外埕闲坐。天空蓝得透彻，阳光照在身上暖洋洋的，适合遐想。入驻德和里的制茶名师强哥送来一泡锯朵仔，与妻女喝茶，清香中带着悠远，回甘中略有甜味。斜躺在竹椅上，芳草鲜美，妻女戏耍，在一杯杯暖胃暖心的工夫茶中，细细品味老厝百年来的往事。

1916年，在暹罗发家的华侨陈欣木回到潮汕，在汕头市澄海区东里镇樟林塘西村购地筑造德和里，历时5年，于1921年落成。德和里占地8.4亩，是“四点金”大厝，潮式基调，雕梁画栋，糅合古今，融汇中西，刚落成便成为潮汕建筑的代表性作品，至今刚好一百年。百年沧桑，风云变幻，德和里是一部耐人寻味的典藏。

陈欣木家族不但饮水思源，而且高瞻远瞩，将古今和中西的美学风格淋漓尽致地展现在德和里。石雕、木雕、灰雕及壁画遍布大门、梁架、亭阁和窗台等地，或人物，或吉祥物，或历史传说，层次丰富，栩栩如生，既体现国风技艺的精髓，又呈现潮汕民居的审美。大夫第风围墙上花窗，原以为只是通风透气，没想到中间镂空出“福星拱照”四个篆书大字，别出心裁。又如祠堂正厅梁架上精美的书册，初看像一本本打开的书页，再看像一层层翻滚的波浪，细看像一块块美味的潮州春卷，寓意深远。

欧风美韵更多以点缀的形式为德和里画龙点睛。向荣别墅中的春晖亭，亭顶是灵动的中式飞檐，亭柱从柱础到柱子却是雅致的欧式方形，柱子之间又以圆润的罗马拱形门相连，为别墅带来精致的欧式建筑风格。哲谋广居书斋的门面用马约利卡瓷砖装饰，门顶则是蓝色主色调“天使抱球”造型灰塑，球似仙桃，好像在托住稳稳的幸福，又似地球仪，宛若在拥抱广阔的世界，两位小小的胖天使为樟林古港带来一抹憨态可掬而又其味无穷的西洋气息。

书斋对联曰：“无求品自高山斗气象，有容德乃大海天襟怀。”经商致富的陈欣木家族不忘诗书传家，将经书雕刻在最庄严的祠堂和祠堂最重要的梁架上，以此修身齐家。更不忘放眼未来，将地球塑造在最远虑的书斋和书斋最显眼的门楣上，以此“治国平天下”。可以说，没有宽广的视野与宏大的格局就没有德和里，而视野与格局的背后，又是什么在支撑呢？

祠堂正面门楼肚有4方石刻，鳌刻《朱子家训》全文；门楼肚两侧分别刻有王阳明先生的《示宪儿》，女



⑦ 德和里大夫第正厅茶室



② 德和里中西结合的窗门

史班昭的《女诫》。既有针对全家的家规，又有特别告诫儿子和女儿的家训，可谓周全。大夫第门楼、哲谋广居客厅、向荣别墅厅门等也都有勤劳、谦虚、和气、忍让、磨砺等励志格言，书法琳琅满目，雅俗共赏，皆为当时名家之作。可见，是良好的家风与家教支撑起家族的事业，而非相反。德和里所有的石刻或门联，不为附庸风雅，而是日常实践，是暖心的情节，更是流动的文化。

一百年来，陈氏家族生生不息，人才辈出，在全世界开枝散叶，在东南亚名望尤甚，直到第五代仍文脉昌盛。族人后辈凭借人品与富贵在东南亚国家担任拿督或成为侨领的比比皆是。好家风与大事业从来都相辅相成，而两者的背后又是什么理念在指导呢？

一百年来，陈氏家族热心公益，扶文助教。1922年潮汕发生“八二风灾”，陈家捐善款200元并参与灾后安保。抗战初期，德和里曾暂借给部队作为潮澄饶抗战自卫队指挥部。1939年，德和里借给澄海中学作为临时课室和教师宿舍。1956年前后，又驻扎过解放军。陈家前后几代人

赞助建设韩江学校，推动马来西亚华文教育。数十年来，陈家海外族人还长期寄侨批接济和赡养乡族。20世纪80年代，陈家后人变卖饶平祖业铺路建校，资助乡土文献出版、曲艺乐社发展。1992年，又汇来25000元善款建设家乡塘西小学新校舍。

持续不断的善举，既赢得乡人的尊重，也获得文人的敬仰，更得到后人的光大。岁贡陈舜、秀才王抡元、《民国日报》社长陈特、教育家黄炎培等知名人士都曾寓居德和里，以不同方式向陈家表达敬意。

由年久失修，过去数年德和里有所荒落，如今乘着复兴传统文化的东风，在各类志愿者组织的协助下，陈家后人自费修复老厝，开放给社工站、潮汕文化研究中心、汕头市华侨历史研究会等机构免费使用，与先祖当年在乡里开办明德女子职业学校之举不谋而合，老厝新使命，义举还在书写，传奇仍在继续。

所以，与其说是良好的家风支撑起陈氏家族的兴旺，不如说是善良的人心造就了德和里的辉煌。陈家后人陈椰说：“修复老厝，修复的更是人心。”是啊，这修复的不仅是陈氏家族的人心，也是樟林古港的人心。如此，德和里不也是一条海上丝绸之路，将善良的人心联结在一起吗？德和里不也是一艘红头船，接续将精神财富驶向五湖四海吗？

行走德和里期间，没有大宅院颐指气使的压迫感，也没有老厝半零不落的荒凉感，更没有暴发户孤陋寡闻的粗鄙感，而是处处弥漫花香、茶香与书香。品读陈氏家族的故事，仿佛看到一段精彩绝伦的潮汕华侨史，领悟到一种使命的传承，一种心灵的教育。于陈氏家族而言，最好的传承不是公司，不是金钱，不是房子，而是视野与格局、家风与家教、奉献与善良，这难道不是对后人更负责的态度吗？后人今日之成就不也是对先人厚望最好的回报吗？

碧海青天夜夜心

——戴维斯·佳七年祭

文 春子（广州大学教授）

来自凤城的凤凰

郭南斯，祖籍广东清远，1921年出生于中国，后移民英国。1989年5月，南斯在英国的美丽海岸城市拉姆斯基为市长慈善基金会筹款而举办的中国之夜文艺晚会上，操持历时两个半小时的晚会。民谣独唱、朗诵、舞蹈等节目尽展南斯作为“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中国杰出民间文化大使”的实力与魅力。在场400多位中外人士除了记住南斯，还记住了始终在旁相助的南斯的丈夫戴维斯·佳。晚会一切的摆设、道具的安排都是他亲手置理，他为南斯腾出时间补妆更衣，还会操纵演出《红梅赞》、古筝《上楼》。举办这场晚会的另一重要目的是促进拉姆斯基市和中国清远市结为姐妹城市，演出司仪是前任市长夫人（女议员），她在开幕时特别以一句颇有诗意的话作了介绍：“郭南斯是来自凤城（清远）的凤凰。”

郭南斯自幼酷爱文学、美术、歌舞，曾在欧、亚、非三大洲举办过64次个展，用中英文写了不少艺术评论和诗文，经常被邀请到英国各大学、博物馆和艺术团体等讲学及表演，被誉为艺术界奇才和最杰出的中国文化大使。与英国人戴维斯·佳结婚后，南斯定居英国。戴维斯·佳是英国著名建筑师，曾受聘于联合国，经公司特别委托赴冈比亚、缅甸和阿富汗工作，所到之处掀起了一股股“南斯热”，成就了诸多南斯艺术创作。

1999年4月，郭南斯落叶归根，回到清远，还带回了一只“白头鸟”——戴维斯·佳，是真

正意义上的鸟归巢。

夫妻俩结合中英两国民居传统结构和现代局部设计理念共同设计完成了清远市政府为其兴建的郭南斯艺术馆，外观最引人注目的是戴维斯·佳为南斯拍摄的那张被誉为“最受人欣赏和注意”的照片。南斯也非常喜欢它并作过解释：“照片与众不同之处是极微妙地应用了极含蓄的处理法——在照片放大时很轻微地移动了底片，造成了雷奥那·达·文西式的人轮廓融化在柔和的明暗之间的技巧。人也就像被罩在一种神秘的气氛、梦境里似的，一张平常的照片就升上了不平常的诗境。”

凤凰在巢

南斯向人们介绍自己的洋夫婿时说：“就叫他佳或阿佳吧！”

阿佳不会听说中文，是一个功能上的“聋哑人”，但这不妨碍他自豪地称自己是“半个中国人”。因为南斯，他非常爱中国。

在清远，但凡有友人到访，阿佳泡茶、冲咖啡、制作漂亮果盅的动作十分娴熟、潇洒。

有一段时间，南斯热衷于每日早餐后作盐浴。每逢电话铃响，阿佳就会很客气委婉地说：“请过一阵再打来吧，南斯这时不方便接电话呢！”

南斯有腰疾，炒菜时，阿佳会把椅子在两灶台处搬来搬去，方便她操作。他们始终没请保姆。

在厨房劳作时，阿佳动听的口哨声便会扬

起，最让人欣赏的是那首《重归苏莲托》（另有译为《重归索伦多》），旋律怀念着蔚蓝的大海，也有男女情愫的幽怨。“请别抛弃我，别让我再受痛苦，重归苏莲托，你回来吧！”但阿佳的哨声欢快、明亮。那是阿佳在怀念他的故乡——美丽的曼彻斯特。

阿佳的笛子吹得不错。我曾送过一只葫芦丝给他。

阿佳十分开心，当即吹了起来，但二者的吹法完全不同，以致他始终无法无师自通。这引来了南斯的悔。她说：“当初回清远时我让阿佳把那小提琴送了人，不然现在阿佳可以拿它作消遣了。”

南斯在海外拥有多个耀眼头衔：国际美术家协会会员、国际艺术评论家协会会员（英国唯一的华人会员）、国际笔会会员、全球作家协会和英国



① 2003年，郭南斯与戴维斯·佳在清远家中

演员协会的终身荣誉会员以及英国华人作家协会顾问。这是基于她在诗歌、绘画、舞蹈、歌唱、戏剧表演、写作、雕塑、剪纸等艺术领域的诸多建树使然。在此之上被誉为“最卓越的民间文化大使”是南斯为家乡人民显示自己的最好身份。

南斯曾称阿佳是“自己最好的打字员、厨师和司机”，其实还远不止于此。南斯绘画，阿佳配制画框；南斯作根雕、骨象、石象、傀儡等，阿佳帮着清洗及操作；又如南斯准备做各式主题的艺术展时，阿佳那双灵巧的手为展品一一赶制木箱并装运。在英国，大家盛赞南斯“非常幸运地有一位很能合作的丈夫在旁相助”。到清远定居后，戴维斯·佳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直接熏陶下，更是身体力行，从幕后走到了台前。

凤凰在巢。那时的他们依然充满活力、心畅神怡，生命呈现着无限风采。除了认真履行清远市荣誉市民的职责，还应邀参加一系列国内外相关活动，如“亚太华商领袖大会暨亚太文化与经济发展论坛”及多个著名城市的国际诗人笔会等。

清远籍雕塑家郑有江为南斯与阿佳均作了塑像。铜像形神俱妙，恰如其分地把握住了人物独特的气质和神韵。南斯看了自己的塑像后称赞说：“看上去很有灵气，比我的英国朋友所塑的石膏像更出色、更耐看。”

戴郭伉俪九十大寿。小说家高小莉组织团队策划编导了八集长篇音画散文《印象郭南斯：生命的舞者》，展示了郭南斯九十春秋的传奇人生。在观赏时你

会真切感受戴郭伉俪的神情举止扑面而来。

历经数年，《郭南斯的世界》第一至三集自费在清远出版，即《忆德钦哥都迈大师·怀念缅甸和缅甸的友人》（2004年）、《国画大师和诗人送给郭南斯的画和诗》（2007年）、《郭南斯的多种创作：根雕，骨象，石象，葫芦舞女，傀儡，面人，衣帽，首饰，家具，陶瓷，舞狮，舞龙，各种舞蹈，为阿富汗设计云石桌面》（2009年）。书籍的编撰图文并茂，厚重而质朴，展现了求真求善求美的基本价值理想。他们的敬业观念及人格精神再次得到提升。

望穿秋水

阿佳没有自己的孩子，始终视南斯与前夫所生女儿飞灵为己出。孰料1972年年初，年仅32岁的飞灵在中国的一次采访中不幸病逝。而阿佳陪伴南斯回到祖籍地时俩人均已78岁了。回国后，苦候4年，郭南斯艺术馆的兴建可谓一波三折，媒体甚至作过“一锤定音定址开工”的报导。望穿秋水，馆址却始终定不下来。南斯说：“我们已经不能再等了。”

南斯为此陷入了莫名的焦虑。她的朋友也在通过多种渠道促成此事，尤其是曾经的文化部部长、《白毛女》作者贺敬之及诗人柯岩伉俪以“文艺战线上的老兵”的名义向时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求助。一年又一年的等待磨损了南斯的身体，诸多病痛接踵而至。这也影响到阿佳，他的忘性大了，再也听不到那动人的口哨声了。南斯甚至因此萌发了返回英国之去意。

南斯不止一次向朋友们诉说着对阿佳的担忧——“没有我，他连最起码的电话也不会打。”“有时我感到真的很对不起他。”“我真担心是否我害了他。”

清远市中医院副院长曾丽萍说，每每她打开南斯的冰箱，除一个番茄或洋葱，再无其他。见

着年已逾八旬的夫妻俩，才真正懂得什么叫膝下犹虚了。

自此，我每次去清远，便用一只黑帆布背包装满胡萝卜、洋葱、番茄及阿佳最爱吃的牛油、起司等食品。南斯每次见之，欣喜地说：“呀，你把超市都搬来了。”阿佳起身洗了胡萝卜并打成汁。他嗜黄油、尤喜起司。南斯却不爱。阿佳把黄油涂在饼干上，俩人开心得像个孩子。

郑有江为戴郭伉俪义务买菜坚持一年多；曾丽萍则把夫妻俩的坐骨神经、腿与膝等处病痛的治疗、护理及白内障等手术事项全包下来，安排得妥妥当当。

惠风和畅。曾丽萍作为民主党派清远九三学社主委多次陈情，促使清远市政府派了两名保姆轮流照顾戴郭伉俪，朋友们才放下心。

守得云开见月明。2014年11月，郭南斯艺术馆正式在清远市北江一座江心岛上落成，是月12日举行揭幕仪式。93岁的戴郭伉俪坐着轮椅郑重地见证了整整十五年的等候而美梦终成真的难忘时刻。他们凝神静气，一种如释重负的欣慰溢于言表。南斯独自一人转着轮椅缓缓绕馆，有沉思、有驻足、有默语，也有依恋。阿佳没有随同南斯，他极有礼貌地和前来与他握手的人致意并微笑着，矜持、谦和、自在、淡定。似乎在告诉人们，他把自己的一生都放在这里了。人们记住了他的微笑，是阿佳那样的永远的微笑。

天上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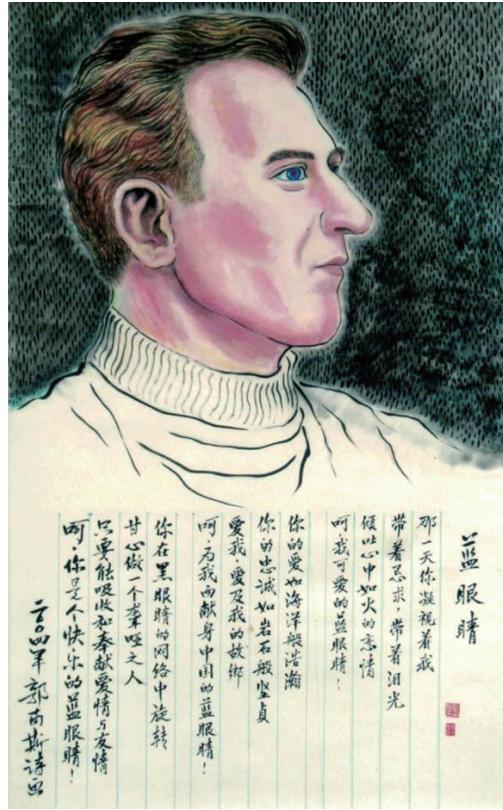
阿佳住院了。保姆说，阿佳不肯吃东西、后来甚至连水也不愿喝，最后就那样走了。诊断结果是“感染性休克、感染性衰竭”，时为2015年3月9日。

清远市政府为这位清远市外籍荣誉市民、城乡建设顾问举办了一场体面的追悼会。阿佳是英国公民，所以英驻穗领事馆派了官员到场。在穗



左图：雕塑家郑有江为南斯塑像

右图：郭南斯为丈夫戴维斯·佳作的诗画《蓝眼睛》



的朋友也纷纷赶来一起向这位可亲可敬最具风度的英国绅士作最后的告别。

戴维斯·佳静卧在花丛中，告别的哀乐是一首英文歌《你好，警察》，女中音缓缓而起的旋律听来令人忧伤、不胜唏嘘。欣慰的是阿佳终于在母语的陪伴下到天国和他的亲人团聚了。

清远郭氏后人表示，要把阿佳葬在祖坟地马骝山上入土为安。南斯祖籍地的乡民以国人置白事的最高规格向他们的洋女婿表示了最大和最后的敬意。

保姆说，阿佳走后南斯大哭了三场，后来会突然问：“阿佳去哪里了？”

再后来南斯每天都会这样问十多次。

2001年的国庆节与中秋佳节同日，南斯曾以

“百合花为你倾诉 明月来相照”为主旨写了题为《今日何日》的结婚五十二周年的纪念诗，颂赞“坚强的爱情在静默中不须用语言交代”的阿佳。十五年后，2016年的中秋节，月圆人圆，南斯终于选择在天上和阿佳团聚了。

阿佳是一位标准的英国绅士，他对感情的表达不会似法国男士那么浪漫。在阿佳 67 年的爱的庇荫下，南斯能怡乐安康，让自己亦帮助世人去发现生活之美、享受美继而学习创造美，令人生充满真善至荣。人们赞赏阿佳，颂扬着这天上人间极具深远价值的跨国之恋。

今后，在清远这块美丽的土地上，人们也依然会流传着阿佳与南斯爱的传奇。说什么天长地久有时尽，道不尽碧海青天夜夜心。●

《岭南读碑记》：一个文化人的时代担当

文 张艳想（贵州省德江县文联党组书记、主席）

初识林汉筠老师，始于东西部协作，农历辛丑年暮秋，生于湘居于莞的他来到贵州省铜仁市德江县文联挂职；再识林汉筠老师，源自《岭南读碑记》，他让我领略到了什么是文化人的时代担当。东莞有着湾区都市之称、“世界工厂”之誉，经济发展十分迅速。随之而来的烦恼是有些人对东莞的认识产生了偏颇，认为“这里就是一块文化沙漠”。如何讲好东莞故事，回击这些谬论？这成了摆在东莞人，尤其是东莞文化人面前的难题。林汉筠老师“放弃了节假日，放弃了一切工作之外的邀请，放下古籍，走进山头、田埂，穿过大街、小巷，寻找‘生长’在这里的碑石……挖掘岭南千年文化”，用时5年1800多天，终成散文集《岭南读碑记》。

读之见高度。一块块碑里，记录着历史上一个个生动的故事，一个个高尚的灵魂，一个个不灭的精神……它们耀眼的光芒，织成东莞精神的象牙塔：《却金坊记》中李恺的廉政，《重修还金亭记》中袁友信的诚信，《节马碑》中将军陈连升和战马黄骝的赤胆忠义，《陈伯陶墓志碑》中源于陈伯陶“忠信笃敬”的“暨南精神”，《罗公神道碑铭》中边塞将军罗亨信的忠烈，《宋梅外处士传》中书生李春叟的精神高洁、人格崇高，《重修鳌峙塘围堤记》中徐景唐“不苟狃一时之幸，得以为继”的工匠精神，《重修榴花塔记》中袁昌祚的取之有道、爱民护民，《宋东莞封氏始祖墓志铭》中封少瑜的善良热忱、团结凝聚，《陈小姐图书馆碑》中赖云英的乐善好施、回报家乡，《石经幢》中邵廷琄的忠言逆耳、精忠报国，《黄友亭志》中黄友等五人的以身为国、虽死不惧，《朱执信纪念碑碑记》

中朱执信的英勇正义，《仁孝亭记》中蔡丽金的忠孝、忠节、忠贞，《创立虎门义学记》中关天培的仁义，《金鳌洲塔记》中无数文人为东莞带来的灵魂和灵气，《东莞县创建儒学记》中学宫的支撑，精神的支撑，《高埗大桥碑》中袁仲庆的敢为人先、先行先试，《张敬修<可轩题识>》中的孝……这些精神，这些大义，不正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力诠释吗？这不仅仅是挖掘东莞文化，更是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的有力举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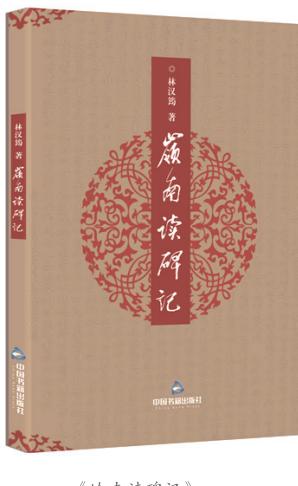
读之见文脉。《金鳌洲塔：绵延420年的文人秀》《重学：回荡在时光里的书声》两篇散文，从人文和办学上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东莞的文脉。东莞县令翁汝遇“一次微服私访，为金鳌洲舞出了千年秀场”。明朝户部主事王献、兵部尚书苏观生、后任福建按察使的王应华、后官至广西参政的邓云霄，张用宾、骆颂嘉、郭九鼎在此吟诗作词，清朝时任广东提学翁嵩年、东莞知县钱以垲、印光任推动金鳌洲塔重建，让这场持续420年的文人秀得以继续，塑造和沉淀了东莞的灵魂和灵气。东莞，早于隋唐就有兴学的风俗。南宋李用、李春叟率先开办儒学馆，时任东莞县令王中行推动学宫建设，乡贤黎晦捐地200多亩土地办学，两年学宫竣，发挥作用数百年。“一代一代的东莞人，在时间的深度里，为学宫结织起深不可测的纬度”。明正统四年重建学宫明伦堂，清乾隆四年重修明伦堂。学宫建了又毁，毁了又建，培养

了无数优秀的人才，成就了“人才之盛独甲于岭南”“由宋以来，所谓声明文物甲于南海”之盛景，全面推动了东莞文艺复兴和创新。学宫里“一块块闪着金光的石碑，照亮着中国文明史上浩瀚的夜空，释放出强大的动力”，成为“东莞人的精神支撑”，它们无声但有力地回击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厥词者。

读之见真情。作者把个人的人生经历和体悟融入文中，给了读者很多启发。林汉筠老师对母亲的爱是深沉的，以至于多篇文章都写到了母亲的爱。《仁孝碑：千年家祭》写到父亲离世后的那次相送，“母亲深切地望着我，直至我们依依不舍地走开，直至我再回头时，母亲仍静静地站在那里，那块崭新的红布仍在石头上飘荡”。《文学碑：印在石头上的芳香》里，母亲望着不谙世事，定不下心来工作的儿子，以竹作比，教育儿子“人和竹子一样，只有扎下心来……才能见到快速成长的一天”。《题识：母亲的可园》以带母亲参观可园为线，将整篇文章贯穿一体。

文中提到“母亲是被我‘骗’来东莞的”。虽是“骗”到身边的，我仍十分羡慕林老师。因为现实的诸多羁绊，与父母同住，成了我的奢望。对于园主张敬修为奉养母亲、践行孝道而建造此园，内心更觉羞愧。父母生我于困顿、供我至大学、放我出千里，我又为他们做了什么？

《岭南读碑记》负重前行，文章里的击沉文字，为文化人在新时代实现新担当提供了范本。向这个在五年时光里潜心研究、霍霍磨剑的灵魂致敬！期待涌现出更多个“林汉筠”，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尽心出力！



《岭南读碑记》

作者：林汉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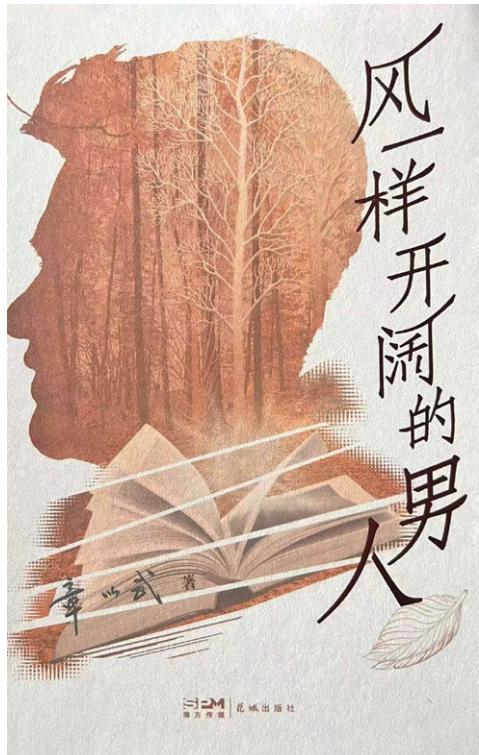
出版社：中国书籍出版社

关于《风一样开阔的男人》的自说自话

文 章以武（广东文艺终身成就奖获得者，电影《雅马哈鱼档》编剧）

暖阳午后，坐在桂花香蒸腾的院子里，淡茶一杯，想着花城出版社的隆情高谊，即将出版我的散文集《风一样开阔的男人》，心里美滋滋。平时，我闲不住，喜欢东跑西跑，东看看西听听，笔记本里记录着生活中撷取的各种写作素材。有的经过对各种信息的提炼、想象、编排、生发，融入小说、影视的情节中；有的醒目的人与事，咂摸一番，觉得这里边留下了大时代的记忆，很可贵，将它们独立成篇为散文；有的形象逼真的日常瞬间，细细品味，其中闪烁着人性的光辉，也书写成篇；有的是本人的创作心得体会与讲堂授课的讲稿，我尽量避开高头讲章之嫌，往画面感靠。这些作品，大多二三千字，发表在《羊城晚报》《南方日报》的副刊，重读它们，感谢肚里有料、双眼识货的编辑们：多夫、桥生、小攀、李贺、郭珊、美华。我的这些散文绝不会奢望高山流水般的回响，只是表达了一个“文痴”笃信人不能闲，闲会生锈，更不能停止生长的信念。

散文天地，悠悠宽广；日月星辰，似水流年；雾蒙绿野，雪白茅舍；良苑奇葩，佳茗美酒；旷世柔情，眼角清泪；叹息感喟，不老记忆。门槛不高，有感而发，自由灵活。然而，我更能喜欢能穿越时间空间的，写在时代节点上的，闪烁着时代亮光的，具有时代脉搏温度的散文。这样的散文更有生命力！我写《风一样开阔的男人》就是这样的认知。这篇散文的主人公陈俊年，如今已年过七十得夜盲症，虽未到目瞽跛足的程度，但上下台阶得有人搀扶。然，他依然人见人爱，圆脑袋、娃娃脸、笑嘻嘻，思维敏捷、睿智风趣，各种文坛聚会常见他的身影，发言“猛料”频爆，笑声迭起，且佳作连连，诗集《你来春就来》赞声如潮！在我眼里，他鲜衣怒马，归来依然是少年。呵，三十多年前，我与陈俊年相识于



广州红书北路省人民出版社的宿舍大院，他对改革开放有火一般的情怀！后来我们成了“老友记”。他告诉我，20世纪80年代初，他参加深圳边防的巡夜，月黑风高，一出“喜剧”发生了。从江西、梅县、河源风尘仆仆结伴而至的都是来深圳特区的拓荒者、建设者。是夜，他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他告诉我，90年代中，他搬至广州天河新家时，那里除天河体育中心外，不乏“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景致，如今的天河发展神速，每每家乡来



人都要东问西摸。他告诉我，他爱参加女儿学校的家长会，改革开放后出生的新一代，他们发出什么样的信息，他们需要什么样的精神食粮？干出版的要多听听，累得大拇指抽筋也值得。他告诉我，1986年金秋10月，他独自骑自行车7天，一路采访连接广深的南中国大道——广深公路（当时没有高速），写出了“广深走笔”10篇。留下了20世纪80年代南方大动脉的呼吸与身影，昭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强大魅力。

“闻弦歌而知雅意”，一个作家的思想境界，决定了他文章的高度！

再说《一个真实的神话》这篇散文，那是我20世纪80年代末写的。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房地产开发企业，被城乡建设部誉为“东华模式”，它是中国最早房地产开发的春的瞭望台。说它是一个真实的神话，一点不过分。1979年，在中共广州东山区委领导下，七八个改革开放的弄潮儿引进外资，开发东湖新村、五羊新城等楼盘，取得了辉煌的业绩。说几个感人的细节：东山区委办公室借了500元作为东华公司的开办费。公司面积15平方米，办公的桌椅板凳都是向兄弟单位讨来的。在没有国家货币投资的前提下，他们从1979年开办到1988年，为社会提供了40万平方米的住宅，东湖新村、五羊新城等七八个楼盘都是东华公司的精品力作。

他们是广州第一个引进外资，建设住宅。

他们懂得土地可以增值的原理。

他们“借鸡生蛋”，造房子卖，卖了再建新房，滚雪球。

他们目光超前，率先提出“建设、管理、服务”的一体化经营方针。

他们创造了崭新的“屋宇文化”。

他们思维超前，实行股份制，发行股票，轰动全国的房地产业。

我在东华公司体验生活一个多月，才动笔写这篇大散文。“敢为天下先”的东华人之所以取

得辉煌业绩，是因为他们沐浴着改革开放的现代风，他们的血脉中糅合着珠江水的奔腾，白云山的风骨，木棉花的热烈，给人以思索与振奋。

20世纪90年代中，我在顺德、中山等地走马观花体验生活时，碰到两则小故事，至今萦绕于心。

一次顺德的文友陪同一位乡镇企业的小老板夜访我。小老板是琴棋书画的爱好者，他邀请我去河涌边的大排档宵夜。那夜，夏风清凉，甘蔗林在风里私语，河涌水潺潺流淌。不远处，星光下，家电企业的霓虹灯广告闪烁迷离，很有情调，我心愉悦。小老板从牛仔裤的后袋里掏出一瓶洋酒“马爹利”，他笑道：“教授，你有文凭，我有酒瓶，文凭加酒瓶就是高水平！”此话一出，我心震撼。这位做瓶盖的小老板，几年前还是跟牛尾巴的人呢，洗脚上田之后，就开始精神换血，他深知知识就是力量！顺德人有句口头禅：“转得快，好世界！”所谓转得快，即观念的变化。天还是那个天，地还是那个地，人却变了，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武装头脑的顺德人，就是不一样，当年的顺德就占了中国家电企业的半壁江山。

第二个故事，我与著名音乐词人郑南去访问一位中山郊区的盆景专业户。进入盆景户别墅之家，哇，好堂皇，偌大的客厅一角摆放着一架锃亮漆黑的大钢琴。我对主人说：“不错啊，你会弹钢琴。”他笑笑摇摇头：“我不会。”我又问：“你夫人会弹？”他大笑：“我老婆会砌‘四方城’（打麻将）。”我再问：“你孩子会弹？”他答：“我孩子在广州读大学，也不会。”我接着问：“那你干嘛买这架钢琴？”他幽默地答：“我买钢琴是将它当摆设的。哈哈哈，我是附庸风雅。”此话掷地有声，我听了好不感动。这位盆景专业户，玩泥巴修理树头的普通农民，如今知晓钢琴是个好东西，它是文明有教养的象征哩，这是社会进步。

这两则小故事，成了我开启珠三角人心灵的一把钥匙，让我在创作中联想多多，受益匪浅。

我认为散文不仅书写风花雪月，杯底风波，更应在散文中着意展现人性的光辉。在日常的普普通通的事物中，往往包含着人性大美的东西，把它拎出来刻意描绘抒发，可以陶冶人的心灵，使人心变得柔顺、细腻、可爱、可亲。一个灵魂粗糙的人，生命是潦草的，也是无趣的。

我写《老娘的清蒸臭豆腐》起因是杭州一位文友在微信中告知：她老妈知道女儿馋重庆小面，特此快递了重庆小面的食材：自擀的面条、自制的酱料，连葱段、香菜都齐备。我这位文友吃着面条泪流满面。这就是伟大的母爱，这就是美丽的人性。顿时，我的脑子里蹦出三个字：臭豆腐。我特爱吃上海的家常小菜清蒸臭豆腐。21世纪初的早春，我回沪探亲，那时老娘已七十多岁了，白发稀疏，身子佝偻，她特地换两次公交车，去郊外的墟上为我寻觅臭豆腐，当她找到时，如获至宝，放入竹篮，冒雨回家，好不兴奋。我以老娘为主角，写她说臭豆腐，找臭豆腐，做臭豆腐，看儿子吃臭豆腐。唉，老娘去世，没了臭豆腐。这篇散文在《羊城晚报》发表后，看哭了无数读者，我在黄埔书院讲《臭豆腐是怎样蒸出来的》，听哭了许多听众。后来这篇散文有5家报刊转载。《羊城晚报》副刊还邀我亲自朗诵此文，以最朴实的声音演绎最醇厚的感情。发掘散文的人性美，对一个散文作者来说，是要牢牢记得的。

《电视机咏叹调》是我很喜欢的一篇散文。里边插进了一个小故事，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中，至今难以忘却。说的是广州流花湖畔的湖边新村，那碧绿的藤萝任性地攀附在一幢幢小院的墙上，那里住着十多位德高望重、誉贯中外的艺术大家。一位生性明达、言语幽默的雕塑大师潘鹤，他的可爱的儿子，小小少年，手执望远镜，透过夜色中婆娑的树影，直向对面楼里影影绰绰的9寸电视机的荧光屏逼视。哈，想必当初这少年，一定心跳加速，那不到50米的距离，定然

是离幸福最近的距离。日久天长，版画大师的老夫人纳闷：我都这么老了，有什么好看的？版画大师大笑：你有没有搞错啊，别自作多情，绝对不会有人偷看你。岁月流逝，那曾经偷窥的少年，如今已是英俊儿郎了。说起这些笑谈，那双眼闪烁欢喜泪花的老艺术家们，眯眼，睁开拐杖，挺胸朗朗大笑：活着真好！

在散文创作中，我发觉大凡小说家写的散文，形象生动，更能触动人的心灵，发声共鸣。他们对花鸟虫鱼，对锣鼓声声、丝竹悠悠往往一笔带过，而对人的个性特征的描绘咬住不放。鲁迅、梁实秋、林语堂、铁凝、池莉、迟子建、贾平凹，他们所写的散文，对人物的勾勒准确、形象、到位。我想原因之一是他们写惯小说，而贴着人物写是非常关键的，他们的散文是我们学习的范本。如今一些爱倒腾散文的文友，对最鲜活、最生动、最丰富的活人偏偏不感兴趣，视而不见，真是令人纳闷。听说中学生对记人为主的记叙文特别头痛，写来写去总是会公式化、概念化，千篇一律的《我的妈妈》《我的老师》《我的同桌》，而且写不出新意。我想，一是视野不开阔，见不多，识不广；二是平时这方面的训练少。我在高校教授写作课时，在堂上出一个题为《兵荒马乱》的作文，要求在堂上完成，要有任务，文字不少于500字。结果呢？大多让人失望，行文可谓兵荒马乱。看不到题旨，见不到完整的情节，更无对人物的画龙点睛的描述。

其实，会写记人为主的散文了，掌握它的套路了，写短篇小说就容易得多了。会写小说了，写微电影，写网剧就顺畅多啦。应该说，散文是各类文学创作起步的必由之路。优秀的经得起历史筛选的散文当然是千呼万唤的。

我这本散文集有一个特点，以写人为主。特别是写广东文坛的文艺家们，他们的音容笑貌、谈吐举止、个性特征，写得是否到位、有点嚼头，那是由读者来评定的。我会虚心倾听的。

牡丹之乡与牡丹秀士

——谈蔡建刚和他的画

文 胡红拴（中国自然资源作家协会副主席）

我与牡丹可谓情缘深厚，不仅仅是因为我家在洛阳，是个地地道道自小就与牡丹为伍的河洛人，另一个重要的原因乃是有几位爱花成痴的同道，他们以牡丹为士，以牡丹为神，将心神与笔墨付诸颂扬牡丹，孜孜不倦，高唱起心灵高处的牡丹之歌。画家蔡建刚正是其中一位。

我与蔡建刚相识已久，知他的人及其艺术轨迹。蔡建刚也是地地道道的河洛人，受家学及洛

阳故乡文化的熏陶，从自幼染丹青到大学苦读，再到分配至古都的艺术单位工作，可以说这一切的一切都让他一次次沉浸在“河图洛书”无限的意境里，沉浸在牡丹那雍容华贵的诗境中。伊洛河畔、铜驼古巷、龙门山色、邙岭烟云都在他的脑海里沉淀累积，一步步升华，一步步化意为象，成为他艺术之路关隘上的一个个驿站。渐渐闯出名气的蔡建刚一别美妻娇儿，毅然北上，投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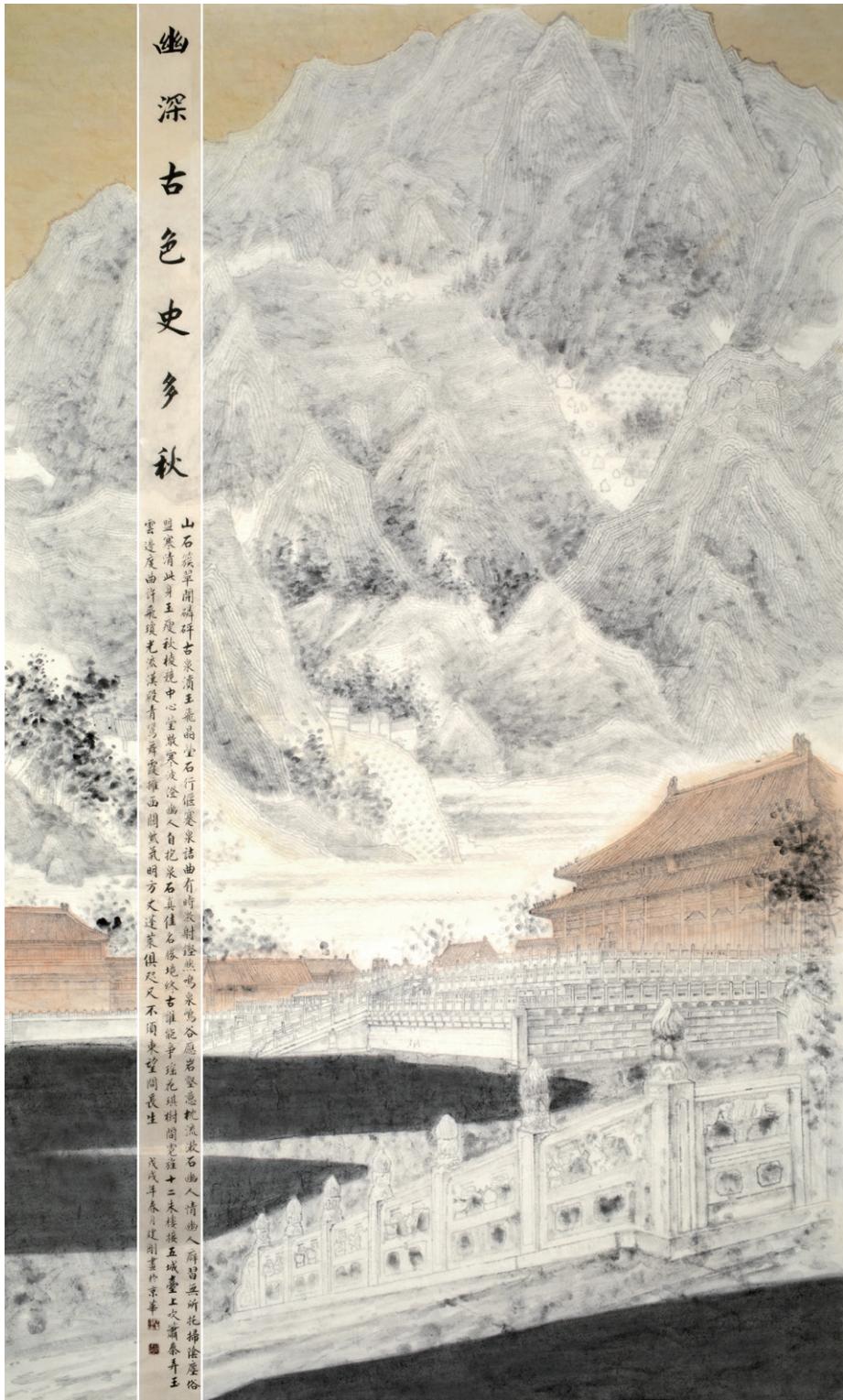
⑦ 盛世天香 蔡建刚/作



画家简介

蔡建刚，现居北京，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工笔画学会会员，中国国画研究院研究员，河南省美术家协会会员，河南省书法家协会会员，洛阳王城书画院副院长，洛阳陕州书画院副院长，作品多次入选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的全国美术作品展并获奖。其作品刊发于《南方日报》《羊城晚报》《中国书画报》《河南经济报》《协商论坛》等报刊。其创作的《紫气东来》被香港现代文化艺术交流中心收藏，《盛世天香》被北京奥委会组委收藏，《舞东风》被中国残联收藏等，著作有《蔡建刚写意牡丹》《蔡建刚书画艺术》，并在山东等地举办个人牡丹精品展。

2018年，作品《乡情》入选同源首届中国画作品展，获最高奖并被收藏；作品《清逸风摇》入选“邮驿路 运河情”全国中国画作品展，获最高奖并被收藏；作品《时代时速》入选“国风盛典”首届全国中国画作品展，获最高奖并被收藏；作品《海丝逐梦》入选“水墨融情海丝梦”首届全国中国画作品展；作品《大时代新丝路》入选“金城流韵 21世纪新丝绸之路”全国中国画作品展；作品《幽深古色史多秋》入选“神圣长白”全国中国画作品展；作品《青山素衣》入选“翰墨青州”2018全国中国画作品展；作品《家山新貌》入选“山水砚都 多彩肇庆”全国中国画作品展。2015年，中国第三届大型廉政文化书画精品展牡丹作品《凝香》获优秀奖并被收藏。2013年第九届海峡两岸书画名家作品展《牡丹》银奖。2012年，作品《紫气东来》获韩国现代美术协会书画艺术展优秀奖。2011年，中国邮政贺年卡发行国画，其《牡丹四条屏》入选。2010年，蔡建刚被保护消费者基金会授予“中国公益事业突出贡献先进人物”光荣称号。





⑥ 紫气东来 蔡建刚/作

一代花鸟画大家鲁慕迅门下，再次苦读研修近十载，让手中丹青笔墨技艺飞涨。

蔡建刚是当年轻一代为牡丹传神的优秀画家。

古人称牡丹为“国色”“国香”“国艳”“国貌”等“国”之象征，认为它端庄大方、雍容华贵、富丽堂皇、绚丽多彩，是花中无可比拟的上上之品。因此牡丹成为中国花鸟画中常见的题材。

蔡建刚笔下的牡丹是有气节的。他所画的牡丹早已跳出以色取胜的套路，在意境和诗径上找到自己心中向往的诗境。也许是受一代花鸟画大家、当代工笔花鸟画泰斗周彦生的影响，蔡建刚的牡丹画将浓浓的诗意倾注在笔墨之中，如他的《紫气东来》，将一丛紫牡丹置于飞瀑流溪之上，那硕大的花朵许是牡丹四大名品之一魏紫的映照，同时又有刚烈之“剑”意，将雍容贵气、天香孤傲的秉性彰显得一览无余，更让那东来的紫气于此驻歇，交融，升腾。

蔡建刚的山水画其源流应是来自明代画家沈周以及明末清初画家龚贤和清初“四王”，其艺

术追求则是既注重传统笔墨又注重师法造化。蔡建刚的山水画创作应该还有五代绘画大师董源、巨然以及宋初北方画派的笔墨影子，其继承的传统笔风墨韵，结合自己对自然山水的观察和感受，也就形成了蔡建刚自己浑朴秀逸的古意格法和笔墨风格——老辣朴拙的笔触，沉着稳重圆润苍劲的皴擦，让“秀而老”的笔墨味道于简练中透出流畅与古雅的变化。山石树木中锋用笔的苍劲古厚，反复皴擦积染的深浅、浓淡、明暗之细微变化，都让那群山流溪、山石树木浑融一体，发出生生不息生命的律动，如他的《春山图》《听瀑图》《流溪清音不夜歌》等。

如今，蔡建刚的画功已迈入艺之高境，但他依然不骄不躁地在水墨之间孜孜以求，“那么多艺术家都在研习如何画牡丹，但真正要把不同品种的牡丹以艺术的形式表现在纸上，既画出她的精神，又做到不媚不俗，是非常困难的，需要很高的艺术修为，值得每一位艺术家穷其一生去钻研。”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这就是蔡建刚的艺术之路。●

抚今追昔珠江口

文 张伟棠（广州市增城区作家协会副主席，《增城日报》副刊主编）

粤港澳大湾区一日千里

2017年7月1日，香港回归20周年。在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见证下，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崔世安、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何立峰、广东省省长马兴瑞共同签署了《深化粤港澳合作 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正式启动，全球第四经济湾区昂首挺胸屹立在世界东方。

珠江口处在粤港澳大湾区中心，珠三角地区的9个城市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都纳进了大湾区范围。影响世界经济的宏伟蓝图徐徐展开。

大湾区城市群糅合了华侨文化、海洋文化、岭南文化、珠江文化、广府文化、客家文化、移民文化等元素，海纳百川。东莞、中山、江门虽然经济实力不如深圳、广州，但都是著名的华侨之乡。

2019年2月18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绘就了一片蓝图：粤港澳大湾区不仅要建成充满活力的世界级城市群、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内地与港澳深

度合作示范区、还要打造成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典范。

大湾区的定位令人向往、催人振奋。

短短三年时间，发展活力充沛、创新能力突出、产业结构优化、要素流动顺畅、生态环境优美的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框架基本形成。

粤港澳大湾区2021年经济总量约12.6万亿元。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为什么能迅速驶上了现代化的快车道？人民心力的凝聚，国家政策的倾斜，民族复兴的使然。还有，正确方向的引领、步调一致的行动和基础设施的建设。

2018年10月23日，总长55千米的港珠澳大桥开通，习主席出席典礼亲自宣布大桥正式开通并沿桥巡览。港珠澳大桥的通车是“一国两制”的成果，是三地百姓的夙愿，对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2019年4月2日，12千米长的南沙大桥通车，这是横跨珠江最长的特大桥，一下子拉近了南沙到东莞的距离，中山、佛山、肇庆等地到东莞、深圳的速度也大大加快。

早在2007年7月1日，香港回归十周年的时侯，全长5545米从深圳蛇口直通香港元朗的

深圳湾大桥已经开通。更早之前的 1999 年 4 月，连接珠江口东西两岸的虎门大桥落成。

广州、深圳、香港、澳门和珠海早已连成一片，成了珠三角城市群的核心。五大机场民航旅客年吞吐量已超过 2 亿人次，沿海港口集装箱吞吐量 8000 万，均位居全球湾区之首。

粤港澳三地达成共识：开放引领，创新驱动；优势互补，合作共赢；市场主导，政府推动；先行先试，重点突破；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现在，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建设如火如荼，社会发展一日千里。珠江口在放歌，伶仃洋在高唱，人民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珠江口涌动着悲壮的历史

181 年前，中国军队在珠江口大角山蒲州炮台打响了抵御外敌第一炮，鸦片战争的爆发拉开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序幕，体现了广东军民坚决抗击英国侵略者、誓死捍卫祖国、保卫家园的民族英雄气概。

蒲州炮台属于大角炮台一部分。大角炮台共有 9 台 12 炮，背靠青山绿树，面向茫茫大海，扼守在珠江口西岸最前沿位置，与对岸的沙角炮台遥相呼应。珠江口虎门炮台群有三道防线：第一道防线就是沙角炮台和大角炮台；第二道防线有镇远炮台、靖远炮台、威远炮台、定洋炮台和上横档炮台、下横档炮台、巩固炮台；第三道防线有蕉门炮台和南北炮台、大虎炮台、永安炮台。其中上、下横档岛和大虎山岛炮台在珠江河中间。沙角台、镇远台、靖远台、威远台在珠江东岸现属于东莞地区。大角台、蒲州台、巩固台、南北台在西岸，现属广州南沙区。

著名的虎门大桥从上横档岛和下横档岛上面跨过，紧密地将珠江口东西两岸连接起来。虎门大桥上游不远处就是大虎山岛。大虎山岛再往北上游 8 千米就是南沙大桥。

大角山不高，地理位置却十分重要，是从伶仃洋进入珠江口的必经之地，和对面的沙角炮台一样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蒲州炮台位于大角山西侧，放眼望去远近风景一览无遗。

大角山脚下是南沙大酒店，往城区内望去是商会大厦等一片高层建筑。往北望珠江方向，只见虎门大桥在阳光下英姿勃发、气贯如虹。大虎山岛躲在虎门大桥后面，若隐若现像一位害羞的姑娘披散了神秘的面纱。上横档和下横档两座岛屿静卧在虎门大桥脚下，就像两艘归航的军舰依偎着虎门大桥。

往南望去，茫茫大海一望无际。来往轮船在阳光的照射下特别耀眼。左边，遥遥望去是深圳，再往前是香港；右边，隔湾远眺是珠海，再往前是澳门。

面对大海的波澜壮阔，我此时此刻的心情也波涛汹涌。就是这片海域，曾经爆发了惊天动地、翻江倒海的鸦片战争；曾经吞没了 400 多名将士的赤胆忠心；曾经哭诉过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

如今，硝烟散尽，隆隆炮声远去。曾经公认为中国近代海防史上设备最完善、火力最强、工事最坚固的在中华民族紧要历史关头发挥了重要作用的虎门炮台群已退出了历史舞台，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在蒲州 1 号炮台，我们看到一尊仿制的大炮立在炮池中央。这是仿照原有的德国克虏伯重型火炮重造，炮身重 10 吨。由于基座安装了轨道，大炮除了上下左右摆动还可以 180 度旋转。虽然该炮长度重量远远比不上厦门胡里山炮台的重炮，但看上去威猛如虎、厚重如山。炮池呈半圆形，全用“红毛泥”混凝土加钢筋造成，池后有暗道连接弹药库和其他炮台。尽管每座炮台都只有一个出入口，但设计巧妙、布局合理，各台之

间遥相呼应、首尾相连。就是这些海防设施，让日本侵略者闻风丧胆。

据资料记载，当时炮台设施并没有现在所见的这么先进，鸦片战争连续两次海战均告失败。第三次海战打败了妄想从珠江口入侵的日军之后，充分显示了这些克虏伯大炮的厉害。

1841年1月7日，早有预谋的英军舰队在伶仃洋靠珠江口海面集结了20多艘舰船，突然向第一道防线的大角炮台和沙角炮台发动了猛然攻击。清军奋力回击，但寡不敌众，“两角”被英军攻陷。1841年2月25日、26日，英军组织更强大的军力向“三远”炮台和上横档岛、下横档岛以及永安炮台、巩固炮台展开了疯狂的大规模进攻，尽管守卫的清军浴血奋战，顽强抵抗，但因力量强弱悬殊，最终全军覆没。

当时，虎门炮台群设施落后，兵力不足，还

遭受到卖国求荣的当朝奸细琦善百般阻挠，结果清军全部壮烈殉国，义律为首的英国侵略者趁机大举进犯。1882年，开明人士、两广总督张树声奏准修复虎门炮台，并重金购买了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些克虏伯大炮。

1937年9月14日，侵华日军5艘舰艇向珠江口发动进攻，遭到虎门炮台守军迎头痛击，各炮台的克虏伯大炮发挥了巨大作用。日军组织了多次进犯均未能得逞。直到1938年10月，日军从惠州的大亚湾登陆，途经惠东、博罗、增城，直逼广州。虎门炮台受到前后夹击，再次失守。

翻阅鸦片战争历史，不能不提虎门销烟的两广总督林则徐。追溯虎门炮台故事，不能不提誓死卫国的水师提督关天培，还有英勇不屈的邓廷桢、李廷钰等众多将士。

19世纪初，世界列强对中国虎视眈眈。英



② 东莞虎门炮台紧靠海边，炮台长139米，炮洞11个 子言/摄

国鸦片贩子大举进入广州并迅速祸及多个城市。林则徐以钦差大臣身份来到广州，在邓廷桢、关天培等支持下，查处烟馆、收缴烟土，和鸦片贩子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839年6月3日，林则徐指挥广大军民在虎门海滩上当众销毁鸦片237万斤，维护了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

义律恼羞成怒，一方面给朝廷施加压力，另一方面密谋武力侵华。琦善不但没有褒扬虎门销烟义举还归罪并处罚林则徐。同时，琦善与义律擅签卖国条约，割让香港、赔偿烟款600万。林则徐一生忍辱负重、忧国忧民、功勋卓著。被道光皇帝革职后，林则徐满腔愤怒，写下发聋振聩的诗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在林则徐领导下，关天培、李廷钰等将领一方面积极参与禁烟、缴烟、销烟，另一方面认真布置海防，在水中设置排桩、铁链，坚决抵御侵略。1840年7月，横行香港的英军在尖沙咀杀死一名无辜的村民。林则徐要求义律交出凶手。义律不但不交，还挥兵进犯沿海内地，结果几次都被关天培等人打败。

于是，1841年1月7日，英军舰船大举攻击大角炮台、沙角炮台。关天培坐镇前线，坚决死守。由于兵力悬殊，情况万分危急，关天培只好向琦善求援。正在与英军“议和”的琦善没有发兵。关天培被迫退守第二道防线，坐镇靖远炮台指挥战斗。

为了激励将士们守住第二道防线，关天培把自己的银钱拿出来补充军饷。他还把自己数枚脱落的牙齿和几件破旧的衣服寄给家眷，表示誓与炮台共存亡的决心。2月26日英军炸断拦江铁链，攻占了横档岛与其他炮台之后，集中全力进攻关天培所在的靖远炮台。关天培率领众将士挥刀上阵，与登岛英军进行殊死肉搏。搏斗从中午到深夜，异常惨烈。无奈寡不敌众、孤立无援，最后400多名将士全部壮烈殉国。

谱写壮丽的新篇章

漫步在威远炮台，看着对岸南沙城区日新月异的高楼大厦和虎门大桥上来往奔驰的车水马龙，为我们伟大祖国翻天覆地的变化和发展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

威远炮台绿树成荫，风景如画。海风轻轻吹来，带着海水的咸味、伴着海浪的歌声，让古战场充满诗情画意。谁能想到就在这么一个美丽、宁静、迷人的地方，一场惨烈的战斗让数百名守军将士魂归大海。

威远炮台隶属东莞市。40年前的东莞虎门炮台就跟随着美丽富饶、经济发达的东莞享誉五湖四海。我第一次参观虎门威远炮台是1980年刚当中学老师的时候。第二次是1991年，我们从虎门镇码头坐船登上了靖远、镇远、威远三台，还专门请了虎门文化站的老师为我们讲了许多历史故事。

东莞位于珠江东岸，南邻深圳，北接广州，是著名的侨乡，是中国近代史开篇地和改革开放先行地，荣获全国文明城市、花园城市、森林城市等美誉。更为可喜的是，2018年11月东莞已选入中国全面小康城市。

珠江口西岸的南沙近几年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飞速发展。1993年成立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以来，南沙走进了发展的快车道。2015年，自由贸易试验区挂牌，南沙更是如虎添翼。最近，南沙融入了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城市群发展规划，并和深圳前海、珠海横琴一道屹立于世界第四大湾区的最前沿，正在形成新时期全面改革开放的新格局。

昔日遭受侵略者炮轰的珠江口，现在是向全世界开放的大湾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正在变成现实，民主富强文明和谐美丽的现代化强国即将昂首挺立在世界的东方。

从高处遥望飘渺浩瀚的伶仃洋，我想：粤港澳大湾区一定会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添上浓墨重彩的壮丽的新篇章。●

邓村石屋客家情

文 罗铭恩（广东省散文诗学会副会长）

广州增城区派潭镇邓村的石屋是广州市唯一具有岭南客家风情的乡村民宿，也是广东省为数不多的保存完好的客家围屋。这里山水田园风光别具特色，自然生态环境舒适怡人，诗和远方不再遥远。

2015年，邓村利用扶贫资金进行整村破旧部分的修复工作，随后，石屋田园度假酒店入驻，为邓村的发展带来了契机。2016年，邓村被派潭镇政府选定为美丽乡村建设试点，邓村石屋成为邓村美丽乡村建设的核心部分，再次推动了邓村

的发展。经过几年改造，如今的邓村石屋已成为粤港澳大湾区遐迩闻名的精品民宿。

邓村地理环境优越，背靠4A风景区派潭镇白水寨。白水寨有全中国落差最大的瀑布，名曰“白水仙瀑”，犹如一条白色的蛟龙从天而降。白水仙瀑作为邓村石屋的近邻，给这片宽敞的围屋增添了宏伟的背景，使邓村石屋的地理优势更加明显。游客站在邓村石屋的高处眺望瀑布，一种博大高远的情怀油然而生。

邓村石屋是一片兼容岭南风格的客家围屋建



⑦ 邓村夜景 巫国明/摄

筑，始建于清朝道光年间，距今已有 200 年历史。石屋似一条村落，占地面积 3400 多平方米，其中南北宽 82.5 米，东西深 41.5 米。石屋依山面水，坐西向东，门前有一块宽阔的晒谷场及三排麻石路，晒谷场旁边有一条挡墙，南北两边的斗方门就由挡墙连接着，一个半月形的池塘在挡墙下面静卧着。从石屋村的门楼走进村里，一座七层高的碉楼赫然屹立在面前，碉楼呈四方形，楼高 22 米，宽 11 米。当时碉楼的作用有两种，一是防御匪盗，二是防洪。因而修筑得非常坚固，仅是墙体的厚度就接近 80 厘米，全用结实的青砖砌筑。碉楼的二至六层均设置射击孔，在山墙上还设有瞭望窗。站在楼顶上眺望远方，田野、池塘、竹林、溪流、果园交相辉映的大自然景象尽收眼底，如一幅田园与生态、人文与自然和谐共存的诗意画卷。

村屋以祠堂为中轴，对称纵横方向各建有两列居室，每套屋室为三进两院落的四合院式布局，甚为宽阔舒畅。建筑物的梁柱上均有精雕细刻的龙凤呈祥图案；屋脊上有各种形态的灰塑；屋檐上有精湛的雕花；屋顶上一排排的褐瓦整齐划一；墙头上绘就了传统山水、花鸟鱼虫的彩画，还有生动传神的人物故事。

关于邓村石屋来源，传说在清朝道光年间，由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的一个宗亲、广府巨富石火星出资建造起来的。在那个年代，只有富豪才能斥资建造如此规模的客家围屋村落。

如今，这片民宿酒店与邓村的自然山水融为一体。这里的一砖一瓦、一门一窗无不诉说着修旧如旧、翻新如新的理念。民宿设计团队当初修复屋村祠堂的时候，特别注意保留屋顶的原貌，屋顶的横梁、椽板都用回原来的材料。工程人员发现有部分瓦片损坏了，就想办法从村民那里收购拆旧屋时保存下来的旧瓦片，而且统一用同一个年代同一种规格的瓦片。围屋门窗的修缮也采用传统的木榫工艺。设计团队还根据客家围龙屋

的基本结构，设计了多种房型，有平房的家庭套房，景观大房，复式的两室一厅套房以及院落式别墅，这些居室均完整地保留了当地客家围龙屋的风格，让身处世外桃源的石屋大宅焕发出新的风采。

邓村民宿浓郁的客家文化底蕴吸引了一批游客慕名而来。一位在数十年前由广东移居到东南亚的梁姓客家人，对客家文化情有独钟，带着一家大小到邓村度假。老人家此行有两个目的，一是在客家围屋抒发怀旧之情，二是让儿孙们领略客家文化的风韵。老人家昔日出国时带着一张家乡的旧照片，如今他也带着这张旧照片回来了，照片中也是一个围屋村落。老人家来到邓村，就像回到儿时的家乡。他说，只要是客家文化，无论在哪里都是同声同气、同根同源的。这里除了保留着客家民宅的传统风貌之外，还增加了一些现代的特色。老人家非常喜欢自己一家住的带天井的两房一厅院落，有青砖墙、红地砖，还有敞亮的天井，以及舒适的室内泡池，既渗透着客家文化的底蕴，又满足了游客期待的独特居住体验。他又拍摄了一套邓村石屋的照片，要带回海外与亲朋好友共赏。

石屋民宿还设有餐室、茶室、书屋、会议厅，以及概念农场和家蔬果园。农场内种植着各式各类蔬菜瓜果，游客可以体验农耕生活。老人家临走时说了几句耐人寻味的话：“我的家乡虽然不是在增城邓村，但邓村围屋的氛围跟我的家乡的客家围屋十分相似，而且比家乡的围屋更有吸引力，我在这里找到了客家文化的根络和血脉。”

华美而朴实的邓村民宿，是新时代美丽乡村的一个缩影，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当代文化结合在一起；也是增城派潭文化旅游品牌的新名片，引领着更多的乡村老屋走上“活态保护，可持续发展”之路。●



惠州三题

文 徐新路（广东省盐业集团纪委）

丰渚园赏荷

荷花儿开了，丰渚园尤盛。踏上见渊亭桥，就置身于丛丛簇簇的鲜绿中。这些从水下袅袅浮起的荷叶，前几日还羞羞涩涩几株几株亭亭着，现在一下子满池满眼，形成青色的峦嶂和碧波。粉艳的荷苞从中探出头，像怦怦跳的少女心，在不为人知时刻，将热烈青春一瓣一瓣递放，送出暗香几许，浓情几许。这情境迷醉了惠州人，从

热烘烘闹嚷嚷的白昼走来，走进一个清凉芬芳的世界。

随着游人，转到文昌阁门前，台阶上铺雕着幅鹭鸟入荷图：几擎荷盖冉冉高空，遮护起一方生机怡然的小天地——荷花盛开，水波漾起，两只白鹭交颈私语。此时此刻，且好好在石阶上坐一会儿吧，天地不远不近，青荷亦香亦瞑，何须赶往它处？

青荷之下，光影接天。天空投映到大地的



⑦ 惠州丰渚园

湖心里，特意来勾勒荷的身姿，用它那流光妙笔，摹下婀娜与写意、丰润或残缺、水墨和丹青，摒绝了外物干扰，引领人到恍若无依的仙境，置荷于白云间，于蓝空里，于时空飘渺处。清风徐来，荷娇艳地摇动着裙裾，微波影里就忽地一剪波，一片涟漪，带你重回人间，起了不停变幻。看那荷茎，连缀着真实与梦幻，在影影绰绰的虚空，撑起粉的花，青的叶，圆的蓬；又越过不定的水面，深深扎到泥淖中，植

下心莹质洁的藕段。每片荷叶都是一纸告白书啊，赤裸裸向着天，坦承心扉，书写着一个生命全部的经络和祈愿，于是感动上苍，降甘霖如斯，在荷盖上呈现出人世间最美的水露形态：圆润丰盈的，一泓泉眼般闪亮的，不停夸张变动的，一滴和另一颗交融又分开的，有如上帝之眼观映着世间，有如初世的童贞清澈着心灵，任凭怎样碰撞、滚动和跌落，它们都质地晶洁，不染纤尘。在硕大的荷盖极力呵护下，时间的种子孕育了灿烂花朵，淡紫，浅红，粉艳或者洁白，一瓣一瓣，一点一点，荷的花儿终于开了，那么轻盈，那么柔嫩，那么浪漫，整个世界都被这渐次的清香晕染了……

而生命丰冗，足够容纳盛盈与凋零。鲜绿嫣红之间，一些荷叶从青苍转枯黄，蜷起臂膀；一些荷花也献出莲蓬，微斜下高贵的头颈。这是怎样的考验和修行？绽放与凋落，丰荣与枯敝，同时轮回上演。天空变幻着，这一方水域也变幻着，从深蓝、湛蓝、浅蓝，直到一点点随夕阳黯淡下去，愈显出池边树影。两条锦鲤啄动着荷茎，几只苍鹭从天空飞过，把影子投到水波里，蜉蝣们划动着颀长的浆，早早地往草岸边的港口去。鸣蝉在耳，岸上鸡蛋花散发的浓郁薰香这时抢了风头，一个劲儿地送到口鼻里来。烟暮里，香樟、木棉树在池塘旁挺立峻拔，柳树垂下丝绦，各色的花树也微笑着退隐到暮色一角，共同守护一片安宁。

再往前走，就是问心桥。来路，我们都看过怎样的风景，植下如何的辛勤？抬头间，荷花造型、飞檐圆顶的就是江孝子亭了。亦不知先有荷，还是先有亭。盈盈荷池拱衬着，亭上有联，“青峰独爱青莲日日徘徊不去；甘露犹思孝子宵宵淅沥重来”，纪念的是清代名士和孝子江逢辰。这亭，当然大有典故。

惠州太守王瑛崇文兴学，倡言“山水有助人文”。此话不虚，山水再美，若无人文情态，

秉持风骨，岂不寂寥空无？江孝子逢辰即是西湖人文孕育下的不二人物。岭南大儒梁鼎芬赏识赞叹“行尽江山见此才”，江逢辰的才情胸怀，于中可以佐证。这人也很是有趣，性情放逸，喜游山水，为官刚正不阿，尤嗜杯中物，据说“饮汾酒以斤计”，然而至孝，当母亲命他戒酒时，他弄了个牌子写上“戒酒”二字缀在衣襟上穿街过市。孝悌乃心上莲花，“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与丰渚园相隔几百米远的元妙观，观前右侧廊厅里，择刻的二十四孝图，就展示着道家对孝悌的阐释。世上万事万物相通相系，所有信仰也无不过是关于自然、天道和人伦的相谐共生。这一池盈盈荷花，在西子湖畔摇曳生姿，惹人心醉，令人怀古念今，畅远追思。

飞鹅岭听蝉

晨跑到飞鹅岭公园门口，听到平地荡起的蝉音，像是迎面撞上了一堵声墙。在这个夏季的清晨，曦光在山林间早早地弥散开来，晨练的人们络绎的走上山岭，舒展着身体，身心愉悦。分明是很清凉的时候，却不知得蝉们为什么也起床这么早。

登山的小径，洒了些青黄落叶，绿衣的苔痕滋润着青砖砌就的台阶，灌木拥簇，栀子花开，林间风过。栀子花的清香弥漫着，身边，偶或飞过一片粉黄色的小蝶。

山不是很高，却足够俯揽大半个西湖。居高临下，山湖叠翠，环城青碧，岭若飞鹅，当真吟诗对酒之地。而身外的情境却提示着你这里曾经是如何兵家重地。一座国民革命军东征战士群雕，正将炮口对着山下的惠州城，矗立于山顶花岗岩广场上夺目震撼。沿山顶构筑着一组军事工地，两座碉堡的水泥筑体上还留有枪炮的痕迹，即使在晨光中也散发着惨烈的硝

烟味道。东征战事，延羁数年，其间将士搏杀、百姓流离之血光灾乱，自不必说。历史原本沉重，孙中山也好，陈炯明也罢，是非恩怨，史当有论，然煮豆燃萁，同胞相弑，国破山河，令人惋扼。转下几步，站在黄埔军官学校东征阵亡烈士纪念碑前，我还是以军人的礼仪来凭吊东征将士。“刘尧宸、沈应时……”，一字一字念出他们的名字，那一刻，将士们的生命仿佛就在这一块方尖碑上重新鲜活。这样的场景，同样让我悼忆起一位因抢险而永远安息在西藏的厦门战友。战士们的生命永远超越历史，无关成败，年轻永续，生命光辉。

回头的时候，见纪念碑附近石阶上，散落着一些不知名的淡黄色花朵，心念甫动，这是大自然的献仪吧。

下山的路舒缓幽静，山野在这儿显露出它本来面目。松软落叶在林间编织，而探头探脑的小蘑菇，这一丛，那一簇，平添生趣。我刚刚在一个石凳上坐下，怎么又忽然荡来满耳蝉声？啊，明白了，是自己刚才几乎忽略了蝉的存在。而坐下来，稍一冥思，那蝉声就如同密密天网，天晓得从哪里撒出来，有些先声夺人、志在必得的气势。就在你刚要被它聒弄得有点烦躁，忽的一阵清风，蝉声一下子变得飘逸，它又归于自然的曼妙天籁之音，带着喜悦抒情，赴往天空无所凭系之所。以空为媒，于是，它在无凭系处找到了凭系，像是绵绵的祈福或密密咒语，四散开来，那是让铁树开花的咒语，是让芳草茵茵的咒语，是催促树木繁茂直冲云霄的咒语。

这蝉声，密密的，连绵不止，没有停歇处。毫不似依附于某棵枝丫上，愈是往林中走得深，愈是清丽高远，只觉得是在你头上织成了一张密密声网，间或有一两个声音特别强劲，稍俄又转换成另一处占了势，如同波浪涌动，水峰从这一头倏忽就涌到了另一头。你愣愣地找，总也寻不到踪迹，却又忽地，蝉音近了，就在

你的头顶，并叫得越加起意，好像嘲弄你的失察与不聪。还没等你表达自己的情绪，它又飘远，像场梦幻，漫山漫野地散开去。

及至山下，才缓过神来，你复置于都市喧嚣中。什么山野自然，什么烽火兵戈，仿若分隔开的世界。原来是那蝉音，收拢了一山的宁静。

平湖门感树

周末的苏堤格外热闹，人群挤撞中，忽然听到一个女孩轻声说：“这里的鸟儿，都不怕人。”

我的心，一下子温润起来。

在西湖无边的风景里，到处都可以看到苍翠的绿色。那些盛大接连的树冠，湖心花树繁茂的一个又一个小岛，就是鸟儿们藉以栖居的家园。美丽的白鹭、苍鹭，各种不知名的水鸟，因为有树，它们都不惶遽，不流离。这些树，如此丰盛存在着，我们却可能极少去关注和感受。

每一片绿脉，都不是凭空而来。最初飘落的一粒种子，少许一些的水土润泽，一点点阳光，造就了树木苍天，然后枝丫衍生，一仰一顿之间，便可能独木成林，抑或是带来一颗又一颗籽粒的薪火传递。亿万斯年，经风沐雨，水湮火噬，不屈不挠的斗争着，存在着，成石，成炭，以各种形



①②图：平湖门感树

象雕于不朽，也藉着物种相传而鲜活于世。树是安静深沉的，它看似无知无觉地存在着，毫不彰显自己，根脉却早已深入岩层，抓住了足以支撑生命质量的坚实，在地表下拓展的深度和厚度也远远赛过冠盖的宏大华丽。

惠州的树，姿容各异，形态万千，尤以西子湖畔为盛。仲元亭旁，几棵细叶榕荫覆了环湖的小径，疏干横斜，强壮颀长，将细密如瀑的气须伸到湖面上，送到深水里，于是树和水以最具感官的表达，完成了精神气质上的相通，无须清风眷顾留恋，于影影绰绰之间，早已枝水相润，微澜暗涌。纪念先烈的仲元亭约有七十余年历史了，不知是忠义感天，还是自然造化，这些榕树间的一粒种子某天日暖飞升，竟在亭顶落土生根，小小的嫩株环护着琉璃顶，细弱的根须从飞檐上洒落下来，稍一闭目遐想，会让你觉得那真像是远远为人抛上

去的一捧花束。环湖漫步，在绿色中穿行，这边一棵除了树根整株都斜斜地悬在水面上，那里一棵根鬚膨出，奇旋怪扭，如雕似琢；有的端庄严整，冠盖云天，有的枝丫张扬，遒劲奔放；百花洲畔，桂花树婷婷而立，芬芳袭人，留丹亭旁，红花紫荆，细柳古榕……

坐在丽日广场七楼的餐厅，大半个西湖尽在眼底了，那样一张舒卷的水墨长卷，以泗洲塔为轴，湖光潋滟之外，浓墨重笔点线勾勒着的就全部是苍翠的树了。惠州城内的树种之多，让我这样一个北方人一下子难以尽识。你看，榕树很是写意，柳树更为传情，樟树不枝不蔓，蒲葵潇洒倜傥，不用说红豆树带来的海南温情，白玉兰所引起的香纯幻像，株株玉立，棵棵传神。相较起来，我还是比较喜欢木棉。

最早，在湖边看到一种素不相识面目冷峻的树，并不粗大，一臂可以环围，长着金字塔般丘起的刺身，貌相拙朴，毫不尖锐，没想到这就是高大帅气的木棉年轻时的样子。成年的木棉变得自信强大，脱却了带刺的甲衣，粗糙斑驳的树身阵列柔软。两周短促的花期，红硕鲜丽的花朵，给满城惊艳。硕大的花儿，五瓣连心，像是伫满了神秘琼浆的杯具，从高高的枝冠上笔直地掉落下来，啪的一声，就摔给西湖一片春醉。木棉有着贵族的洒脱率性，绝不谄容顾盼，它是以花为树的佼佼者，却从不自命清高。那些花朵，洒落在西子湖畔的草地小径上，于游人欣赏的目光里恬然，也洒落在江边寂寞的石阶上，在农家并不宽绰的小院里，连朝京门的城楼也被渐次渲染。

我知道，那一瞬间的缤纷灿烂，不是刻意的招摇和冲动，是源于一个生命由里及表的性格气质。它和紫荆一样足迹全城，却有着英雄般绚烂璀璨的命运结局。

据说惠州一中还有棵四百九十年的老树，而这个城市，有一千七百多年的历史，千数年来与人们同生相伴的老树呢？它们会被大自然无情淘汰，经历天陷地塌，风旋火劈，那也是勇者必须面对的命运。然而，它们更多的生命遭遇和我们人类息息相关吧，那些被猎用砍伐，被摧毁征用，被放逐焚烧的树们，是不是也有着太多需要表述的言语和表情？

在这里，还是要向在城市化进程中保护树木的决策者们致敬，要是没有艺术和文化的引领，我们生活的周边将全部是钢筋混凝土的建筑，水是死水，飞鸟不临。这样一个城市，和这些树木一样，若非时间与文明的积淀，就无以蓬勃至今。我们更要对那些树们充满感激之情，不管怎样的时间转动，如何的光影斑驳，历经了怎样的死灭与新生，断驳与承续，为褒贬，受损伤，都毫不妥协，竭已全能，支撑的华盖满天，春色盈盈。

把心静下来，去拥抱一棵树，触抚它，感受它的生命厚度，聆听来自另一个心灵世界的声音。那是强大的生命意愿，不屈不挠，不奢求，不苛刻，纯粹，干净。在绿色的呼吸和梦境中，你能闻到，木质醇芳，生命甘冽。

和那些树一样生活吧，不管在怎样的喧嚣闹市，都不会失去淳朴的操守和位置，更不会遗落健康和真情。

哥伦比亚的中国文化和中国移民区

文 路易斯·康地略 译 张贝贝



作者简介

路易斯·康地略（LUIS CANTILLO），中文名土木，中国四川大学外籍教授。发表有《连点成画：生活、学习与跨文化创造》《曼努埃尔·萨帕塔·奥利维拉：为了和平，1952年的中国之旅》“庆祝”：1952年北京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中的文化交流与公共艺术》《茶与咖啡：两个世界的相遇》《拉美绘画的现代缩影：博特罗在中国》《友谊之光闪耀在西湖上》等文章。

引文：龙和美洲豹

“面包店里，一道微弱的霓虹灯光在告示牌上奋力跳动着，牌子是宝塔形状，灵感来自中国人的港口。灯光缓慢地由黄色转为粉红色，‘P’后面的字母已经不亮了，兰氏面包店的名字就叫作‘Luna Park’（月亮公园）。”

——梅达尔多·阿里亚斯·沙提萨巴，《亡灵爵士》

我在北京小西天有一位老友，他叫李戈（Rodrigo Escobar-Vanegas），是一名艺术家和电影导演，他出生于哥伦比亚考卡山谷省的贾蒙迪，这是一个距离卡利市仅24公里的小镇。李戈毕业于哥伦比亚国立大学，已在北京居住了十多年，2018年他创作了一部名为《龙豹》（*Dragjag*）的绘画系列，这个词由“龙”（dragón）和“美洲豹”（jaguar）两个词组成，以一种造型艺术的方式展示了两种文化之间的互动和张力。这一形象是一个很好的比喻，再现了哥伦比亚太平洋地区的龙和美洲豹，它们自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是哥伦比亚多元文化大家族中的一部分，并且正如我们接下来看到的那样，这个大家族的后代丰富了哥伦比亚的文化图景，然而我们对他们的历史和留下的精神财富却知之甚少。

本文一方面侧重于探索哥伦比亚文学中的“中国”痕迹，即哥伦比亚混血文化（主要由白人、黑人和原住民组成）中的那些“他者”，尤其集中于



探讨梅达尔多·阿里亚斯·沙提萨巴的小说《亡灵爵士》和胡丽安·张 (Julián Chang) 的小说《当微风呢喃》，他们的作品向我们揭示了一个文化更加多元的哥伦比亚，其中的那些“他者”已经成为“我们”的一部分；另一方面，研究哥伦比亚太平洋地区华人聚居地的历史，以及这些“龙”和“美洲豹”们所创作的文艺作品——从广义上理解，包括诗歌、小说和艺术评论。这些作品要么相当有名，但其作者的中国背景不为人知；要么作品本身就鲜为人知。针对第一种情况，我们将会探讨作曲家、诗人佩德罗·张 (Pedro Chang) 的歌曲；针对第二种情况，此文将出现莉斯·瓦克·叶 (Lise Waxer Yip) 的《音乐记忆之城》一书，她是一位华裔加拿大籍的民族音乐学家，是哥伦比亚作家梅达尔多·阿里亚斯·沙提萨巴的妻子，曾居住在卡利，并写了关于这座城市为何成为“世界萨尔萨舞之

都”的文章。

布埃纳文图拉：东方与热带的交汇处

11月月底，收音机里开始播放一首经典的节日歌曲，宣布圣诞节即将到来，这是一首甜蜜而温柔的歌曲，它的歌词似乎从很久之前就一直伴随着我们，为12月那个节日做好了准备：幸福是毫无保留地给予的一切，一朵花，一个吻，爱的温存。圣诞节是提醒我们生活是美好的，十二月是爱……

这首歌曲诞生于20世纪90年代初，是为红鹰咖啡公司创作的广告歌曲，最初由卡利女歌手伊莎多拉 (Isadora) 演唱，它被认为是哥伦比亚广告界令人记忆最深、最流行的广告歌之一；和传统的圣诞颂歌一样，它已经成为哥伦比亚圣诞节背景音乐的一部分。尽管许多人记得它的旋律和歌词，但很少有人知道这首歌的作者是佩德罗·张，他是一位多产的诗人、作曲家和广告商，母亲是哥伦比亚人阿斯特丽德·巴雷罗 (Astrid Barrero)，父亲是中国广东人佩德罗·安东尼奥·张 (Pedro Antonio Chang)，佩德罗·张是独生子。佩德罗·张是卡利前卫诗人团体中的一员，他们受到纳达主义运动的影响，用更加直接、梦幻和尖锐的语言对哥伦比亚的文学进行了革新。佩德罗·张后来创立了“墨菲提克派” (los Mefíticos)，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在诗歌中打开了一个‘节奏’的孔洞，我们为亨利·米勒、超现实主义者和纳达主义者点燃了蜡烛。我们挑战陈



② 1930年布埃纳文图拉海湾 Hernan Fellner/摄

规，我们在大学食堂与流浪汉和妓女分享食物，让他们尝一尝智慧的佳肴。”在学校里，佩德罗·张认识了何塞·马里奥·阿贝莱斯·拉莫斯（José Mario Arbeláez Ramos），后者常被人们称为J.马里奥，在纳达主义运动的创始人贡萨洛·阿朗戈（Gonzalo Arango）不幸去世后，J.马里奥渐渐成为该团体的代表诗人之一。佩德罗·张对他的朋友J.马里奥的描绘如下：“瘦得像兰波的一句诗，喜欢在街头闲逛，总处于恋爱中，他是奥布雷罗区（Barrio Obrero）的使者，他利用学校的长凳来宣扬他的那些奇怪的知识。……有了J.马里奥的存在，很多人开始相信，在火车轨道的另一边还有一个不同的世界。”

佩德罗·张出生的城市——布埃纳文图拉，是铁路线的最终目的地，也是哥伦比亚最热闹的港口，它在历史上的某段岁月中要比如今更大、更国际化。作家梅达尔多·阿里亚斯·沙提萨巴这样描述布埃纳文图拉：“在老布埃纳文图拉，大宅子的地板是愈创木的，阳台是樟木的……港口那里常年居住着外国人，有37个领事馆，4个剧院，5个社交俱乐部，3家报社，1个市图书馆，还有1个垃圾焚烧厂，用来焚烧雷蒙德公司的外国佬们带来的垃圾。”1925年，律师豪尔赫·克鲁斯（Jorge Cruz）在布埃纳文图拉的周刊《盾牌》（El Escudo）上写了一篇关于这个港口的评论：“从地理上看，这个城市是一座岛屿。海水温柔而美好，惬意地将城市包裹。城市有一条主干道，很少有横向街道。雨不停地下，雨在此处是一种必需之物……在海湾里，有来自不同国家的



◎ 诗人、作曲家佩德罗·张

货船，有海岸巡逻队、小艇、小划子和帆船，向远处望去，它们在风的指引下，仿佛是在海上嬉戏的海鸥。”在20世纪上半叶，这个城市曾有过一段黄金时代，不仅全国大部分的货品在这里进出口，而且旅游的游轮也会抵达此处，这里是从哥伦比亚内地前往美国或欧洲的必经之路。如今，那段闪亮的历史已不复存在，作家们笔下的老布埃纳文图拉已经留在了过去，新布埃纳文图拉试图在抵达其港口的大批财富中、在剧烈的变动中生存。即便如此，我们仍然可以看到遗留在这里的中国人墓地和华人区的房屋，如今这些地方已被弃置不用，但它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多元文化历史和昔日的辉煌。

亚伯拉罕·叶·马德里（Abraham Yip Madrid）是一位自学成才的华裔作家和历史学家，他在布埃纳文图拉生长，对哥伦比亚其他地区鲜为人知。他在一篇题为《布埃纳文图拉的历史旁白》的文章中对20世纪30年

代的华人社区作了如下描写：“正如数量最多的外来移民是来自中国，对港口的商业发展贡献最大的也是亚洲人：曼努埃尔·顾、维克多·蔡、菲利克斯·蔡、乔治·司徒、路易辛多·洪、亚伯拉罕·叶、杨坝堰、何塞·林、卡洛斯·冯、亚历杭德罗·郑、马西亚·冯、卡洛斯·钱、巴勃罗·范。”在同一时期的布埃纳文图拉周刊《盾牌》上面，我们不仅可以找到中国商铺的广告，如：“布埃纳文图拉亚洲商业公司：大型杂货店，批发和零售，货品齐全、不断更新，接非本地订单，价格实惠”，甚至还能看到一封题为《一位中国人说》的公开信，上面带有路易斯·G·莫克（Luis G. Mock）和何塞·C·克拉索斯（José C. Collazos）的签名，这是一封给考卡山谷省省长的请愿书，要求他撤换布埃纳文图拉市市长。

“基于强有力的、想必能够说服您的理由，我们写下这封请愿书，无比恭敬地请求您发挥您的职权，将何塞·伊格纳西奥·霍马萨·N.先生从他目前担任的本市市长职位上撤下来，因为他作为一位官方人物，对您的管理不能增添丝毫荣誉……在这里，我们需要严肃的人，在司法行政上公平公正的人。我们需要的是因其贡献和工作而值得人们爱戴的人，而不是表面光鲜、实则迂腐的人，这些人的工作只是每月在工资单上签字。”

——《一位中国人说》公开信

哥伦比亚太平洋地区的布埃纳文图拉港、图马科港以及加勒比海地区的巴兰基亚港，是大多数中国移民和来自其他文化的移民定居的地方，

他们来这儿是为了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就华人社区而言，第一批中国移民是在1854年左右来到这里的，他们参加了巴拿马洋际铁路的建设，当时这一地区仍属于哥伦比亚共和国。“几年后，项目完工，他们中的一些人搬到了哥伦比亚的其他地方：巴兰基亚是他们的主要目的地，然后是卡塔赫纳和布埃纳文图拉，他们在那经营起了零售生意和餐馆。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美食在加勒比地区的饮食习惯中随处可见”，名厨莱昂诺尔·埃斯皮诺萨（Leonor Espinosa）在她的《锅碗瓢盆告诉我们的事情》一书中，写到了哥伦比亚的异国美食，据说加布里埃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曾称，在巴兰基亚可以吃到哥伦比亚最好的中国炒饭。

在我国国家，有关哥伦比亚太平洋地区的中国移民的文章很少，为此在2018年，作为《中国之友》杂志的编辑，我决定邀请卡利市的几位有代表性的华裔人士写一写他们的家族史，其中包括作家胡丽安·张，他是佩德罗·张的长子：

“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初，阿方索·洪同我的祖父一起从中国来到哥伦比亚。他告诉我，我的祖父当时住在广东，但由于一些政治原因，祖父和他的一些同乡都受到了迫害。蒋介石在当时的国内政局中担任主要角色，祖父的妻子惨遭杀害。因此，他也成了首批来到哥伦比亚布埃纳文图拉的中国移民之一。他不是跟自己的亲兄弟一起来的，而是跟几个堂兄弟。阿方索告诉我，在翻遍世界地图以后，他们觉得哥伦比亚的太平洋港口或许和广东有相似之处，于是他们冒险漂洋过海抵达了这里。而时间最终证明了他们的做法是正确的，虽然两国之间有着文化差异，但他们还是不失体面地融入了当地社会中。”

阿方索·洪在谈及广东和哥伦比亚太平洋沿岸地区的地理相似性时，并不是夸大其词，事实上，香港的港口和布埃纳文图拉的港口首先是作

为岛屿存在，两地全年的湿度都很高。另一方面，阿方索·洪的孙女皮拉尔·洪如今是一名记者，也是卡利电视台现任台长，她写道：“一大批农民、矿工、厨师和工人都把哥伦比亚太平洋地区作为一个工作之地，他们在饥饿、人口过多、经济困难的压迫下，离开了自己的国家寻找新的谋生机会。”

当时的中国政局动荡，再加上日本入侵中国，这些因素也是艺术家、策展人约兰达·蔡（Yolanda Chois）的祖父从中国移民到哥伦比亚的原因：“弗朗西斯科（我的祖父）来自一个战事频仍的中国，那里有饥荒和领土侵略。所有与他相关的事在我们家都是一个谜，因为他的大女儿，也就是我的姑妈悲惨逝世后，他就离开了哥伦比亚，我就是随姑妈取了约兰达这个名字。因此，我所讲的故事始终笼罩在一个于我而言十分遥远的人物的光晕里。这个谜团是用碎片拼凑起来的，有人说他乘坐一艘载满中国移民的船来美洲大陆的某个地方碰碰运气。有关这趟航行的想象中，最吸引人之处是想到他经过加勒比地区的时候，他所乘坐的船停靠在古巴，这里也居住着很多中国移民，但他不愿意留在那里；船也停靠在了巴拿马，虽然我们都知道巴拿马在当时有众多的中国移民，但他仍不想留在那里，布埃纳文图拉好像是那艘船的最终目的地，他便在那儿下了船”。约兰达·蔡写的这篇回忆文章是一个令人心碎的故事，这种文化断裂——不管是出于有意还是无意——都是一些家庭共有的特征，正如我们在下文中看到的那样，它也是胡丽安·张的小说《当微风呢喃》的一个潜在背景。

梅达尔多·阿里亚斯·沙提萨巴是为数不多的展现哥伦比亚太平洋地区华人居住史和华人精神财富的人之一，他是一位作家，也是卡利《国家报》的专栏作家。他的第一部小说《亡灵爵士》的背景就是他童年时期的布埃纳文图拉，在那个“美好时代”，港口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



② 《亡灵爵士》

小说讲述了美国人杰里米·厄尔利来到伊比萨（港口在小说中的虚构名字），并在格雷斯海运公司工作的故事。如果说马孔多是哥伦比亚文学显性的一面，那么伊比萨则是其隐性但却同样辉煌的一面。马孔多和伊比萨都取材于 20 世纪初的早期工业城镇，在这些地方，外国人和当地人在不同的、分隔的条件下生活，只有在那些包容的灰色地带，他们才会融合到一起。在加布里埃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一书中，中国人是过客一般的存在，“他们用中文生活，用中文繁衍后代，彼此间长得十分相像，以至于没人能分得清他们谁是谁”。在阿尔瓦罗·穆蒂斯（Álvaro Mutis）的小说《海军上将的雪》中，一名海员与一个中国女人产生了一段浪漫情缘，但故事讲了一页半，她便从小说中消失了。相反，在阿里亚斯的小说中，中国人是主角、挚爱之人和朋友，他们都有自己的名字。例如小说中的几个人物：罗萨里奥·兰（Rosario Lan）和她的父亲余·兰（Yu Lan），后者是伊比萨的面包师。这些人物实际上取材于布埃纳文图拉的“市中心”面包店的店主巴勃罗·范一家，他的几个孩子曾是小说作者的同学。阿里亚斯在下面的这个

小说场景中，描述了面包店的内部状况：“余·兰的长女罗萨里奥在柜台后面忙碌着。她微笑着站在收银台后面，有时会拉动一条绳子，打开天花板上的一个秘密小窗口，她父亲通过这个窗口和她说话。有七扇门可以从面包店通向楼上的房间。只有兰氏一家知道每扇门通往哪里，这些门是一座座迷宫，由宣纸灯笼做成的长龙守护着。”在小说的另一个场景中，主人公杰里米·厄尔利与他的朋友伦道夫在纽约唐人街，杰里米谈到了他亲爱的朋友余·兰：“如果你认识余就好了，他是伊比萨的面包师，他人真的很好！在我旅行前夕，他和他的女儿罗萨里奥给我开了一个牡蛎派对。你应该去岛上看一看。我会把你介绍给我的朋友们……”在一次采访中，梅达尔多·阿里亚斯告诉我，小说中这些场景的灵感来自他的童年记忆；他还说，巴勃罗·范一家有时会给学校送好几篮子面包，这是一个非常慷慨的举动，也许是遵循儒家的传统，以此感谢学校所做的工作，激励学生们努力学习。附近的卡利市的华人社区也曾因其团结而闻名：1937年，他们帮助筹集资金，完成了“三个十字架”这一伟大纪念碑的建造，如今这座纪念碑就伫立于卡利西边某座山的山顶上。

卡利，一个错误的城市

“卡利市坐落在考卡河的山谷中。它的西部毗邻一条被称为法拉隆内斯的岩石山脉。其中的一座山上，矗立着三个混凝土十字架，其最初目的是为了抵御魔鬼的进攻。”

——胡丽安·张，《当微风呢喃》

卡利是考卡山谷省的首府，到20世纪中叶时，它已成为哥伦比亚人口第二多、工业第二发

达的城市。今天，它被称为哥伦比亚的绿色城市、“天堂的分部”和“世界萨尔萨舞之都”，因为它是友好的居住城市之一，并将来自安的列斯群岛的一种音乐节奏变成了带有自己特色的舞蹈。

佩德罗·张所作的几首歌曲中都提到了这座养育他的城市，他把卡利定义为“一座错误的城市（没有海，却有山），因为到处是甘蔗而让人腻味，曾经无条件地接收了农民暴动的孩子；卡利寻找着它的路和它的定义，卡利用它的微风、太阳和天空打造出一片理想空间，能让它毫不胆怯地拥有自己的观点”。我们可以说，这种对身份的寻求在1971年左右得到了加强，当时卡利举办了第六届泛美运动会——佩德罗·张为其创作了主题曲《美洲昆比亚舞曲》，并设计了运动会的吉祥物维克多·帕纳梅里卡诺，此外卡利还在现代艺术博物馆成立后不久举办了第一届版画艺术双年展。关于这个历史转折点，如今担任卡利现代艺术博物馆策展人的阿莱杭德罗·马丁（Alejandro Martín）是这样说的：

“在1971年之前，卡利是一个小城市，对现代性抱有期望，因为靠近（布埃纳文图拉）港口而吸引了不少外国人，并且正在经历着几个剧烈的文化进程，这始于1956年，当时开设了拉特图利亚文化俱乐部（和卡利实验剧院）。1971年，所有这些进程达到了高潮，那一年也标志着卡利向现代城市的飞跃。”

巧合的是，2018年在卡利现代艺术博物馆举办了展览“卡利1971，一座美洲城市：设想与现实之间”，展现出了艺术、体育和政治之间的碰撞，充满活力的青年艺术场景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它的孕育始于太阳城这个项目，而一位华裔卡利青年将在之后成为其主角之一，他就是艺术评论家和策展人米格尔·冈萨雷斯·查韦斯（Miguel González Chaves）。



② 佩德罗·张的长子胡丽安·张也是一名作家

活跃于 1971—1973 年期间的太阳城是一个独立的、艺术合作空间，它位于“一栋有两层楼、15 个房间和两个院子的房子，曾经是卡利市中心的一个修道院”。它由埃尔南多·格雷罗和一群卡利年轻人创立，以“促进造型艺术、平面艺术、摄影和电影的创意项目”为使命，太阳城迅速成为卡利的艺术中心。其成员之一就是米格尔·冈萨雷斯（Miguel González），他的第二个姓氏“查韦斯”（Chaves），最初是“张”（Cheung）。虽然他的母亲出生在哥伦比亚，但母亲的娘家来自广东的中山市——国父孙中山就出生在这个城市。米格尔·冈萨雷斯一直是卡利乃至哥伦比亚最有影响力的文化经办者之一；他是所谓的当代艺术“四福音书作者”之一，这个标签将四位有远见的艺术推动者集合在一起，他们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扩大了玛塔·特拉巴（Marta Traba）所开创的道路，在他们的合力促进下，“艺术策展人”这一工作在哥伦比亚正式确立。

太阳城成了艺术家的温床，并为几个重要人物提供了发展平台，其中包括：电影制片人卡洛斯·马约洛（Carlos Mayolo）和路易斯·奥斯皮纳（Luis Ospina）；摄影师费尔内尔·弗朗克（Fernell Franco）；以及传奇作家安德烈斯·凯塞多（Andrés Caicedo），他曾是米格尔·冈萨雷斯在学校的同桌。太阳城成立时的规章中写道，米格尔·冈萨雷斯是太阳城的

公关人员，但他的主要贡献却是策划艺术展，他举办了奥斯卡·穆尼奥斯（Óscar Muñoz）、埃弗·阿斯图迪罗（Ever Astudillo）、贝阿特里斯·冈萨雷斯（Beatriz González）等艺术家的展览。作为这项工作的补充，他还在当地报纸上撰写艺术评论。米格尔·冈萨雷斯在工作和管理方面非常出色，以至于太阳城的创始人埃尔南多·格雷罗认为他的地位过于突出，决定解雇他。格雷罗回想起来说，这是他的重大错误之一，也是这个项目走下坡路的开始。

米格尔·冈萨雷斯的文艺批评作品相当丰富，他的一大部分作品被收录于一套书籍中，其中有一卷名为《卡利：视野与目光》，专门介绍来自卡利的，或以卡利为基地的艺术家们。在这里我想强调此书中的一段相关文字，讲的是哥伦比亚华裔雕塑家巴勃罗·范·王的作品，与他 1996 年在卡利现代艺术博物馆举办的一次个人展有关，当时米格尔·冈萨雷斯是主要策展人：

“巴勃罗用几件作品表现了他近来所关注的事物。虽然他的艺术语言仍采用了生锈的物件和变化无穷的元素，但不一样的是，他用黄金将所有元素结合在一起，赋予作品一种奢华的外观。巴勃罗·范·王将苦难、暴力和遗弃的感觉与器物一端的金色薄片放在一起进行对比，增强了隐喻的意味，制造出矛盾和毁灭感——这些概念催生了他那阴森可怕的诗意，以及他那有力亦轻妙的论点。他那饱



② 左起：豪尔赫·蔡，梅达尔多·阿里亚斯，玛丽亚·蔡与宁发·查韦斯·德蔡 土木/摄

含真挚的作品对人类的现状进行探察，借助于物件，但也对物件原有的功能打乱重来。”

冈萨雷斯写道，巴勃罗·范·王的作品特点之一就是他的那些脑洞大开的长标题：

“巴勃罗执意用长长的富有诗意的标题去命名作品，这些标题囊括了他所有细腻的感觉，他还使用各式各样的素材，展现了奇妙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夜晚将至，骑白色飞马的光荣诸神将冲向前方》这件作品是用保鲜盒、玻璃、金属、

天鹅绒和燃烧产生的污染物完成的，这类的作品是对物件的救赎，营造出了科幻感，传达出这样的概念：事物之脆弱与时间之流逝是亘古不变的。《它们将再次苏醒，所有美好的事物将只不过是瞬息的激情》这件作品呈现的是十五件用铁做成、状似士兵头盔的东西，带着生锈的钉子和金色的薄片，旨在对外形和实质进行讽刺。”

我摘取了上述片段，既是为了欣赏冈萨雷斯的评论，也是为了品味巴勃罗·范·王的诗学。从我所能查阅到的介绍巴勃罗·范·王的文章来

看，很少有文章提及他的中国血统，人们普遍认为他是一位哥伦比亚艺术家，创作的是有关哥伦比亚现实的作品。

亚洲血统在巴勃罗·范·王和冈萨雷斯的身上体现得不是很明显，但对他们来说是一种非常个人化的、潜移默化存在。例如，冈萨雷斯的姨妈宁发·查韦斯·德蔡（Ninfa Chaves de Chois）——此人在冈萨雷斯的母亲早逝后担任起了他母亲的角色——她住在一个配着精美中国家具和装饰的公寓里。她的丈夫是一个有事业心的中国移民，经由秘鲁来到了哥伦比亚。在一次采访中，她告诉我，她的父亲试图教孩子们书法，但由于缺乏判断力，而且书法在当时的哥伦比亚没有什么实际用途，她和其他孩子渐渐荒废了书法课。她还说，多年来他们总是与在香港的亲戚保持联系，但遗憾的是，自一段时间以来，这种联系已经中断了。她的儿子豪尔赫·蔡（Jorge Chois）是一名工程师，喜欢烹饪，他珍藏着一本笔记本，他的父亲在上面手写了所有他知道的中国菜谱。另一方面，巴勃罗的姐姐凡妮·范·王告诉我，她的父亲巴勃罗·范出生在哥伦比亚，她的母亲出生在中国。凡妮从小就学会了说广东话，对她来说，品尝美味的中国菜和喝茶是用来与别人分享和庆祝的精致仪式。巴勃罗·范·王在1996年的一次采访中，提到了“道”和《易经》中的东方哲学对其创作过程的影响；而米格尔·冈萨雷斯虽然很少谈及这个话题，但他告诉我，在某次假期中，他进行了一次中国朝圣之旅；由于他是一名专业的歌剧观众，所以他在现场欣赏了长达7个小时的京剧表演，令导游惊讶赞叹不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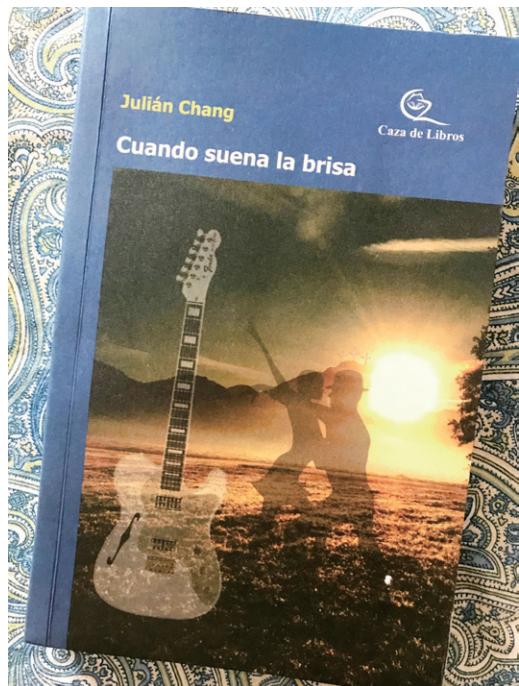
从上面的描述中，我们可以推断出，20世纪上半叶到达哥伦比亚的中国移民，在某种程度上经历了亚洲身份的逐渐丧失，但另一方面，他们知道如何适应哥伦比亚社会，并以体面的方式繁荣富起来，同时也会珍惜他们从祖先那里多多

少继承下来的东西。记者皮拉尔·洪这样总结道：

“这个有冒险精神的年轻人（阿方索·洪），在二十世纪初期来到布埃纳文图拉，为了一个稳定的未来去创造梦想、经历梦想。……他在哥伦比亚留下了8个儿女，33个孙子孙女和30多个重孙子女。为了纪念祖父，同时也为了让我们的家族延续中国历史，我给我的儿女们分别取名为韩愈和中山。”

当微风呢喃

2016年，作家胡丽安·张的处女作小说《当微风呢喃》出版，这也许是哥伦比亚截至目前出版的唯一一部主角是华裔哥伦比亚人的作品，这个细节可能会被忽视，但如果仔细阅读那些揭示主角家庭背景的段落，也许你会同意，这些段落是小说中最感人的部分，它揭示了哥伦比亚社会



② 《当微风呢喃》

中多元的、万花筒般的文化层面。

小说围绕着埃米利奥·萨尔加多（Emilio Salgado）和他的朋友们展开，他们出生于 20 世纪 70 年代，在著名的 90 年代里长大成人，那时的卡利遭受了一股贩毒浪潮的强力冲击。三条相互交织的叙事线构成了小说的主线：第一条线以倒叙的方式，讲述了发生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故事，当时这些年轻人正在从高中向大学过渡；小说还有一条现在的时间线，是 2004 年 7 月 24 日晚，这群朋友再次聚会，一起庆祝，并谈论世事的变化；最后一条线是一系列取材于民间传说的恐怖故事，赋予了这本书以神秘小说的意味。在每章之间，我们可以看到几首诗（俳句风格），以小插画的形式写成，是由主人公埃米利奥·萨尔加多写的，正如我们稍后将看到的，他也许是作者的另一个自我，因为主人公的背景灵感来自作者的家族史，还因为他们在创作这些“充满甘蔗香味的千年”诗篇时，具有一种相似性。

《当微风呢喃》属于卡利城市文学传统，安德烈斯·凯塞多在其小说《音乐万岁！》中体现过这一传统；这两部小说都试图在某一代人的年代中留下印记；它们讲述的都是年轻人的故事，他们在向成年过渡的过程中成为城市的主人，并敢于跨越不同的社会领域。音乐作为一种创造性的力量、一种怀旧的参照物和故事的背景音，在小说中扮演着主要角色。例如，在小说的开头，主人公埃米利奥·萨尔加多与他的朋友们组成了一个融合摇滚小组，他们创作了一首歌曲，为了向“桃椰子”（chontaduro）致敬，这种产自哥伦比亚太平洋地区的特色水果一般在非洲裔的街区售卖，小说以这种微妙的方式庆祝非洲裔哥伦比亚文化在近几十年来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并渗透到了卡利的流行文化之中：“桃椰子有着邦戈鼓的鼓点 / 有着尚戈的精美铃铛 / 有着索内罗的欢闹 / 还有管乐队 / 桃椰子，桃椰子，哎呀我的桃椰子”。

让我们回到小说中的“中国”元素，有一处关键情节，即主人公埃米利奥·萨尔加多的父亲阿尔弗雷多·萨尔加多的守灵现场，作者在此处对自己的过去进行了思考，并对这种“其他”文化进行了反思。在小说的开头，胡丽安·张用浅浅几笔勾勒出了那次聚会的气氛：“一个中国代表团从布埃纳文图拉来到这里。领头的是一个叫安东尼奥·冯的人，他送给埃米利奥一个中国的幸运娃娃。埃米利奥感到胃部有一丝不适。他在聚会余下的时间里一直站着。”在题为《幸运娃娃》的这一章中，胡丽安·张再次回到了这一场景，并叙述道：

“这个男人（安东尼奥·冯）由他的人围着，坐了下来，把他的手杖靠在墙上，并在膝盖上摩擦他的手掌。身着白衣的代表团与黑色污渍形成鲜明对比。小埃米利奥第一次看到这些与众不同的生物，他们身材矮小，眼睛细长，他们不是外星人。

谢谢。

他们接受了饮料。

安东尼奥·冯和他的同胞们使用了恰当的词语。奇怪的是，当棺材被打开时，他们没有一个人探出身子，以最后看一眼阿尔弗雷多平静的面容。很难辨别这些皮肤下面配置了怎样的感情，因为这些人物的面部表情就像水一样中性。”

正如我前文所说，小说中很少有章节涉及家庭背景，但恰恰是那些涉及的部分是非常真挚和感人的：“黄种人代表团带着死者遗体来到朱宁家：他们是第一代中国移民，是乘船来到此地的华人。不止一个中国人有着棕色的皮肤，说话带有布埃纳文图拉的口音。他们向努比亚（寡妇）打招呼，微微点头。”作者在这里对哥伦比亚太平洋地区社会的种族融合投去了一瞥：“一些（中国人）娶了黑人妇女，生下的孩子皮肤黑，眼睛细长。”再往后，胡丽安·张继续对他们的性格进行

描述：“阿尔弗雷多喜欢中国人说话的方式；字字铿锵，好像他们生气了一样……阿尔弗雷多说他们是糟糕的失败者，但作为朋友，他们是忠实的。”

在采访胡丽安·张的过程中，他告诉我，这些场景来自记忆与虚构的叠加，其中一个例子就是玩扑克游戏的场景，他在这一部分叙述了阿尔弗雷多·萨尔加多死亡时的情况，这是一个真实的事件，灵感来自他的祖父佩德罗·安东尼奥·张的人生：“阿尔弗雷多曾经与他的一群朋友见面，玩扑克。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来自华人社区。里面住着 20 世纪 40 年代从中国广东来的移民。独裁者蒋介石对广东人采取了具有镇压性质的措施。其中一些人决定移居国外。在海外，在一个太平洋海湾的岸边，他们发现了一个名为布埃纳文图拉的热闹港口，它与广东有着相似的地理特征。华人移民的带头人安东尼奥·冯翻遍了地球仪，最后发现了这块热带飞地……时钟已经接近 11 点。阿尔弗雷多拿着一杯威士忌和一支抽了一半的雪茄，面带微笑。他手里拿着同花顺：黑色梅花的 10、J、Q、K、A。就在他准备宣布胜利的时候，他因心脏病发作而栽倒了。”这种命运的偶然性和作者祖父的早逝对张氏家族来说意味着中国文化延续性的断裂；父亲去世时，佩德罗·张还只是个孩子，他既不能继承也不能传递来自另一种文化的生活知识和习俗，然而尽管如此，他的血液中还是带着这种文化，或许来自东方的文化遗产和智慧通过他的诗歌萌芽了。1989 年，为了宣传佩德罗·张的诗集《事物的另一面》，他的朋友、作家埃尔南·托罗（Hernán Toro）在封面上这样写道：“在佩德罗·张的身上，东方和热带的混合产生了一种奇特的结果……不可复制；他的诗歌出人意料，他的诗句值得被熟记。……他的诗歌是中国几千年智慧的女儿，在人民社区中不断成熟，由一位广告工匠悉心调教，由一位来自我们之中的人书写出来，尽管这个人经历了糟糕的时代，但他没有失去微笑的能力。

力，他不惧于表现温柔”。

让我们再次回到《当微风呢喃》中的守灵场景，胡丽安·张如此总结道：“那晚的记忆依然模糊不清。吊唁和无用的安慰。安东尼奥·冯走近努比亚。他带着酋长般的威仪对她说了几句话：阿尔弗雷多是个好人，他耗尽了他最伟大的东西：心脏”。这些话呼应了 2001 年卡利的知名报纸为年仅 55 岁的佩德罗·张的离世而发布的标题为《佩德罗·张耗尽了他最伟大的东西：心脏》的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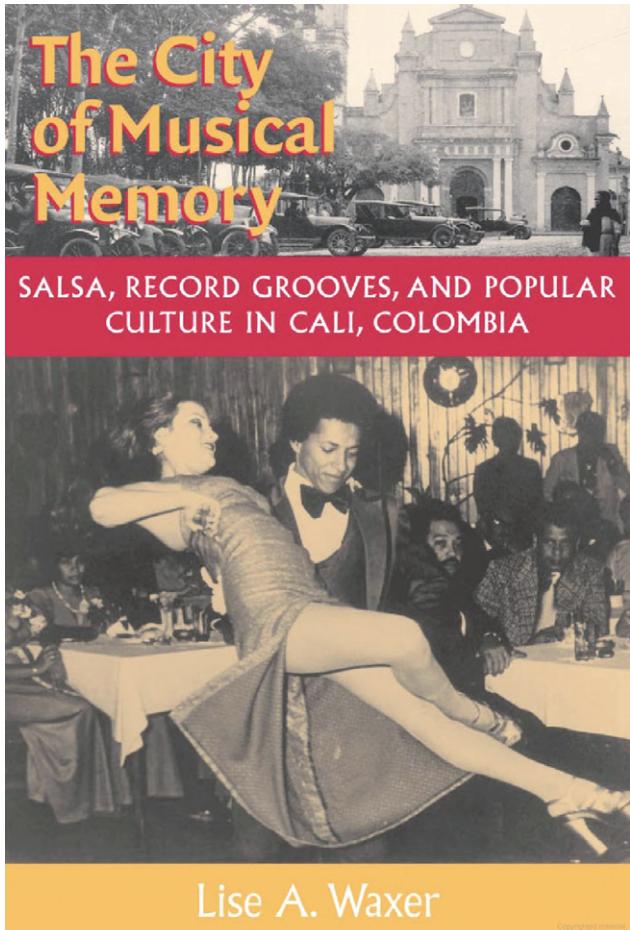
音乐记忆之城

“跳萨尔萨、听萨尔萨，收集萨尔萨唱片和现场演奏萨尔萨音乐已经成为一系列日常但有意义的行为，通过这些行为，卡利人回想起（字面上意义的回想）他们最初是如何经历了自己的城市转变为一个重要的城市化和工业中心，并对这一转变赋予意义的。”

——莉斯·瓦克斯·叶，《音乐记忆之城》



⑥ 加拿大民族音乐学家莉斯·瓦克斯·叶



② 《音乐记忆之城》

作为这一话题的结束，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位作家，她虽然不是出生在哥伦比亚，但也是这个哥伦比亚太平洋地区家族中的一员。我在这里指的就是加拿大民族音乐学家、华裔莉斯·瓦克斯·叶，她是梅达尔多·阿里亚斯的妻子，遗憾的是，她的一生也尤为短暂，但令人钦佩；她对哥伦比亚的探索和热爱凝结成了一本书，极为精彩、详尽地对卡利以及她对萨尔萨的音乐热情进行了阐述：《音乐记忆之城：哥伦比亚卡利的萨尔萨、唱片坑纹和大众文化》。

20世纪90年代中期，瓦克斯居住在卡利，她一边为攻读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博士学位做研究，一边作为拉丁爵士乐队“Magenta”——成员均为女性的钢琴手加入了卡利的音乐界。瓦克斯留下了值得纪念的学术成果，其中包

括《对萨尔萨的定位：拉丁美洲流行音乐的全球市场和地方性意义》和《音乐记忆之城》，获得了美国作曲家、作家与出版商协会的迪恩斯·泰勒奖（ASCAP Deems Taylor Award）和阿兰·梅里亚姆（Alan Merriam）民族音乐学会奖。后一机构为纪念她的学术贡献，设立了莉斯·瓦克斯奖，以鼓励学生在流行音乐领域发表文章。

《音乐记忆之城》一书是在她的博士论文《动感的卡利：一座哥伦比亚城市的萨尔萨社会史》基础上发展而成的一本专著，作者在其中叙述了萨尔萨音乐如何通过布埃纳文图拉港渐渐传入卡利人的耳朵，并成为他们文化的一个特色标志。正如我们前文所讲，1971年前后，卡利正处于城市转型、现代化和寻求身份认同的过程中；正如佩德罗·张指出的那样，“（卡利）曾经无条件地接收了农民暴动的孩子”，也就是说，卡利是一个新兴的城市，“在这里建立了一种新的文化现实，任何一个社会群体都不居于其他群体之上，因此，没有一种地区音乐传统能够代表这个新的、复杂的城市环境。因此，萨尔萨和安的列斯群岛音乐被采纳为这座日益异质化、国际化的城市的代表风格”，瓦克斯在书的导言中如是写道，这与美国学者多丽丝·萨默（Doris Sommer）将舞厅定义为“城市乌托邦的空间”是一脉相承的，在那些“城市的社交绿洲”之中，人们聚集在一起跳舞，不在意别人来自哪里，也不在乎他们的社会或种族背

景：“我指的是适合所有人的乌托邦，不是表面上相似，也不是行为上相似，而是对一个特定主题创作即兴的变体，因为舞蹈是一种创造性的艺术，它强调差异，而非一致性。”

这种安的列斯群岛音乐流派在当时既与古巴、波多黎各有关，也与纽约的拉丁音乐先锋派有关，恰恰是它代表了拉丁文化的国际化和崛起，与来自哥伦比亚中心的“传统”哥伦比亚音乐形成鲜明对比。于是，卡利虽然位于太平洋沿岸，并远离哥伦比亚的文化中心，但是渐渐发展成了一处更加国际化的文化环境，将自身与世界上其他的萨尔萨城市联系了起来。在卡利，萨尔萨找到了一个有利的、开放的环境，随着时间的推移，诞生了一种独特的音乐收集文化和音乐的广博文化，在诸如“萨尔萨舞厅”或“黑胶博物馆”这样的流行音乐酒吧中可见一斑——酒吧的名字来自某位DJ对它们的称呼。在城市里，这种音乐流派也发展出一种独特的“卡利”风格的舞蹈方式，其特点是继承了波加洛舞、恰恰舞、摇摆舞等舞种的快速动作。

瓦克斯编织了近半个世纪的历史，最后，多亏了这位加拿大华裔女士和她的作品，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为什么卡利是“世界萨尔萨之都”。瓦克斯没能活着看到“萨尔萨舞节”，这是如今在卡利狂欢节上举行的萨尔萨舞者大游行，若是她知道卡利狂欢节中最受欢迎、最有名的活动之一是“音乐迷大会”，即萨尔萨音乐收藏家和专家们齐聚一堂，想必她会很高兴的。她曾经说过的话仍然很适合当下：“在城市空间诞生的艰难过程中，狂欢节仍将会是一个充满希望之地，它通过萨尔萨音乐和其他活动所传递的记忆和大众身份认同感，一直加强和保持着卡利的身份和经历。”

亚伯拉罕·叶·马德里的侄女帕特里夏·阿门·叶（Patricia Amen Yip）接受采访说，在她从叔叔那里继承的一个箱子中，有一份关于哥伦比亚中国移民区历史的手稿。但愿这份手稿在不久后能重见光明，以便让人们了解这个一直保持低调的移民区的历史。另一方面，近年来，新一代的中国移民来到了卡利市：来自浙江、福建和其他省份的商人加入了广东后裔居住的移民区中。这批移民的涌入给卡利的华人区带来了活力，人们现在又开始庆祝中国传统节日了。在第16期《中国之友》——这一期的专题是哥伦比亚的中国移民——刊发后，哥伦比亚—中国友好协会的布埃纳文图拉分会正在重新启动，他们希望完成的项目之一就是与当地大学联合建立孔子学院。如果这一愿望能够实现的话，那么在布埃纳文图拉港口将会竖立起一座学术“宝塔”，它所纪念的是中国龙和美洲豹之间的历史和家族血缘关系，两者之间奇特的邂逅已经在本地结出了奇迹般的果实。●

[文中除署名图片外，其余由胡丽安·张、梅达尔多·阿里亚斯提供]

法兰克福书展巡礼

文 艾云（广东省作家协会散文创作委员会副主任、一级作家）

前往法兰克福

2009年10月，德国第61届法兰克福书展开展，中国作为主宾国派出了100多人的作家代表团前去参展。广东省作家协会有我、杨克、温远辉、范英妍和邱超祥作为派出代表参加这次文学盛会。

关于法兰克福，跳入我脑海的便是“法兰克福学派”。

读过西方理论和政治哲学的人，应该对这一学派有所耳闻。在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中心，聚集着一批致力于新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人。他们中间有弗洛姆、马尔库塞、阿多诺、霍克海默、哈贝马斯等人，本雅明也属这个流派，但他是个自由写作者，不在研究中心工作。

1923年，这个学派成立，以恢复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意义为初心，与被误解、被篡改的所谓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划清界限。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研究中心的犹太籍学者纷纷逃亡。战后的1950年，幸存者才返回法兰克福。

二战结束之后，法兰克福学派的知识分子最为世人瞩目的学术贡献是他们提出的否定辩证法以及批判理论。他们怀着对马克思主义发扬光大的激情，对资本主义及其意识形态进行揭露与批判。资本在利益的驱动下，以不停歇的、如野兽般吞噬的力量呼啸向前。当资本如滚雪球一样无休止扩大时，表面上这一切正在为世界带来科技进步、生活富足，但事实情形是，人类已丧失节制、隐忍、适度匮乏的自我限制和禁忌，任凭欲望张开贪婪的大口。关于责任、义务、德性的道德良知在消失，人类的感受力、想象力在下降，灵魂在苍白中萎缩。贪婪的欲望借着技术的能力，人类在挑战自然与神性的底线。现在的人们，已在不知不觉中承受着另一种压迫和奴役。现代社会，不再是一个健康有力的躯体，它已是百病丛生。

一路回顾着法兰克福学派的说项，不由惊出一身冷汗。现代社会正在和将要发生的一切不幸被其言中。我心想，这次来到法兰克福，一定要去法兰克福大学走一下。即使只在校门外徘徊，也可以想象那些学人在这里工作生活的场景。

住宿等一应琐事安排妥当，我们便到法兰克福书展的活动现场了。

阔大的广场，人群熙攘，你在这里可以看到世界各地不同肤色和着装的人。广场上有许多化妆成各种各样角色的年轻男女。这造型多是仙女、女妖、精灵、海盗、吸血鬼一类，夸张而富于戏剧性。这是西方盛大狂欢节日的表演；一场书展，便是一场盛会。

广场上，中国作家在逐渐聚拢。在门口，我看到铁凝。我记得，1986年年初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第二届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上，我在一个舞会上第一次见到铁凝。铁凝面庞端庄秀丽，神态活泼生动，一排齐刘海覆在前额，后边梳着高高的马尾辫。不久前，她的《麦秸垛》发表并获奖。《麦秸垛》以凛冽峻严之风，一改当初她的成名作《哦·香雪》的清新淡雅。我非常喜欢读她的这篇小说。

那晚，我近距离观察铁凝，她身上有着火焰，多么激荡人心。这样的女人，当然会书写。舞会上，她不停地跳荡着、旋转着，马尾在脑后飘逸。她恣意放达，青春无敌。

这次青创会比较微妙。从上边来说，是继续清污还是坚持解放思想、开放改革，似乎仍有讨论，前景不明。所以青创会也就很少有大的座谈交流，多是自由活动。年轻的中国作家在自由浪漫中嬉戏聊天，从这个房间串到那个房间，大家度过了一周难忘时光。这是石块也可迸溅火苗的燃情岁月，一周聚拢，光是见见人、想想事，已足以催化叙事，启示灵感。随后，我读到了铁凝的《棉花垛》和长篇《玫瑰门》。铁凝成为有力量有胆识，可以穿透人生命运思考的大女人。我曾为《玫瑰门》写过一篇评论《把女人的性别发挥到极致》，发表在1989年的《当代作家评论》上。这是我的有感而发，谈不上是成熟的评论。但我的确被大气磅礴的铁凝给征服了。

我对铁凝始终怀着好奇，深以为她是集禀赋心智、审美、能量于一身的奇女子。

后来，河北籍的女性批评家谭湘有一次对我

说：“铁凝智力超群，情商尤高，世事练达，通透圆融。她特别能照顾到别人的情绪，善于斡旋人际关系。老中青、左中右她都能摆平，都说她好。”

让所有人满意不大可能，神仙也做不到。但在懂得人情世故的铁凝那里，她深谙人性之幽暗复杂及真实，自己也常存危机意识，并无多少道德优越；这保证了她的平抑低调、谦逊待人的本心。听说有基层作者给她写信，她都会亲自回信。她眼里没有三六九等，她除了冰雪聪明，还有侠气豪爽的风度。她懂得为官之道和为人、为文之道，她本身就是个有意味的存在。

女人对女人，总有观察和感受。且让我暂时中断这些纷纷思绪，随一波又一波的人流前往中国文学馆。

上电梯，又上电梯，穿过一道又一道厚重门户，中国文学馆那带有强烈东方人文之光的设计呈现目前。

一摞摞的书籍、一叠叠的纸张、一汪汪的水漾，连同活字印刷，中国的古老文明与文化，携带着昔日的光荣和今日的梦想，以永恒不衰的精神意向弥漫于无穷天地，那么漫长古老，又那么弥新传神。

右手边的巨大墙壁上，一张张放大了的中国作家的黑白肖像贴挂那里。那些男男女女，都是当代中国文坛比较活跃的人物。他们的面孔严峻冷，有灵魂受难的气质。我的心不觉一震。作家，大都是心事浩茫、沉郁顿挫的人，每天欢天喜地的人做不成作家。人的灵魂若无战栗怎么会出感受、出语言？但是我有着庸俗的秉性，真心希望致力于原创性写作的人，要懂得一些日常保健，能够身心无恙地活着。我可以灵魂受难，但我恐惧肉身疼痛，任何一些的不舒服，比如头痛、失眠、憋闷、心悸，都影响到我的日常生活，当然更包括写作。写作即思想。在思想途中，我们要完成的不是在世的功名，不是书印刷多少，有

无很高的知名度，而是说在我们的写作过程中，不追慕虚名、不打诳言妄语，不以卑琐企图，传递不好的东西。凡落到纸上的，都有敲击人心的影响力和神圣性，以虔诚敬畏之心而书写，才是写作者一生的宗旨。一生很长，却又很短，打一个呵欠就老之将至了。而人生修为何其漫漫，若尽可能以健康之身活得长些，以迎接那一场场春风化雨般蜕变的年轮，最后可以走向澄明清澈之境，那该多么好。

我正在那里出神，突然听到后边有人喊我，扭头一看，哦，原来是张江。张江在广州时与我是邻居。2000年广东省作协单位宿舍楼竣工，我分到5楼，张江分到7楼。成邻居之前，我们就已相识。那年，他从广西调来广东工作，我们在一次朋友聚会上见面，彼此留下好印象。他是学者型官员，本科学的是外语，同时又是笔杆子，热爱理论，具有思辨力。

我和张江握手。时隔几年，在异国他乡遇旧相识，非常高兴。他笑盈盈站在那里，我发觉他有些像演员段奕宏，只是更和蔼可亲。他已从广东调往辽宁，正是2009年5月，他正式被任命为辽宁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听说他为林建法任主编的《当代作家评论》给予了少道义和经济上的扶持。他一定会这样的。

我们未及详聊，就被冲散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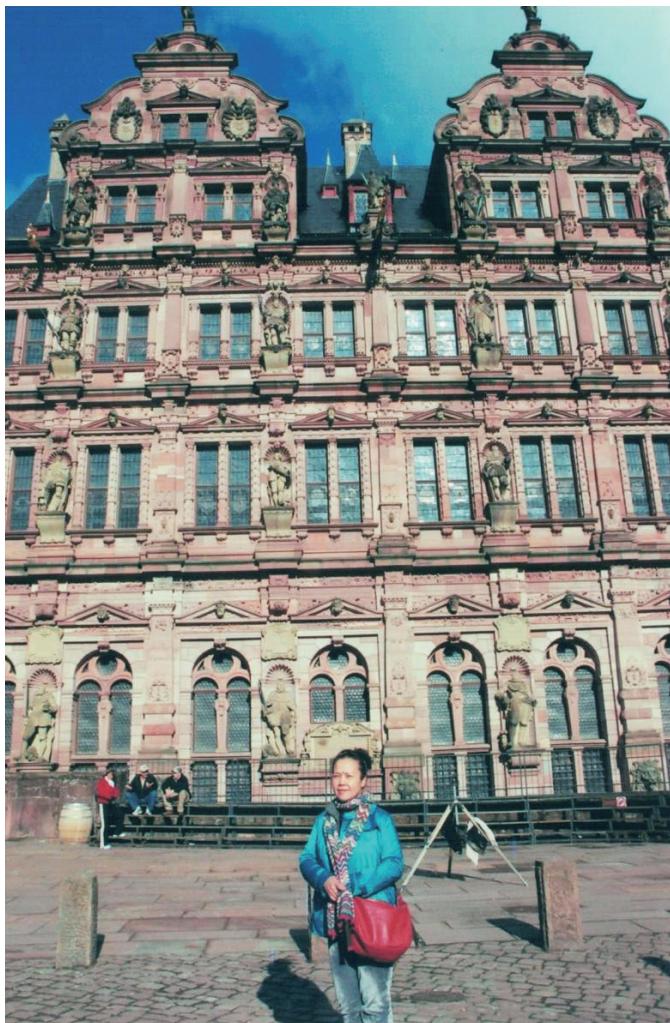
人实在是太多了，参观的人一波波涌进。我在这里见到了许多久

未谋面的人。这不，我见到了河南作协的郑彦英等人。我在河南省文联供职10年，与郑彦英是老朋友，此次相见，又是欣喜。

在拐角处，我竟意外地碰到了李洱。这个小兄弟极其聪慧，是个人精。我在河南省文联《奔流》杂志任理论编辑时，他还在河南郑州某一所高校教书。我们距离较近，他常到我办公室小坐。他那时正在苦读博尔赫斯，入迷博氏的智性书写中交叉花园的小径。后来，我迁徙广州；他去上海读书毕业又回豫，后来又调往北京。他的小说已崭露峥嵘，《花腔》出来，赞誉声隆。

李洱拿有相机，他为我拍了不少照片。

认识和不认识的中国作家，比肩接踵，都在法兰克福邂逅。



② 艾云在法兰克福市区游览

文学的、世界的

隆重的书展开幕式在法兰克福会议中心举行。这次开幕式，规格的确是高。

德国出版协会主席讲话、法兰克福市市长讲话以后，中国作家代表莫言、铁凝发言。

中国作为这届书展的主宾国，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亲自莅临开幕式并讲话，之后是德国总理默克尔讲话。这个女人执掌德国最高政治权力，让人心服口服。在德国，舞台一向是为男人准备的。且不说政治舞台上有腓特烈大帝，有俾斯麦铁血宰相，就连文学也鲜见德国女人的身影。比较邻国，英国至少有盖斯凯尔夫人，有夏洛蒂三姐妹，也有伍尔夫这些女作家荣耀英伦。法国那就更多了，斯达尔夫人、乔治·桑以及近代的波芙娃、尤瑟纳尔、杜拉斯都有响亮的名声。德国很少女作家。当年狂飚突进时期，有热爱思想的谢林夫人卡洛琳娜，她也只是在男知识分子讨论研读时在一旁端茶倒水。她所有的文字只留在她写给友人的信函里，并无其他著作问世。却是默克尔，一旦登上政治舞台，她是那样光彩夺目不同凡响，有着杰出政治家的开阔胸襟和卓识远见。在面对严峻的世界大事件时，在变幻莫测的历史风云中，她掌舵德国这艘巨船，沉着冷静，稳健务实，又有原则立场和价值判断。她为德国赢得声望与光荣。

随后，在法兰克福有自由活动时间，我们开始在市区游览。

天仍阴着，但是没有雾霾。市区空旷，街道两边的屋舍，无论平房还是楼宇看起来都比较整齐规范，很少见潦倒颓败的破房，这显然是注重日常维修的效果。街面洁净，空气无尘，一切都充分显示着秩序感。

我们一路步行穿过大街小巷，浏览沿途景致。

穿过一道拱门，发现了一大片有着历史感的建筑群。这些灰白、浅黄、赭褐的楼宇大都三四

层，不高，但建筑风格经典考究。最吸引人的是外墙精美的浮雕。我发现，在欧洲国家，人们很愿意将艺术表现手法装饰于外，浮雕艺术尤其引人注目。那浮雕多是久负盛名的历史人物，人物形象生动逼真；也有很多装饰性花卉缭绕，线条优美流畅。这是将艺术置放于大地之上的公开展现。每当人们经过这里，都将是一次艺术的感官唤醒。

深秋的风吹着，叶子落在锃亮的石子路面。空气清冽，冷香幽幽，让人惬意。

悠悠走着，我们居然来到法兰克福大学。门口一大片草坪，草坪后边，有一座红赭色主楼，这应该是代表法兰克福大学形象的楼宇了。这所大学不像德国其他大学历史悠久，它创办于1914年，属国立大学。

在主楼两侧，可以看到一幢幢米黄色的7层楼房，这应该是学生宿舍吧。

望着这些楼房，我在想，阿多诺、马尔库塞、霍克海默他们那闻名世界的“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中心”在哪个房间办公？我甚至可以想象他们安静地沉思、阅读，然后又热烈讨论的情景。

走着想着，在校门外西边，突然看到有一群人在那里聚集。参加者戴有法西斯的显眼标志。不一会儿，有赶过来的警察将他们驱散。

这多是些年轻人，情绪极为反常，以为愤懑反抗会让他们显得与众不同。他们不懂历史的残酷真相，以为希特勒的法西斯政权给德国带来了强盛国威。这些极右翼势力，在德国仍有一批拥趸。他们不了解法西斯的所做所为从来都是上帝无法原谅的罪孽。

在国外，我不禁联想到如今居住在世界各地华裔的处境。我们中国人走到哪里都保留着勤劳节俭、顾家、不忘习俗的传统，这些习俗并不一定会为异国文化所接受。比方说，中国人认为勤劳才能致富，他们把点滴时间都用来创造财富上。

国外开商店，节假日肯定要关门。中国人开店，哪有休息这一说？只要有顾客，有需求，就肯定会开门迎客。外国人认为你这么做，岂不是侵害了他的利益。再比如说，中国人挣到了钱，他们肯定会想着赶紧寄回国内接济家乡的亲眷。外国人则认为你在他们国家赚钱，却不在那里消费，还要将所挣钱款寄回中国，这是无法容忍的一件事。再比如，中国人无论在哪个国家定居，总保留唐人街，有大的事情总会祭祖、烧香、舞狮子。外国人认为你为什么不能完全融入他们的文化传统。这一切，久而久之，就被人家认为是原罪。外国人对华裔存在根深蒂固的成见，这是两种文明、两种文化传统的冲突。早些年间，美国制定的《排华法案》，印尼残酷的排华行为，都让在海外谋生的华人经受着痛苦而惨烈的不堪境遇。后来，正是伴随中国的崛起和强大，海外华人才因此可以挺直腰板不那么受人欺辱。祖国强大，才是可以依恃的靠山。

正想着，大家折转身来，往歌德故居走去。这一站，才是以创作为生命的作家们所要朝拜的同行。歌德，是法兰克福的儿子，他出生在这座城市；我们来法兰克福，肯定要去歌德故居参观。

穿过几条街巷来到市中心西思格拉大街。说是大街，并无车水马流的喧闹，街道不宽，非常僻静。走过一段有坡度的道路，便见路边一座四层楼房，楼的正面墙壁浅白带黄，一侧的楼面爬满青藤。这里正是歌德出生、长大、生活的地方。我们从一个侧门进到歌德故居里面。

歌德家世并不寒微，可以说是比较富裕。这里有 16 个房间。第三层，歌德于 1749 年 8 月出生在这里。第四楼，是他写作的地方。歌德站着书写的斜面桌子还摆放在那里，书橱里有 5000 多册图书。

歌德这个人非常有意思，他从不把自己弄成苦哈哈的样子。他求学、漫游、沉思，也不耽误他做官、社交、入世。他在莱比锡大学学法律，

毕业以后他有一段游学时光。那些经历都被他写进了《威廉·迈斯特学习年代和漫游年代》。

歌德对中国文化与文明怀抱热忱，他讲到中国人时不无赞誉：“那些人几乎和我们有同样的思想、行为和感情。我们认为和他们是同类人，只不过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来得更加明朗、纯洁，也更符合道德。”

我望着这间书房，想象歌德当年站在这里写作的姿态。他不仅是书斋的，他也入世。那一年，德国中部魏玛公国的卡尔·奥尔斯特公爵，也是图林根国君，召歌德前来魏玛公干。26 岁的歌德欣然前往。奥尔斯特公爵是歌德的小迷弟，他将许多国务活动交予歌德，歌德随后担任枢密大臣，相当于部长职位。在这里，歌德为郊外的房子设计装修，他从此爱上了园林与建筑；也是在这里，他爱上了夏绿蒂·施泰因，为她写下 1600 多封情书；在这里，他与女工克丽斯蒂娜发展恋情，却一直没有给她名分。直到儿子 17 岁那年，有感于克丽斯蒂娜患难之中依旧不离不弃，他才同她结婚。

歌德知道自己的庸俗和渺小，妥协和薄情，但他仍是自省的，他将精神追问写进了作品。他 23 岁的成名之作《少年维特之烦恼》，写着懵懂青春岁月的烦忧；但若是没有他的诗性悲剧《浮士德》，他将无法进入世界文化巨擘的序列。有了《浮士德》，歌德名垂千古。这是歌德一生的追省：他借浮士德与魔鬼签约，将一个人求学、旅行、恋爱、入仕等在世的活动实践写进诗章。那是跌宕起伏的追省涵盖了歌德的一生。这部著作歌德的确是写了一辈子。没有很多的体验，他写不出来。他经历着然后创造着。后人将歌德的《浮士德》与荷马的《荷马史诗》、但丁的《神曲》、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并称不朽之作。歌德不虚此名。

我习惯于走神。我在想，一部《浮士德》，歌德花毕生精力去写，放在我们，谁可能做到。

我们写作，不习惯低回徘徊中个人的灵魂自省。我们要么喜欢对他人、对社会去否定去批判，借此让自己有种天然的正义伸张的道德优越；要么，我们从个人生活的鸡毛蒜皮写起，以为这是接地气的文字，是现实关怀。

批判精神与现实触及都是必须的，但在经验之外是否应该有超验维度？我们中国作家是否也应该考虑一下灵魂追省？有人说，超验，作品富于思想性，是一种精神奢侈，那些面色枯槁，蠕动苟活的人不会去想这些问题。仅这一句道德高调，一下子可以堵住所有人的嘴。但是，关心穷人、无产者，必须要在精神拔擢之后，正如同无产阶级从来不会在自己的阶级中产生自己的代言人，反倒是那些经过知识储备、思想训练的非无产者，才有宽广的胸襟为无产者悲苦的命运揪心地疼痛，并努力改变。

灵魂问题，是我们宽阔眼界以后必须要正视的。所有的写作，不仅仅是呈现被污辱被损害者的卑琐，不堪处境，而是要有救赎的形而上精神。将智识拓展，让心胸强大，正是创作者应该奉献给读者的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关心灵魂问题，不是一个人吃跑了饭没事干的呓语。只要你写作，你就已经超越了自身的阶级规定。无论你是穷人还是富人，无论你是托尔斯泰那样的贵族，还是歌德那样的廷臣，你都会冲出本阶级命运的规定和局限，成为代人类发出人性真实声音的一分子。

关心灵魂问题，是文学的、也是世界的永恒话题，没有族群、性别之分，正如同生死。当年歌德在《浮士德》中抛出的人在世的种种挣扎与思索，无论哪个国度、哪个时代的男男女女都要面对。

从歌德故居出来已经中午了，我们去找餐馆吃饭。都说德国的咸猪手很有名，来这里自然应该品尝一下。于是，大家在一家专门的咸猪手饭店坐下。

灵魂的与身体的

我有些头疼，决定放弃这顿美味佳肴。

来德国的这几天，酒店提供自助早餐比较丰富，牛奶和奶酪很香，不免多吃了几嘴。但这浓郁、热量较大的食物，我的身体消受不起，略一食多，便觉冲头。

我没吃午餐，喝了几口柠檬水，便在街上溜达。凉风吹着，大概过了半小时，我感觉头脑清醒多了。

欧医生常说：让身体说话，你要懂得倾听身体告诉你的讯息。我在欧医生那里治疗5年，身体在变好的同时，也在变得极其敏感。任何不适，身体马上会表现出来。我吃得热量过了，就会头疼，这提醒我要减免食物热量摄取。有的人一不舒服马上就会去吃西药，或者要进补，以为是营养跟不上。这看怎么理解，如果一个人真的营养不良，是要增加营养；可是现在的人，尤其生活在城市的人，有几个营养不良，大量是营养过剩。欧医生一直说：现在人们的很多毛病都是吃出来的。这话，说给人听大都不信。人们有病，首先应该做的不是补而是清，清比补更难，这里边的学问更大。

有的人说，能吃是福，吃到嘴里就是赚。于是，那些条件好的，肥膏丰脂，浓汤厚油一并入肚。有的人说，我肠胃特别好啊，吃什么都香，吃多少都不撑。殊不知，这后果很可怕。若你什么都照单全收，没有任何不适，可能是你的经络堵塞，身体麻木，已发不出感应灵敏的信号。时间长了，等到你觉察到了，一去医院检查，肯定就是大病。还有的人，前期身体对不良的生活习惯和饮食还有回应，比如吃热量过多头疼。但他从不自己找原因，然后马上去吃止痛片。头刹那不疼，他以为病好了，仍然热量进口多多。又头疼，又吃止痛片。本来，聪明的身体在提醒，也在向你发出求救信

号，你不但不理睬，反而祸害它。一个原本健康的人，这么一路下来，没病也有病了。本来，就是饿一下，减轻肠胃负担，如此简单的收支平衡之事，让我们越弄越复杂。

我在凉风习习的法兰克福的街上走，脑子里想的却都是些庸常世俗的念头。中国作家及思想者许多是以血为墨而书写，长期的案牍，逐渐将残破的肉身变成了语言的发送地。他们谈及殉道、献祭，莫不充满美学的悲壮感。这样的作家将与沽名钓誉者拉开距离。这部分人虽是少数，却足以延续作家与思者的光荣基因。但是，他们读很多书，社会的、哲学的、文学的，却不去读身体这本大书；具体来说，他们不大重视中国医学、即博大精深的中医理论。我是因为自己长久患病处在亚健康状态，才陆陆续续接触到中医理论，并庆幸得到一个中医大师的诊治。

我想说的是，之于一个作家、一个以写作为日课的人，大多数并不是对功名放不下，而是对自己心里想写而又未写出来的东西放不下。我常常会在半夜惊醒，过后便是一阵阵的心焦魔乱。包括这几天在德国。面对优秀的写作同行，敬佩之余，也对自己有鞭策。我之不才，却又心有不甘。在我日渐老去的往后余生，我不是为衰老而难过，而是心有不甘。曾经的日子，我写下过许多断片残羽，却因为无力成型结构成文，一直放在书橱和抽屉里，厚厚叠叠，上边落满延宕的灰尘。我希望自己有一天可以清理出来，让这些札记归于适宜的章节。

我努力医治自己，不是为别的，只是想让自己此生少留遗憾。但我深知，人要有足够的体能和一定长的寿数，才可以将一些书籍消化运用，将一些遗存的问题思考清楚。一个作家，将此生要做的做得大致不差了，不留什么遗憾了，自然会坦然面对后来漫漫的死亡暗夜。

一路想着，人在旅途中，体能在休歇，一些事情也想明白了。我估计他们午饭应该吃得差不

多了，便折转身来找他们。去到店里坐下，我浅酌了一小杯清冽甘甜的德国啤酒。

晚上，我们在法兰克福剧院去听一场音乐会。

豪华富丽的音乐大厅里，发现德国听众都打扮得相当隆重，女人们衣香鬓影、环佩叮当；男人们西装革履，头发闪亮。在公共场合，人们欲以把最美好的精神面貌、姿容仪态展现出来。

比较起来，我们穿着还是普通的衣服。作家们讲灵魂，往往在幽隅苦思冥想，精神撞击成陨石碎片，砸得人生疼生疼。于是，一种抽搐、受难的表情成为我们的常态。我们总是忧伤的、不快活的，喜乐之事是我们必须远离的，我们的语境总是雾霾深重，在阴郁之中，我们沤着自己的心和魂，吐哺一些文字。眼下，这奢华的音乐大厅，这些舞台、公共活动的场所，更适合热爱世俗生活的人。他们衣着光鲜、表情洋溢，与环境和背景匹配。若是走来一些面容愁苦、衣着落伍的人，则显得格格不入。所有的场面，的确不是作家的擅长展示所在。作家是在炼狱中经由疼痛，抵达神圣。

我经常游走在此岸与彼岸，既想了解事物背后深刻的本质，又想咀嚼此世的丰富感受。我的妥协与中庸，注定我的写作只能是对有限的、匮乏的、卑琐的个人，进行重重复重重的灵魂追问。

法兰克福书展活动暂告一段落，我们将分成不同的小分队，分别前往德国不同的城市进行文化采风、文学交流与座谈。

我们这个小分队由 15 人组成，除了我们广东省作协的 5 名成员，另外有浙江作家协会的郑晓林、王手、杨东标、稽亦工和一名年轻的翻译。中国作协有杨承志、胡平、艾克拜尔、岳雯、王莹。我们 15 个人，将奔赴科隆、海德堡、杜塞尔多夫、美因兹等地进行文化交流。人们常说，只有一起出行，才能增进了解、建立起深厚的感情，此言甚是。接下来的几天，我们 15 个人，的确度过了美好而难忘的时光。

东亚四季美学观念的形成及拓展

文 蒋述卓



作者简介

蒋述卓，1955年生，广西灌阳人。文学博士，现为暨南大学中文系二级教授、文艺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席，广东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海外华文文学与汉语传媒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文艺评论基地（暨南大学）主任，暨南大学文学院文化产业发展研究院院长，《华文文学》主编。

四季意识是东方文学艺术的深层文化因素，它渗透并联系着东方民族的宇宙观、时间观、历史观、伦理观、人生观、命运观，也具体体现在文学艺术作品的叙事结构、人物关系与人物命运叙事中。探讨四季意识与东亚美学的关系，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东亚文学艺术风格和特征的形成，进一步理解东亚美学的独特形式和美学建构的奥秘。

中国古代是一个农业社会，幅员辽阔，跨纬度较广，气候复杂多样，总体上属大陆性季风气候，是世界上季风最典型、季风气候最明显的地区。灾害性天气频发，夏季多降雨，东南部有台风，冬季又有寒潮，西北部与北部还有冰灾等。由于农作物生长与四季气候的变化密切相关，原始初民很早就有了强烈的四季意识。成书于西周初年的《尚书·尧典》就记载，尧帝曾命羲氏与和氏为掌管天地四时的官。甲骨文中已出现春、秋二字。春秋时代，中国古人就利用土圭实测日晷，有了“二至二分”的观念，确定了冬至、夏至与春分、秋分四个节气，同时在宗教活动中有了四时之祭，提倡依时而行。《左传》

僖公五年里已记载有了分（春分、秋分）、至（冬至、夏至）、启（立春、立夏）、闭（立秋、立冬）八个季节的区分，由此形成了岁时活动，并开启了重视季节与政治的关系的先河。《管子·四时篇》就通过古人对阴阳的观察认为天地通过四时寒暑交替来化育万物。阴阳的观念基于天气和气温的观测而来，它们的出现与古人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如《诗经》中的《公刘》篇是周人的史诗，里面就写到他们的先祖后稷被誉为农师，十几代之后传至公刘，公刘的一大功绩便是率领部落由邰迁到豳（今陕西旬邑），其中写到公刘到豳之后相地治田：“笃公刘，既溥既长，既景乃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所谓阴阳，就是山的向背寒暖，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农作物的生长。关于节气以后又不断地改进与完善，到战国时期，出现了《吕氏春秋·十二纪》和《礼记·月令》，至西汉年间，二十四节气名称完成，这标志着中国先人对于四季时空变化的认识已经达到了一个全新的水平。公元前104年，由邓平等制定的《太初历》，正式将二十四节气订于历法，并明确了二十四节气的天文位置。

反映在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中，四时的变化不仅成为影响万物生长凋零的原因，也成为人们情绪与心灵变动的动因。《诗经·豳风·七月》里不仅描写了季节的变化与劳作的过程及其与万物变迁的联系，也写到了春天里女子的思绪波动，

“春日迟迟，采繁祁祁，女子伤悲，殆及公子同归。”对此，郑笺解释“女子伤悲”是“感其物化也”，这是符合春心摇荡而引起女子伤感的原意的。后来的《淮南子·缪称训》所说“春女思，秋士悲”也是指的这个意思。日本中国文学研究学者小尾郊一说：“一般说来，四季之中季节变化最为显著的，对人类感情的震撼最为强烈的，

是春与秋。”他以魏文帝曹丕、曹植、西晋的张载、张协、刘桢、陆机、阮瑀等的诗句为例，指出“在文学中，把秋作为悲哀之物加以表现，以及这种表现的固定化，实际上是从魏晋之交开始的”，“魏晋以后的文学中所表现的秋天景物，绝大部分是和《月令》一致的”。日本学者松浦友久也指出：“正是由于中国的春与秋短暂，由此产生出被扩展了的爱惜与寂寥之情，结果使之成了最易感受的、更深沉细腻的诗歌所表现的季节。”在另一方面，古人还将四季的更迭、春秋的变化与时光的流逝联系起来，从而感叹人生的短暂和时间的不可把握，在文学的表现中就将时间与空间的咏叹融为一体，产生一种天气与人事与人生交融的交感意识，也是美学意识。在中国古典诗歌中伤春悲秋就逐渐成为中华民族将自然与人事、与社会融为一体的集体无意识。

对此，在中国古代文艺理论著作中，从《礼记·乐记》的“感物而动”到陆机的《文赋》“遵四时而叹逝，瞻万物而思纷”再到刘勰的《文心雕龙》的《明诗》《物色》和钟嵘的《诗品·序》，形成了一条“物感”美学理论的显著线索。其中尤以刘勰的总结最为著名。他在前人文学艺术经验的基础上，于《文心雕龙·物色》里说：“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盖阳气萌而玄驹步，阴律凝而丹鸟羞，微虫犹或入感，四时之动物深矣。”“是以献岁发春，悦豫之情畅；滔滔孟夏，郁陶之心凝。天高气清，阴沉之志远；霰雪无垠，矜肃之虑深；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中国古典美学中这一最有显著特色的“物感”美学就来自四季意识，它不仅是中国抒情文学的源泉，也是叙事美学的源泉。自魏晋之后，中国文学以四季来抒写自己的情怀已经形成固定的

格式和传统，并在后来的文学创作中逐渐丰富与扩张。

在东亚的日本，虽是岛国，南端和北端存在着亚热带和寒温带的气候差异，但主要的部分位于中部处于温带。气候温和，空气潮湿，四季的变化较为缓慢而有规律，整个列岛处于柔和的环境之内。山脉贯穿于南北狭长的地形，森林较多，日本的文化形态是从对植物的感受与思索开始的，其美学意识也从对自然尤其是对四季的变化与感受开始建立的。日本美学家今道友信认为日本人“审美意识的基本语词中的最重要的概念都是来自植物的”，“诸如静寂、余情、冷寂，也大多与植物由秋到冬的状态有关”。中国学者也指出：“日本人对自然，特别是对四季的变化、植物世界的变化有着极其纤细而多彩的感受，这就是日本人的自然观最重要的特征。日本人从这种感受中找到了独特的四季自然之美。”《古事记》《日本书纪》里就有了日本人对季节感的萌芽。《万叶集》中的作品，尤其是后期的作品，反映出日本人对四季的强烈关心和感受。全卷的许多诗歌是季节歌咏，有些卷如卷八、卷十则完全按照春夏秋冬四季来划分种类，分出“四季杂歌”和“四季相闻”，就是爱情的歌咏也与四季变化中的自然风物结合起来。日本赴唐学习过的弘法大师遍照金刚在其文论著作《文镜秘府论》“论文意”一篇里也认为“春夏秋冬气色，随时立意”。到了中世的诗歌集《古今和歌集》和《新古今和歌集》，目录中春、夏、秋、冬各自独立。而春、夏又各分上下，所占比重尤重，季节感趋于明确。发展到近世的俳句，“每首俳句必须有一个季题，季题就是与四季有关的题材，范围极广，举凡与春夏秋冬四时变迁有关的自然界及人事界现象都包括在内。”季题成为俳句的结构要素，它

不仅增加俳句的姿色，也成为一种审美习惯。所以，日本文学史家久松潜一称日本文学是“季节的文学”。

正是在对四时风物推移的感受和描写中，日本人建立起他们的“物哀”美学。像中国对春秋的关心和感受一样，日本的《古今和歌集》里，也表达出对四季尤其是春日樱花的伤感和秋夜的愁思。紫式部的《源氏物语》里写到源氏公子对四季的看法，“四季风物中，春天的樱花，秋天的红叶，都不可赏心悦目。但冬夜明月照积雪之景，虽无彩色，却反而沁人心肺，令人神游物外”，这里面已经透露出一种强烈的情物相融意识。但日本人没有将这种对物与心的体察关系简单地等同于中国的“物感”美学，而是在此创造出两个新的概念“物之心”与“事之心”，并将它们的合一称之为“物心人情”，从而建立起他们独有的“物哀”美学。“物之心”是指人心对四季景物的感受，日本文艺理论家本居宣长指出：“例如，看见异常美丽的樱花开放，觉得美丽，这就是知物之心。知道樱花之美，从而心生感动，心花怒放，这就是‘物哀’”；“能够体会到他人的悲伤，是因为知道其悲伤所在，就是能够察知‘事之心’，而体味别人的悲伤心情，自己心中也不由得有悲伤之感，就是‘物哀’”。本居宣长还举出一些具体的作品来谈何为“知物哀”，如《源氏物语》中《桐壶》卷有“虫声唧唧，催人泪下”，“听着风声、虫声，更令人愁肠百转”。《柏木》卷有“看到你，像庭院中的小树那样一无所知的样子，我更加哀伤”，“这些都是面对不同时节的景物而引起的物哀，而随着当时人情感的不同，对同一种景物的感受也有所不同，悲伤的时候所见事物是悲伤的，开心的时候所见事物是开心的”。“物哀”是四季的美学，也是日本文

学艺术的源泉与传统。

—

有“感物而动”的“物感”美学作为基础，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无论在抒情文学还是叙事文学上都注重季节与人的交感、景色与人伦的比附。先秦时期的“山水比德”说发展到魏晋，则进一步演化成“心物交融”的理论，四季的转换也被染上浓浓的人间世情。季节的表达既假借物色来完成，也借人对时间与生命流逝的咏叹来赋予社会与美学的意义。此时，时间的流转带动了空间物色的改变，而空间的变化又在时间的流变中得以扩展，人的感情则是一条经线，将时空串在一起，实现了心物融合。“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正恰切地道出了其中的心物交融美学结构的秘密。

在中国古典诗词中，如《诗经》中的《七月》，它是按照季节与农事的安排来展开叙述的。有些写四季的诗如误为陶渊明所作的顾恺之的《神情诗》“春水满四泽，夏云多奇峰，秋月扬明辉，冬岭秀孤松”，其结构虽是按四时为序，但却是短诗，说不上典型，何况它所反映的四季的生机主要还是表现一种人的感情与精神的投射。在郭茂倩所编《乐府诗集》的《子夜四时歌》里，有记载晋、宋、齐的清商曲辞，其中有春歌二十首、夏歌二十首、秋歌十八首、冬歌十七首，其中春歌中以花落隐喻青春的易逝而无人相邀，夏歌中以莲花隐喻青春的爱怜与爱恋，也有一种时令的感怀和淡淡的忧伤。乐府是民间的歌谣，他们与魏晋时期的文人对春秋的歌咏相呼应，一道成为文学对季节的表达载体。初唐时期一些文人的应制诗，分别以元日、立春、人日、上元、

晦日、寒食、清明、上巳、端午、七夕、仲秋、重阳和除夕等为题，虽是奉和之作，但也反映出当时宫廷的一些祭祀节令的仪式以及民间的岁时风俗。在当时的一些边塞诗、送别诗、闺怨诗里，四季的自然物象与作者的情感抒写紧密结合在一起，一些著名的诗篇更是将伤春与伤世之感渲染到极致，如卢照邻的《长安古意》、刘希夷的《代悲白头翁》就以花开花落的循环往复抒发了光阴流逝的无情和人事变化的无常。四季意识也构成了初唐诗歌繁复的自然物象和时空咏叹相互交织的鲜明特色。

但到小说里，则有了按季节来叙事和展开情节与人物关系的艺术处理方法。“物感”美学在小说里便转化为一种人物情感、心理乃至家族的盛衰随季节的变化而变化的情节叙事。

最典型的莫过于中国古典小说《金瓶梅》和《红楼梦》了。

《金瓶梅》的整个故事从温暖的春天开始，结束在萧索风凉的秋天。西门庆家的盛衰与季节的循环常常相合。《红楼梦》里林黛玉的出场是在冬天，贾母说等过了残冬，春天再给她收拾房屋，另作安置。为表现林黛玉的多愁善感，作者安排她在春天里葬花，其实是在暗示她的红颜薄命。她初次生病时是在秋天，秋雨季节，阴晴不定，她读的诗词是《秋闺怨》《别离怨》等，自己做的词也是《秋窗风雨夕》，其中有句子“罗衾不耐秋风力，残漏声催秋雨急”。连她所喜欢的诗句和审美习惯，也被安排是喜欢秋天的枯荷，“留得残荷听雨声”。一年之后的中秋，她给“寒潭渡鹤影”对出的联句竟然是“冷月葬花魂”。她的心情一直与季节的推移相吻合，她的命运也随着季节的变换而变换。她焚稿而亡时是正月，冬天时节要生火盆。这里边既有抒情的因素，但更

多的是为了叙事的安排。而贾宝玉最后的命运也是以大雪纷飞的冬天而告结束，小说也由此写出了贾府的衰败终成定局。

在这两部小说中，时序的运行与家庭的命运紧密结合起来，也与各种人物之间的矛盾及情节的推进紧密结合。其中最有深意的就是将一些主要人物的生日与节令安排在一起，如《金瓶梅》里李瓶儿的生日在元宵节，吴月娘的生日在中秋节，潘金莲的生日在元月九日的腊月里。《红楼梦》中的一些关键的活动也安排在节日里，如中秋节众姐妹的诗会和三月花落时分重建诗社“桃花社”，等等。这两部小说还很懂得冷热的对比，常常会将一些热闹的活动安排在冷清的秋天或者冬天，相互映衬，以增加小说叙事结构的美学张力。《金瓶梅》里曾四次写到元宵节的欢乐，李瓶儿邀请西门庆为她庆生则是书中的重头戏之一；《红楼梦》中元春省亲安排在寒冷的正月里，热热闹闹的庆祝活动却衬托出元春心情的悲楚；省亲的热闹之后的大半年便出现大观园的变异以及宝黛关系的直转而下。四季的轮转正暗示着人生命运的无常，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祸福相依”“否泰相转”以及世事循环轮回的宇宙观相吻合，体现出中国传统美学“相生相易”的艺术辩证原理。

到了中国当代文学艺术中，这种美学的基因依然存在并得到转化与发挥。

中国当代舞蹈家杨丽萍的舞剧《孔雀》是以四季为分幕来结构作品的。《孔雀》的主题是自然、生命和永恒的爱，它被看作是东方舞蹈之美的代表，它既是关于孔雀的故事，又是关于人性的寓言，体现着生命与天地自然的相融相通。在舞台的音响和灯光设计上它以四个季节的四种主色调为主，是四种色彩基调的多重变奏。在强调

四季更迭的鲜明效果中，让观众感受到时间的流逝和季节的轮替。西方舞剧的经典之作《天鹅湖》，黑天鹅和白天鹅的整体色彩决定了舞剧色彩上黑白分野，在情节上建立起一种善恶对立的形式与结构，而《孔雀》则是一个个体生命的历劫与循环，它的冲突和解决是向内实现的，奉献与爱最终让生命在四季更替中找到答案。这是东方人对生命的阐释方式：内敛，隐忍，历练，渡劫，回归。东方叙事中的四季与生命体验的特征紧密缠绕，四季的“变易”即通向生命的“永恒”。

中国当代导演程小东的作品《白蛇传说》是从中国民间传说《白蛇传》改编而来的，其中白蛇与许仙故事也依照四季来展开。许仙上山采药和与白蛇相遇是在草木葱茏的春天，而最后白蛇被关进雷峰塔里则是万木肃杀的秋天，许仙守塔就在默默清扫落叶与纷纷大雪中度过，一切归于沉寂，影片结尾的字幕缓缓升起，一种空无与荒凉感留在观众的心里。

中国当代电影《无问西东》虽然在结构和叙事上并没有依照四季作明确的序列编排，但是从四季出发来设计四个故事的时空背景的构思令整个影片具有一种跨越春夏秋冬、天南地北的辽阔质感。民国青年学生吴岭澜在飘雪的冬天倚着枯树迎着飞雪拉琴；20世纪60年代学生王敏佳的命运转折点发生在蝉音不绝的夏季，她最终在一场比赛中涅槃重生，而陈鹏与她告别后走入的背景是黄叶遍地的深秋；20世纪30年代学生沈光耀选择参加空军，也是在金秋季节飞上湛蓝的天空；张果果的故事贯穿影片的开头与结尾，故事又与四胞胎新生婴儿有关，它发生在冬春交替之际，象征着一种生命的希望。四个故事各自时空独立，又交织进行，可以视作是以四季审美观念为基础的多线索叙事实践。导演李芳芳注重

视听元素的细腻铺砌，将四个季节的自然特征加以突出表现，影片不时渗出“碧云天，黄叶地”或“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古诗词里的中国意境。

当代作家付秀莹的长篇小说《陌上》从腊月写起，展开她的芳村叙事：进入五月，春天转为夏季，一切事情就变得忙碌起来，人物的活动、矛盾就开始变得复杂起来，家庭内开始吵起架来，村里的皮革加工厂也热闹起来，随着秋季的到来，皮革厂与村委会的矛盾开始加剧，秋雨落下来的时候，村里便出现了摔了一跤病得不轻而又被子女们遗弃的老莲婶子喝农药自尽的悲剧。到下一个腊月和夏季的到来，一切都在继续着，依然是吵架的归吵架，乡村乱象依然是乱象，等到春节的时候，连从北京城里回来的小梨也被乡村的攀比风感染开始胡诌起来。“风吹过村庄。把世世代代的念想都吹破了”。四季的轮转、人事的变化让作者的悲伤感深深地从纸面上透出来，让人感伤不已。

日本平安时代的物语文学就利用季节的变化来展示自然美，并用四季来丰富人物的精神世界。如紫氏部的《源氏物语》，用季节的各种物象来表现源氏与众多女性的感情纠葛，也以季节的推移来映衬他的感情起伏与波澜。比如，紫上是在年终岁暮，作者以当时的自然景物来暗示源氏生涯的终结。这种结构也很像中国的《红楼梦》。与紫氏部同一时代的清少纳言，其著名随笔作品《枕草子》在开篇的第一段就对四季的美作了精彩的描写，她将春天破晓的紫云，夏天暗夜的流萤，秋天傍晚的乌鸦归巢、大雁列飞以及日没后的风声虫声，冬天早晨下雪下霜时分的火盆烧炭，当作一种极有意思和情趣的物事来看待，充分展示了日本文学的四季意识。《源氏物语》里

就写到当时在皇宫里挂有古代画家画的四季景色画；在室町时代，还出现绘制四季的屏风画。为了遮盖大面的墙壁，日本的艺术家会将一些中国绘画大师如马远、夏珪等所创造的山水范本合并成一幅巨型图画，从右到左按春夏秋冬四季排列。当时著名的日本画家雪舟到中国旅行，受到中国绘画的影响也画过一套中国画的四季山水图。后来他回到日本做全国旅行，还作了一套从春到冬的四季山水长卷。1968年，日本作家川端康成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在其著名的讲演词《日本的美与我》中，一开篇就引用日本道元禅师和歌《本来面目》中的句子“春花秋月夏杜鹃，冬雪寂寂溢清寒”来展开言说，在结束时又再次提到它，说它是“讴歌了四季的美，其实富有深刻的禅宗哲理”。他的作品许多都与季节中的旅行相关，如《雪国》《伊豆的舞女》等等。

以四季譬喻人物的手法在日本文艺作品里也可寻见，如广为流传的日本民歌《四季歌》就以四段歌词将对春夏秋冬的歌咏与友人、父亲、爱人、母亲四类人物的美德联系起来。日本导演市川崑根据谷崎润一郎小说改编的电影《细雪》，讲述一个家族中四个女儿各自的婚嫁选择与人生境遇，其中四时的风物与女儿们的锦绣和服相映衬，透出极致唯美的东方意境。影片开篇即是京都赏樱的场景，结束于雪子出嫁后大阪迎来的第一场初雪，春樱、红枫与纷飞的细雪伴随着三女儿雪子的相亲和出嫁，这些片段就如以“花事”喻人，托风景寄情的含蓄俳句。《细雪》充分展现了日本民族的“物哀”审美意识，即将对“季节流动”的观感与“人生无常”的感悟相联系，“物哀”中“哀”的概念早已超越了最初“哀苦”和“悲怜”的狭义情感，而表达为通过“静观”而“知事之心”和“知人之心”的心理体验，更是

进一步发展为一个“将优美、艳美、婉美等种种审美要素都摄取、包容、综合和统一过来，从而形成了意义上远远超出这个概念本身的特殊的、浑然一体的审美内涵”。

“‘四季’意识作为一种文艺传统对日本电影创作者的构思也产生了深远影响。”日本电影《小森林》是一个以四季为纲的结构手法，全片分成“冬春篇”和“夏秋篇”，原著者五十岚大介在其漫画原本中并没有安排鲜明的四季结构，但在导演森淳一的改编之下，“将这些散漫的章节根据季节进行归置，梳理成一条较为清晰的时间线”，四季递进与女主角市子的人生阶段嵌合，构成逻辑十分流畅且自然动人的叙事篇章。故事从市子回到故乡小森并在这里农作、回忆，思索自己人生的道路，至她决定再次离开闯荡，多年后又回到小森，在一个春天的市集与村民们一同迎接新生活。女主角的向内自我探索和外部世界的时间流逝、万物变迁不时呼应，并且产生情感上的强烈共鸣：夏之闷热难耐是市子内心的困窘，秋之收获甘甜是市子尝到自己努力付出的回报，冰封大地之冬象征了深藏的往事和亟待破冰的心事，春回大地之时市子又回到了故乡，肚子里还怀着一个充满希望的新生命。从结构上看，电影《小森林》的改编找到了一个非常理想和充满寓意的形式，并借这个形式抒发了人物充沛的感情和生命探索历程。另外，“是枝裕和在《海街日记》的改编中同样选择了以四季作为故事发展的时间线索，一来体现了日常生活中时间流逝的感觉，二来暗示对人生起伏、风景流转的譬喻”。

韩国导演金基德的《春夏秋冬又一春》又是一个典型例子。全片以四季循环结构叙事并与“欲望、历劫、救赎、轮回”的主题萦绕丛生，正如它的片名所揭示，影片叙事按照春、夏、秋、冬乃至又一次春天来临而形成一个闭合的圆形叙事时空，四个季节分别与一个僧人人生的四个年龄阶段相对应。影片开始时，万物萌生的春对应童僧的无知和启蒙；下一篇则是躁动的盛夏，僧人已长成情窦初开的少年；肃杀的悲秋，青年僧人在犯下杀人之罪后重返寺庙寻求谅解，至冬季是服刑后回到寺庙的中年僧人的自我救赎；一个陌生妇女来到寺庙并留下了一个男婴被僧人收留，至下一年春天来临，男婴又成长为一个顽童，重复着曾经的童僧做过的恶作剧，预示周而复始的世情轮回。四季意象在这里化为具有佛教意义的象征体系。影片没有采用观众熟悉的按照因果律推进情节的叙事方式，而是采取一季一篇的“章回”结构，篇章之间的空隙耐人寻味，而相同空间、不同季节拍摄的寺庙及周围的空镜头将篇章充分衔接，这些表现“季节”的空镜头不仅仅只是过场场景，而是导演专注刻画的对象，通过对光影和色调的控制，导演精心营造了不同的四季氛围，令观众生出一种光阴荏苒世道人心循环往复的感慨。●

中餐西传梦华录

文 王丽华

汪曾祺先生曾有言：“人生忽如寄，莫辜负茶、汤和好天气。”一场疫情让我们对吃这件事更为关注。有研究表明，疫情期间绝大多数家庭的恩格尔系数暴涨，支出的80%～90%都与吃有关。民间有句俗语：“食在广州，厨出凤城。”食之于国人确实堪称人生一大享受，其中中国八大菜系中的粤菜还扬名海外。粤菜是如何流传到海外的？经历了怎样的独特历程？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可以在周松芳所著的《饮食西游记：晚清民国海外中餐馆的历史与文化》（以下简称《饮食西游记》）一书里找到答案。

史料扎实，为广东美食树碑立传

《饮食西游记》全书六章，其中五章以中餐传播的国家为主线，包括《美国中餐：最是杂碎能惹味》《英国中餐：从水手馆到香港馆》《法国中餐：大陆味，中餐贵》《德国中餐：



⑦ 各式各样的广式茶点

相对后起，与时沉浮》《欧美行次的中餐馆故事》，第六章《旅食异域的滋味》则记录了民国留学生的海外饮食生活，梳理了近代以来中华美食在海外传播发展的独特历程，展现了以粤菜为首的中华美食传播域外的“饮食西游记”。

胡文辉先生在《饮食西游记》序言中强调：“近现代以来，中华美食在海外广泛传播、备受称颂，首功是要记到广东人身上的，广东人是推动中国饮食文化走向世界重要的一支力量。作者是在为广东人及广东美食树碑立传。周松芳博士是文史学者，对岭南饮食文化研究甚深，他勤搜史料，以文献为基础，在故纸堆里挖掘出活泼新鲜、极为生动具体且

有针对性的第一手资料，为我们拼织出粤菜传播的巨幅长卷。”

在《美国中餐：最是杂碎能惹味》一章中，作者考察当时当地情形，多方考证，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与刘海铭教授的评论，揭示了“李鸿章杂碎”谣传背后的广东人的营销动机：利用李鸿章访美大做文章，试图向美国公众推销中国餐馆。广东人利用名人效应使“李鸿章杂碎”一时风靡美国，成功打开了中国美食在美国的市场。美国人的中餐馆也大多是由广东籍老板开办的粤菜馆。作者援引蒋梦麟先生《西潮·新潮》中所写到的一次“唐话”遭遇，不会说广东话却会写汉字引得店员的惊异，更凸显了广东人在海外中餐传播中的开拓性力量。

此外，在中餐馆前往英国、法国等欧洲国家落地生根的过程中，广东人也是主力军。《英国中餐：从水手馆到香港馆》中描述：由于“一口通商”的缘故，广东人很早就践土英伦，在早期的外国洋轮上充任水手与杂役，后来求学留英者也越来越多，推动了英国中餐馆的产生。从颇具风味的伦敦水手馆到英国中餐馆标杆的探花楼，广东人从主要食客转变为餐馆老板，广东风格与广东品格逐渐影响了英国的饮食文化。哪怕是在精于烹饪的法国，广东人经营的餐馆深受华工与留学生的欢迎，在巴黎的中餐业里立起了标杆，还曾流传出“天天万花楼”的逸闻趣事。在荷兰，中餐馆仍是广东人的天下，七处中餐馆全系粤人所办。

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一书中说：“我看中国近代文明进化，事事皆落人之后，惟饮食一道之进步，至今尚为各国所不及。”在近代中华民族饱受屈辱的岁月里，华侨在外实在不易。然而，广东人却在艰难的处境下努力传播中国饮食文化，让粤菜在异国他乡扎下根基，在西学东渐的时代里做到中餐西渐，其中虽有海外粤人基数大的缘故，但也足以窥见广东人坚韧不拔的奋斗史的

一角。

周松芳不是职业吃货，不重口腹之欲，算不上文人中的美食家，但他扎根于文献库、故纸堆，凭史实立言，为中餐西传做了一份历史总结，为广东人及广东美食树碑立传，实在是做了一件极有益处的工作。

内容丰富，令广大读者大呼过瘾

《饮食西游记》以“吃”为出发点研究中餐的传播路径，却不止步于饮食的描述，呈现众多口颊留香的美味，还讲述了清末民初学者文人的故事，读来酣畅淋漓，让人大呼过瘾，同时此书知识量大，视野广，用讲故事的方法讲历史，干货满满。

饮食与经济、政治、文化等从来都是密不可分的。在《饮食西游记》中，我们能从饮食中看到移民文化的传播、海外政治生态的变化、中西文化差异等。例如，英国的水手馆最初是为暂居或被迫长居此地的水手而开设，由于“一口通商”的缘故，早期的外国洋轮上的水手和杂役多是广东人。早期的远洋商船都要趁着季风航行，水手们从广东到英国后又要等好几个月才能启航，因此在利物浦等港口就居停了不少广东水手。他们中的一些人选择不再返航，而是长期迁住于伦敦等城市，这就是中国移民的早期雏形。美国最初的中餐馆同样是为赴美淘金的广东人而开设的，杂碎馆慢慢走出唐人街，日益美国化。当时的中餐馆也与国际革命政治紧密相连，有的中餐馆之间还存在党派争斗。其天然的参政优势大概源于两点：一是提供经费，孙中山早期的革命经费很多就是从中餐馆来的；二是提供场所，有革命热情的人们聚集在此，巴黎的万花楼曾一度成为重要的文化与社交舞台。

中国饮食是一门大学问，远行人会通过一道

美食想起一个城市，想起故乡与祖国；异乡人或者异国人也会因为一道美食萌生了解这座城市、了解这个国家的心思。英国著名汉学家阿克顿在吃惯广东菜后曾“希望自己能成为完整的中国人”，中华美食甚至能激发他的诗歌创作灵感。梁实秋在美国怀俄明州首府夏安火车站旁一小馆吃饭时，得见同为“唐人”的老板，并因这故乡之情而获得免费招待，大慰乡思之苦。另外，此书还杂糅了许多历史的

逸闻趣事，梁宗岱在巴黎几乎“天天万花楼”惹得其父大发雷霆；挽着法国女人成双成对而来的中国留学生在万花楼看到蒋梦麟，惊慌失措，几天不敢踏足万花楼；郭沫若与日本女护士安娜结婚，后又悄然回国，不久便重组家庭……书中这些掌故缓和了文言史料带来的冗长与正经，令读者一笑。

正如胡文辉先生所说，“此书不属于饮食写作”，不是写菜谱，而是从“吃”引发出去，将历史、文化融会贯通，讲的虽是中餐西传史，道的却是民国时代的社会经，其中深意留待读者细细品味。

视角独特，显本书作者独具匠心

古人云：“民以食为天。”中国人重视饮食，古已有之。商周时期，常以烹饪技艺的好坏，作为升降官员的标准，《周礼》还把主管饮食官员列为全书之首，并享有显赫的权势。俗话说，“开

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中国人始终把“吃”当作人生第一大事。《饮食西游记》从生活史的角度切入研究，梳理了学者们不太着力的饮食文献，从西方中餐馆的发展瞥见晚清民国海外生活的历史与文化，视角独特，文字亲切，显示出作者的独具匠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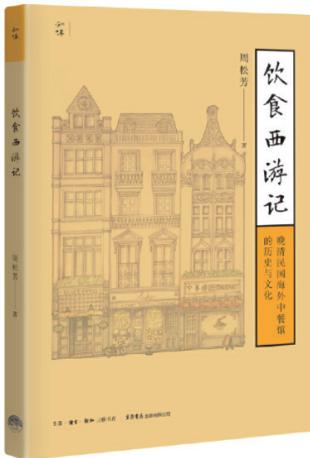
周松芳记录了民国时期知识分子的海外生活经历，借朱湘、赵元任等人的饮食生活、饮食爱

好拼织出一幅海外国人饮食图景，让读者对晚清民国的海外生活有了鲜活印象。令笔者印象深刻的有两个故事。一个是诗人朱湘写信给妻子，要她寄些腌鱼腊肉来下饭。信中有一句：“千万不要多，一样半块钱，总共一块钱的就够了。”其境况可谓是凄凄惨惨，令人嗟叹。另一个是一些不会做菜的留学生吃了没烤熟的土豆而死亡。中国人并不是生来就自带烹饪天赋的，旅居海外的中国人的生活也并不是轻松光鲜的。此时，

古时的民以食为天的准确性与深刻性就全然显露了。

昔年孟元老作《东京梦华录》再现当年京师盛况，“暗想当年，节物风流，人情和美”，引得后人无限畅想。而今周松芳挖掘史料，对中餐西传作了详细的研究，为广东人及广东美食树碑立传，让国人对中华美食更添一份自豪感。●

[作者系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2020级学科语文研究生]



《饮食西游记：晚清民国海外中餐馆的历史与文化》

作者：周松芳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区广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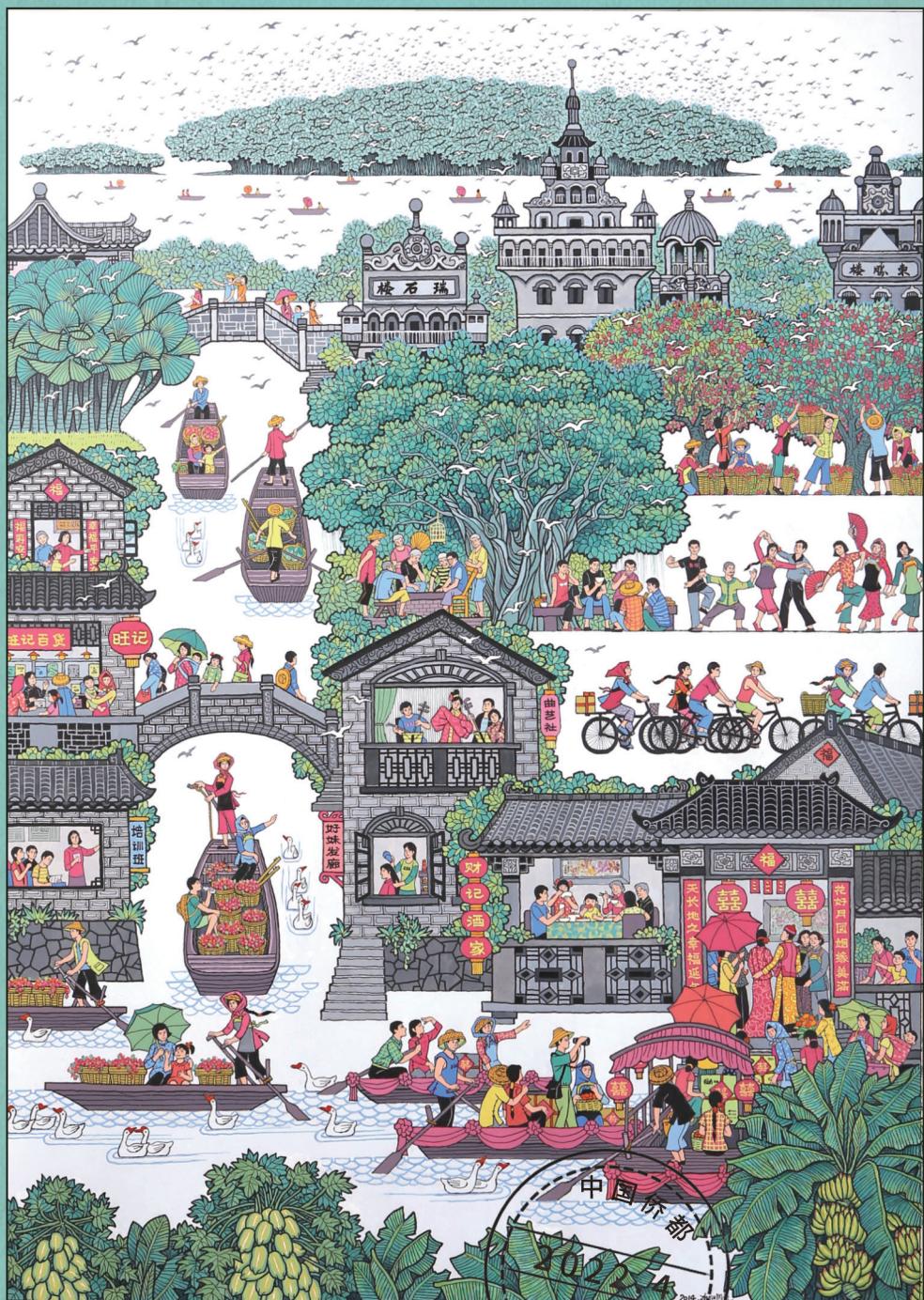
西樵山人，墨池春深阁主人。生于书乡世家，七岁被岭南书画名家、广东国画研究会核心成员卢子枢的高徒袁伟强收为入室弟子。从古法入手，转移摹写，坚守传统山水画风，走出一条复归传统的成功路径。其艺术风格承传着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的画学传统。被学术界誉为具有近百年历史的广东国画研究会第三代传人之一。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广州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广东省美术家协会理事、羊城晚报报业集团文化顾问、中央文史研究馆书画院南方分院研究员、原广州大学艺术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先后出版有《区广安画集》《区广安山水雅品集》《水石云林图》等画集30多种。作品曾在国内外多地城市展出，并被中国美术馆、北京人民大会堂、广东省博物馆、广东省美术馆、广东省档案馆等机构收藏。



区广安先生将中华虎文化生活化、平易化，有点宠萌，有点烟火气，充满了生活的气息。他的画笔所及之处，展示的是生活事物的纯真与良善，这种至善至美的追求构成他绘画艺术的视野和胸襟。欣逢虎年，南海之畔，虎文章华驭春风。区广安先生的虎齐聚珠江，虎虎生风，美美与共，不仅包罗了生活万象的风采，更是他对生活不倦的歌咏。

——刘迪生（《华夏》杂志总编辑，广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南粤侨都水乡和乐曲》(年画) 周敏 / 作

江门出海到大洋，是安居所乃家乡。

五邑才俊遍天下，满天星斗看辉煌。